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4 June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3 年实质性会议

2003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2

促进在发展中国家采用农村发展综合办法
以消灭贫穷和推动可持续发展

2003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第一章

2003 年世界经济状况**

* E/2003/100。

** 大会在第 53/208 B 号决议第 8 段决定，如果报告迟交给会议事务处，应在该文件的脚注内说明延误的原因。本文件迟交，但未按规定说明理由。



摘要

世界经济尚未从 2001 年的减缓中复苏。2002 年世界总产值增长不到 2%，连续第二年大幅度低于增长潜力。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业绩水平欠佳，但中国和印度以及一些转型期经济体是显著的例外。在更广的范围内，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经历与 2001 年相同，人均产出下降。总体而言，在新千年的头几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令人失望，其中一些国家更是遇到重大挫折。

现在预测 2003 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复苏，预计全年世界总产值增长 2¼%，2004 年将增速至稍高于 3%。预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将率先复苏，刺激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不过按照 1990 年代的标准，世界贸易和国际资金流动将继续缺乏生气，2003 年的出口增长将低于 4%。此外，如果近期美元对许多国家货币贬值的情况持续下去，将降低美国对这些国家提供的刺激作用。在此种情况下，预计 2004 年年底之前恢复适宜长期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将寥寥无几。与此相对照，转型期经济体在这次减缓中相对具有回弹力，并且预计将继续保持此种局面。

世界经济受到 2002 年年底和 2003 年年初升高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因素仍然构成压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不过在 2003 年第二季度，此种风险大大降低。2003 年年初，一种新的非经济冲击——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萨斯)——震撼了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不过，看来此种冲击已基本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仍存在一些充分确定的经济风险，可能威胁短期全球增长。其中最重要的风险涉及美国对外赤字不可避免的调整的性质。该调整过程看来已经随着美元贬值而开始。第二项相关挑战是，越来越多国家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在处理眼前这些威胁时，决策者不应忽视他们制订的处理长期全球发展问题的议程。

复苏推迟

曾经预计，美国将在 2002 年下半年开始从 2001 年的全球经济减缓中复苏，此种复苏将逐步加速并扩展到整个世界经济。2002 年曾有短暂的复苏，但稍现即逝，同伊拉克迫在眉睫的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是主要原因。

入侵伊拉克前升高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察知的风险通过若干渠道渗透世界经济。对冲突可能中断石油供应的担忧促使油价升高到远远超过经济基本面证明合理的程度；油价升高本身也是一种全球经济冲击，抑止总需求，并增加石油进口国的价格压力。全球政治紧张局势造成多数证券市场暴跌，加剧 2000 年开始的全球资产价格紧缩。一些国家的消费者信心和企业信心跌落到十年来的最低点。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资本支出下降。就经济而言，同伊拉克对峙的总影响是 2002 年晚些时候和 2003 年年初的活动减少，发达国家遭受的挫折最明显（见表一.1）。2003 年第一季度，这些国家的增长不仅没有出现预计的复苏，反而普遍低于前一年。

表一.1

1994-2004 年的世界产出和贸易增长

(年百分比变化)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2003 ^b	2004 ^b
世界产出 ^c	3.1	2.8	3.2	3.5	2.2	2.9	4.0	1.2	1.8	2	2
其中：											
发达经济体	2.9	2.4	2.7	3.0	2.5	2.7	3.5	0.9	1.4	1 ³ / ₄	2 ¹ / ₂
北美	4.1	2.7	3.4	4.4	4.2	4.1	3.8	0.3	2.5	2 ¹ / ₂	4
西欧	2.7	2.3	1.6	2.5	2.8	2.7	3.3	1.5	1.0	1 ¹ / ₄	2 ¹ / ₄
亚洲和大洋洲 ^d	1.3	2.0	3.5	1.9	-0.7	0.5	3.2	0.6	0.5	1	1
转型经济体	-7.2	-0.6	-0.1	2.4	-0.8	3.4	6.7	4.4	3.8	4	4
中欧和东欧	4.0	5.7	4.1	3.3	2.6	1.4	3.9	2.7	2.6	3 ¹ / ₄	3 ³ / ₄
波罗的海国家	-4.7	2.2	4.2	8.4	5.8	-0.2	5.5	6.7	6.3	5 ¹ / ₂	5 ³ / ₄
独立国家联合体	-13.7	-5.1	-3.6	1.4	-4.0	5.5	9.3	5.7	4.7	4 ¹ / ₂	4 ¹ / ₄
发展中经济体	5.6	5.0	5.7	5.4	1.6	3.5	5.8	2.1	3.2	3 ¹ / ₂	5
非洲	2.5	2.7	5.2	3.0	3.0	2.9	3.1	3.3	2.9	3 ¹ / ₄	4
东亚和南亚	8.4	8.1	7.3	6.0	0.5	6.3	7.1	3.7	5.7	5 ¹ / ₄	6
西亚	-0.8	4.0	4.6	5.5	4.1	0.7	6.4	-1.2	2.0	1 ¹ / ₄	3 ³ / 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3	1.4	3.7	5.2	2.0	0.4	3.9	0.3	-0.8	2	3 ³ / ₄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2003 ^b	2004 ^b
世界贸易	10.5	8.6	5.5	9.2	3.3	5.2	10.5	-0.9	1.8	4	7
备忘录项目:											
以购买力平价加权 ^c 的世界产出增长	3.5	3.4	3.8	4.1	2.5	3.4	4.7	2.1	2.8	3	4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

^a 部分为估计数。

^b 部分根据由联合国秘书长发展政策分析司和多伦多大学联合协调的国际计量经济模型合作研究组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c 按个别国家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加权数依据的是按 1995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d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e 采用另一种办法对各国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加权,按购买力平价,将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国内总产值转换成国际元(见附件导言:统计表)。

除西亚以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受伊拉克问题的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的直接影响程度较低。不过发达国家的复苏推迟具有间接消极后果。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内的困难加剧了此种后果。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期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形势对于疲弱的外部环境是一种缓冲。中国和印度提供了这方面最明显的实例,并且多数转型期经济体也表现出重大程度的国内主导增长。撒南非洲在较小程度上表现出类似的回弹力,不过增长仍然微不足道。

入侵伊拉克给该区域人命和经济活动造成重大损失。不过同人们担忧的情况相比,军事行动的时间较为短暂,人命代价较低,范围较小,对全球经济活动的破坏较轻,结果是,较早表现出来的上次地缘政治不确定期间显示的一些消极因素迅速并显著降低。油价回落,并且预计将随着全球石油生产的恢复而进一步降低,有利于全球增长和缓和石油进口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入侵后期间的产权价格反弹,反映并推动对经济前景的更乐观看法。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指数在冲突后也有所恢复。先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绝大多数消极后果预计将在 2003 年第三季度消失。

此外,曾预计将启动 2002 年复苏的若干积极因素仍然存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刺激作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继续保持低政策利率,一些国家还有进一步放松利率的某种有限度的余地。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受惠于财政刺激,一些国家已经允诺进一步放松财政。这两项政策刺激,加上一些发达国家房价骤升产生的财富效应,应能重振 2003 年的消费需求。周期性的库存补充也将提供推动作用,因为此种补充的时间推迟,所以可能比先前的预测更有力度。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产能过剩先前是抑制投资的重要因素,现在,尤其是由于该部门

特有的较快的淘汰率，此种过剩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伊拉克冲突结束之后的积极事态发展强化了这些基本的周期性因素，预示 2003 年下半年复苏情况良好。

与此同时，一些因素将妨碍复苏速度。低于平均值的增长期间延长加剧了早先的一些弱点。例如，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很可能限制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同样，敌对的国际政治环境尤其对一些具体部门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国际旅游业和航空公司，这些行业尚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攻击的后遗症中复苏。预计其中一些行业在一段时间里不会完全复苏；同时，它们更软弱的处境，包括破产，很可能给更广泛的增长带来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因素可能妨碍增长，使增长的加速率低于周期性上扬期间常见的水平。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受升高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严重，同样，美国从恢复正常局势中获得的利益也最多。因此，如同对 2002 年的预测一样，预计美国将领导全球经济复苏。看来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够承担这一角色。例如，日本在摆脱低增长轨道方面困难重重，同时德国看来在 2003 年年初进入衰退。大多数国家明确期待美国的增长得到改善，以此作为振兴本国经济的催化剂。

美国的复苏预计将在 2003 年下半年出现，并将刺激其他地方的增长。2003 年年初的美元贬值如果持续下去，将强化美国的复苏，但将降低美国的增长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刺激力度。不过世界贸易增长仍将加速，惠及所有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得益于更好的商品价格，尽管商品价格仍处于历史低水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因国际资本市场利率降低而受益。

必须实现广泛的复苏，因为虽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目前的积极力量可以启动复苏，但是仅靠其自身不大可能充分维持 2004 年全年的复苏。过去两年的企业投资特别不振，必须恢复此种投资才能维持复苏势头。过剩产能的减少应增加对新资本的需求，同时证券价格的提高和消费者需求恢复所带来的利润增加应有利于筹资。虽然低利率迄今没有刺激企业投资，但如果其他条件得到改善，低利率应有利于增加投资。不过为了劝说企业增加支出，还需要有一个更积极的国际环境，包括改善国际贸易，恢复国际资本流动。

更好的外部环境将使转型期经济体能够发展本国近期的强点。在发展中国家，预计 2003 年下半年和 2004 年外部需求的改善将支持拉丁美洲的复苏，并将为非洲提供有限但稳定的额外支助。部分由于今年年初萨斯的影响，南亚和东亚 2003 年的增长将放慢，但 2004 年将出现反弹。同样，在预测的 2004 年复苏之前，伊拉克局势将减缓西亚经济。

黯淡的国际经济环境

特别是同 1990 年代相比，当前的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缺乏生气，反映并促成世界经济的总体疲弱。2001 年世界出口下降，2002 年仅增加 2%，预计 2003 年增长不到 4%，预测 2004 年将扩大 7% 左右(见表一. 1)。世界经济承受的非经

济冲击损害世界商品贸易，但是尤其损害旅行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除了贸易增长率低于 1990 年代以外，商品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之间的比率(由于全球化，趋向于从 2 增加到 3)又回复到较低的数字。

油价在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攀升，2003 年 2 月中旬达到 12 年最高水平，但是入侵伊拉克之后，油价下跌，主要原因是预计该区域的石油供应中断情况将不如以前担心的那样严重。2002 年全年的平均油价同 2001 年油价类似(见表一. 2)，但预计 2003 年油价将下跌。

表一. 2

1998-2002 年国际经济环境指标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价格					
石油(每桶价格(美元)) ^a	12.7	17.8	28.3	24.4	25.0
非燃料商品(1990 年=100, 基年 1985 年) ^b	91.5	79.1	80.6	78.2	76.7
制成品出口价格(1990 年=100) ^c	95	91	87	84	86
贸易加权美元汇率(1997 年=100) ^d	116.5	116.9	119.7	126.1	127.2
利率(美国六个月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 ^e)(百分比) ^f	5.6	5.5	6.7	3.7	1.9
新兴市场利差(百分比) ^g	11.5	8.2	7.6	7.3	7.7
国际资金流动(10 亿美元)					
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净额	-33.7	-120.9	-179.3	-155.1	-192.5
官方发展援助	50.3	52.1	49.5	52.3	56.6
外国直接投资	128.0	133.0	125.6	145.3	110.0

^a 国际能源机构，《石油市场报告》。

^b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商品价格月报》。

^c 联合国，《统计月报》。

^d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e 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3 年 4 月。

^g 摩根斯坦利公司，新兴市场债券扩大指数(EMBI+)。

由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缓慢，2002 年**非燃料商品**的平均价格继续走低。在该总情况下，恶劣的天气条件使一些农产商品的供应减少，价格上升。2002 年年初，全球增长势头短暂增强，多数矿产和金属的价格改善，但年中之后的挫折使这些产品的价格由升转降。2002 年年底，价格重获上升势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渐增，美元疲软，预计 2003 年全年和 2004 年多数非燃料商品的价格将趋于坚挺。

2002 年年中和 2003 年头几个月，主要货币的兑换率发生重大变动，最明显的是美元对欧元贬值，并在较小程度上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如果美元贬值持续下去，将对全球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见下文)。

2002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金流动净额**仍相当巨大，主要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为面临财政压力的少数几个国家提供大笔贷款。比较令人鼓舞的是，2002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不但绝对数值增加，而且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尽管增幅很小。在这一年还有一些国家承诺今后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希望这标志着近年下降趋势的转折点。

2002 年的**私人国际资金流动**继续缺乏生气，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善。全球经济减缓和证券市场泡沫破灭使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公司之间的大规模跨界并购陷于停滞。

2002 年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私人资本外流和同早先流入的资金有关的对外付款数额不仅连续第六年超过相应的收入，而且外流量创造了记录。此种净资金转移加剧了发达国家实际部门缓慢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起初挺住了 2001 年的全球经济减缓，这可能是因为在投资决定和执行之间存在滞后效应。不过在 2002 年，全球经济状况和私营化减慢导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只有中国显著例外。短期内此种投资似乎不可能重新大量流入。另一方面，流入东欧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成本方面的考虑和这些经济体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前景是促成此种现象的原因。

2002 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私人资本仍然数量不足，并且流出量大于流入量，反映了此种资本流入的助长周期性波动性质和恶劣的地缘政治气候。对于能够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借款的成本趋于下降，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来，因为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同时降低了适用于发展中借款国的“利差”。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和世界经济逐步加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可能增加。不过同样的形势发展可能会促使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复苏，从而降低目前存在的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激励因素。

缓慢增长的对策

虽然初期的经济减缓程度严重，但因许多国家采取了反周期政策措施，包括自动采取的措施，减缓程度已经减轻。但是，特别是在缓慢增长期延长时，各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或者愿意采取扩张措施各不相同。持续滞缓表明，需要给予更多的刺激，但许多经济体的政策框架限制着许多当局采取此类措施。

发达国家对 2000-2001 年经济减缓作出的直接反应是大幅降低政策利率。虽然 2002 年能源价格攀升，而且一些国家房价上涨，但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把通货膨胀视为主要威胁，因此大多数国家在该年全年以及 2003 年初期维持了低利率。一些中央银行，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联储)在此期间进一步调降利率，

许多情况下将利率降到非同寻常的低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 2003 年年初之前一直采用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规定，使其没有太多行动余地，致使拖到 2003 年 3 月才削减政策利率。与此同时，它把 2% 的通货膨胀目标从以此作为上限改成以此作为指标，增加了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由于存在通货紧缩的可能，若干中央银行已表明，它们将考虑可否进一步酌情放松银根。2002 年，中欧若干国家也调降了利率，主要是为了减缓货币升值，以保持竞争力。

大多数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较少，原因是其庞大的财政赤字迫使它们自行执行预算规定，否则就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机构对其作出不利反应。美国是一个很大例外，2002 年，美国中央政府增支减税，两者结合起来产生了可观的财政刺激，并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在西欧，2002 年的财政政策稍具扩张性，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受到压力，需要稳固预算状况，以达到《稳定和增长公约》所确定的 3% 的赤字上限。日本政府虽然没有这种政策规定，但财政处境已经艰难，如果进一步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就会加剧国际评级机构进一步降低其国债等级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损害经济信心。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转型期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在 1990 年代已经好转，但由于政府收入减少，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因经济减缓而造成开支增加，自 2001 年以来更加严重的赤字问题仍是一大难题。但是，发展中国家中出现巨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些国家有着较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国家却面临宏观经济失衡状况并（或）存在其他、往往是外部的限制。中国和东亚的大多数经济体在目前缓慢增长时期，一直能以适当的反周期方式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与此相对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却不得不优先处理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这通常需要以限制性的、从目前来讲助长周期性波动的方式采用这些政策手段，而不是以之作为抵消目前滞缓状况的手段。2003 年，这种两极分化还可能持续，并将进一步使不同增长结果的情况维持下去，因而拉大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区域业绩和前景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如果要使普通公民的福祉每年都得到改善，就需要实现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增长。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在减少生活贫困人口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它们就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目前低于水准的增长时期有损于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虽然发达国家的增长普遍不令人满意，但 2002 年这些国家中仅有四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有所减少（见表一.3）。转型期经济体境况更好，仅有两个国家人均收入出现倒退。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所监测的 95 个国家中，有 33 个国家的人均产出有所下降（2001 年为 37 个国家）。这 33 个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 8%（2001 年为 10%）。2002 年，有 16 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取得了超过 3% 的增长，它们占全世界人口的 46%。但是，这一群组中大部分人居住在中国和印度。如果将这两个国家排除不计，则发展中世界其他地方 25 亿人口中仅有约五分之一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 3% 的国家。在可获得数据的 41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2002 年有 15

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仅有七个最不发达国家在 2002 年取得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3% 的增长，与 2001 年相比减少了五个。这些数据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来说，2002 年是减贫方面又一个进展甚微的年份。

表一.3

人均产出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频率，2000-2002 年

	受监测 国家数目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降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超过 3%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a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a
		国家数目					
世界	145	25	41	39	69	45	40
其中							
发达经济体	24	1	3	4	14	2	3
转型期经济体	26	0	1	2	21	23	21
发展中国家	95	24	37	33	34	20	16
其中：							
非洲	38	14	10	10	7	12	7
东亚和南亚	18	1	7	2	13	4	6
西亚	15	3	7	7	7	3	2
拉丁美洲	24	6	13	14	7	1	1
备忘项目：							
最不发达国家	41	16	12	15	9	12	7
撒南非洲	31	13	9	9	5	10	7
		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百分比					
发达经济体	16.6	0.0	4.8	0.1	3.6	0.2	0.3
转型期经济体	17.9	0.0	0.0	0.1	5.8	5.6	5.3
发展中国家	65.5	5.1	10.3	8.0	57.4	45.9	46.4
其中：							
非洲	26.2	3.6	2.4	1.9	1.0	4.1	1.5
东亚和南亚	12.4	0.1	1.3	0.5	48.4	40.4	42.2
西亚	10.3	0.4	2.4	1.3	2.9	1.2	2.3
拉丁美洲	16.6	1.0	4.3	4.3	5.1	0.2	0.4
备忘项目：							
最不发达国家	28.3	2.6	2.1	2.1	4.2	4.4	2.2
撒南非洲	21.4	3.1	2.3	1.8	0.7	3.5	1.5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包括《世界人口前景》2000 年订正本第一卷，综合图表和更正（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XIII.8 和 Corr.1）中的人口估计和预测。

^a 部分为估计数字。

发达国家：复苏脱轨

因可能发生伊拉克冲突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2002 年年初的 5% 跌至第四季度的 1.4% 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战争威胁”已大体消除，经济前景现已改观，而且随着 2003 年的向前推进，预期增长将加速。战前家庭消费部门较为疲软，但应会改善：消费者信心已经恢复，利率仍处在历史低水平，房屋和住宅建筑市场仍保持强劲。美元贬值将在中期促进出口和进口替代活动，而中期的复苏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支出是否增加。随着 2002 年的向前推进，加拿大的增长已经放慢，主要是由于出口更加疲软。预计 2003 年增长还会下降，但预期出口和商业投资会带动复苏。

日本经济 2002 年仅增长 0.2%，强劲的出口是该国经济未陷入衰退的主要因素。前景仍然严峻，住房投资滞缓，预期公共投资将进一步减少，家庭消费情况不能令人乐观。由于预计库存将得到补充，而且公司投资将出现一定复苏，预期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预计在 2003 年和 2004 年期间仍将在低位徘徊。但是，增长仍严重依赖出口，因此易受日元升值之害。

西欧 2002 年的增长率仅为 0.9%，但预期 2003 年将有所恢复，2004 年则将进一步好转。由于低于趋势的增长时期延长，导致整个区域失业率上升，若干国家接近或超过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3% 的上限。加上欧元升值，这些因素将不利于恢复，但预期消费会慢慢升温，商业投资预计会出现回升。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2 年强劲的国内需求对疲软的对外部门起了抵充作用，两国经济增长均超过 3½%。企业盈利丰厚，债务水平较低，促使加大资本投资，而就业率的增长和实际工资的增加都带旺了家庭消费。预期两国经济的增长将减速，但 2003 年和 2004 年仍将保持在 2½% 至 3% 之间。

转型期经济体：减速有限

中欧和东欧的增长率 2002 年几乎保持不变，但预期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有所上升。截至 2002 年底，已有一些迹象显示中欧工业生产有所增加。总的来说，预期以下因素将有利于增长：国内需求持续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不断涌入和相关投资，以及欧盟将生产部门进一步转移到该区域。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大体上继续不受全球经济动荡的影响，自 2000 年以来每年都取得强劲增长。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国较旺的国内需求、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在里海区域进行的相应的油气投资，是这一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中亚，由于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大规模投资，许多国家的经济水平高涨，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则得益于其矿产和金属部门的扩展。预计整个区域的增长在 2003 年将达到 4½%，2004 年则将回降到 4¼%。

波罗的海国家 2002 年增长了 6.3%，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并采取灵活措施满足独联体强劲的需求以抵消欧盟需求的减少。预计 2003 年和 2004 年增长将逐渐放缓，但国内需求仍将推动增长。

发展中国家：成绩持续欠佳

预计**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2003 年将稍有改善，2004 年则继续加速。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在 2003 年下半年有所好转，预期出口将会增加。几乎各类出口商品的预计价格增长将使出口收入进一步增加，因而有助于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石油输出国组织减少配额，以及国际需求不旺，抑制了北非 2002 年的经济业绩，但预期这些经济体将在 2003 年出现更强有力的增长。撒南非洲 2002 年的增长主要源自国内因素的推动：大多数国家得益于农业产出增加、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非农业部门的大幅度增长。预期这些正面因素的影响将在 2003 年和 2004 年继续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少数国家持续动荡，一些分区域前景暗淡。

东亚从 2001 年的经济急剧放慢中回升的速度将在 2002 年下半年开始减缓。2003 年第一季度外部需求依然低迷，而且由于爆发萨斯，预计该年度全年的增长都会进一步降低。如果这一流行病得到控制，预期增长将在该年下半年好转，并一直持续到 2004 年。美国的进口需求以及中国持续较旺的需求将有助于出口增长，而总体上有利的政策、较低的油价和不断增长的信心将拉动国内需求，促进工业生产，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工业的生产。

中国在 2003 年初已经加快增长。国内需求和对外部门均迅速扩展。所有部门和地区的固定投资带动国内需求，而住房部门继续快速扩展。出口和进口在 2002 年都取得了超过 15% 的增长，预计将在 2003 年增长近 20%。尽管存在一些长期挑战，如大量失业、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金融系统较为脆弱，预期 2003 年和 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南亚增长率 2002 年稍有提高，该区域近期前景向好。国内需求和出口均对增长有利。大多数国家在 2003 年上半年出口不断增加，预期随着国外需求在该年度下半年回升会进一步增加。预期国内需求也会增强，其有利因素是低利率，出口不断增长以及气候条件正常后获得更好收成。到 2003 年年中将出现更强劲的增长，而 2004 年的前景是将会有进一步增长，整个区域更加平衡。

西亚经济在 2001 年滑坡之后，2002 年由于大多数石油输出国石油产量下降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冲突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增长起色不大。而伊拉克局势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旅游收入以及消费者信心和投资信心降低。入侵伊拉克对该

国和该区域都产生了不利的经济影响。虽然对石油基础设施的损害有限，但要恢复到战前的石油生产和出口水平，可能需要数月时间。随着油田开发和若干石油化学产品项目上马，预期 2004 年区域前景将有所好转。伊拉克的重建将进一步刺激该区域发展，但其他石油输出国家的增长将起色不大。预期该区域的石油进口经济体不会展现太多活力。

拉丁美洲经济在 2002 年萎缩之后，正在取得有限复苏，但疲软的国际环境以及若干国家的国内经济或政治问题仍是一种制约因素。该区域的增长继续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大量注入。虽然外国直接投资依然是外部供资的主要来源，但流入的资金总的来说比较少，而一揽子有价证券投资的流动则变化无常。

短期不确定因素及风险

在短期内，政策制定者必须以恢复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首要任务。虽然近期经济前景要比 2003 年早些时候预测的情况好一些，而且估计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有望逐渐复苏，但是短期前景仍然充斥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总体情况仍然对经济增长不利。

首先，一些地缘政治风险虽然已经缓解，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入侵伊拉克虽然消除了战争前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但西亚及其他一些区域的政治发展仍然前途未卜。2003 年第二季度又发生了一些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说明此类活动今后还可能继续发生。经验表明，此类活动对信心及对短期增长有较大影响。

自入侵伊拉克以来，**石油价格**虽然已经下降，但是仍然非常不稳定，因而上涨或下跌的风险都存在。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因素可能更多一些，因为潜在的过度供应可能导致油价在 2003 年晚些时候或 2004 年进一步下跌，跌破预期的幅度，这会对全球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降低了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 2003 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这一疾病的爆发看来已大体得到控制，但是如果这一疾病或者另外一种具有类似破坏性的疾病蔓延开来，就会对一些区域经济体，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起到催化和推动作用，因此也容易受到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的影响。美国经济特有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其对**外部赤字**势在必行的调整，将属于什么性质以及何时进行。实际上，2003 年头几个月美元贬值的时候，这一调整可能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次贬值本身也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了一些风险（参看方框一.1）。

方框一. 1

美元贬值的经济意义

自 2003 年初以来，同其他许多货币相比，美元的价值大幅度下跌，同欧元的比价下降最为迅速。同 2002 年高峰时期相比，美元相对于其他 10 种主要货币的贸易加权指数已经下降近 20% (看图)，尽管这一指数仍然要比 1995 年上一次低谷时期高出 10% 以上。同欧元相比，美元已贬值近 30%，目前处于自 1999 年 1 月欧元启用以来的最低水平。^a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人们早就认识到，汇率的波动经常会大大突破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合理范围。这些经济基本面，如各国在通货膨胀率、金融资产回报率 and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的差量，以及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对比等，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政策干预及政治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美元的贬值可以被看作是 1990 年代末的美元强劲走势的回落，当时对美国货币有利的一些力量现在已经减弱，甚至逆转。

人们对伊拉克战争前景忧心忡忡，这是美元从 2003 年初开始跌价的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因素还是，大家对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究竟能够维持多久的担心由来已久且与日俱增。^b 主要国家的利率差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

^a 如果将德国马克作为欧元启动之前时期的代表性货币，美元现在的价值要比 1995 年最低点时期高 20%。

^b 《200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1.II.C.1），第一章，分节，标题为“不确定性和出现不利情况的危险性”。

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比大多数其他经济体都更加迅猛地降低利率，尤其是同欧元区国家以及“美元集团”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相比。1990年代末，美国的股价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升值，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推动对美元的需求。那时候，利率差量的作用被掩盖了，但是股票价格下跌以后，利率差量的影响力可能已经重新显现。另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大大减缓，至少短期情况是这样，降低了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差量。而且，美国已放弃，或至少是以默示方式放弃了过去十年执行的“强势美元”政策。鉴于所有这些情况，可以说，对于美元的贬值，人们预期已久，不足为怪。然而，美元仍然前景难料，暴涨暴跌的可能性都有。^c

美元价格走低不仅对美国经济而且对世界其他经济都产生影响。从原则上看，美元贬值应该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特别是对过去两年中比较疲软的制造业和出口业有利。对实体经济的大多数影响可能只会逐渐显现，因为美元贬值转化为相对价格变动需要一定时间，而实际需求和供应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则需要更长的时间。^d 美元价格走低会增强美联储低利率政策所产生的货币刺激，这对出口和公司利润，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出口和利润影响最为有利。对贸易赤字的影响也不会立刻显现出来，相反，短期内赤字还将继续扩大。^e

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有可能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持有美元标价的金融资产的外国投资者亏损。这进而会引发流入美国的资本进一步减少，减少对美元的需求，促使美元进一步贬值。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就会陷于危险，受到损害，妨碍经济增长。

美元贬值对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增长有利有弊。贬值削弱了进口需求，从而削弱了美国作为带动许多其他经济体复苏的全球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的发达经济体的制造和对外贸易部门将面临更大

^c 根据基线展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速度预计将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快得多，对美元有利。

^d 包括“联接项目”在内的几项计量经济研究都显示，大约需要一年时间相对价格中才会体现美元贬值的一半效果，美元贬值 10% 大约会导致美国次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1 个百分点。

^e 这是由于所谓的“J 曲线”效应的影响。当遇到象美国现在这样，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的时候，对进口商品实际需求的调整额要比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增加额低一些，所以一开始反而会导致增加进口开支。

的衰退压力。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本国货币同美元挂钩、或者对美元升值不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从美元贬值中获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进口需求不会受到影响。许多商品的价格可能会由于美元贬值而上涨，因而增加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收入，但是这些经济体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即贸易条件未必能够得到改善。美元贬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承担美元债务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国家的负担。

美元贬值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还取决于这些经济体采取的相应政策。例如，在欧元更加坚挺并因此面临较小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也许会在降低欧元利率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而这将会刺激内部需求。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利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了降低利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大余地。

另一个单独但相关的风险是**美国财政赤字**不断膨胀。虽然这一赤字不会立刻构成威胁（相反，2003年政府开支进一步增加是一项适当的反周期措施），但是其产生的挤出效果有可能会增加中期困难。这包括利率的升高，而利率增加会对消费及投资支出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由于美国经济所起的关键作用，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的其他风险也特别威胁到美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特定的国家内部，一些工业部门仍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起初，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中这一趋势最为明显，但此后该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有所减少。但是，在受过去两年地缘政治演变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些部门（例如航空公司和旅游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如汽车）中，现在也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这方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将对商业投资产生压抑作用，而这一类投资对维持经济复苏是很必要的。

证券市场正在从伊拉克局势的负面影响中复苏，原先担心的价格进一步大幅度或者长时间下跌的情况，现在看来不大可能出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住房业存在泡沫**。不断上涨的房价一直是维持这些国家强劲的消费开支及住房业和建筑业本身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上升的房价以及日本的经验都说明，泡沫一旦爆破，就会对这些经济体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通货紧缩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深远的消极后果；也影响到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并且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在一些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中出现。美元贬值减少了美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但却增加了货币升值的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国家特别是德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一些亚洲经济体出现了短期的通货紧缩，但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后果，然而日本出现的情况突出显示，如果让通货紧缩扎下脚跟，就会带来种种危险。在采取反通货紧缩措施的时候，应当比采取反通货膨胀政策时更预先采取行动，并且更应该以前景展望为依据而不是以目前的情况为依据。这种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自身固有的一系列风险。

履行新的发展承诺

要在中期内维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任何积极趋势，必须重振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以便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挑战。国际发展合作有助于修复过去一年中多边合作遭受的破坏，并且也可以作为一项重要手段，来解决引发深层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全球不平等状况。

2002 年底至 2003 年初期间，出现了一些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在此之前，国际社会曾通过一系列全球会议，就发展优先事项和行动达成了国际共识。2001 年 11 月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2002 年 3 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 2002 年 8 月至 9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共同确定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种新的全球促进发展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共担责任和相互承诺来加速发展。这一伙伴关系的所有实施方案均同时重视资源和政策两个方面。

在过去一年中，为完善和落实实施方案所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越来越有必要对各项政策和方案加以协调统一。在某些政策之间存在直接矛盾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尤为明显，但是一般来说，这需要确保所有政策和行动都要尽量有利于发展。

确保在贸易议程上取得进展

在实施于多哈、蒙特雷和约翰内斯堡制定的各项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得失参半，这是必然的。其中，多哈发展议程的规定期限最短，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短期潜力也最大，但取得的进展却最小，这是非常不尽人意的。该议程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设定的最后期限已过，但仍没有达成协议。这些问题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切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贸易的考虑，同时也是因为关系到发展领域的某一优先事项。由于起步已晚，所以要顺利完成多哈方案，就必须拿出高度的政治决心，包括发达国家必须愿意采取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调整措施，进行贸易制度自由化。

多哈工作方案不仅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且时限也非常紧张。不过，各方商定，该方案是一个“一揽子承诺”，所以，“除非全部谈妥，否则就等于全部谈不妥”。多哈谈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务必取得成功，但鉴于到目前为止进展甚微，本来实现难度就很大的目标现在就更难以实现。如果在即将于 2003 年 9 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能取得切实的进展，那将具有根本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根据《多哈发展议程》进行的谈判及其它工作进行中期进展审查。这需要各国政府对这些谈判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将贸易谈判作为促进发展的新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还应该在目前需要加

快全球短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看待这些谈判。为此，各国政府可以在今后最近一段时期里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领域最重要的若干问题，并采取更具开放性的态度。

其中一个优先问题是，推行 2001 年 11 月 14 日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问题的宣言》。¹ 该宣言是发展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因为它授权发展中国家向国内实体颁发许可证，允许其生产“主要供给国内市场”的专利药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31 条(f)款）。然而，自己缺乏必要药品生产能力的国家，不但不能利用这一项规定，而且也不能从获得许可证的国家进口药品。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往往是最贫穷、受疾病之害最重、也是最需要低成本药品的国家。各国政府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已经两次没遵守它们自己设定的时限，至今没有能够解决（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宣布，在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暂时停止目前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福祉，因此是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核心。及时达成一项妥协的、并且可能是逐步解决的办法，可以为多哈谈判提供其急需的推动力，同时也能够显示促进发展的新伙伴关系的效力。这不仅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也是公共部门同私营部门之间结成的一种伙伴关系。

另一个主要关切是农业贸易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为其农业部门提供补贴及其他支持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大家一直都在鼓励发展中国家取消补贴，以便消除其经济中的不正常因素，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然而发达国家却继续维持对许多农产品提供巨额农业补贴以及征收高额关税的做法。由于农业部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因此上述这些措施直接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同这些国家进行其他形式合作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些措施直接违反了伙伴关系原则及一致性原则，而这两项原则是新发展协约的支柱。因此，发达国家应当立即开始降低农业补贴，并承诺在一定时限内彻底取消补贴，且不以此作为多哈其他谈判的交换条件。可首先从消除所有出口补贴开始，并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农产品的做法；这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并进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水平，包括许多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产生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

在为促进全球贸易体制更有利于发展而举行的一轮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受到特别重视。大家普遍认为，同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应当实行较宽松的贸易规则，但是这一原则应当如何具体实施，则众议不一。因此，在“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的谈判也一再突破规定的时限，未能完成。

¹ 若需查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可参看 1994 年 4 月 15 日于马拉喀什完成的《体现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各项结果的法律文书》(总协定秘书处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GATT/1994-7)，附件 1C。

最不发达国家是尤其应该获得特殊待遇的群体。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以及一些双边和区域性的减让安排都确认了这一点。特别是，欧洲联盟“除武器外全部免税”的措施使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非武器商品可以在免除关税的条件下进入欧盟市场，香蕉、糖和大米等所谓的敏感商品除外；而所有这些敏感产品的关税将在 2009 年之前取消。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差别待遇方面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所有发达国家均应实行“除武器外全部免税”的原则，这些承诺应当限于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另外，一些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对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的原则。最后，应当不遗余力地推动早日取消敏感产品的关税，哪怕是以个案处理的办法加以消除。

解决外债问题

过去几年突出显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 20 多年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偿付外债的困难。这一问题有一个长期解决办法是，发展中国家尽量利用不造成债务的资本流动。这种做法实际已经形成，因为资本市场比以前更不愿意贷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时，从阿根廷的严重危机中可以看到，需要达成更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便处理同现有债务有关的私营部门债务危机。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如何避免和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金融危机的讨论，应当继续下去。

还有必要解决重债穷国迫在眉睫的困难。目前有 15 个重债穷国，如那些刚刚经历冲突的国家，它们的情况还没有得到审议，对它们的资格需要尽快加以评估。已经审查的 26 个国家中，仅有三个在达到增加优惠的重债穷国倡议中规定的“决定点”之后，能够进而在 2002 年 4 月至 2003 年 4 月之间到达“完成点”。这样，此类国家的数量已达到 8 个。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所有合格的国家能够尽快达到完成点。在其中几个已经达到完成点的国家中，为使其能够按最初的构想获得持续承受债务的能力所需的减免数额高于预期。其原因往往是，商品价格下跌，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或出口收入经常低于预期目标。有必要确保重债穷国方案能够将一个国家的债务减到即使受到不可抗力的消极影响仍可持续承受的水平。最重要的是，由于重债穷国信托基金资金短缺，另外，由于并非所有债权国都减免了债务，因此债务减免的数额已经受到威胁。需要再作努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全面实施这一倡议。

恢复减让性资金流动

2002 年官方发展援助的增加令人鼓舞，一些捐助国还承诺将在今后几年进一步增加捐款。但是考虑到即使这方面有所改善，仍然不能达到普遍认为需要的数额，因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于 2003 年提议建立一种国际融资机制，旨在于今后几年将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一倍。虽然一些捐助国对这一提议存有疑问，但是它反映官方捐助者认识到，需要大幅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流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通过简化和协调有关手续，在提高援助效率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这些积极情况由于援助被进一步政治化而大打折扣。捐助界越来越倾向于将援助集中在那些它们现在认为采取了“正确政策”，包括进行“善政”的受援国。正确的政策和善政的确会促进发展，但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义。从概念上说，这种方式与现在的一些普遍观点难以相容。舆论普遍认为，附加条件的做法不可行，也不可以千篇一律，且自主权在成功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鉴于捐助界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因此对它们来说，采取稍微谦虚谨慎一点的态度可能更妥当一些。

全球地缘政治的局势也正在对援助资金产生影响。根据记录，美国作为最大的捐助国在 2002 年突然大幅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但是这主要是针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反应。预计伊拉克重建将会导致今后几年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通量大幅度增加。最近几年捐助界作出了一些努力，确保对官方发展援助进行适当的界定和衡量，如排除高收入受援国。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地缘政治目的，但是纯粹用于地缘政治或者商业目的的资金应当单列，以便确保这些资金的支出不会影响向许多需要援助、以迎接长期发展挑战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第二部分

经济政策与贫穷

概述

联合国 189 个会员国于 2000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¹ 列述了旨在改善 21 世纪人类福利的一系列承诺。《千年宣言》确定的发展目标重点是通过基础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来消除贫穷。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在 1990 至 2015 年间将每日以 1 美元或低于 1 美元为生（极端贫穷线）的世界人口比例减半和将挨饿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贫穷本质上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人类境况的许多方面，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到环境、政治和文化方面。具有多方面特点的贫穷的定义各不相同，并表现在收入、消费、被剥夺获得卫生和教育资源的机会、易受伤害、没有发言权和没有权力等方面。² 即使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也不能轻易描述他们遭受的贫穷和困难。不过，他们没有发言权的状况正得到解决。世界银行了解和减轻贫穷的部分工作包括征集和出版穷人的观点、经历和愿望。³

了解贫穷的原因、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贫穷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对制定和执行实现《千年宣言》减贫目标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在国家和全球两级衡量贫穷程度反过来又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能够对政策行动的影响进行评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各种贫穷指标，以监测具体目标的实现情况和评估国家和国际行动。

到 2015 年将贫穷减半的目标促使决策者日益关注直接以实现这一目标为目的的政策和措施。同时还必须审查也许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这一目标的早期政策，以及实现其他可能相关目标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对贫穷产生影响，虽然它们本身并非直接以减贫为目的。本《概览》的第二部分考察了其政策在中期或更长的期限内有望对贫穷产生有利影响的若干领域，即使这些政策的首要短期目标并不是减少贫穷。

本《概览》的第二部分特别审查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若干领域的经济政策对贫穷的物质方面，如收入、消费、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审查的政策有货币和财政政策（第五章）、贸易政策（第六章）、农业改革（第七章）和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制定的政策（第八章）。这些政策的特定目的并不是

¹ 见大会 2000 年 9 月 8 日的第 55/2 号决议。又见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A/57/270 和 Corr. 1），特别是题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附件。

² 《2003 年世界社会概况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即将出版）讨论了社会易受害性、没有发言权和没有权力等方面，并审查了旨在消除造成穷人易受害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的若干政策。

³ 为世界银行开展的部分工作，即“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穷进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系统收集了 60 个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 60 000 名男人和妇女的观点。这些观点分三卷出版：《穷人之声：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纽约）；《穷人之声：要求改变》（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纽约）；以及《穷人之声：来自许多地方》（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纽约）。

为了消除贫穷，而是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率以便从长期减少贫穷。例如，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被认为主要通过经济增长对贫穷产生有利影响：这两个领域的适当政策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而增长反过来又能减少贫穷。⁴ 农业改革通过农业生产和分配效率的提高以及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模式来影响贫穷的发生率。这些不同的政策通过不同的渠道，不仅从长期而且从短期和中期对贫穷的发生率产生影响。

国际社会对减贫的重视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即所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贷款均要求编写国家减贫战略文件。这些文件的重点不仅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对减贫的影响，还包括旨在向穷人提供就业和教育以帮助他们摆脱长期贫困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帮助他们克服当前困境的收入补贴和粮食援助等措施。这反映了应当向目前贫穷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找到工作的人提供帮助，并向因就业机会没有增加而仍然处于贫穷状况的人提供额外帮助这一考虑。暂时贫穷和长期贫穷之间的这种区别非常重要，但经常被总人数所掩盖，因为这些数字没有区分譬如贫穷状态超过一年的人和计算人数时仍然贫穷但此后不久即摆脱了贫穷的人。这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均有关系。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将旨在确保长期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因此确保使暂时衰退时期因失业而陷入贫困的人摆脱贫困的——宏观政策与旨在解决长期贫穷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见第八章）。

政府可采取的经济政策和实现经济活动自由化的整个运动会对贫穷产生什么影响仍然是一个问题。对这些不同经济政策的审查表明，虽然它们从长期来说是减轻贫穷发生率的有效工具，但需要微观政策的补充，以便在中短期对减贫产生最大影响。第二个考虑是经济政策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而且，至少从短期和中期来说，如果不采取适当的行动，有些人群可能会受到损害。尤其是，虽然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一个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活动的开展，但可能会导致没有这种优势的其他活动的长期下降，甚至消失。同样，虽然基于市场的农业改革能够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现有资源，但必须制定国家支持的筹资计划，以确保得不到贷款的最穷的人不会失去什么，实际上能从中获利。这两种考虑最直接的影响是必须同时或相继采取若干补充的政策。

但很难说明这些政策之间的联系及其对贫穷的综合影响。第二部分的目标是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个教训是需要国家和国际两级加强关于政策的轻重缓急、关于相互补充的政策之间的权衡以及关于适当排序的讨论。例如，有些转型期经济国家在 1990 年代的经验表明，在实施经济政策时必须认识到可能对贫穷

⁴ 关于对有效的政策、增长和减贫之间假定联系的批评，见 Joseph E·Stiglitz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专稿（贫困、全球化和增长：对一些与统计相关问题的看法）。

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必须合并实施能缓冲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并以最有可能陷入长期贫穷的人为对象的补充政策。

为说明经济政策和贫穷之间的联系，并确定对第二部分审查的政策进行评估的框架，第四章认为应从不同方面评估政策对贫穷的影响。评估一项政策对贫穷演化情况的影响主要依赖于(a) 政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贫穷方面，包括收入和/或非收入方面；(b) 使用的汇总级别，如国家或国家以下，城市或农村，贸易或非贸易部门，妇女或男子；以及(c) 对政策影响进行评估的时间范围—短期或长期。

第四章审查了增长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并以多国经验和案例研究为基础说明了使用以上三个方面来确立政策评估框架的重要性。经济增长和收入方面贫穷的减少经常相互关联，但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未必导致卫生状况的改善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卫生状况和教育程度是长期贫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只考虑贫穷的收入方面，一般会发现经济增长对穷人有利。但这种结论是以大多数国家的平均经验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同一程度可能会对不同国家的贫穷发生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取决于起初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增长源（如出口驱动的增长与用于国内消费的农业生产的生长相比）。因此经济增长可能会对某些人群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从相对方面来说。另外，由于连长期增长也很少是稳定增长，经常会有短期的起伏，在经济低迷时期，穷人—他们很少有资产来抵消这些起伏带来的消耗—与非穷人相比，更有可能变得更加贫困。

第五章分析了货币和财政政策对贫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其中特别讨论了经济危机时期的这些关系，这一时期穷人是受不利影响最大的群体。该章审查了东亚和拉丁美洲在过去十年的经验，以便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时行时止可能产生的某些影响，特别是对贫穷的影响。其中强调了在增长期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以及在危机时期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能够保护穷人的重要性。分析的重点是城市贫困人口，因为他们在经济危机时期比农村贫困人口更易受到伤害。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不足以解决穷人的问题，必须采取补充措施。

分析强调，预防或减少经济震荡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就贫穷而言，因为保护穷人很少是危机发生时宏观经济反应的优先考虑事项。因此，甚至在危机爆发前就应该在社会保护方案内确立预防措施，在危机爆发时须采取纠正措施，其强度视需要而定。城市地区获得卫生、教育和营养的机会通常优于农村地区，但由于许多穷人都在非正规部门，这些方案更有可能惠及正式部门的中高收入家庭。因此，除正式的社会方案以外，有必要提供以一般民众的参与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社会援助，以便使援助惠及所有穷人，特别是非正规部门的穷人。

第六章阐述了贸易自由化如何因为其增长的长期影响而有利于减少贫穷，重点讨论了短期和中期调整对贫穷发生率的影响。该章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影响贫穷的各种渠道。其中包括价格和商品与服务供应的变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投

资和技术转让激励的措施变化，对政府税收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总的来说，贸易自由化对穷人是有益的，虽然它通常需要其他政策的补充。在各国降低吸引外资的标准方面基本上没有“一拼到底”的证据。不过，最贫穷的国家在充分利用贸易创造收入的潜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重大障碍，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补助政策。

第七章讨论了旨在增加农业生产率的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确定了这些政策对实现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在撒南非洲。该章表明主要粮食市场的自由化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特别重要，他们经常靠生产主要粮食来创造大量收入。因此应特别注意粮食销售改革在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该章还分析了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如何能够促进更大的经济效率和更公平的农村增长模式。

该章表明，虽然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减轻农村的贫穷，却仍然能对减缓贫穷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着重强调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及成本效益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在减缓农村贫穷方面产生了混杂的效果。因此未来的主要挑战是采取纠正措施，在保持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方法所产生的效率提高、销售成本减少和财政储蓄增加的同时，解决实施改革产生的问题。

第八章讨论了独一无二的震荡之经济方面对贫穷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东欧，然后是分解成独立国家的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终结。人们普遍认为，将在体制崩溃后短时期内建立市场体制，并达到较以前更高的生活水平。

对将在 2004 年加入欧洲联盟的国家来说，事实证明这种预测大体上是正确的，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贫穷在转型的最初几年有所上升，但现在已经下降。不过，特别是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之间，中央计划的崩溃造成了贫穷的急剧上升，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和长期贫穷。不同人群——失业人群、少数民族、单身母亲以及居住在曾经封闭的军事小镇上的人受到了转型的重大打击。另外，不能再将普遍贫穷视为一种暂时现象，像东欧大多数国家那样——现在应将其视为一种长期现象。这些国家必须在政府资源减少时面对建设以最贫困的人为对象的社会安全网这一挑战。这项任务现在应容易一些，因为它们的经济正在复苏，但仍然需要许多方面的努力，因为他们遭受的长期贫穷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复苏而消除。

转型经济体的经验极大地强调了《概览》第二部分得出的主要结论，即减贫和实施最佳经济政策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其中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和贸易和农业的自由化，因为这些政策应当产生有助于减轻贫穷的经济快速增长。增长使制订解决穷人需要的微观政策成为可能。但是，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也必须认

识到它们可能对贫穷产生的影响，在必要时应采取补充政策，以确保在减贫方面产生的更大收益。⁵

⁵ 关于如何实现增强公平的增长战略的讨论和对综合增长方法中社会政策优先事项的分析，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题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社会方面”的报告，2001年6月22日，纽约（ECESA/4）。

第四章

增长与贫穷：政策评估框架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步状态中，在社会正在进一步获得，而不是已经获得全部财富后，劳动穷人和大多数人的境况似乎是最幸福和最舒适的。在静止状态下生活很艰难，而在下降状态下就有些苦不堪言了。实际上，进步状态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愉快和满意的状态，静止状态令人烦闷，下降状态则令人抑郁。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埃德温·卡农编辑，
(纽约现代图书出版社，1937年)，第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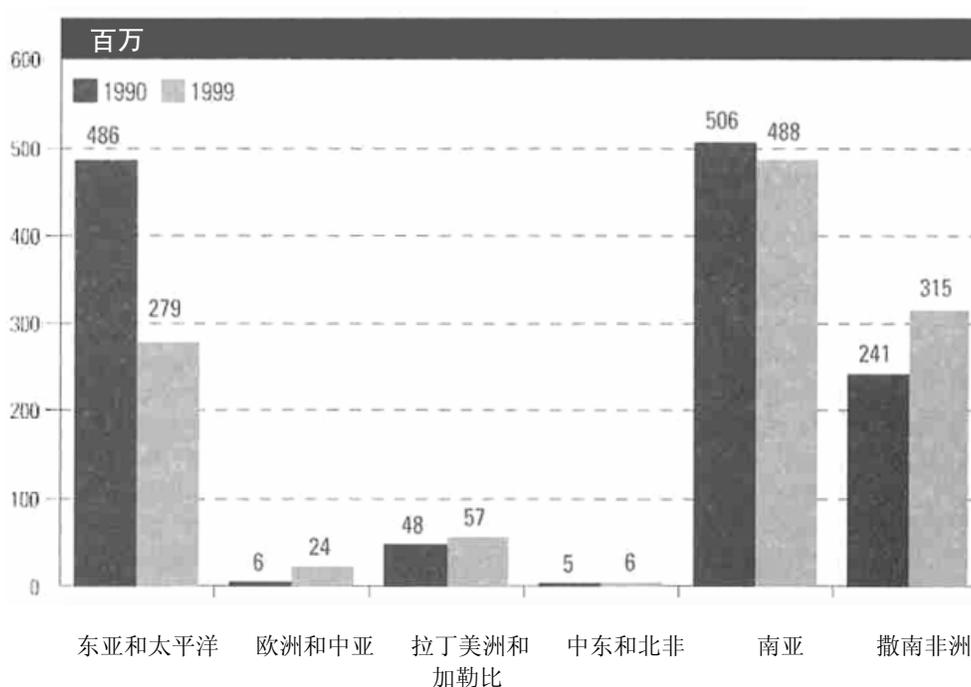
多年以来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表达了对贫穷的关注，虽然贫穷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次序并不总是很高。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提出了消灭贫穷的新举措，随后，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首次在《联合国千年宣言》（见大会2000年9月8日第55/2号决议）中认可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承诺。战胜贫穷成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各个组织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在1999年约为12亿，这是最新数字（见图四.1）。¹ 该数字约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总人数的23%，比1990年的30%有所改善。在1990至1999年间，只有东亚和南亚减少了每日收入为1美元或低于1美元人口的比例。其余发展中世界则增加了这一比例，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中东和北非的增加量很少。由于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撒南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7.4%增加到1999年的49.0%，同期的贫困线以下人口从2.41亿增加3.15亿。转型经济体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也因为与其经济改革有关的困难而有所增加。1990年代全世界的减贫步伐足以实现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² 但这一成功主要是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取得的重大进展。

¹ 严格来说，这一估计数字是以消费/支出为基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的。由于现在通常将每日的这一购买力平价数字看作收入，本章采用了通常的用法。关于估算方法的详细情况，见 Shaohua Chen 和 Martin Ravallion，“1990年代世界最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世界银行第2049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2001年8月，华盛顿特区）。

² 秘书长2002年7月31日题为“《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A/57/270和Corr.1）第40段。这一期间的年平均减贫率为2.7%，如果在1990至2015年间保持这一比率，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15.1%，约为1990年代的51%。

图四. 1

1990 和 1999 年按区域分列的发展中国家极端贫穷人数^a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世界银行《2003 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2002 年，华盛顿特区），第 30 页。

注：界定的极端贫穷人口每日以不足 1 美元为生。

^a 按世界银行界定的区域。缺乏根据《概览》其他部分使用的国家分组计算这些总数所需的国家数据。

各个人群中都有穷人，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就业人员还是失业人员，男子还是妇女。他们住在中心城市的贫民区或农村的破落地区。发达国家也有穷人区，消除他们的相对贫穷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但发达国家的贫穷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穷不同，这些国家的国家贫穷收入界限通常相当于每日 1 或 2 美元。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中，死于饥饿和容易患病的危险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穷人。因此减轻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极端贫穷是全球议程的优先项目。

了解贫穷的原因及其相互作用对制订和实施影响贫穷的经济政策非常必要。在国家 and 全球两级衡量贫穷的程度和确定可衡量的具体目标反过来又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能够对政策行动的影响进行评估。国际社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了衡量进展情况和评估国家和国际行动的千年发展目标。

为以明确或默示方式减少贫穷而制定和实施了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³ 明确以穷人为对象的政策包括提供就业和教育的收入补贴方案、粮食援助计划和行动。由于这些政策的定向性，对它们对目标人群的影响及其与预期目标相关的有效性的衡量非常简单，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不过，许多其他政策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减贫，虽然它们的实施可能作为提高所有人类福利工作的一部分而有助于消除贫穷。包括结构调整方案和贸易政策、农业改革、工业政策和国家发展计划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属于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是加强或稳定一个经济体、一个部门或一个产业内的活动，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因此而提高人口的福利，包括穷人的福利。它们对贫穷的综合影响是重大的，有时甚至因为其中一些政策在整个经济范围内产生的效果而超过直接政策的影响。

近来的政策制订趋势与 1980 年代中期以前制订的政策（如国家发展计划）之间的一个区别是现在认识到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决策者现在制订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市场的发展，并在政策设计中考虑到了现有市场的作用。例如，更多的国家现在不是不考虑市场情况，将市场利率固定在预先确定的水平，而是采取了所谓的瞄准通货膨胀这一目标来稳定经济，货币当局通过货币市场与公众进行交流，以实现既定目标。⁴ 许多国家将其经济的对外部门自由化，而不是通过进口关税和扭曲的外汇汇率来保护某些产业。主要粮食、水和电的价格过去往往是由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政府直接确定，但这些价格目前越来越由市场情况来确定，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有一些保护性的安排。

每项此种“有利于市场运作的”政策与贫穷发生率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因为它们对贫穷的影响并不直接：每项政策都可以通过许多渠道对贫穷产生影响。为说明政策和贫穷之间各种间接联系的性质并制定评估本《概览》以下各章审查的政策框架，本章认为应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政策进行评估：即贫穷的定义，贫穷情况汇总的社会和地理级别，以及时间范围。

如《千年发展目标》所确认，贫穷涉及人类境况的许多方面，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和文化方面。鉴于其多方面的特点，贫穷的定义也各不相同。采用哪种贫穷定义不是一个是非问题，它取决于该政策的目标，或者决策者确定的优先事项。例如，如果某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经济状况，就应当从收入、消费、就业或工资等方面来判断它对贫穷的影响，而不是从卫生状况或获得水的条件来判断。另一方面，如果某卫生政策的目标是改善妇女的整体卫生状况，则应当从目标妇女的卫生指标，而不是从她们赚取的收入来评估该政策。

在讨论政策对个人或按照社会经济或地理特征分类的某一特定人群是否有效的时候，汇总级别非常重要。全国范围的失业补偿计划是补充与失去正规部门的工作有关的收入下降的一个重要工具，但由于缺乏生产性就业，它对非正规部

³ 《2003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即将出版）审查了帮助减少社会易受害性这一贫穷根源的若干社会和文化政策。

⁴ 见《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11.C.1），方框 1.1。

门的工人或长期贫穷的人来说没有太大作用。这种计划的有效性不能按照非正规部门的贫穷人数来计算。

对某项政策对贫穷影响的评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评估者，即决策者、专家或民间社会选择的时间范围。虽然旨在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的政策从长期来说有助于减少贫穷，但没有人能够在一两年内观察到这些政策对贫穷的可以衡量的影响。

多种多样的政策的两个极端，即反全球化群体和天真的市场自由化群体往往为说明其各自主张的合理性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过度简化政策和贫穷之间的联系。本章认为这种简化没有抓住这些联系的本质，在许多情况下误导了政策辩论；实际上，对增长与贫穷关系的评估取决于所选择的贫穷定义、贫穷情况的汇总级别和时间范围。关于增长和贫穷之间关系的分析突出了在评估上述政策对贫穷发生率的影响时非常关键的若干重要问题。

发展、政策与贫穷之间的关系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影响人们生活和生计的许多事件和变化。人为的灾难，如战争、内乱和政权更迭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对无数人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地震和火山爆发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即使在政治稳定时期，经济和政治改革、外部环境的变化，如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石油冲击和 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以及严重的流行病如在十四世纪造成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亡的淋巴腺鼠疫（黑死病）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等不仅吞噬了人类生命，还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缺乏应对局势的资源，穷人受到这些事件和变化的影响最大。

在 1995 年 3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联合国会员国认识到所有国家都存在贫穷现象，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发达国家的穷人区，经济衰退造成的生计丧失，以及灾害或冲突导致的突然贫穷。会员国承诺除其他外将克服贫穷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⁵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认识到造成贫穷的原因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原因和过渡原因，“贫穷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问题，有其国家和国际范围的根源”。⁶ 贫穷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剥夺（收入、消费和资产），还包括健康状况差和教育不充分（人力资本），易受不利的冲击的影响以及感觉在社会或国家中没有发言权和权力（缺乏参与）。⁷ 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经常会产生一种恶性

⁵ 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有关的文件可在 <http://www.un.org/esa/socde/wssd/indec.htm> 查阅，特别见《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题为“消灭贫穷”的第二章。

⁶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第 23 段。

⁷ 关于贫穷性质的讨论，见世界银行，《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穷进攻（世界银行，2001 年，华盛顿特区），第一章。关于穷人自己对贫穷的看法，见世界银行，《穷人之声：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纽约）；《穷人之声：要求改变》（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纽约）；以及《穷人之声：来自许多地方》（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纽约）。

循环：穷人赚取足够收入的机会有限反映了他们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较差的健康状况，而他们不充分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以及缺乏有形和政治基础设施又经常导致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国家和当地政治。另外，低收入与起初较差的健康状况使穷人患病的风险更大，从而使他们更难充分参与生产性的活动。

只把重点放在贫穷的一个方面往往令人产生误解，因为贫穷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某个与贫穷相关的指标改善的情况下，其他指标可能会恶化。例如，在 1990 年代的不同时期，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在穷人人数的、小学净入学率、儿童营养和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福利的所有四个方面都表现出进步，加纳和毛里塔尼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见表四.1）。但另外四个非洲国家的成果喜忧参半。虽然马达加斯加的穷人人数的略有增加，其他变量则表现出进步趋势。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的穷人人数的和儿童死亡率都有很大的增长，但上学儿童的比例也大大提高了。而在赞比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和儿童死亡率均略有下降，但上学儿童的比例下降，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也有所上升。

表四.1

撒南非洲部分国家贫穷的标准衡量方法的演变

国家和期间	贫穷人数 ^a		小学净入学率		儿童营养不良 ^b		儿童死亡率 (每千人)	
	期初水平	百分比变化	期初水平	百分点变化	期初水平	百分点变化	期初水平	变化
埃塞俄比亚 (1994-1997)	39	-26 ^c	19	6	66	-11	190	-15
加纳 (1992-1998)	51	-24	70	12	26	0	119	-15
马达加斯加 (1993-1999)	70	1	48	16	50	-1	170	-21
毛里塔尼亚 (1987-1995)	58	-40	28	13	48	-25
尼日利亚 (1992-1996)	46	56	94	4	38	..	136	11
乌干达 (1992-1997)	56	-21	68	18	43	-4	165	-3
赞比亚 (1993-1998)	74	-3	73	-7	40	3	194	-5
津巴布韦 (1991-1996)	26	35	83	3	30	-7	77	3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Luc Christensen、Lionel Demery 和 Stefano Paternostro，“非洲的增长、分配和贫穷：来自 1990 年代的信息”，世界银行，2002 年 3 月，表 1 和表 6。

注：黑体表示改善。

^a 消费是指区域紧缩的实际住户支出的每个成人对等值。贫困线是根据基本需要成本方法来计算的，其中包括非食品需要（津巴布韦除外）。毛里塔尼亚的贫困线则按美国每天 1 美元的等值来计算。

^b 指就其年龄而言，身高低于 0 至 59 个月国际基准人口中间值减去两个标准偏差的 5 岁以下儿童。

^c 仅指农村贫穷人口。

虽然埃塞俄比亚、加纳、毛里塔尼亚和乌干达的穷人福利在特定期限在原来水平非常低的基础上平均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如何概括其他国家的贫穷状况变化尚不明确。这些复杂性往往引发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人类发展相关因素如贫穷的原因和影响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⁸ 另外，由于与数据收集有关的成本和技术困难，很难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或驳斥论点。最后，贫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可能会妨碍适当的理解”。⁹ 这种情况给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特别是他们在制订旨在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和评估该政策的结果时。一项政策必然会以复杂方式导致经济、社会和其他变量的变化；如果没有适当的理解，决策者将很难——如果不是决无可能的话——制订和实施具有可行目标的适当政策。

根据确定的政策目标和可用的数据选择若干贫穷变量有助于提高分析能力，使决策者能够密切考察贫穷和政策行动之间的关系。鉴于当前关于贫穷、发展和政策之间关系的知识储备，决策者和该领域的专家可将重点放在贫穷的某些表现上，而不是放在对穷人多种经历的更加深刻的描述上，以此来获得合乎实际的深刻见解，无论这些见解是多么不完整。¹⁰

将重点放在衡量贫穷物质方面（收入、消费和生产力）的一个或几个指标上具有额外的优势。确定这一重点的原因之一是用于分析政策变化在不同时期对消费或收入影响的国际可比数据的有限性。这些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追踪政策对贫穷的影响必然要求追踪不同时期贫穷指标的变化（所谓的贫穷动态）。第二，对于与贫穷的物质方面有关的指标有着既定的统计定义，这与没有权力和发言权的感觉不同。第三，与贫穷的物质方面相关的一些指标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比健康、教育和识字率等社会变量更加敏感。这些指标，特别是收入和消费产生的计量问题较少，被观察的次数也很频繁，以发现它们和社会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政策的变化。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贫穷的多方面定义往往会导致关于贫穷的复杂但静态的观点，也就是说，及时抓住其中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反贫穷战略的重点是人们缺乏什么。¹¹ 相反，贫穷的狭义物质定义更容易追踪政策变化和贫穷动态之间的关系，并使决策者将重点放在人们为什么缺乏某些东西

⁸ 评估穷人状况的一种方法是确立一个“贫穷指数”，该指数规定与贫穷相关的不同变量的权重，然后将它们加以综合，得出一个数字。不过，问题是应当包含哪些变量，以及怎样确定各个变量的权重。

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摆脱贫穷陷阱》（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11.D.13），第40页。

¹⁰ 关于增长、减贫和社会指标之间理论联系的讨论，见 Lance Taylor、Santosh Mehrotra 和 Enrique Delamonica 著，“经济增长、减贫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理论与政策”，载于 Santosh Mehrotra 和 Richard Jolly 编，《带有人性的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经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纽约）。

¹¹ 见《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第二部分第一章。

上。¹² 另外，这种方法还使决策者能够将长期贫穷和暂时贫穷区分开来（也就是说长期遭受贫穷的人相对于可能在短期内摆脱贫穷的人），这两种贫穷的减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自己独特的一套政策处方。

本章下面各节重点讨论了经济变量特别是增长和贫穷指标之间的关系，并审查了经济政策对这些变量和指标的影响，以期发现对我们有何启发，并在宏观经济框架范围内提出减贫的指导方针。

增长和贫穷之间的一般关系

历史表明，“甚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减少甚至消除极端贫穷的一个关键因素。¹³ 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持续增长，直至十八世纪中期那里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还认为贫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现象的西欧¹⁴ 就不可能实现今天的高生活水平。其他区域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虽然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战争、经济萧条、社会动乱和其他挫折，但它们采取对策来纠正这些情况，并保持了长期持续增长，从而使它们达到了当前的发达状态。

不过，在关于政策和贫穷的当前辩论中，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家当局如何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使穷人尽可能快速有效地摆脱贫穷，以便到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甚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在消除贫穷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认识，但决策者除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外，还必须确定使经济增长能够更加积极地减少贫穷发生率的一套新政策。

就贫穷展开的一场重要政策辩论的焦点是贫穷和宏观经济政策——即旨在稳定、保持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下：以自由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改革对穷人有积极影响吗？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是对穷人和穷国有利，还是让富人和富国更富？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对穷人有利吗，如果不，什么样的增长对穷人有利？¹⁵ 更一般来说，近些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别是穷人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些问题似乎认为贫穷和全球化、贫穷和经济增长、以及贫穷和经济改革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存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如前所述，贫穷有着各种原因

¹² 另外，如本章后文所述，将重点放在狭义的贫穷动态突出了政策变化的短期与长期影响问题，这造成了决策者、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见 Ravi Kanbur, “经济政策、分配和贫穷：分歧的性质”，《世界开发》，第29卷，第6期（2001年6月），第1083-1094页。

¹³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甚长期一般指超过一个世纪的期间。关于这种分析的实例，见 Charles I. Jones, “工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甚长期的经济增长”，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汇编，第7375号（1999年10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¹⁴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三章。

¹⁵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一词现在经常出现在政策辩论中，但关于其含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见 Howard White 和 Edward Anderson, “增长与分配：增长模式有关系吗？”《发展政策评论》，第19卷，第3期（2001年9月），第267至289页。

和表现，因此与全球或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下文以为，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增长与收入或消费贫穷在中长期存在具有统计规律性的某种关系，但增长对贫穷的影响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最初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关于增长对贫穷影响的评估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总级别（国家、区域、部门或个人）以及选择的时间范围（短期与长期），这就产生了不同的贫穷动态，通常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影响。

增长与贫穷之间的一般长期关系

世界银行估计，1999年世界人口中有19%每日以低于1美元为生，有46%每日以低于2美元为生。¹⁶ 不过，此类贫穷在各国的发生率大有不同。人均收入和贫穷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与收入和贫穷水平有关的一些总体趋势。（见图四.2）。首先，平均来说，人均收入越高，贫穷发生率越低，这并不奇怪。其次，虽然穷国的贫穷发生率更高，但人均年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贫穷发生率差别很大。例如，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的国家中，每日以低于1美元为生的人口比例从不到20%到70%以上不等。¹⁷ 这种差别反映了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两个平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的贫穷发生率往往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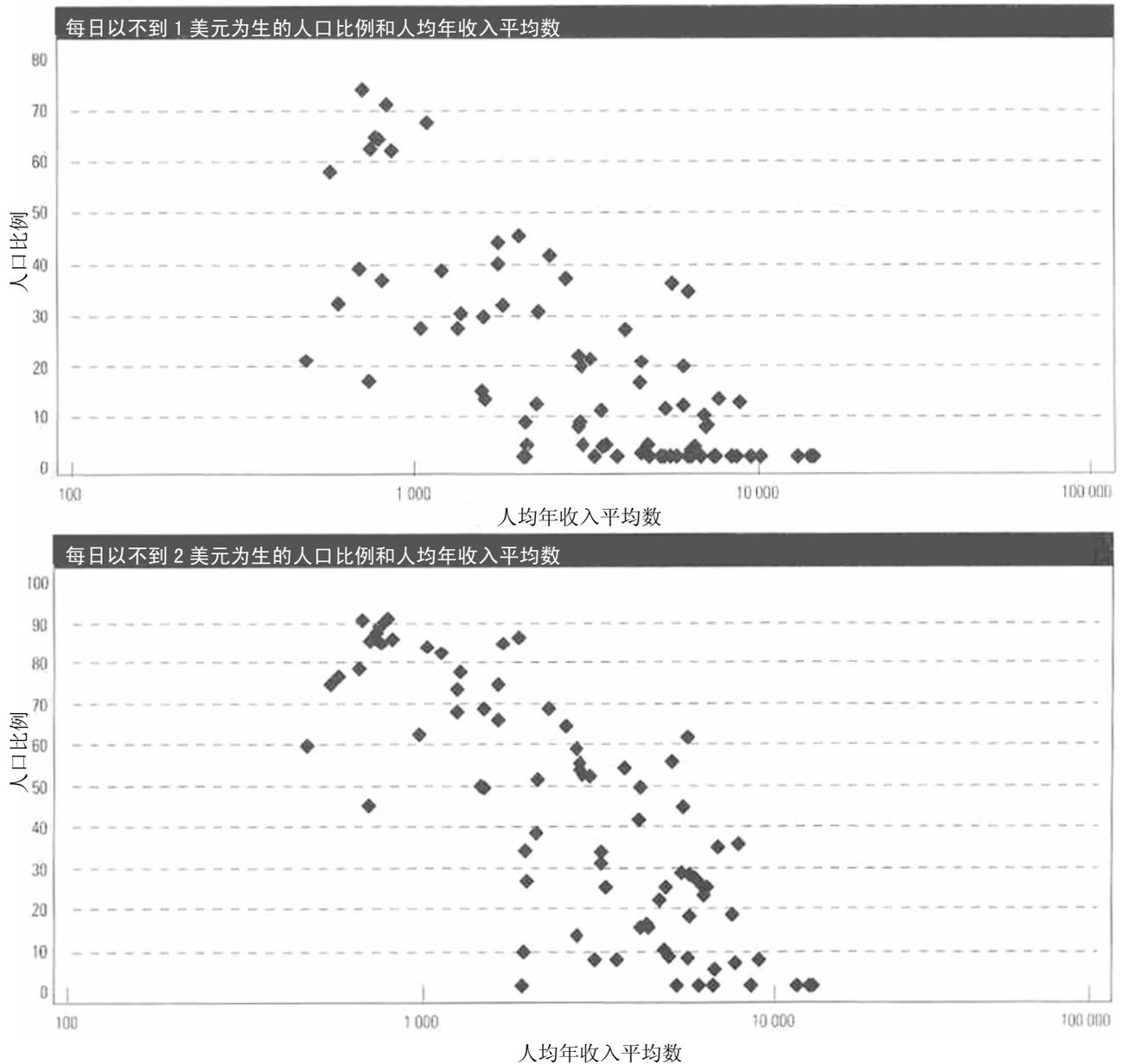
贫穷和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贫穷发生率的不同是许多研究的主题。但富国和穷国之间贫穷发生率的巨大差异说明实现持续增长非常重要，而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贫穷发生率（和收入不平等）的较大差异则表明必须改进收入平等程度，这是减少贫穷的一种方法。

不过，也就在这点上存在一致意见，在贫穷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平均生活水平即人均收入的提高。虽然任何时期的收入重新分配都能在短期内减少贫穷，但一国的收入分配和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和争论的主题（见方框四.1）。在长时期内，增长、不平等的增加和贫穷的减少是前后发生的。最近，争论扩展到减贫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上，据认为，全球经济的全球化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家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最简单的问题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穷人是否有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可能通过它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穷人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¹⁶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让贸易对世界穷人有益》（世界银行，2002年，华盛顿特区），表1.8。

¹⁷ 贸发会议将“普遍贫穷”定义为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刚刚或不足以满足其基本需要，经济体中的可用资源勉强能够持续满足人口的基本需要。见《200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图四.2.
1990 年代人均收入和极端贫穷^a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世界银行，《2002 年世界发展指标》，CD-ROM（世界银行，2002 年，华盛顿特区）；以及世界银行，《2002 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机构》（世界银行，2002 年，华盛顿特区），表 2。

^a 数据涵盖 78 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每日收入以低于 1 或 2 美元为生的人口比例指 1990 年代的各个年份，人均年收入平均数指 1995 至 1998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995 年美元数）。

方框四.1

平等、增长和贫穷：权衡利弊了吗？

增长导致的收入分配和经济进步之间的联系是近来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这方面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设是 Simon Kuznets 的假设。^a 他认为一国的收入分配在该国从贫穷的农业社会发展成富裕的工业社会时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平均数通常比城市人口低，而城市人口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在城市人口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这些储蓄的累积效应是高收入人群日益增加的资产的集中。因此，随着城市部门城市化进程中在经济中所占权重的增加，国家的整体收入分配往往会恶化，直至城市部门占主导地位。此后，收入分配由于三个因素而趋于稳定，即富裕阶层人口的增长放慢，不动产并非在稳定产业的人对技术提供的致富机会的利用，以及工人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的流动。这些都表明了“日益发展和自由的经济社会的动态”。^b 另外，累进直接税和政府收益往往使税后收入趋于平等。根据 Kuznets 的假设，这种首先恶化然后随增长而改善的收入平等模式是一个长期现象：例如，Kuznets 认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间在英格兰（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 1780 至 1850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从 1840 年（特别是从 1870 年）开始，在德国则是从 1840 年代到 1890 年代。人们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最终还是发生了，英格兰约从 1875 年开始，德国和美国是 1918 年以后。

被称为“创新机器”的自由企业制度后的世界经济数字开始表现出生产率的提高，其速度创世界历史之新的发明则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突出了这种长期现象（见表 1）。^c 这些数字考虑了国内的收入差异，而不仅仅是每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差异。无论是以基尼系数还是以泰尔系数计算——这两个系数均随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世界收入分配在 1820 至 1950 年间出现了极度的恶化，在 1910 至 1929 年间停止恶化。1950 年以后，这一模式变得不太明显，基尼系数在 1980 和 1992 年间趋于稳定。

^a 见 Simon Kuznets,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美国经济评论》, 第 46 卷, 第 1 期 (1955 年 3 月), 第 1 至 28 页。

^b 同上, 第 11 页。

^c 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中财富产生的可能性的分析, 见《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2.II.C.1), 第 162 至 163 页; 以及 William Baumol, 《自由市场创新机器: 分析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以及联合王国牛津。

方框四.1 (续)

为了本分析的目的，将世界分成了不同的国家组别：(a) 非洲，(b) 亚洲，(c)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d) 东欧（包括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以及(e) 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然后计算出了由于国家组别内或国家组别之间的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1820年，由于世界各地的平均收入在工业革命使西欧远远领先以前被认为大体相同，总体不平等中只有12%是由于国家组别间的收入水平不同造成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并将更多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席卷在内，这一比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近40%，在1929年达到47%，在1950年则达到了近60%。1950年以后，由于更多的国家，首先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然后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亚洲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增加了平均收入，这一数字逐渐得以稳定。亚洲的这一快速增长期出现在欧洲大国结束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后，在控制期间，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经常受到旨在帮助这些大国的政策的阻碍。

在世界一级的收入不平等增加，特别是国家组别间的差异增加的时期，极端贫穷（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人每日消费1美元衡量）被大大减少，从1820年占世界人口的84%到1910年的66%以及1950年的55%。随着这一情况的继续，到1992年，按上述方法计算的世界极端贫穷人口为24%。同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从1820年的26岁到1950年的50岁，并在1992年达到60岁以上。

在全球一级，不平等增加特别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增加，以及收入增加和贫穷下降的趋势仍然存在。总体数字表明，用人数或世界人口比例与其收到的收入表示的全球经济分配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偏右，这表明收入有所增加。另外，特别是自1970年以来，分配的两个高峰——一个是处在每日收入1到2美元的贫困线上的穷人高峰，另一个是每年收入约9 000美元的富人高峰——趋于平缓表明全球一级出现了中等收入阶层。

但是，在1970至1992年间，不同地区的情况变化非常大。某项研究表明，亚洲的穷人（按每日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数量急剧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实现了持续增长（见表2）。在中国，这一期间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像Kuznets的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城市部门的发展比农村部门快。但印度的收入分配变化不大，印度尼西亚的收入不平等则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在拉丁美洲，1980年代“蒙受损失的十年”使1970年代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发生扭转，但在1990年代，情况开始好转，穷人人数的开始少于1970年。非洲在这一期间的情况持续恶化。在尼日利亚这个最大的国家，每日靠不到2美元为生的人数从1970年的45%增加到1998年的70%。但是，随着收入分配因经济下降而偏左，人均私人消费在1980至1998年间每年下降了4.1%，分配的上端转而偏右，表明最富裕的尼日利亚人变得更加富裕，而普通的尼日利亚人变得更穷。这种情况在非洲并不少见。

方框四.1 (续)

Kuznets 的假设解释不了这种现象，因为他的分析是以经济增长而不是下降时期发生的情况为基础的。虽然非洲的经验可以与收入分配随经济下降而恶化的某些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相比（见第八章），但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造成转型经济体衰退的冲击的影响现在已被克服。许多非洲国家当前的收入分配可以看作许多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如不良管理、矿物租金的错误导向和对农村部门尤其是农村穷人的关注不够等，这些因素造成了非洲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表现令人失望。

能否在当前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问题，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因素。持续增长只有在任何进步成果同下降时期的损失相比得到更公平的分享，特别是被穷人分享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在下降时期，不断下降的收入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最富裕的成员所享有。无论如何，大量的世界人口特别是亚洲人口在继续取得快速进步，而非洲人口即使在经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后天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后仍继续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非洲经济增长的绝对下降趋势被停止或扭转，否则世界的收入分配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不会像 1820 至 1950 年的情况那样说明世界某些地方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而是表明在其他地方快速扩大的同时，有一个地方在经历绝对的下降。

表 1.
1820-1992 年全球一级的贫穷和收入不平等

	1820	1850	1870	1890	1910	1929	1950	1960	1970	1980	1992
基尼指数	0.500	0.532	0.560	0.588	0.610	0.616	0.640	0.635	0.650	0.657	0.657
泰尔指数	0.522	0.598	0.672	0.745	0.797	0.777	0.805	0.776	0.808	0.829	0.855
国家组别内的不平等	0.462	0.470	0.484	0.495	0.498	0.412	0.313	0.318	0.315	0.330	0.342
国家组别间的不平等	0.061	0.128	0.188	0.250	0.299	0.365	0.482	0.458	0.499	0.499	0.513
国家组别间的不平等占总体不平等的百分比	11.7	21.4	28.0	33.6	37.5	47.0	59.9	59.0	60.9	60.2	60.0
1990 年的世界平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658.7	735.7	890.0	1113.8	1459.9	1817.1	2145.5	2798.6	3773.8	4 544	4 962
极端贫穷（世界人口比例）	83.9	81.5	75.4	71.7	65.6	56.3	54.8	44.0	35.0	31.5	23.7
平均预期寿命（岁）	26.5	29.9	32.8	38.5	50.1	..	59.4	..	61.1

资料来源：François Bourguignon 和 Christian Morisson, “1980 至 1992 年间世界公民的不平等情况”，《美国经济评论》，第 92 卷，第 4 期（2002 年 9 月），第 731-732 页表 1，以及第 734 页表 2。

表 2.
1970-1998 年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每日收入低于 2 美元的人口

百万	1970	1980	1990	1998	1998 年的总人数
亚洲（日本除外）	1130.8	1112.6	814.9	480.3	2958
中国	608.7	554.1	405.0	231.8	1239
印度	321.1	373.1	275.0	140.5	980
印度尼西亚	81.6	53.0	17.6	6.7	204
巴基斯坦	30.1	37.3	30.3	30.8	132
孟加拉国	39.3	55.6	54.1	42.8	126
拉丁美洲	60.4	36.3	59.5	51.1	485
巴西	29.8	18.7	24.3	21.4	166
墨西哥	10.2	4.8	3.7	1.8	96
哥伦比亚	5.7	4.6	6.0	7.0	41
非洲	141.2	193.0	270.9	368.4	579
尼日利亚	24.2	37.6	60.7	84.4	121
埃塞俄比亚	23.7	30.2	42.4	50.3	61
刚果	20.3	27.0	37.4	48.2	48
南非	4.5	4.7	6.4	7.7	4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1.2	14.7	21.7	28.7	32
肯尼亚	8.5	10.3	14.9	18.5	29

资料来源：Xavier Sla-I-Martin, “世界收入分配(根据个别国家的分配所作的估计)；国家经济研究局第 8933 号工作文件(2002 年 5 月,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表 5-7 (可在 www.nber.org/papers/w8933 查阅)。

注：这些数字与采用不同编制方法的其他来源数字可能不同。

将逻辑考虑与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考虑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对有关增长-贫穷之间关系的逻辑回答就会很简单。一国的经济增长, 即该国生产或人均收入的增长, 既不是减少贫穷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其充分条件: 持续增长与减少贫穷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增长不是减贫的必要条件, 因为在缺乏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国家所有成员中重新分配收入来减少贫穷。增长不是减贫的充分条件, 因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分配方面: 持续增长可使富人更富, 但对穷人没有任何涓滴效果。虽然逻辑上行得通, 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因为富人日益要求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并且能够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支付更多的钱。简言之, 涓滴效果肯定会有, 虽然可能非常有限。因此, 由于在增长或全球化和贫穷之间缺乏逻辑关系, 不能从推理上判断增长或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穷人的影响。

但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实际观察似乎表明，增长与贫穷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与上述逻辑推测正好相反。观察到的关系是这些经济体中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结果，而逻辑考虑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从而限制了可以观察到的综合情况的范围。例如，虽然消除极端贫穷的收入重新分配政策对高收入国家来说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因为消除极端贫穷所需的财政转移（如税收和补贴）与国家收入相比数额很小，但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行的。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消除贫穷要求的财政转移与它们的国家收入相比占很大份额。在实施这种政策方面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政治困难，而措施本身可能会破坏增长前景。另一方面也不能寻求对富人过份有利的经济增长，因为大多数人口越来越不满意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并有可能出现政治不稳定或社会动乱。持续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可能对穷人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不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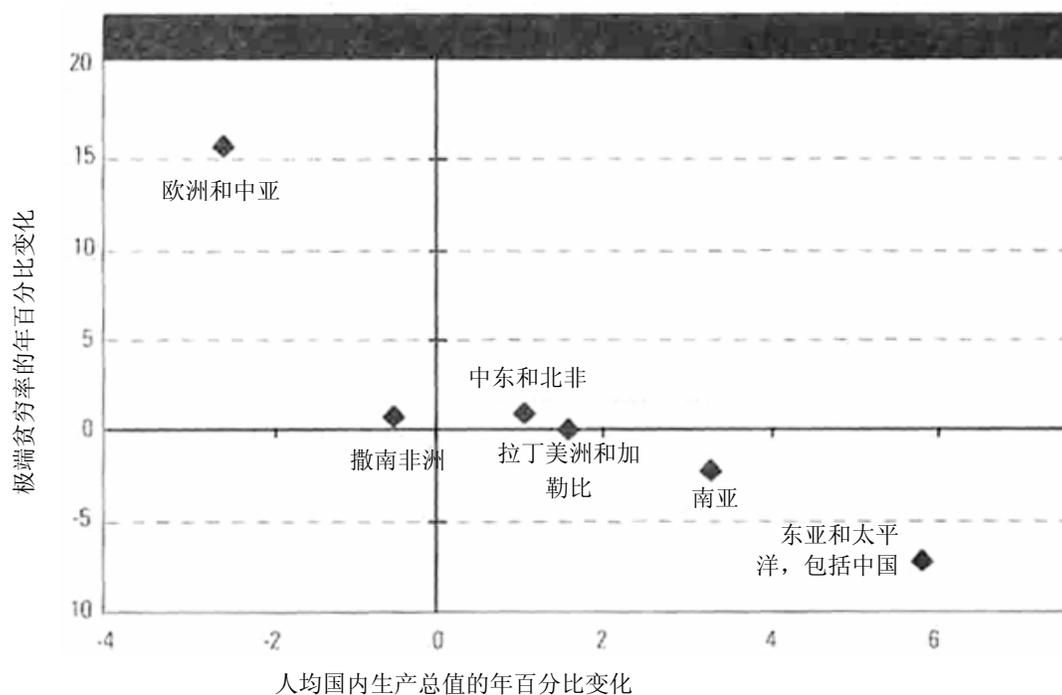
对增长与贫穷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收入贫穷衡量、多国和时期间数据的可比性以及采用的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分歧（见方框四.2）。即使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方面，数据通常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或者所含的信息量不够。因此本节的其余部分主要介绍专家的一些共同理解，以便为后面的政策问题审查确立一个框架。

其中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增长通常对穷人有利，但也有例外。据发现，如果对不同国家的增长和贫穷经验进行“平均”，而且每个增长时期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般为五年或以上——增长就对穷人有利。但围绕这个平均数，各国的经验有很大差异，而且增长与贫穷关系的短期浮动与长期关系不太一致。另外，增长对穷人有利的程度取决于所选择的收入贫穷定义，即使是用同样的数据集也不例外（见方框四.3）。总的来说，虽然经济增长一般会对穷人有利，但必须根据分析框架（包括时间范围）和使用的定义来理解这一说法。这些问题是决策者、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在旨在减贫的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

1990 至 1999 年期间在区域一级，增长与极端贫穷是负相关的，即高增长与低贫穷率有关，但在各个区域，极端贫穷对增长的反应是不同的（见图四.3）。例如，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均收入每增长 1 个百分点，极端贫穷就下降 1.2 个百分点，但其增长只有 0.7 个百分点。南亚出现了负增长。欧洲和中亚的贫穷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最大，但却是反方向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 1 个百分点，贫穷发生率就增长 5.9 个百分点。在经济萎缩情况下贫穷率的急剧上升表明，由于政府减少了社会支出，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不仅通过经济下降，而且通过社会条件的恶化对人口福利产生了影响。¹⁸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在 1990 年代经历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增长——尽管很少，但极度贫穷的发生率略有上升。在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有所下降的撒南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 1 个百分点，极端贫穷人口的比例就增加 0.8 个百分点，这一数字与南亚贫穷率的变化同经济增长/萎缩的关系具有可比性。

¹⁸ 联合国，《200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C.1），第六章。

图四. 3.
1990-1999 年增长与极端贫穷的演化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根据世界银行, 《2002 年世界发展指标》, CD-ROM (世界银行, 2002 年, 华盛顿特区); 以及世界银行, 《2003 年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 2003 年, 华盛顿特区)。

注: 区域分组依据的是世界银行定义, 与《概览》采用的分组不同。关于世界银行的分组见世界银行, 《2002 年世界发展报告: 建立市场机构》(世界银行, 2002 年, 华盛顿特区), 第 241 页。

方框 4.2

设定贫困线

减少贫穷的千年发展目标使用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日 1 美元的国际绝对贫困线。^a 每日 1 美元的标准很简单，这有效促进了极端贫穷概念，并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基准。但是，这一贫困线在具有不同的专业观点和经验的专家中间引起了争议。^b

对每日 1 美元的贫困线的批评至少有三个理由，即(a) 仅用一个指标来作为国际基准，(b) 购买力平价转换率的计算，以及(c)使用的住户调查设计，以及以这些调查为唯一依据。^c

关于(a)，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贫穷的概念应指获得资源的最低权利，并且是衡量向人们提供的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初级能力参与社区生活方式的机会的一种方法。参与社区生活方式所需的最低资源（以及收入）取决于个人/家庭所在的社区，因为各国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许多国家的国家贫困线都是根据这一概念确定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固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概念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d而每日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是以生活水平方法为基础的，假定与特定的消费水平相对应。它的目的是衡量主要生活在最贫困国家的极端贫穷人数，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与社区相关的贫穷。国际贫困线与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贫困线大体相同。^e

^a 严格来说，该贫困线设定为 1993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每日 1.08 美元。见 Shaohua Chen 和 Martin Ravallion, “1990 年代世界最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世界银行第 2049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2001 年 8 月，华盛顿特区）。

^b 关于以下观点的技术方面，见 Angus Deaton, “用于监测有关贫穷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数据”，油印件，发展研究的研究方案，普林斯顿大学，2003 年 1 月。

^c 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与分析单位有关（个人还是家庭），而且更具技术性质。见 Deaton, 前引文。

^d A. B. Atkinson, “贫穷”，载于 John Eatwell、Murray Milgate 和 Peter Newman 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MacMillan, 1987 年，伦敦)，第 931 页。又见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5/2030 年之前的世界农业：粮农组织的观点》(Earthscan 出版物，2003 年，伦敦)，第 214 页，方框 8.1。

^e Deaton, 前引文。

方框四.2 (续)

关于(b), 购买力平价转换率是指用于将以当地货币计量的普通人在一国消费的一揽子典型货物的成本转换成美元成本的价格指数。除了与任何指数相关的一般问题外,^f 还有一个用于计算购买力平价的一揽子消费的相关性问题。可以想象, 而且很有可能的是, 穷人消费的一揽子典型货物及其支付的价格与同一国家的普通人不同。^g 另外, 由于有些农产品只在某一特定地区供应, 并且占据当地人口的大部分支出, 因此很难在全球一级找到相关的可比价格。在这些情况下, 与穷人相关的一揽子货物的成本就无法转换成准确的美元数。^h 虽然这些考虑很重要, 但许多国家统计局当前还不具备进行如此详细分析的能力。

至于(c), 国家住户调查在许多情况下是确立消费或收入分配和估计极端贫穷的基础, 但它们的设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并无统一标准。有些专家使用以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为基础的平均消费或个人收入来计算贫穷估算值, 因为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概念框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更加标准化。ⁱ 不过, 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框架未必能产生关于消费或收入的更加准确的信息。只要该框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和更详细的估算程序, “残差”即直接估算数没有计算在内的项目增加和偏误的机会就越大。

另一个让人关注的问题是调查代表一个国家的人口程度。前往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往往较高的偏僻农村地区的花费通常很高, 而在城市地区又很难计算无家可归者或“流浪街头者”并对他们进行抽样。而且, 富人经常拒绝参与调查或者不如实回答问题, 因为他们害怕税收当局会根据他们的回答发现他们不交税的“非正规”活动。虽然以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为基础的估算不会遇到这

^f 同上。

^g 有些证据见 Christophe Muller, “价格与生活标准: 卢旺达的证据”, 《发展经济学杂志》, 第 68 卷, 第 1 期 (2002 年 6 月), 第 187-203 页。

^h 见 Jeffrey G. Williamson, “全球化两个世纪中的赢家和输家”, 国家经济研究局第 9161 号工作文件 (2002 年 9 月,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i 例如: 贸发会议, 《2002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摆脱贫穷陷阱》(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2.II.D.13) 第二部分; 以及 Xavier Sala-i-Martin, “令人不安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的”, 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汇编, 第 8904 号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2 年 4 月)。j 平均收入或消费及其分配对调查组访问的时间 (特别是在农业社区) 和再次访问的间隔也很敏感。

ⁱ 例如: 贸发会议, 《2002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摆脱贫穷陷阱》(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2.II.D.13) 第二部分; 以及 Xavier Sala-i-Martin, “令人不安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的”, 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汇编, 第 8904 号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2 年 4 月)。

方框四.2 (续)

些问题—至少在概念上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但它们对消费或收入的估算将并非代表私人实际支出的项目也包括在内，如服务性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消费，金融中介的估算收费（以取消重复计算），以及自有住房的估算收入。^j

由于住户调查和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设计与方法的不同，对平均消费或个人收入的估算有时差别很大。在以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为基础的数字中，在经济增长较高时估计的平均消费也往往较高，从而使贫穷估计数比使用其他数字要低。在增长停滞时期，估计的消费较低而贫穷较高。例如，使用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报告说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贫穷人数比以住户调查为基础的世界银行估计的数字要少；^k 但贸发会议还估计，由于撒南非洲的较低增长，该区域极端贫穷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世界银行的估计。有些研究人员甚至称，根据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方法，关于减贫的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实现，这主要是因为除撒南非洲以外的某些发展中区域实现了较高的增长。^l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无论他们采用什么估计程序，撒南非洲的普遍贫穷应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每日 1 美元的贫困线的确立和使用导致若干很难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国际组织和专家采取行动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住户调查标准化，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统计局的能力。^m 同时，应将以调查和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为基础的估算视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信息来源。

^j 平均收入或消费及其分配对调查组访问的时间（特别是在农业社区）和再次访问的间隔也很敏感。

^k 见《2002 年最不发达国际报告》。

^l 见 Sala-i-Martin, 前引文；以及 Robert J Barro, “联合国在贫穷和不平等方面大错特错了”，2002 年 5 月 6 日《商业周刊》第 24 页。他们的贫穷估计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他们采用的方法考虑到有助于提高穷人生活标准的政府开支如保健和教育开支。

^m 联合国出台了一个关于有效设计和实施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住户调查的项目。见联合国统计司，“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住户调查操作特点的分析：调查成本、设计效果和抽样以外的错误”（ESA/STAT/AC.85），2002 年 9 月 3 日，向 2002 年 10 月 11 日在纽约召开的专家组会议提交的草稿。

方框四.3

增长与相对贫穷

《千年发展目标》是从绝对角度给贫穷下的定义。不过，如果从相对角度给贫穷下定义的话（如包含收入分配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增长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关于增长对贫穷影响性质的多种但有时相矛盾的观点。

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定义在概念上的区别与定义贫穷的生活水平方法和最低资源方法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见方框四.2）。在前一种方法中，个人需要达到特定的消费水平（并因此花费一定数额的金钱），无论他居住在哪里。这是绝对贫穷水平经常以一揽子消费为基础的一个原因。而后一种方法强调的是确定贫穷时个人所属社区的重要性。例如，居住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个人参与当地生活方式的需要与居住在发达国家的个人需要不同。在许多情况下，相对贫穷人口被定义为收入（代表参与社区的机会）处在或低于国家平均收入某个百分点的个人或家庭，^a 或者属于收入分配最低阶层的人。为了享受某一水平的当地生活方式，居住在发达国家的个人需要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其数量可能比居住在最不发达国家的个人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要多。

如果穷人被定义为一国收入分配最低的人——一般是收入分配人数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20%），而且增长期间至少是五年，多国回归分析表明，穷人从经济增长获得的益处和因为经济下降而遭受的损失与赚取平均收入的人相同；^b 也就是说，在国家人均收入增加（或减少）时，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也以同样的幅度增加（或减少）。^c

^a 图四.3 使用的国家定义的贫穷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b 据发现，最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对于整体平均收入的弹性是一致的，或者非常接近一致（见 David Dollar 和 Aart Kraay, “增长对穷人有益”，发展研究小组，世界银行（2000年3月））。应当指出的是，这相当于说收入最低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份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无关。见 Martin Ravallion, “增长、不平等与贫穷：平均数之外”《世界开发》第29卷，第11期（2001年11月），第1803-1815页。

^c 这并不意味着增长提高的穷人收入的绝对数额与赚取平均收入的人相同。收入分配的持续不平等使穷人的平均收益低于非穷人的平均收益。

方框四.3 (续)

虽然以技术为由对分析增长与贫穷之间关系的多国回归方法提出了批评,^d但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波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察为基础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因为据观察,不同时期各国的收入分配比商业周期的经济波动更稳定,声称只有非穷人得到了过多的利益,而穷人没有受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收入分配就会恶化到历史记录所没有的水平。^e

通过 1990 至 1999 年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中国在穷人数量和穷人所占比例方面大大减少了极端贫穷。但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 7% 下降到 5.9%。^f 另一方面,虽然布基纳法索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贫穷率却从 1994 年的 44.5% 上升到 1998 年的 45.3%,但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变,从 4.4% 增加到 4.5%。^g 这些情况表明,穷人的收入份额变化非常小,在经济出现强有力增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而且不同的贫穷定义会产生关于增长对贫穷影响的不同看法。

总的来说,这两种方法都表明,在穷人被定义为国家收入分配中最底层群体的时候,增长与分配无关。根据这两种分析,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占一个国家总收入的份额受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从而使增长收益与穷人和非穷人的当前收入成正比。例如,如果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高 10 倍,那么最富人口的绝对收入增加额也比最穷人口高 10 倍,因此收入分配保持不变。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政治问题,即决策者和一般公众,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是否应当接受这种增长“有利于穷人”的说法,因为它对每个人有益,

^d 例如见 T. N. Srinivasan 和 Jagdish Bhagwati,“外向与发展:复兴派是正确的吗?”1999 年 9 月,油印件;以及 Steven N. Durlauf,“增长计量经济学宣言”,《计量经济学杂志》,第 100 卷,第 3 期(2001 年 1 月),第 65-69 页。

^e 这是以下文章中采用和加以标准化的观点: Danny Quah,“关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重要性的一些简单算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2001 年 7 月),以及“三分之一的世界增长和不平等”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2002 年 4 月)。

^f 根据世界银行,《2002 年世界发展指标》,CD-ROM(华盛顿特区,2002 年),表 2.8;以及“Deininger 和 Squire 数据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新数据集”,见 <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growth/dddeisqu.htm>。

^g 根据 Hippolyte Fofack、Célestin Monga 和 Hasan Tuluy,“布基纳法索的住户福利和贫穷动态:住户调查的经验证据”,油印件,世界银行,2001 年,表 2 和附件 1。

方框四.3 (续)

包括穷人；这样的增长也可视作“对穷人不利”，因为它扩大了穷人和其他人口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从绝对角度对贫穷进行定义的一个优势是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分配考虑不会引起争议，只要穷人摆脱了每日 1 美元的贫穷，或一致同意的其他绝对贫穷线，增长就可以被视为有利于穷人。

选择哪种贫穷定义取决于分析目的或政策目标。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贫穷概念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每一种可以设想的情况。但每日 1 美元的贫穷基准有助于评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较贫穷国家极端贫穷的影响（见方框四.2）。

区域一级现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和极端贫穷程度是影响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贫穷发生率的两个重要相关因素。如果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一般由较高的基尼系数表示），¹⁹ 穷人在其他方面平等的情况下因为经济扩张而得到的额外收入非常少，从而使他们很难摆脱贫穷。拉丁美洲和撒南非洲收入的高度不平等（与东亚相比）是这些区域的减贫速度放慢的一个原因。²⁰ 总的来说，区域一级（以及国家一级）增长和贫穷之间的关系对该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敏感，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反映了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当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虽然对导致各区域当前收入不平等的进程的分析超出了本《概览》的范围，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进程非常普遍，政策影响贫穷发生率的方式取决于这些进程与所选择的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极端贫穷程度（一般以贫穷深度比表示²¹）很高的情况下，使许多人摆脱贫穷需要经济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撒南非洲较高的极端贫穷程度意味着要减少贫穷，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很快，但该区域正式和自给部门之间的微弱联系妨碍了将增长收益从正规部门转移到自给部门。另一方面，由于中东欧和中亚的贫穷深度比较小，一旦该区域的国家实现了持续增长，该区域就有可能迅速减少极端贫穷。²²

¹⁹ 凭直觉来说，基尼系数表明的是一个人选择成为按平均收入分类的人口中某个高收入者后所期望获得的平均收益。例如，如果平均收入是每年 1 000 美元，而基尼系数是 0.6，那么成为某个高收入者的期望收益是 600 美元，这是一项很大的收益。见 Nanak C. Kakwani,《收入不平等和贫穷：估算方法和政策应用》（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年，纽约），第 5 章。

²⁰ Douglas Smith,“关于收入不平等和信贷市场不完善影响私人储蓄率的国际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64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第 103-127 页，该以国家抽样调查为基础估计拉丁美洲、撒南非洲、东亚和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是 0.472、0.468、0.427 和 0.322。

²¹ 贫穷深度比是根据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和贫困线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平均收入（以占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之间的差别中得出的结果来定义的。例如，如果有 50% 的人口生活在每日 1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而这些人的平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40%（也就是说每日 60 美分），那么贫穷深度比就是 20%。

²² 据发现，如果收入不平等很普遍，或极端贫穷程度很高，在国家一级也存在着贫穷发生率对增长的反应程度很低的情况。见 Anne Epaulard, 宏观经济表现与减少贫穷，货币基金组织 W0/03/72 号工作文件（2003 年 4 月，华盛顿特区）。

区域平均数的背后

上述分析表明了增长至少在中长期对减贫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忽视了不同时期贫穷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一个是个别国家的经验与其所在的区域总体情况有所不同，另一个是个人陷入或摆脱贫穷的机动性，这导致了贫穷发生率在短期内的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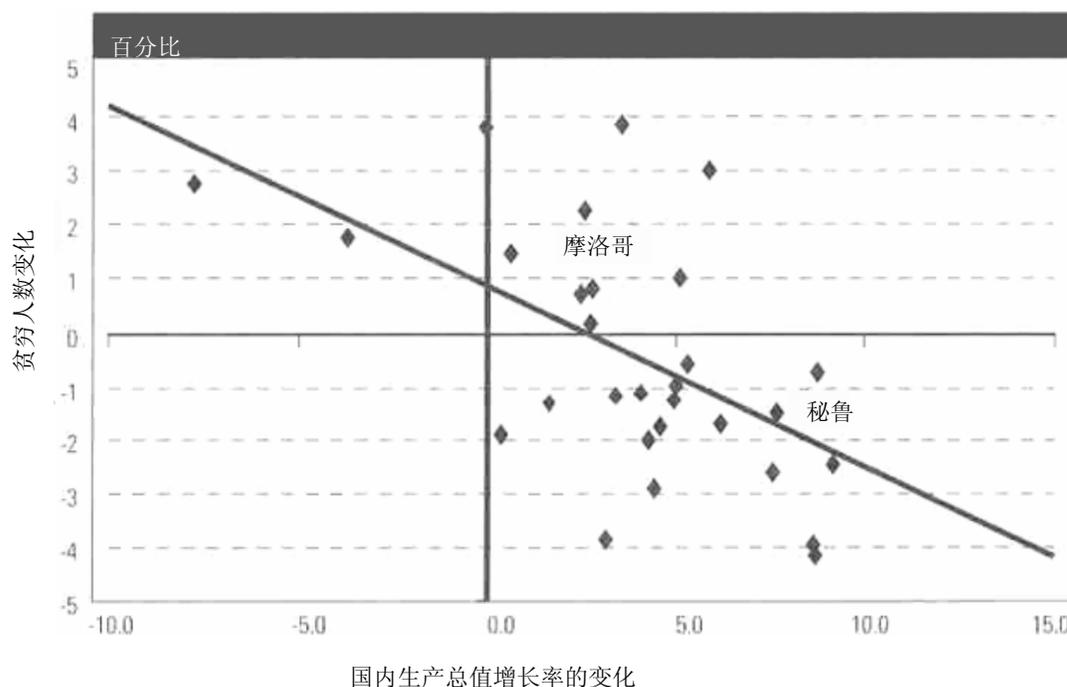
偏离平均数

上述结论是以区域经验——一个区域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验的“平均数”——和相对长的增长期间为基础。但在统计分析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符合平均数，而许多国家与平均数相差很大。区域平均数排除了这些差别，并可能会掩盖影响国家业绩的因素。

关于28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近期增长和贫穷发生率变化的数据²³表明，增长和贫穷演变之间存在着负相关，这说明增长往往会减少贫穷（见图四.4）。不过，差别是很大的。许多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右下方格中的数据点表示）而成功减少了国家定义的贫穷人数；但在八个国家，按其贫困线衡量的贫穷即使在它们的经济增长，有时甚至是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也没有下降（右上方格）。有三个国家在贫穷增加的同时经历了负增长（左上方格）。

图四.4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增长与国家定义的贫穷演变^a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CD-ROM（世界银行，2002年，华盛顿特区）。

^a 国家定义的贫穷与极端贫穷不同。该指数是指生活在国家当局认为适合该国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比。

²³ 样本包括至少可以提供两种对不同时期贫穷发生率观察结果的国家。

在国家一级，贫穷的演变进一步受到贫穷发生率首次被衡量时的状况以及政府在首次衡量后采取或放弃的政策的影响。在政府实施重大的经济改革如结构调整、自由化或取消管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通过保证人人有工作而在改革前的时期保持了较低的贫穷率（以及收入不平等），推行市场自由化和对外贸易的更加开放将取消某些工作岗位，至少是暂时取消，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将增加贫穷。转型经济国家就属于这一类（见第八章）。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利益，如果贫穷非常普遍，或者改革前时期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市场和贸易改革可能会产生使收入均等的效果，从而对穷人有利。例如，秘鲁在实施于 1980 年代中期出台的改革政策时在 1990 年代中期降低了贫穷率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²⁴ 区域平均数可能会消除这些不同的经验，掩盖初始条件与随后采取的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改革政策有助于秘鲁于 1990 年代中期减轻贫穷的同时，较晚采取这些政策的有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贫穷发生率有所上升，即使在正增长的情况下。

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别程度，或称经济二元论（经常按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相比的相对生产力来估计），也影响到国家一级的增长-贫穷关系。²⁵ 农村部门的增长——农场产量加非农场收入——对减少贫穷来说很重要：²⁶ 没有农村部门发展的宏观经济增长在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往往不及包含农村部门发展的宏观经济增长。例如，摩洛哥在 1990 年代出现了正增长，但贫穷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恶化造成的。1990 年代后半期的干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广泛种植可在市场上卖出高价但却不能抗旱的作物使情况更加严重。²⁷ 另一方面，许多亚洲国家如过去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以及当前的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极大地减少了贫穷。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村非农场部门的转变是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改革、引进高产种子和新技术、以及改善有形基础设施的结果。²⁸

陷入或脱离贫穷的变动性

在更基层的一级，平均数不仅掩盖了各国不同的初始条件和部门特点，还掩盖了个人或家庭在不同时期陷入或摆脱贫穷的变动性。在国家或区域一级收集的

²⁴ 关于秘鲁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见 Barbara Stallings 和 Wilson Peres, 《增长、就业与公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改革的影响》（布鲁金斯学院/拉加经委会，2000 年，华盛顿特区），第 5 章。

²⁵ François Bourguignon 和 Christian Morrisson, “不平等与发展：二元论的作用”，《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57 卷，第 2 期（1998 年 12 月），第 233-257 页。

²⁶ 同上，以及 Martin Ravallion 和 Gaurav Datt, “为什么印度有些邦的经济增长比其他邦更有利于穷人？”《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68 卷，第 2 期（2002 年 8 月），第 381-400 页。

²⁷ 货币基金组织，“摩洛哥：2001 年第四条协商：员工报告；公众情况通报；以及摩洛哥执行主任的声明”，第 01/205 号国家报告，2001 年 11 月 3 日。

²⁸ 《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五章。

综合数据有助于审查宏观经济增长和贫穷发生率，以及确定穷人人数及其平均收入之间的固定或一般关系。但在综合时间序列数据涉及的穷人中，有些人已经脱离了贫穷，另一些人则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这种临时（或暂时）的贫穷对制订减贫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由于成功实施了宏观经济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每个人受益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必须实施以国家以下的地区或社会经济群体为对象的补充政策来帮助穷人（见第八章）。综合数据在涉及临时贫穷和住户或个人一级的相关应对机制时，其信息量是不够的。

巴基斯坦某个地区的经验说明了这种移动（图四.4 没有包含）。1996 年和 1999 年在西北边境省（白沙瓦行政区）的农村地区开展了住户调查，该地区因农业引导的增长范围有限，教育水平低，而且婴儿死亡率高。虽然在 1996 至 1999 年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1.2%，但贫穷发生率和人们陷入和摆脱贫穷的变动率均有所上升。²⁹ 在这一期间，接受调查的 299 个住户的平均收入下降了 23%。抽查住户中有四分之三的穷人/非穷人地位没有改变，³⁰ 但有 33 个住户摆脱了贫穷，有 46 个 1996 年的非穷人家庭至 1999 年陷入了贫穷。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失业或农场和非农场工资（而不是收获的作物）的大幅度下降，这对所有住户都产生了影响。不过，在贷款方面受到严格限制的人无法克服消费困难，从而使他们在消费方面成了穷人。³¹

总的来说，临时贫穷同长期贫穷一样是一个普遍现象，³² 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临时贫穷比长期贫穷更常见（见表四.2）。³³ 个人或住户在任何特定时间的收入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其过去对资本回报的理解、特殊冲击（如死亡、患病和事故）和普通冲击（如经济下降和自然灾害）。季节因素，如在收获季节有更多的工作岗位，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年内的收入变动。穷人和稍微处在贫困线以上的人拥有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一般很少，他们始终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是大量的收入损失的风险，而且还在受到不利事件影响时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易受伤害性——受冲击的负面影响的风险——是陷入和摆脱贫穷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²⁹ Takashi Kurosaki,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消费脆弱性和动态贫穷”, 油印件, 东京 Hitotsubashi 大学 (2002 年 7 月)。

³⁰ 有 31 个住户在贫困线 (1996 年为每年每人 189 美元) 以上, 有 189 个住户继续处在贫困线以下, 成为长期贫穷住户。

³¹ 这些贫穷住户还停止送他们的女孩 (但不是男孩) 上学。父母认为女孩的教育与预期私人回报相比是昂贵的。见 Kurosaki, 前引文。

³² 有些研究人员将长期贫穷定义为不同时期平均消费在贫困线以下的情况。这种定义不如消费水平始终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长期穷人定义严格。见 Lawrence Haddad 和 Akhter Ahmed, “长期和暂时贫穷: 埃及在 1997 至 1999 年的证据”, 《世界开发》第 31 卷, 第 1 期 (2003 年 1 月), 第 71-85 页。

³³ Bob Baulch 和 John Hoddinott,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动和贫穷动态”, 《发展研究杂志》, 第 30 卷, 第 6 期 (2000 年 8 月), 第 1-24 页。

收入波动并不直接转换为消费上的变化，因为住户或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用应对机制来稳定消费。在许多缺乏公共管理方案或以市场为基础的保险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机制是非正式的。这些机制包括地方社区和大家庭之间互惠的“礼物”交换、自我保险活动如储蓄、资产累积和借款以及旅居国外或本国其他地方的移民的汇款。³⁴ 这些私人机制有助于缓冲普通收入震荡以及某一个人受到的冲击。但这些机制不能完全保护人们，使他们不致陷入贫困。如果整个社区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就没有人能立即提供“礼物”交换，因为社区的大多数资产，如土地、作物、牲畜和房屋全部被毁。在家庭的主要赚钱者长期患病或死亡的情况下，最终会失去社区的支持。脱离这些机制因此在获取贷款方面受限的住户或个人，成为消费穷人的风险更大。

表四.2

不同国家的长期和暂时贫穷住户比例

国家	调查期间	福利量度	住户百分比		
			始终贫穷	有时贫穷	从未贫穷
南非	1993-1998	人均开支	22.7	31.5	45.8
埃塞俄比亚	1994-1995	人均开支	24.8	30.1	45.1
印度	1968/1969-1970/1971	人均收入	33.3	36.7	30.0
印度	1975/1976-1983/1984	人均收入	21.8	65.8	12.4
科特迪瓦	1985-1986	人均开支	14.5	20.2	65.3
科特迪瓦	1986-1987	人均开支	13.0	22.9	64.1
科特迪瓦	1987-1988	人均开支	25.0	22.0	53.0
津巴布韦	1992/1993-1995/1996	人均收入	10.6	59.6	29.8
中国	1985-1990	人均开支	6.2	47.8	46.0
巴基斯坦	1986-1991	每个成人的收入对等值	3.0	55.3	41.7
俄罗斯联邦	1992-1993	人均收入	12.6	30.2	57.2
智利	1967/1968-1985/1986	人均收入	54.1	31.5	14.4
印度尼西亚	1997-1998	人均开支	8.6	19.8	71.6

资料来源：Bob Baulch 和 John Hoddinott，“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动和贫穷动态”，《发展研究杂志》，第30卷，第6期（2000年8月），表1。

³⁴ 见本《概览》第八章，以及 Jonathan Morduch，“国家与市场：非正式的保险能否修补安全网？”，《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14卷，第2期（1999年8月），第187-207页。根据后者，这些机制在农村比城市地区更加普遍。

短期的贫穷演变

人们陷入或摆脱贫穷的变化造成了国家或国以下一级贫穷发生率的短期浮动。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和住户调查没有捕获这些短期变动，因为前者一年才估计一次，后者几年才进行一次。缺乏追踪短期贫穷的数据使得很难单独分析整个经济体范围的政策，如贸易自由化和宏观经济调整对贫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但某一特定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经常是，举例来说，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决策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当局和实地工作者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对贫穷影响的争论的焦点。³⁵ 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决策者的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指标和调查数据为基础的，鉴于数据收集的频率，他们的时间范围通常为一年或更长。他们认为增长和支持增长的政策从长期来说对穷人有利。地方当局和实地工作者（包括非政府组织）有着关于贫穷的日常和实际经验，他们的时间范围可以短至一天。³⁶

长期的宏观经济和调查数据未必能捕获增长或政策变化对穷人的短期影响。以旨在限制较高的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减缓经济活动的货币紧缩为例。稳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是增长因此从长期来说也是减贫的关键（见第五章）。³⁷ 但经济减速可能会通过失业上升而在短期对穷人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以短期的时间范围为重点的人对穷人处在生存的边缘倍感关注；在他们看来，穷人福利将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提高的可能性并不重要或相关。

如上所述，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平均而言，增长在长期内对穷人有利，但对于穷人的福利状况在短期浮动期间的变化没有系统的证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多数现有证据局限于轶事奇闻。为了使对贫穷演变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具有可比性，需要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季度或半年数据，并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贫穷调查。由于政府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不能提供这样的数据。

但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例外。1997年8月爆发并对印度尼西亚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该国对经济危机、政策变化和贫穷的深入研究。该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对危机期间贫穷的短期变化进行了追踪（见图四.5）。其政府也从1996年开始对10 000到65 000个住户进行了若干次大规模（但不一定是代表全国）住户调查。³⁸ 虽然这些不同的调查使用的抽样方法和贫困线不同，但研究人员估计的危机以前和整个危机期间的贫穷率相当一致。

³⁵ 如此尖锐的分歧使关心贫穷问题的人所持有的复杂多样的分析和政策观点显得过于简单。进行这种简单分类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在穷人状况和政策规定方面存在的争执。见 Kanbur, 前引文, 第二节。

³⁶ 同上, 第5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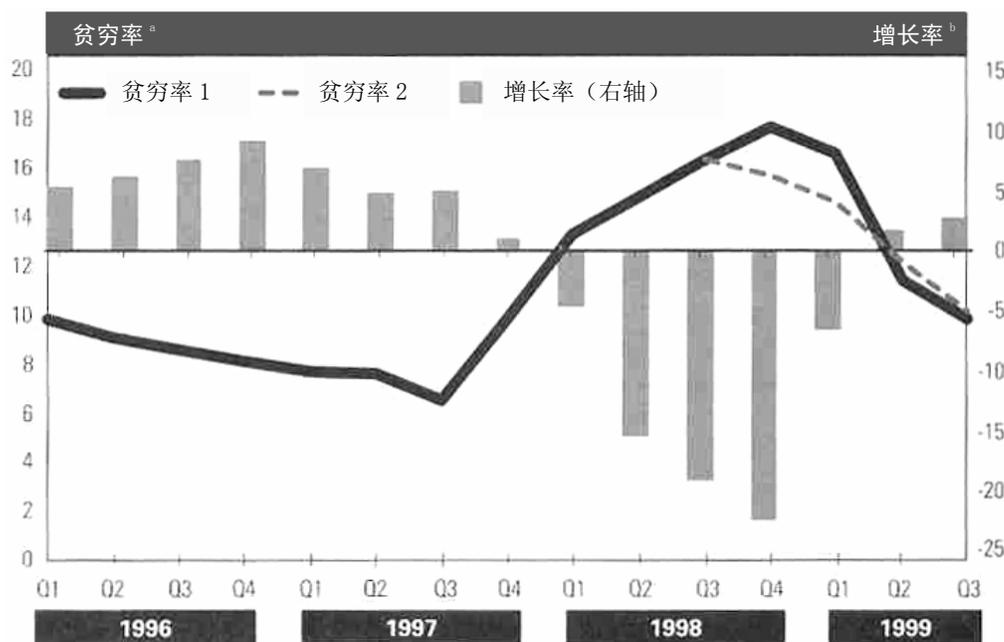
³⁷ 例如见 William Easterly 和 Stanley Fischer, “通货膨胀与穷人”, 《货币、信贷和银行杂志》, 第33卷, 第2期(2001年5月, 第一部分), 第160-178页。

³⁸ 详见 Asep Suryahadi 等, “1996至1999年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贫穷演变”, 社会监测与早期反应股(2000年9月)。又见 Menno Pradhan 等, “1996年、1999年及其他年份对印度尼西亚贫穷的衡量”, 雅加达社会测督与早期反应股(无日期)。

对图四.5 的考察有四点结论。首先，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对即使在短期也对贫穷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贫穷率随经济增长而稳定下降，但在 1997 年第三季度危机对该国产生了冲击，³⁹ 此后的六个月，贫穷率翻了一番。其次，贫穷率对增长的反应在繁荣期和衰退期是不对称的；据估计，在 1996 年和 1997 年的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了 6%，贫穷率则从 9.8% 下降到 6.6%，这意味着每增长 1 个百分点，贫穷率就会下降 0.5 个百分点。但在危机以后，1998 年的经济萎缩了 13%，贫穷率从 1997 年第三季度的 6.6% 上升到 1998 年第四季度的 17.4%，说明产出每下降 1 个百分点，贫穷就会增加近 0.8 个百分点，从绝对角度讲是经济增长时期下降幅度的 1.6 倍。因此，下降时期穷人的风险比上升时期的获益要大：穷人在下降趋势中可能遭受营养不良和饥饿。

图四.5

1996 年第一季度至 1999 年第三季度印度尼西亚的短期贫穷演变（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Asep Suryahadi 等，“1996 至 1999 年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的贫穷演变”，雅加达社会监测与早期反应股（2000 年 9 月）；以及印度尼西亚统计局，“国别报告：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季度国民账户”，向 2002 年 6 月 17 至 21 日在曼谷举行的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社会季度国民账户讲习班提交的论文。

^a 自 1998 年第四季度起有两个系列。系列 1 以社会监测与早期反应股的调查为基础，系列 2 以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的调查为基础。

^b 以连续两年同一季度没有进行季节调整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为基础。

³⁹ 1997 年 8 月至 10 月开展的调查表明当时尚未受到危机的影响。

第三点是，两种不同的调查表明，贫穷率在 1999 年第一季度，甚至在宏观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第二季度以前就开始下降。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穷人并不被动，而是通过上文所述的某些应对机制设法找到了确保最低消费水平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低估：有些经济活动可能为了逃税目的而部分成为“非正规”的活动，结果同样面临财政紧缩的统计机构在危机后的国民账户中没有捕获这些活动。第四点是，虽然贫穷率在 1999 年经济恢复增长后有所下降，但在 1999 年第三季度仍然是危机发生前的约 1.5 倍。

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突出了可能适用于其他危机形势的一些发展。从绝对角度来说，消极震荡对贫穷的影响似乎比积极震荡大。持续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益较慢，但消极震荡会立即对他们产生影响。不过，危机的不良效应可能不会对穷人产生不相称的影响。在 1996 至 1999 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从 0.36 下降到 0.33（或者是 0.32，视使用的价格减缩指数而定），这表明非穷人受到的不良影响比穷人相对要大。最后，穷人似乎有包括自助在内的“私人机制”来应对消极震荡，至少是在短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应对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穷人，但印度尼西亚贫穷率的回转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从而意味着这些机制是有效的。

虽然在增长和贫穷的长期演变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经验研究，但对经济浮动如何影响贫穷以及公共和私人应对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穷人福利的短期分析却仍然很少。更多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填补陷入和摆脱贫穷的短期变动与贫穷的长期演变之间的联系方面的知识空白。它们还有助于评估政策对贫穷的近期和长期影响。

结论意见

本章认为，增长——一般对于减贫是可取的——对贫穷发生率影响程度的评估受到贫穷定义、贫穷的社会和地理汇总级别，以及评估使用的时间范围的影响。如上所述，贫穷物质方面的改善与非物质方面的改善不一定是同步的。即使仅从物质方面对贫穷进行定义，经济增长也未必对所有社会或地理群体产生相同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同样的增长对两个人群的影响是相反的。不可持续的高增长率往往会在短期内减少贫穷发生率，但最终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从而对整个人口的福利，特别是财富储备极少的穷人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如方框四.3 所指出，贫困线的选择影响到增长-贫穷关系的一般特点：如果穷人被定义为处于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最低阶层的人，他们从增长获得的收益就会同赚取平均收入的人一样多，但如果从绝对角度对穷人进行定义（像《千年发展目标》那样），这种对分配无影响的状态就会消失。简言之，像“增长对穷人有利”这样简单的说法所传递的信息是强大的，但如果不从评估框架的具体上下文来理解，就可能会产生误解。

增长影响绝对贫穷发生率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收入和有形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最初分配，以及经济增长时期通常采取的经济和政治制

度。与导致贫穷率大幅度下降的东亚增长相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990 年代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没有减少贫穷率。虽然很难找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根源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的非常不利于穷人的收入分配和大量的长期贫穷等因素说明了增长与减贫之间关系微弱的原因。在撒南非洲，收入不平等、没有人力和非人力资本的大量极端贫穷人口的存在，以及自给部门同正规经济部门的分离，使得增长收益很难流向极端贫穷人口，即使在经济增长时期也不例外。

《概览》以下各章考察了政策通过对某一特定部门或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对贫穷发生率产生的影响。这几章认为，增长与贫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延续到政策与贫穷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政策有财政和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两场关键的农业改革，所有这些政策和改革都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不一定是直接消灭贫穷，但可以对贫穷发生率产生重大影响。政策与贫穷之间联系的复杂性来源于市场对所实施政策的复杂反应，以及造成贫穷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与增长和贫穷之间的关系评估相同，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确定一项政策对穷人有利的程度，即贫穷的定义、汇总级别和采用的时间范围。

第五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贫穷

宏观经济政策与贫穷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理论上讲，“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加强增长的政策，¹ 持续增长长期而言能够减少贫穷；但在实践中，增长对贫穷影响的程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第四章所述。除增长效应外，宏观经济政策还对贫穷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评估某项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贫穷的整体影响并非易事。

宏观经济政策被用于处理短期的总需求和将经济送入长期的高增长轨道。通过这些方式，决策者试图提高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福利。从短期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被用于平衡总的需求和供应（关于当前做法的讨论，见本《概览》第一部分）。从长期来看，实施了一些结构性改革来对三个增长来源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来源施加影响，² 这三个来源是：生产因素的增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分配效率的提高，以及提高这些因素的使用效率或导致新产品或现有产品新用途的创新。例如，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利用相对优势和从国外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来提高一国资源的使用效率。³ 放松经济管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目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提高分配和生产效率。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短期影响并不总是对穷人有利。因此，有必要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穷人，直至采用了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

本章将首先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贫穷的短期和长期理论关系，然后着重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特别是经济危机期间即穷人最易受到伤害时的这些关系。东亚和拉丁美洲在过去十年的经验将有助于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和条件的突然变化可能对贫穷产生的影响。本章将探讨在增长期间保持稳定以便在危机期间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保护社会和经济上易受伤害人群的重要性。然后将重点讨论城市穷人，因为他们被确定为在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比农村穷人更易受到伤害的人群。本章接下来指出，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不足以解决穷人的问题，必须采取直接的补充措施。其中将对两个区域的例子进行研究。最后，将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不同行动级别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贫穷

货币政策通过管理金融体系来影响总需求、价格和就业水平，金融体系可使用其任何和所有主要工具，即公开市场业务、官方贴现（或其他）率的确定以及

¹ Stanley Fischer, “宏观经济因素在增长中的作用”, 《货币经济学杂志》, 第 32 卷第 3 期 (1993 年 12 月), 第 485-512 页。

² T. N. Srinivasan, “增长与减贫：来自发展经验的教训”, 油印件, 2001 年 2 月。

³ 第六章讨论了贸易和贫穷问题。

外汇市场交易。货币当局对选择的个别工具和工具组合的依赖程度随经济状况、整套目标和汇率制度而变化。每个工具和工具组合对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工资和就业均有影响。这些变量反过来又对贫穷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确定货币政策与贫穷之间的一般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两个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即产出和通货膨胀来审查货币政策对贫穷的影响，从而使分析得以简化。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往往能在短期内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这对穷人的影响有两种主要方式。首先，较高的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会导致没有预先计划的收入重新分配。它可能因减少工资和转移（如养老金收入和其他政府赞助计划）的实际价值而给穷人带来损害，但同时又牺牲债权人的利益而对名义上的债务人——通常是穷人——有利。其次，而且最重要的是，总产出的增加可以直接减少贫穷，东亚国家在 1997 年危机以前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见下文）。周期性的扩张创造了工作岗位，其中大多是技能较低或要求的教育水平较低的岗位。

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会无限期继续。它在短期内减少了失业，将产出增加到趋势能力以上。另一方面，与趋势能力相对的低失业和高产出引起通货膨胀上涨，对此货币当局最终不得不通过采取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而紧缩政策在短期内对穷人和其他群体都是有害的。如果不加抑制，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加速，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经济下降。因此，虽然扩张性的政策总体上看似乎更对穷人有利，但从长期来说，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突然的产出波动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⁴

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对贫穷有若干影响。首先，它会在短期引起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产生的净效应对穷人来说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具体取决于对他们的工资、转移支付和债务的综合影响。其次，高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总体上的有形投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边际和平均回报，降低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不过，如果资本的平均回报增加，而税务当局注意到这一点的话，税收负担可能会从劳动力转向资本，部分抵消工资方面的损失。第三，经济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减少了对他们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如卫生和教育），而这种投资是他们摆脱贫穷的一个重要方法。最后，高通货膨胀对某些工业部门的损害可能会大于其他部门。例如，通货膨胀可能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面向出口的部门，如劳动力密集和雇用劳力丰富的穷人的农业和轻工业制造部门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出口部门可能会根据货币贬值程度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由于这些因素对穷人影响的方式和强度不同，不能根据推理确定长期高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净影响。为了观察实际影响，研究人员经常使用所谓的多国回归分析，在这种分析中，长期通货膨胀与贫穷发生率之间在统计学上的关系是依据许

⁴ Christina D. Romer 和 David H. Romer，货币政策与穷人福利，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汇编，第 6793 号（1998 年 11 月，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多国家的经验进行估计的。在这些研究中，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穷人较低的平均收入有关。⁵ 虽然平均通货膨胀和国内生产总值名义上的增长的变化高度相关，从而很难区分通货膨胀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对穷人收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货币政策通过较低的通货膨胀或较稳定的增长或通过两者增加了穷人的福利。⁶

国际民意测验数据中揭示的穷人对通货膨胀的极度厌恶证明了宏观一级的观察结论：⁷ 即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下降，人们将通货膨胀说成最令人关注的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此，虽然富人或教育程度高的人对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破坏有更多的了解，但他们的有形、金融和人力资本都能防止通货膨胀的不良影响，从而使通货膨胀对他们来说不像对穷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那么令人关注。在人力资本（教育）最少，而且/或者非人力资产微不足道的情况下，穷人显然没有办法来缓冲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因此通货膨胀就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往往选择扩张性的政策以帮助穷人的决策者所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不可能只在货币政策框架内得到解决。穷人更喜欢长期的较低的通货膨胀，但也可能接受短期的高通货膨胀，如果这样的通货膨胀与扩张性政策和更多就业机会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有一些收入来源和可望利用这些新机会的话。然而，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加速，扩张性政策迟早是要摒弃的。

财政政策与贫穷

与更直接的减贫战略最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因为它影响用于社会需要的开支。社会支出通常由教育、健康和营养、住房、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组成。社会保障与减贫的相关性相对较少，因为很大一部分受益人的收入水平一般都在贫困线以上。

实现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即资源配置、整体稳定和分配会对贫穷程度有所影响。可以进行两种分析：综合分析和组成分析。财政政策变化的影响可通过审查总支出或赤字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评估，如果它们是减贫中仅有的有关系的变量的话。⁸ 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往往会在供应限制因素呆滞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增加国民收入。而如上所述，国民收入的此类增加往往会减少贫穷。然而，

⁵ 同上。

⁶ William Easterly 和 Stanley Fischer, “通货膨胀与穷人”, 《货币、信贷和银行杂志》, 第 33 卷第 2 期 (2001 年 5 月, 第一部分), 第 160-178 页。

⁷ 同注 6。

⁸ 关于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关系, 见 Fischer, 前引书; 以及 Robert J. Barro,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多国经验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7 年,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第一章。

从长期来看，在税收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持续的财政扩张将会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挤出私人投资，加速通货膨胀和减缓增长——特别是在赤字由货币当局筹资的情况下。另外，如果国内储蓄不足以负担国内投资和财政赤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如此），经常账户余额就会恶化，产生所谓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对外赤字。税收减少而财政支出不减少同样会导致这种情况。因此，如果这些赤字累积并达到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的话，长期的财政持续不均衡可能会对经济并对贫穷产生不良影响。还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实现了均衡，无助于资本积累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由此引起的生产力提高从长期来看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潜力。

不过，仅仅依赖支出和收入总额或财政赤字规模是不可能精确预测财政政策对贫穷的整体影响的。整个财政的构成——经常和资本支出，支出的功能分配（如教育、健康和营养、社会保障和福利、防卫、利息支付等方面的支出）以及资金的类型和分配（税收、收费和外部援助）——都对政策的性质和成果有很大影响。如果利息支付占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政府用来实现其他目标包括减贫的钱就会减少。在收入方面，健康或教育服务收费限制了穷人接受这些服务的机会。⁹ 增值（或消费）税的负担对较穷的人来说可能会显得太重。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支出更加有针对性，可能会对穷人产生积极影响。为了筹措在必要时可用于扩大社会方案的资金，增长期间的财政状况必须保持稳定。以下部分将对与不同国家社会支出有关的问题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贫穷成果对财政支出和税收组成的敏感性，确立财政政策和贫穷之间单独的一般联系是不可能的。各国政府认识到政策与减贫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致认为应通过民间社会的更广泛参与来解决这个难题。它们的决定一部分是在例如非政府组织参与发展中国家财政预算决策的情况下依据积极经验作出的。减贫战略文件的编制和通过反映了这一点（见方框五.1）。

⁹ 见《2002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II.C.1），第七和第八章。

方框五.1

民间社会参与加强减贫战略

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增长与贫穷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国内和国际上目前也认识到国家需要对发展方案拥有所有权，这些认识共同导致了修正国家和民间社会在制订减贫政策中作用的努力。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低收入国家的所有贷款所要求的减贫战略文件，即受援国政府的目标说明，新达成的一致意见是邀请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广泛和积极参与制订国家的公共减贫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国际金融机构反过来也相继推行了旨在支持减贫战略实施的新贷款手段。^a 双边援助国日益参照减贫战略文件中规定的国家政策和目标调整自己的援助方案。^b 这表明在国内和国际两级，政府和国际组织制订国际发展战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减贫战略文件确认，如果同时进行结构调整、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健康、教育、就业和社会融入政策）和实施有效管理（包括预算进程和监督制度）的话，宏观经济稳定将有助于穷人从增长中获益。减贫战略文件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工作。减贫战略文件的使用还将改革工作扩大到以前的调整方案定为主要领域的社会部门以外。财政部现在是协调国家的主要政策手段，从而将减贫战略与国内外资源的国家中期预算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进程中，减贫被视为所有部门的一个目标，影响到宏观经济和其他政策的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领域。

民间社会参与制订影响贫穷发生率的所有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是减贫战略文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些文件吸取了某些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国家 and 地方积极经验。

例如，乌干达制订参与性国家减贫战略的努力是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减贫战略文件以及加强的重债穷国倡议的楷模。在制订 1996 至 1997 年的消灭贫穷行动计划时，乌干达政府请“中央和地方政府、捐助各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以及学术界”共同参与，并很快利用这些结果来重新分配 1997 年基础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c 地方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的机会自 1998

^a 特别是货币基金组织的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的减贫扶助信贷。

^b David Booth, “导言与概述”, 《发展政策评论》, 第 21 卷, 第 2 期 (“减贫战略文件有用吗? 非洲的经验” 专刊), 第 131-159 页。

^c John Mackinnon 和 Ritva Reinikka, 乌干达消除贫穷战略的教训, WPS2440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2000 年 9 月 30 日)。

方框五.1 (续)

年以来有所增加，这一年提供许多服务的责任被转移到地方当局，并通过新闻界向公众公布了相关预算数据。^d根据这些方针，政府在 1998 年征求意见时，贫穷的城市和农村社区要求得到更多的清洁水，从而促使乌干达中央预算对此更加重视。^e

要使减贫战略文件不是“昙花一现、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发展世界中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尚”，^f政府、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必须加强它们在各个领域的能力。其中包括收集有关穷人的更加准确的信息，审查贫穷条件和原因，更好地了解贫穷发生率和减贫战略文件中考虑的政策（包括一般财政政策和预算资金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追踪减贫公共开支的制度。^g这些行动可以大大加强代表穷人的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从而加强关心发展的各界的减贫能力。

^d Derik W. Brinkerhoff 和 Arthur A. Goldsmith, “公民如何参与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验和对减贫的影响”，《世界开发》，第 31 卷，第 4 期（2003 年 4 月），第 696 页。

^e 同上，第 690 页。

^f David Booth, 前引书，第 135 页。

^g 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追踪重债穷国的减贫公共开支”，2001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imf.org/External/np/hipc/2001/track.pdf>)；以及货币基金组织与开发协会，“加强追踪重债穷国减贫公共开支的行动”，2002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imf.org/External/np/hipc/2002/track/032202.htm>)。

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所受冲击可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出现。震荡可能是由非经济因素如自然灾害、国内政治动乱和战争引起的，也可能是由经济因素如商品价格的突然变动、国内银行危机或财政危机引起的。这些危机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外流，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另外，一国的危机也可能是由另一国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资金外逃可能会产生区域效果，影响到其他邻国及其货币。虽然非经济和经济冲击均可对经济和贫穷产生重大影响，但应将重点放在经济因素引起的冲击，因为它们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更密切。

随着经济更加开放和对国际经济变化更加敏感，这些经济冲击也变得更加常见。一方面，如果没有自由化，资本流量就会较少，对发展进程的支助也较少；另一方面，自由化还意味着易受伤害性的增加，需要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部门管理予以更多的关注才能从自由化中获益。¹⁰

¹⁰ 关于易受伤害性的进一步讨论，见《200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C.1），第二部分。

经常导致贫穷急剧增长的经济危机促使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经济不稳定性。鉴于 1990 年代危机的重大影响和严重程度，需要对危机影响国贫穷增加的差异程度及差异原因进行更多的分析。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涉及对减贫的重视程度，因为保护穷人的措施（如增加社会开支）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财政平衡的恶化。决策者在确定目标的优先顺序时必须考虑不同政策和措施如社会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平衡。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危机期间的贫穷增长究竟是暂时的还是（部分或全部是）长期的。

对近期国家经验的审查可在政策和贫穷之间的关系方面向决策者提供一些线索，但要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代价成为减贫战略更有效的一部分，必须有更加系统和全面的了解。

经济危机扩大了增长率变化和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对贫穷的影响。1990 年代的危机可以作为有关这一关系的近期案例研究，它表明危机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洲和经济结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既表现出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但同时为防止未来危机及其后果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以下的部分将简要介绍对这些危机的宏观经济对策，分析可能对贫穷产生的影响，并讨论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在震荡时期的作用有限而必须采取的补充措施。

东亚和拉丁美洲针对危机采取的宏观经济对策

东亚的若干国家直接受到了 1997 至 199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其中五个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危机过后贫穷都有所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在 19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高的持续增长。在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5 至 13 个百分点。这些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在 1998 年有所上升，但仍然保持在单位数以内，只有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58%。¹¹

针对危机，东亚国家起初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限制性的，以恢复国内的稳定；但随着危机范围大于预期这一点变得日益明确，宏观经济政策从 1998 年后半年开始成为扩张性政策。¹² 在大多数国家，收入的总体下降成为自动的稳定因素，社会支出则随着危机期间总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采取紧急方案的需要增加了。¹³ 结果，1997 和 1998 年间，财政余额下降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到 4%（见表五.1）。

¹¹ 关于危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详细分析，见《1998 和 1999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分别为 E. 98. II. C. 1 和 E. 99. II. C. 1）。

¹² 对东亚危机后采取的对策是否适当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进行了许多讨论。本节只提到了这些政策与贫穷相关的结果。

¹³ 《1999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方框三. 2。

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各种货币的汇率，这些货币随着资本逃离该地区而迅速贬值。利率特别是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在 1997 年后半年和 1998 年上半年迅速上升，但此后开始下降，以防止经济活动的进一步下降并支持财政努力。

表五.1

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危机的反应

国家和基准年	财政余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利率 (贷款)	
	上一年	基准年	基准年的年利率 (百分比)	与上一年相比的 百分比变化
印度尼西亚 (1998)	-0.7	-2.9	32.1	47
大韩民国 (1998)	-1.5	-4.2	15.3	29
马来西亚 (1998)	2.4	-1.8	10.6	12
菲律宾 (1998)	0.1	-1.9	16.8	3
泰国 (1998)	-0.3	-2.8	14.4	6
阿根廷 (1995)	-0.7	-0.6	14.0	146
巴西 (1995)	-10.0	-4.6	49.1	-3
墨西哥 (1995)	0.0	-0.5	19.3	5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拉加经委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概览》的数据（各期）。

虽然拉丁美洲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趋势不像东亚国家那么集中，但 1990 年代发生的三次冲击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经济状况。1994 年底墨西哥货币的贬值在 1995 年拖垮了阿根廷的经济。巴西当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东亚危机以及随后于 1998 年 8 月爆发的俄罗斯危机给巴西雷阿尔带来了压力，该货币自 1994 年开始实施雷阿尔计划以来一直保持在某个范围之内，但在 1999 年不得不贬值。在世纪之交，阿根廷遭遇了自己的危机，墨西哥和巴西则由于全球经济全面减速而仍然处于萧条状态。

1990 年代前半期，该地区的通货膨胀非常剧烈；1995 年墨西哥的通货膨胀极度恶化，阿根廷则通过实施自由兑换计划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使比索与美元的兑换率始终保持在 1:1 的水平。这三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状况在新世纪之初表现出一致迹象，虽然巴西的通货膨胀在 2002 年再度缓慢上升。墨西哥比索在 1995 年就遭到了贬值，阿根廷比索则处于钉住状态，直至阿根廷在 2002 年停止自由兑换计划，此后阿根廷比索便骤然贬值。雷阿尔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更多的起伏。虽然其汇率途径各不相同，但该地区这三个最大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差额在 1990 年代后半期都出现了占国内生产总值 1% 到 5% 的赤字。这意味着与危机前时期相

比，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有所减少，这是出口增加的结果。巴西的经常账户赤字在 1994 和 1999 年间有所扩大，但在危机过后的几年稳定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4% 的水平。

总的来说，拉丁美洲 1990 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受到了经济摆动的影响。例如，在财政方面，由于政府收入紧跟增长趋势，而支出又紧跟收入，政府往往在增长时期增加开支，而在困难时期缩小开支。鉴于财政政策有可能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助长周期性波动趋势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¹⁴

同样，拉丁美洲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并没有降低该地区经济的不稳定趋势。通常情况下，在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资本大量外流后，国内货币就会迅速贬值。为了调整和防止贬值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货币当局不得不提高利率。而这反过来又减少了投资，使负债的中期代价更加高昂，尤其对国内筹资产生了不良影响。结果，这种货币政策只能在整个经济因震荡效应而萎缩的时候加剧财政政策的紧缩效应。

在缺乏国内外资金的情况下，这种综合政策可能是恢复价格稳定和最终走上增长道路的唯一方法。不过，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是长期的。

在这里讨论的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墨西哥在 1990 年代整个十年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定，即使在 1994 至 1995 年的危机期间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主要支出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财政赤字在危机期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阿根廷的财政状况在 1990 年代初期是稳定的，但在国内实体经济、对外部门和省级财政问题的影响下，在这十年的后半期有所恶化，直至 2002 年。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停止实施摒弃自由兑换计划和在经济活动下降期间缩减开支后即不再出现。巴西的公共部门由于 1998 年偿付债务的成本增加，财政赤字数额相当大。这导致根据国际金融界关于对主要支出加以的建议在 1999 年迅速实施了收缩。¹⁵

这三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试图缓和其货币贬值现象，吸引短期资本和/或减少即将发生的价格急剧上升。阿根廷和墨西哥在 1995 年危机期间，巴西在 1998 和 1999 年间，利率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前两个国家在随后的一年即降低了利率，而巴西在放松货币政策方面显得更加迟疑，因为它的货币的实际价值在 1999 年下降了 36%。

对策比较

影响东亚区域的重大经济震荡只有一个，即 1997 至 1998 年的震荡，¹⁶ 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则经历了 1994 年底的龙舌兰酒危机，1990 年代亚洲和俄罗斯危

¹⁴ Ricardo Martner, “Los estabilizadores fiscals automáticos” 《拉美经委会评论》(圣地亚哥), 第 70 期 (2000 年 4 月)。

¹⁵ 不包括偿债在内的总支出。

¹⁶ 所有五个东亚国家在危机以前都保持了较高的持续增长率。菲律宾的增长率较低，但增长下降的幅度也最低。虽然从增长下降的幅度来说，东亚所受冲击比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要大，但该区域恢复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

机的影响，1999年巴西雷阿尔的贬值和阿根廷的一系列危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更易受伤害，导致这一期间本区域各经济体更加不稳定，而且没有太多的恢复时间或空间。除了经常出现短期的不稳定以外，拉丁美洲1990年代的国内储蓄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共部门的储蓄较少。¹⁷另外，这里提到的所有五个东亚国家的经常账户都有盈余，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在危机过后仍然不得不筹资来弥补其经常账户中的赤字。¹⁸

由于存在资本流量需要和不稳定程度方面的这些差异，不同区域的宏观经济对策也有所不同。如上所述，亚洲国家采取了有助于防止增长进一步下滑的财政政策。同样，在货币方面，它们降低了利率来恢复经济，只有通货膨胀压力更大的印度尼西亚除外。而在拉丁美洲，由于缺乏资金，迫使政府不得不勒紧腰带，放弃了经济复苏政策。拉丁美洲的货币当局被要求采取紧缩政策，限制财政扩张（见表五.1）。

重返增长道路的这一延误对贫穷产生了影响。而且，由于上述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城市活动，城市穷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对穷人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具体取决于采取的对策及其对经济部门的影响。对穷人来说最相关的两个变量是工资变化和失业。这些变量的相对调整程度取决于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在阿根廷，虽然自由兑换计划仍然有效，财政赤字被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2%以下，利率却高于危机发生以前。这样，通货膨胀受到控制，实际平均工资（虽然有所浮动）也得以保持，但在阿根廷停止实施自由兑换计划，让比索自由浮动（2002年1月）后实际平均工资就下跌了。因此，在自由兑换计划期间，主要是通过失业进行的调整，在1995年首次震荡后失业率始终较高。2002年的失业率也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比1990年代中期发生危机以后要低。在龙舌兰酒危机期间和巴西雷阿尔计划的末期，贬值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使墨西哥和巴西的工资低于价格的骤涨。不过，在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后，墨西哥恢复了工资水平，失业率下降，而在巴西，由于采取了严格的紧缩措施，工资持续下降，失业率则始终较高。

在亚洲危机之后，所有五个国家都经历了若干年的高失业率，然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只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这两个国家，危机过后几年采取的货币政策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也就是说，官方和贷款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这五个国家在危机后的几年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保留就业数据的主要部门中，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在危机期间的绝对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相反，农业的就业率有所上升，尽管该部门1998年的产量有所

¹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Una Década de Luces y Sombras: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los Años Noventa”，Alfaomega 和拉加经委会（波哥大和圣地亚哥，2001年），第89页。

¹⁸ 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除外，这次危机由于进口缩小而导致了经常账户的盈余。

下降——只有泰国例外。在泰国，所有部门的就业率均有下降。¹⁹ 在同样经历了货币大幅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实际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较大。

危机以后的贫穷

据认为，短期内的城市贫穷增长（可能会产生中长期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一般由国内外不均衡以及针对这些不均衡采取的对策所导致的经济震荡。²⁰ 由于通常集中在城市的活动、投资和产业的性质，城市与其他地区相比更易受到某些震荡的影响。投资的减少是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结果导致失业率特别是建筑和制造部门失业率的上升。贸易条件震荡对农村或城市地区都可能产生影响，具体取决于货物生产地点。无论是哪种震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通常是技能较低的工人，他们处在收入阶梯的最底层，是最贫困的群体。

虽然证据不充分也不确定，但总的来说，东亚的农村部门似乎更能抵抗 1997 年危机的影响，因为它们依赖的农业部门基本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在拉丁美洲（见下文），大多数人口和穷人集中在城市地区。此外，拉丁美洲的农业部门与大多数东亚国家类似，比城市部门更能抵抗震荡的影响，在危机期间仍持续增长。²¹ 因此，当前讨论的范围限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城市地区的影响。²²

关于城市贫穷的分类数据很少，因为这些数据不经常收集，并且会产生涵盖范围和衡量问题。不过，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危机后的城市贫穷问题。在本章讨论的东亚五个国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的城市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 57% 至 82%。²³ 在印度尼西亚，42%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在泰国只有五分之一。如表五.2 所示，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城市居民，这两个国家在危机期间的城市贫穷率分别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印度尼西亚生活贫穷的人口约占五分之一，其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城市地区。菲律宾的城市贫穷率在危机后于 2000 年上升到 25%，破坏了危机前几年取得的进步（1994 至 1997 年间城市人

¹⁹ 由于采矿业雇用的劳动力人数不多，从经济活动人口或贫穷增加角度来说，该部门的就业率下降不明显。见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指标”（<http://www.adb.org>）。

²⁰ 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讨论，见 Camilo Arriagada, *Pobreza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s Escenarios y Desafíos de Políticas Para El Hábita Urbano*, 《Serie Medio Ambiente y Desarrollo》第 27 期（拉加经委会，2000 年 10 月，圣地亚哥）；以及 Nora Lustig, “危机与穷人：对社会负责的宏观经济学”，1999 年 10 月 22 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第四次年度会议上的主席讲话。

²¹ 根据拉加经委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研究》的数据（圣地亚哥，各期）。

²² 另一个因素，即人口的迅速增长，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在中长期对城市贫穷状况产生影响。按照当前的增长率，城市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农村人口（《世界城市化前景：2001 年修订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XIII.16））。研究还表明，如果城市贫穷继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将会超过农村贫穷（Martin Ravallion, “论贫穷的城市化”，《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68 卷（2002 年），第 435-442 页；又见本《概览》第七章关于农村贫穷的讨论）。因此，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城市贫穷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²³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华盛顿特区，各期）。

口的贫穷率从 28% 下降到 21.5%)。泰国在危机以前的数字表明只有 10% 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泰国的贫穷率在危机期间确有上升，但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²⁴

表五.2

经济危机对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影响

国家与基准年	宏观经济指标年率 (百分比)				其他指标					受影响最大的部门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通货膨胀	汇率 ^a	经常账户余额变化 ^b	失业		实际工资 ^c 百分比变化	城市贫穷 ^d		
					率	百分比变化		率	百分比变化	
印度尼西亚 (1998)	-14.4	57.6	-70.9	6.0	5.5	36.2	-41.0	19.5	101.0	C.F
大韩民国 (1998)	-7.4	7.5	-32.1	14.4	6.8	161.5	-9.3	19.2	180.0	C.T
马来西亚 (1998)	9.5	5.3	-28.3	19.1	3.2	41.7	-1.1			C.M
菲律宾 (1998)	-2.7	9.7	-27.9	7.7	9.6	21.5	-2.0	25.0	16.3	C.F
泰国 (1998)	11.4	8.1	-24.2	14.7	3.4	277.8	-7.4		略有上升	C.M
阿根廷 (1995)	-4.1	3.4	-0.1	2.3	17.5	52.2	-1.1	17.8	34.8	C.M
巴西 (1999)	-0.3	8.9	-33.6	-0.5	7.6	0.0	-4.4	26.4	7.5	M.S
墨西哥 (1995)	-7.8	35.0	-47.4	6.5	6.2	67.6	-13.0	37.5	29.3	C.S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拉加经委会和其他官方来源提供的数据。

^a 每美元国内货币的价值百分比变化。负数表示货币贬值; 正数表示货币升值。

^b 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点的变化。

^c 亚洲国家的数据来自 Gordon Betcherman 和 Rizwanul Islam 编, 《东亚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危机: 影响、反应和教训》(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动局, 2001 年, 华盛顿特区和日内瓦), 第 14 页。

^d 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人口百分比, 危机前和危机后基准年的变化取决于现有数据。

^e 增长下降幅度最大的部门: C: 建筑; F: 金融; M: 制造业; S: 服务; T: 贸易。

²⁴ 关于危机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详细情况, 见 Michelle Gagnolati, “东亚金融危机的社会影响: 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证据”, 世界银行, 东亚环境和社会发展股, EASES 讨论文件汇编, 2001 年 6 月。

选出的所有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城市贫穷率在经济震荡后均立即上升，并且同东亚一样，使危机发生前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步发生逆转。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75-88%）生活在城市地区，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贫穷人口占贫穷总人数的 60-75%。²⁵ 阿根廷和墨西哥在 1994 年以前设法减少了城市贫穷，特别是阿根廷，城市贫穷人数从 1990 年占总人口的近 19% 减少到 1994 年的 11% 多一点。墨西哥的城市贫穷率在 1996 年急剧上升后，又下降到接近危机以前的水平。然而，墨西哥的城市贫穷水平仍然很高（占总人口的 29%）。阿根廷的城市贫穷问题在 1990 年代后半期继续恶化，并随着宏观经济的低迷持续到新的十年。仅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区，生活在国家确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就在 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5 月间从约 30% 增加到 50%。²⁶ 巴西城市地区的贫穷率在 1990 至 1996 年间从 36% 下降到 24%，²⁷ 但这一下降在 1999 年的危机期间发生逆转，这一年的贫穷率上升到 26% 以上。

解决城市贫穷的直接措施

各国当局在增长期间可在宏观经济政策舞台上获得的自由程度影响到危机期间急需满足社会需要的资源供应。东亚国家在危机以前积累的盈余使它们能够在危机时期进行财政扩张，并制定了保护穷人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在危机以前并不存在。²⁸ 拉丁美洲的例子说明即使危机以前就存在的较大财政限制和大量长期穷人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在危机发生时是如何限制现有社会保护方案的扩展的。

总的来说，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府在增长时期增加了社会支出数额。在 1990 年代的紧缩和增长缓慢时期，该区域的许多国家发现很难保证预算的社会预算支出。各国的调整程度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其助长周期性波动模式与各国政府的总支出模式保持了一致。虽然试图保护用于社会目的的预算资金，但在存在财政限制因素的情况下，这一点并不总能实现。总支出对收入变化很敏感，同时收入又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市场对外国资本的更加开放，经济波动更加频繁，也更加突然，使财政支出也变得不稳定，从而很难控制。²⁹

因此，财政状况可能会影响到社会保护计划的数量和规模。大体上有两种计划可以按照其目的进行分类，即重点在于协助受影响人口创造收入或赔偿其损失的计划和旨在保护人力或有形资本和/或恢复任何此类资本损失的计划。前者包括

²⁵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²⁶ 《2003 年世界经济状况和前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C.2），题为“今日阿根廷的贫穷”的方框三.1。

²⁷ 拉加经委会，《2000-2001 年拉丁美洲社会概观》（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G.141）。

²⁸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护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F.2）。

²⁹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见拉加经委会，《2000-2001 年拉丁美洲社会概观》；以及拉加经委会，《财盟约：优点、弱点、挑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8.II.G.5），第 125-129 页。

工作福利、失业保险制度、解雇金和微额信贷援助等方案。后者包括教育、卫生、营养和住房等方案，有时称为生计保护。³⁰ 虽然后一种方案各领域中的社会服务同第一组方案一样，也可视作货币援助，但重点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防止对人力资本造成长期损害。住房是一种有形资本，但同时也有助于保持人力资本和人民生活的质量。各国政府现在不仅将住房看作空间或有形问题，还看作减少贫穷和社会孤立状况等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下文将做出解释。由于城市贫穷提出了多方面（收入和非收入）的挑战，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特定的问题和限制，各国政府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这两种方案应当相互补充，特别是在穷人创造的收入不足以补偿危机期间遭受的人力资本损失或者不足以提供享受服务的机会的情况下（见表五.3，该表将危机后采用的政策进行了分类）。

印度尼西亚和大韩民国的城市贫穷发生率比拉丁美洲国家要高得多（见表五.2）。不过，平均来看，拉丁美洲的贫穷率高于东亚。东亚在危机以前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东亚危机后成为穷人的人数急剧增多。另外，这些“新穷人”在失去工作以前大多受雇于正规部门。因此，在这一区域实施了创收方案，以帮助这些新穷人回到以前的状态。拉丁美洲恰恰相反，在危机发生以前的几年穷人比例比较高，虽然这些年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³¹ 不过，拉丁美洲的大多数贫穷都是结构性或长期性的，甚至在增长时期也是存在的。因此，该区域实施了许多方案来满足收入和非收入型需要。

表五.3

社会政策对经济危机的反应

政策类型	
创造收入/补偿 主动 工作福利方案 培训方案 小额信贷方案 被动 失业保险 解雇金 补贴	生计保护 人力资本 提供保健 营养方案 教育方案 有形资本 住房方案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³⁰ 用公共筹资术语来说，这两种方案都在政府的社会支出项下编制预算。与收入相关的方案通常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部分，而生计保护与预算的其他部分有关。

³¹ 拉加经委会，《2000-2001年拉丁美洲社会概观》……

东南亚实施了若干“收入型”方案来帮助受1997年危机影响的人口。³² 这些方案包括前摄措施，即旨在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措施，如公共工程方案，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信贷，以及“被动”方案如失业保险计划等。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部分实现了减少直接受到区域金融危机影响的穷人的损失这一目标。但它们都遇到了覆盖范围和效率问题。这些方案中有许多不得不在危机开始后制订和实施，因为许多方案在该区域增长迅速、对它们的需要不甚迫切的时候并不存在或者被暂停实施。此外，在本章讨论的五个东亚国家，对现有紧密和强有力的家庭关系和支持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依赖往往取代了政府保护，特别是在繁荣时期。因此，许多此类方案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方案，缺乏克服贫穷骤然上升所必需的制度化 and 规划。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实施的公共工程方案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同时扩大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性质，即繁重的建筑工作，妇女和老年人并不总能参加这些活动。另外，这些方案大多设在农村地区，对失去城市地区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没有吸引力。印度尼西亚发现这些方案的持续时间太短，使许多人仍然处于失业和贫困状态。赞成这些方案的观点强调说它们易于实施，得到了教育水平低的工人的良好响应，并且在工作得以持续的同时增加了收入。在大韩民国，政府为那些有资格纳入生计保护方案的人将公共工程和工作培训与粮食、衣服、住房、教育和卫生保健的现金和实物转移结合起来。³³ 该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提供创收能力和在必要时为保护人力资本提供援助的双重目的。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实施的小额信贷方案尤其对教育水平低的妇女有益。³⁴ 受益人可以通过这种信贷在较短的时期内为创收活动筹资。不过，同公共工程方案一样，小额信贷未能惠及那些受金融危机影响最直接的人群，即城市正规部门的失业者。原因之一是必须成立团体才能得到这种信贷。城市失业人员不能在短期能组成这些团体。这种方案的另一个缺陷是信贷被接受者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性的投资，这反映了他们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的困难。

大韩民国的失业保险计划设法向正规部门的受益人提供足够的救济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³⁵ 但是，像大多数保险计划一样，它们没有涵盖非正规部门。其他国家在危机期间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大韩民国实施的中小企业信贷方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中小企业得到的援助最少，而财务状况较好的中小企业被批准的贷款数额较大。由

³² 亚太经社会，《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护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

³³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针对危机的社会安全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教训和方针”，2001年2月向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提交的论文，第13-14页。

³⁴ 亚太经社会，《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护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第44-45页。

³⁵ 同上，第52页。

于在选择受益人时采用了标准的信贷标准，最易受伤害的企业得到的贷款是最少的。³⁶

拉丁美洲也实施了创收型的社会保护方案。与东亚一样，确定受益对象是该区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但原因不同。拉丁美洲的许多穷人与东南亚的新穷人不同，他们在危机以前就不是正规部门的一部分。因此，与正规部门密切相关的这些方案往往不能惠及这些穷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非正规部门相对较小，只占总就业的五分之一左右。³⁷ 泰国的数据有所不同，但这些数据表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较小，尚且不到总就业的十分之一。相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占城市总就业的45%到一半以上。

因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有些政府采取了以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为对象和解决长期结构问题的各种方案。³⁸ 长期解决没有技能的贫穷工人问题的例子有培训方案，如墨西哥的就业和工资再培训方案，该方案自1980年代末以来每年培训的城市工人有近五十万。不过，每项培训方案都由于时间太短，似乎没有提供必要的长期技能。在巴西，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称为国家工人资格计划的新型专业培训方案，该方案与正规部门无关。在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下，该方案的目的是面向主要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的穷人。³⁹

拉丁美洲虽然支付解雇金，但实施的失业保险方案非常少。不过，劳工市场非常不正规，这限制了这些方案的涵盖范围，特别是在穷人中的涵盖范围。例如由雇主专门缴款供资的巴西失业保险方案就是这种情况，它主要对收入水平较高的失业人员有益。⁴⁰

巴西的信贷方案试图将两个目标结合起来：支持小型企业，并通过这些穷人管理和供职的企业向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为失业保险计划而储备的同一基金，即1990年设立的工人援助基金，向这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案提供支助。⁴¹

³⁶ 同上，第59页。

³⁷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01-2002年劳工市场主要指数》（2002年，日内瓦）。

³⁸ 另外还有以正规部门的工人为对象的工作方案。例如，“工作福利”方案，如阿根廷的Trabajar，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了建筑岗位，工资水平不高于市场价格的90%，以便只吸引穷人并鼓励在需求恢复后返回市场。此类方案的优势是能够在危机时期迅速扩张，以贫穷地区为对象并且能吸引穷人。但是，政府可能要承担很高的成本。见Norman Hicks和Quentin Wodon，“拉丁美洲对穷人的社会保护”，《拉美经委会评论》第73期（2001年4月）；以及Jyotsna Jalan和Martin Ravallion，《工作福利给穷人带来的收入收益：对阿根廷Trabajar方案的估计》，世界银行第2149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1999年7月，华盛顿特区）。

³⁹ 关于对巴西减贫政策的评论，见世界银行，《向巴西的贫穷进攻：重点在于城市减贫政策的贫穷报告》第1和第2卷，第20475-BR号报告（世界银行，2001年3月31日，华盛顿特区）。

⁴⁰ 同上，第78-79页。

⁴¹ 同上，第39页。

在危机期间生活水平也受到影响，生活水平的下降可能会产生长期效应。生计保护资金的减少增加了获得基本服务的难度。教育、卫生、营养和住房等方面的生计保护方案与同收入有关的社会保护计划一样，也存在着覆盖范围的问题。其中许多方案面向的是整个人口，而错过了真正的穷人。因此，富人往往从这些方案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更直接地参加这些方案。这在危机时期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时人力资本的恶化会对穷人的生计造成长期损害。例如，由于家庭收入减少而退学以便早日工作的决定可能会在将来对个人及其未来的家庭产生长期影响。新穷人房客可能不得不离开他们的住所，生活在更不稳定的环境中。社会支出可在中长期产生渗透到其他社会部门的积极的外在因素。不过，回归或以穷人为对象的方案无法解决底层十分之一人口在危机以后的需要。

墨西哥在教育 and 卫生方案方面的近期经验说明了恰当地惠及穷人的这些问题。研究表明，墨西哥的公共教育支出对富人更有利，并高度集中在城市地区，虽然 1994 至 2000 年间这种分布的歪斜程度有所改善。高等教育每个学生的支出大大超过初等教育。此外，教育程度越高，支出的递减性越强。只在初等教育一级发现最穷的 40% 的家庭得到了公共支出总额的 40% 以上。同样，收入较低的十分之一人口很少能享受到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在改革方案中，政府试图通过向正规部门以外的工人提供医疗保险来增加他们享受的卫生服务。⁴²

具有多个目标的战略，即鼓励穷人努力保护或同时建设其“人力资本”不同方面的激励措施，也面临着确定受益对象的问题。例如，采取了粮食补贴来鼓励上学和接受健康治疗。但是，虽然采取了这些激励措施，缺乏接受教育和使用卫生设施的机会仍然妨碍了穷人的参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在确定对象和惠及适当群体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住房问题或许是城市贫穷最明显的结果。收入不够和缺乏获得贷款的机会迫使穷人非法开垦土地和用尽各种办法来建设住宅。在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中众所周知的这些大片的贫民区，不仅向当局提出了城市政策问题，而且可能使穷人居住的不稳定环境成为永恒现象。由于土地随意开垦，没有适当的基础设施，为居民创造了不健康、不卫生、拥挤甚至危险的条件（如陡峭的山坡容易滑坡）。此外，这些住宅与城市其他地区和社区产生了自然和社会上的隔离。仅提供住房虽然确实提高了生活条件，但并没有减少城市贫穷。

巴西采取了若干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穷人的住房问题。⁴³ 其中一个办法是向住户或社区提供贷款。住户贷款方案以不同条件下收入水平不同的群体为对

⁴² Ana Corbacho 和 Gerd Schwartz, 墨西哥：对穷人有利的开支政策的经验；货币基金组织 WP/02/12 号工作文件（2002 年 1 月，华盛顿特区）。

⁴³ 关于这些方案的进一步分析，见世界银行《向巴西的平穷进攻》……，第 2 卷。

象。这些方案涵盖的社区包括许多非穷人住户，但有些市由于信誉太低，根本不符合贷款条件。因此，真正贫穷的社区仍然得不到贷款。而有资格的社区中的某些非穷人住户则得到了利益。

第二种方案以贫民区条件的整体改善为目标。这些方案提供了提供基本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并提供了支持和建议，以提高贫民区居民的生活。里约热内卢一个多部门贫民区改善项目的目标是使居民能够从社会和物质上融入包括所有中等居住点在内的城市街区。Favela Bairro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其中包括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培训中心、商业机构、体育设施和提供基本服务等。虽然该项目反映了解决穷人住房问题的新方法，不仅试图提高他们的居住条件，还试图使他们融入社会，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复杂性使它没有达到预期目标。⁴⁴

解决巴西城市穷人住房问题的第三种方法是改革土地管理，要么使非法开垦的土地合法化，要么放松土地使用管理。⁴⁵ 世界银行认为巴西城市地区严格的土地使用管理促进了非正式街区的增长，因为穷人达不到使用合法土地的要求和条件。⁴⁶

总之，创收方案和保护穷人生计的方案都在惠及目标人口方面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庞大的情况下。许多问题都是缺乏接触正式机构的机会所造成的。虽然可以通过与正规部门有关的方案向许多新穷人提供援助，但长期穷人仍然遭到忽视，并且更难动员。必须制订以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或长期结构问题为目标的方案来解决长期贫穷。这些方案在危机时期为穷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网”。

所涉政策问题与建议

可以看出，经济震荡对城市穷人非常有害，恢复可能很慢，而且代价高昂。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可以减轻或防止这些震荡的政策。在危机时期，经济政策的直接和主要目标是稳定宏观经济，其直接结果不一定是减少贫穷。此外，财政限制因素也可能限制财政政策的施展范围，并决定社会一级的政策。因此，可以而且应当在限制因素较少而施展空间较大的增长时期采取预防宏观危机的措施。

采取预防措施的主要动机是“未雨绸缪”，避免繁荣和低迷时期的过剩。在这方面达成了广泛的一致，特别是在经历了 1990 年代的危机之后。但同时认识到一套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危机，必须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对政策加以调整。采用

⁴⁴ Elizabeth Riley 等，“Favela Bairro 和为城市穷人制订的新一代住房方案”，《地理论坛》，第 32 期（2001 年），第 521-531 页。

⁴⁵ Hernando de Soto 在《资本之谜：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却在其他地方遭到失败》（基本书籍出版社，2000 年纽约）中认为，穷人不仅需要产权，还需要进入使他们能够增加已获资产的价值市场机制。

⁴⁶ 世界银行《向巴西的贫穷进攻》……。

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防止危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对国内银行系统的管理和监督以及适当的资本控制有助于补充宏观经济政策预防危机的努力。⁴⁷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预防措施将使政府能够持续采取导致相对平稳和不间断增长的政策。换言之，增长时期的反周期政策应该留出在突然需要时采取扩张性政策的余地。⁴⁸这对实行有效的减贫进程非常重要，因为该进程要求长期稳定，中断将意味着失去已经取得的进步这一基础。⁴⁹

这些政策有助于降低经济不稳定，而经济不稳定可在危机时期增加政策反应的难度。衰退期间的财政限制通常直接减少用于社会目的的预算，从而妨碍向穷人提供援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也能直接影响社会保护计划的有效性，而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应当是决策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预防措施，即宏观经济政策未能保护整个经济免受内部或外部冲击的影响，社会保护计划在协助易受伤害人口和帮助长期穷人最终摆脱困境方面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讲，纠正性措施应当是不必要的。而且，如果减少了结构问题（如财政政策助长周期性波动的趋势），特别是在增长期间减少了这些问题，那么在增长缓慢或负增长时期就能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保护计划。虽然这些计划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经济下降的影响，但可能有助于缓和震荡。

政府在减少城市贫穷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通过政策所作的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差距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进程的各个阶段，从设计、规划、筹资和确定对象到实施和监测都存在着问题。

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整体差别与危机造成的穷人有关。在亚洲，新穷人主要是由于失业而突然面临贫穷，但在危机过后可能因再就业而摆脱贫穷的正规部门人员。在拉丁美洲，新穷人通常是非正规部门人员，他们往往加入长期贫穷的行列。这一结构上的差别能决定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有些以目前或曾经是正规部门人员的穷人为对象的政策可能对其余城市穷人无益，因为他们也许接触不到正规部门机构。为了给长期贫困人员带来利益，可能需要其他类型的方案。

东亚国家必须采取新的特殊措施，因为许多社会保护方案在该区域都被废止或根本不存在。这些方案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该区域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⁴⁷ 关于对全球化的世界中财政易受害性的讨论，见《2001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题为“全球化世界中的财政易受害性”的第四章（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C.1）。

⁴⁸ 关于此类政策的讨论，见 J. A. Ocampo, “全球化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反周期政策”，“Serie Informes y Estudios Especiales”，第4期（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II.G.115）。

⁴⁹ 有些研究从城市贫穷的增加角度计算了危机的成本。关于近期的一些例子和经济危机的社会影响的进一步讨论，见 Nora Lustig, 前引书。

长，并且在困难时期更多地依赖家庭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相反，拉丁美洲国家依赖的是扩大现有的方案，因为这些国家始终存在着贫穷问题，即使高速增长期间也不例外。⁵⁰

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支出取决于非常不稳定的经济活动周期，从而使衰退时期的社会支出下降。⁵¹ 因此，就像宏观一级的预防措施一样，必须在增长时期资源充足时制订社会保护方案。

除了上述实施问题外，主要的挑战是通过社会支出供资的方案来帮助最贫困的人。虽然由于人口分散和到达农村偏远地区困难，城市地区通常比农村地区更有机会使用卫生、教育和营养设施，但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方案往往只对城市地区的中等甚至高收入个人有利。大多数方案只能惠及已经在正规部门供职的人员，而极端贫困人口往往是在非正规部门，很少有机会使用教育和卫生设施。⁵² 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国家的许多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类型的隔离。大贫民区就是这种空间或居住隔离（或集中，视观点而定）的例子。这些地区附近的学校往往低于平均水平。非正规部门产生了与正式劳工市场不同的自己的动态，使隔离制度成为长期的现象。⁵³ 因此，传统方案不足以惠及整个目标人口。

人们组织基层活动来努力弥补这一差距，向城市穷人提供必要的服务。由于城市穷人同正规部门包括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隔离，非政府组织自然成为一个桥梁。非政府组织表明它们可以在低收入街区建立社会资本，并获得在地方投资的金融资本。⁵⁴

减少城市贫穷需要社会各级许多行为者的参与，它同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以及该进程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复杂。在最高的宏观一级，预防震荡是必要的，但危机的宏观经济反应并不总能保护穷人，特别是在财政限制因素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自由度的情况下。因此，在第二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确定社会保护计划内的预防和纠正措施，其强度根据需要而定。从理论上讲，社会方案应当能够满足穷人的需要，如果他们是正规部门人员的话。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非常大，基层一级的参与也是推动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的一个必要因素。

⁵⁰ 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及美洲开发银行，“应对危机的社会安全网……”

⁵¹ 拉加经委会，《2000-2001年的拉丁美洲社会概观》……

⁵² 关于对墨西哥情况的研究，例如见 Ana Corbacho 和 Gerd Schwartz，前引书。

⁵³ 关于对拉丁美洲穷人的这一隔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例如见 Rubén Kaztman，“Seducidos y abandonados: el aislamiento social de los pobres urbanos”，《拉美经委会评论》（圣地亚哥），第 75 期（2001 年 12 月）。

⁵⁴ 关于对为城市穷人开展的基层活动的评论，例如见 Diana Mitlin，“通过强化资产来解决城市贫穷”，《国际生境》（即将出版）。

第六章

贸易政策、增长与贫穷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 John Stuart Mill 注意到贸易可在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对外贸易的开放……在一个资源不发达的国家有时是一种工业革命”。¹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一联系的重点略有不同。当前重点强调的是贸易政策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贸易政策在减贫中发挥的潜在作用。近几十年来，许多因素共同将这一联系推到了最前线。首先，从 1970 年代开始，若干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大大增加，在出口推动下又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² 另外，从 1990 年代起，对全球化进程的关注开始引起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尤其是对通过贸易模式成功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与半途而废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这一问题给予了大量的关注。人们日益对这些最贫穷的经济体缺少进步和它们可能陷入边缘化表示关注。《联合国千年宣言》明确说明了纳入这些最贫穷国家的必要性。³ 《千年宣言》强调了消除贫穷的必要性，并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有章可循的、可预测的和非歧视性的”贸易体制（第 13 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最后，《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⁴ 注意到国际贸易是“发展的引擎”，指出一个“普遍的、按章办事的、开放的、非歧视的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有实际意义的贸易自由化将可大幅度增进全世界的发展，这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利”（第 26 段）。

本章将讨论贸易和贸易政策在刺激增长从而协助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贸易政策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数量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自由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使一国的居民能够在政府干预最少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而战略贸易政策是为了影响伙伴国家的贸易政策。只有在其他国家像预期的那样作出反应，改变其贸易政策，这些政策才能带来利益。贸易政策自由化包括采取减免关税、放宽或取消进口限额（数量限制）、减少进口税和出口补贴等措施。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必须或多或少注意到不使贸易自由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放任自由。

本章的基本观点是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以及通过这种增长才能减少贫穷。本章认为贸易效应，以及产生这些效应的政策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发挥作用。此外，贸易可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贫穷，如改变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供应或者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贸易和贸易政策带来的

¹ John Stuart Mill, 《政治经济原则》(伦敦, Taylor and Francis 书籍有限公司, 1996 年), 第三卷, 第七章。最初于 1848 年出版。

² 例如, 在 1969 和 1999 年间,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的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从不到 2% 上升到 8% 以上。

³ 见大会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决议。

⁴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 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2.II.A.7) 第一章, 决议 1, 附件。

变化产生了调整成本。不过，从长期来看，扩大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往往大于成本。另外，因担心潜在的调整成本而避免扩大贸易将导致停滞。但必须对贸易政策进行慎重考虑，因为贸易只是增长方程式的其中一个——有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变量，适合一个国家的政策转换供他国使用并不容易，因为各国情况像各经济体一样具有个性。因此，一国的贸易政策经验不能用于开具普遍有效的“政策处方”。

贸易与经济

如果看一下各个国家组别中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见表六.1），贸易作为发展催化剂的潜力就会一目了然。被视为有助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在1990年代增加了29%。至2000年，出口几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6%。出口占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占最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一点进一步证明了出口的重要性。此外，在这十年中，这两个国家组别的出口都急剧上升，至少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两倍。鉴于这些数字，不能将重点放在贸易是否有助于增长和减贫，而必须放在制订政策以确保它有助于增长和减贫。

表六.1.

1990和2000年不同国家组别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百分比	1990	2000
最不发达国家		
货物和服务出口	13.6	21.6
货物和服务进口	22.7	29.6
总贸易额	36.3	51.3
低收入国家		
货物和服务出口	17.8	28.7
货物和服务进口	20.7	28.1
总贸易额	38.5	56.8
中低等收入国家		
货物和服务出口	20.1	29.9
货物和服务进口	19.6	27.8
总贸易额	39.7	57.8
高收入国家（经合组织）		
货物和服务出口	18.0	22.6
货物和服务进口	18.0	22.9
总贸易额	36.0	45.5
全世界		
货物和服务出口	19.9	25.6
货物和服务进口	19.8	25.3
总贸易额	39.7	50.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网站，华盛顿特区。

在确定特定贸易政策的经济后果，以及了解这些政策变化的影响方面存在着许多固有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贸易政策是可变的，随情况需要而变化。这部分是因为贸易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工具，通常比改变货币或财政政策更容易实施。例如，通过征收进口税而增加政府收入在政治上可能比通过提高税额来增加收入更加可行，因为前一种方法伤害的人口可能要少得多。同样，非关税贸易壁垒虽然由于特别对消费者产生了许多成本而在经济上是无效的，但在政治上也许是可行的，因为它们保护了国内的生产者。或者，在面临国际贸易平衡赤字的时候，决策者可能认为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容易的方法，特别是在不能采取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在汇率依赖于另一国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或贬值成为无效的政策工具的经济体中，可能会发生后一种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依靠贸易政策来确定经济改革的方向虽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可能是最可行而且使用最多的方法。⁵

确定特定贸易政策对经济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在于很难（如果不是绝无可能）阻止因果关系（与相关性相比）的发生。这是因为贸易政策不是在真空中实施的。除贸易政策外，还在实施许多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将贸易政策的影响与其他经济政策和事件区分开来极其困难。例如，某伙伴国家的关税减免可能会刺激出口。不过，出口增加也可能是因为产品质量高或收入增加，从而导致伙伴国的需求增加。

确定贸易政策的结果也有困难，因为贸易政策通常是逐渐变化（极端情况下除外），因此它们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国家经常在各种保护形式之间变动，而不是取消保护或突然提高保护水平。人们经常担心贸易改革如取消进口配额或减少进口关税会对进口竞争行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同时给其他经济部门带来繁荣。虽然经验表明发展的利益会超过因任何受保护部门的毁灭而产生的成本，但更加谨慎的人表示担心进口竞争部门的紧缩会导致剧烈和长期的衰退。但实际上，一旦实施了贸易改革，整体影响通常小得令人惊讶。⁶ 例如，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的若干估计数字发现福利只增长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至 1%，或者与预期相比增加幅度较小。⁷ 但综合动态影响就会发现福利收益的增加幅度大得多。因此，在直接或静态状况之外，贸易和贸易改革的潜在收益，以及自由化对增长的刺激影响，从中期或长期来看对一个国家是非常重大的。因此贸易和贸易政策可成为减轻贫穷的有力工具。

⁵ 例如，扩大出口的努力可能会受出口补贴的驱动，并由于进口商被起诉至世界贸易组织而随后产生倾销费用。

⁶ Rui Albuquerque 和 Sergio Rebelo，“关于贸易改革的动态”，《国际经济学杂志》，第 51 期（2000 年），第 21-47 页。

⁷ Thomas F. Rutherford 和 David G. Tarr，《贸易自由化与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在增长》，世界银行第 1970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1998 年，华盛顿特区）。

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即扩大开放的同义词）日益成为过去二十年经济政策建议的习惯原则。虽然普遍认为开放最终是有益的，但审查和剖析这些政策的影响可能非常复杂。根据上面的说明，贸易影响——在确实追踪的情况下——表现在三个时间范围。首先，贸易可对长期的整体增长产生影响。此外，贸易还影响收入分配和穷人福利。这两种影响都是中期效果。但贸易政策也能带来各种短期后果，产生调整问题和成本，甚至是整个经济的震荡。

由于贸易自由化和贫穷都不易衡量，而且可单单将自由化视为主要经济震荡的历史例子有限，因此很难确定二者之间的经验联系。⁸ 不过，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大的国家往往收入较高。在解释这种主张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可能因为富裕才做较多贸易，也就是说，贸易额可能源于内部。不过，贸易额较多的国家在整个二十世纪收入都较高。⁹

“开放”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一国本身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从出口补贴或进口关税或配额等保护中解放出来。各国可以控制它们在这方面作出的政策选择，虽然有时很难作出这些选择。扩大开放通过对进口和福利的影响而对贫穷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通过许多途径来显现，如改变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供应以及劳动力的需求，改变投资和创新激励措施，影响政府收入和收入分配等。另外还有市场准入和潜在的伙伴经济体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如配额、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程度的问题。这里，出口在促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作用是相关的。为了获得贸易收益，外国市场必须是开放的。不过，在这方面个别国家所起的作用非常小。相反，应由伙伴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社会共同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贸易与增长

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长期减贫的关键。因此，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经济开放贸易是否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¹⁰ 在探讨与贸易自由化有关的增长对穷人有利还是有害之前，必须对开放贸易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审查。

理论与实践中的自由化与增长

自由化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是不明确的。Robert Solow 1956 年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该模型的含义是开放通过促进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长期提高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内在增长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从而表明开放可能会以多种方式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例如通过技术传播或边学边做。

⁸ 例如见 L. Alan Winters, “贸易和贫穷：二者之间有联系吗？”，载于《专题研究第 5 期：贸易、收入不平等与贫穷》（世界贸易组织，2000 年，日内瓦）。

⁹ Douglas A. Irwin 和 Marko Terviö, “贸易是否增加了收入？二十世纪的证据”，《国际经济杂志》第 58 期（2002 年），第 1 至 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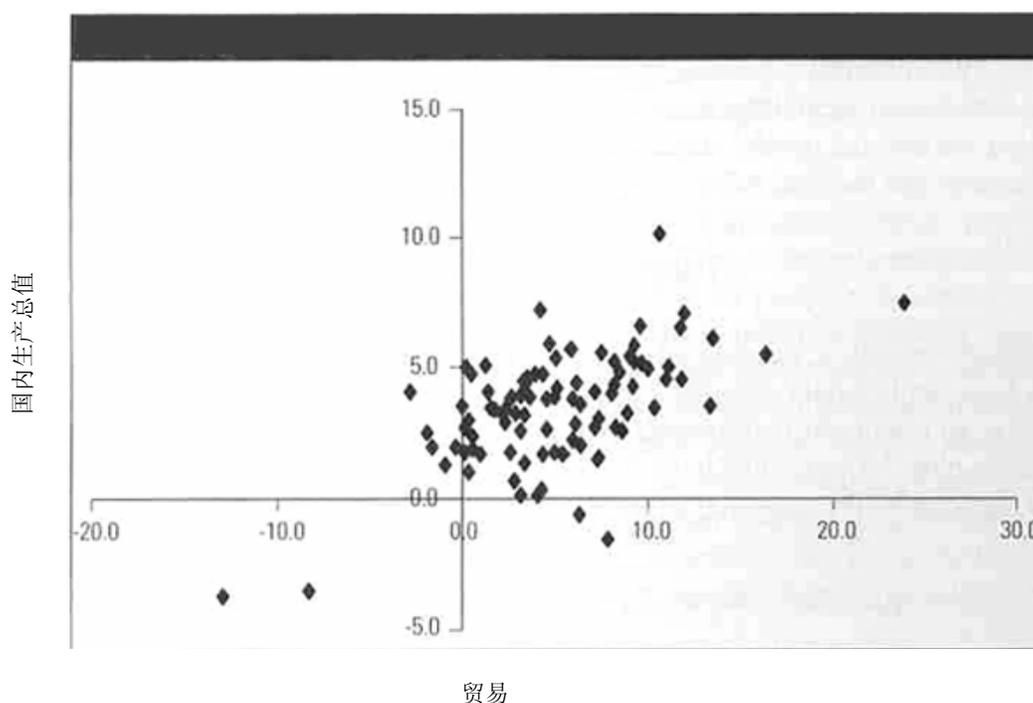
¹⁰ 关于这些关系的强有力的说明，见 Jagdish Bhagwati 和 T.N. Srinivasan, “贫穷国家的贸易与贫穷”，《美国经济评论：文件与会议记录》，第 92 期（2002 年），第 180 至 183 页。

为了评估关于自由化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首先需要确定一个经济体的积极开放或自由化与现有的开放状态之间的差别。寻求两个动态变量如自由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符合逻辑的，寻求两个静态变量即开放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样符合逻辑。不过，寻求贸易开放程度与增长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是错误的。¹¹ 自由贸易或开放带来的收益是一种静态效率收益。源于自由化的动态收益对增长有影响。¹²

偶然的经验证明了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联系（见图六.1）。但从政策角度审查这一关系时至少有两个问题。很难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特别是在该国比较封闭的时候。这是一个精确度的问题。此外，确立经验联系的困难由于贸易政策通常是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而变得更加复杂。¹³

图六.1.

1990 至 2000 年平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年）。

¹¹ Andrew Berg 和 Anne Krueger, “水涨船高：为什么开放有助于抑制贫穷”，《金融与发展》，第 39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

¹² T. N. Srinivasan 与 Jagdish Bhagwati, “外向与发展：修改是否正确？”，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1999 年。

¹³ Neil McCulloch、L. Alan Winters 和 Xavier Ciera, 《贸易自由化与贫穷手册》（联合国国际发展部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01 年，伦敦）。

虽然自由化的国内影响，或者相反的保护成本很难衡量，但大量多国和有时存在争议的证据表明，自由贸易制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关系。这一结论得到了不同国家，包括许多撒南非洲经济体的确认。¹⁴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调查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工业货物的贸易壁垒都产生了大量的成本。¹⁵高度保护和大量的消费成本通常集中在每个国家的几个产业。有些部门经常会开展一些高度保护活动。农业、服装和纺织实际上出现在每个发达国家的清单中，而汽车和零部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保护项目。运输、通信和金融受到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严格保护。

已确认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经验联系，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外开放的国家增长更快。其中有些调查只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¹⁶另一些调查范围更广。对 1970 至 1989 年间的 57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开放有助于增长。¹⁷有些分析采取了第二个逻辑步骤，即从更加动态的角度来看待开放，也就是说，将开放视为公开或自由化的同义词。对自由化影响的一项审查重点审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1990 年代中期的 100 多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¹⁸自由化与增长之间显然存在着强有力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组别内，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以每年 4.5% 的速度增长，而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每年的增长率只有 0.7%。在发达国家组别内，“开放”经济体的年增长率为 2.3%，封闭经济体的年增长率为 0.7%。这些发现还扩展到自 1990 年以来实施市场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的中欧和东欧经济体：贸易改革强度较大的经济体至 1994 年实现了经济正增长。

这些研究很少区分开放程度。使用两组贸易开放衡量方法对 100 多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增长进行截面分析的进一步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和直接”。¹⁹不过，据发现，贸易额与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积极关系，而第二组衡量结果支持贸易通过各种渠道如技术转让、

¹⁴ Kazi Matin, 《撒南非洲的开放与经济状况：多国时间序列分析提供的证据》，世界银行第 1025 号工作文件；以及 Ann Harrison, 《开放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多国时间序列分析》，国家经济研究局第 5221 号工作文件（国家经济研究局，1995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¹⁵ Gary Clyde Hufbauer, “调查保护成本：一种局部平衡方法”，载于 Jeffrey J. Schott 编《世界贸易体制：未来的挑战》（国际经济学研究所，1996 年，华盛顿特区）。

¹⁶ 例如见 Michael Michaely, “出口与增长：一项经验调查”，《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4 卷第 1 期，1977 年，第 49 至 53 页。

¹⁷ Romain Wacziarg, “衡量贸易带来的动态收益”，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院，1998 年，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以及《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 15 卷，第 3 期（2001 年），第 393 至 429 页。

¹⁸ Jeffrey D. Sachs/Andrew Warner, “经济改革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布鲁金斯论文经济活动，第 1 期（布鲁金斯学院，1995 年，华盛顿特区）。作者将发展经济体分成三类：始终开放的经济体；起初封闭但到 1994 年已开放的经济体；以及截至 1994 年年底一直封闭的经济体。

¹⁹ Halit Yanikkaya,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多国经验调查”，《发展经济学杂志》第十卷（2003 年）。

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促进增长这一观点。使用九种不同的“开放”估计数字对1980至1990年间的9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分析产生了相同的结果。无论开放的定义如何，“更开放的国家确实增长更快”。²⁰ 另外，虽然开放本身不能保证较快的增长，但参与这些调查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减少贸易壁垒与稳定和歧视的汇率制度、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善政措施一道，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²¹

与贸易-贫穷之间的联系有关的警告

贸易改革与增长所必需的效率提高之间存在着联系。减少平均关税以及降低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导致了产出增长的增加，即使在投资和能力使用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不过，贸易改革对一个国家有利的程度反映了该国的初始条件。市场有效运作和人力资源基础更好的国家从贸易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更多。例如，加纳、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在1980年代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贸易改革。虽然这三个国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因为与加纳相比，当时它们的生产结构更加多样化，而且市场运作情况更好。²² 因此初始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与“初始条件”并行的是各国在出口和可出口的产品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大于初级商品出口，因为前者一般能产生更多的外在因素和学习效应。商品出口经济体的这些外部效应往往较小。而且，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矿物出口经济体来说往往很脆弱。在这方面有若干解释，包括“荷兰病”现象，当时矿物出口收入的急剧增加导致了实际汇率的增值，以及其他贸易产品竞争力的降低。²³

另一个条件是贸易开放与许多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往往较高。例如，一个国家的机构质量、持续长期增长和较高的贸易水平是相辅相成的。调查结果表明“贸易和机构在很长时期内共同发挥重要作用……”。²⁴ 因此，自由化只是对增长重要的诸多变量中的一个因素，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可能有所不同。

²⁰ Sebastian Edwards, 《开放、生产力与增长：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国家经济研究局第5987号工作文件（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国家经济研究局，1997年）；以及《经济学家》，1998年3月21日。

²¹ Robert E. Baldwin, 《开放与增长：经验关系如何？》，国家经济研究局第9587号工作文件（国家经济研究局，200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²² Ejaz Ghani 和 Carl Jayarajah, 《贸易改革、效率和增长》，世界银行第1438号政策工作文件（世界银行，1995年，华盛顿特区）。

²³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摆脱贫穷陷阱》（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II.D.13），方框11。

²⁴ David Dollar 和 Aart Kray, “机构、贸易与增长”，《货币经济学杂志》，第50X卷第1期（2003年），第133至162页。

最后，贸易政策也只是决策者许多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中的一个。更重要的是，有些目标是贸易政策不能，也不应期望它们达到的。例如，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 1965 至 1995 年间贸易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贸易政策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困难。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²⁵

评估证据

在确定贸易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时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用于审查这一问题的许多统计技术相当脆弱。²⁶ 虽然贸易自由化一般被认为有助于减贫，但关于贸易-贫穷之间联系的证据通常是残缺不全的。自由化使得能够开发生产潜力，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减少武断的政策干预。但大多数改革都会产生一些输家——即便是从较长的时期来看——有些改革可能暂时会加深贫穷。²⁷

此外，虽然减贫一般是与经济增长并行的（见第四章），但特定增长率对贫穷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²⁸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增长对贫穷的不同影响是初期不平等水平的一个表现。较高的不平等导致穷人获得的增长收益较少。

许多调查发现，穷人随着贸易的扩大而受益。若干“1980 年后的全球化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没有发现贸易额的大量增长和住户收入不平等的小幅变化之间有什么系统关系。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与贸易扩大相关的增长率的上升一般会导致穷人的收入多少有些增加。²⁹

为个别国家确定了可比结果。例如，对喀麦隆、冈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尼日尔的模拟表明，贸易（以及汇率）的自由化往往对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穷人住户有益，因为取消了外汇租金，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且农业贸易产品的生产回报率提高。³⁰

²⁵ Sarath Rajapatirana, 《贸易政策、宏观经济调整与制成品出口：拉丁美洲的经验》，世界银行第 1492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1995 年，华盛顿特区）。

²⁶ 当前使用的方法可分为四大类，即多国回归分析，局部平衡/生活费分析，全面均衡模拟，以及微观-宏观综合。这四类包括贫穷和贸易专家分别使用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以详细的调查信息为基础，强调个别住户的异质和贸易与贫穷之间的商品市场联系。第二种方法从微观经济理论的“代表住户”假设开始，通常包括贸易与贫穷之间的额外联系，如要素收入和贸易条件效应。这方面的工作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彻底分析需要同时包括两种方法。见 Jeffrey J. Reimer, “估计贸易自由化对贫穷的影响”，Purdue 大学全球贸易分析中心和农业经济学系，印第安那州 West Lafayette, 2002 年。

²⁷ L. Alan Winters, “贸易与贫穷：二者之间有联系吗？”世界银行的背景文件（2000 年），《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向贫穷进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纽约）。

²⁸ 有 95% 的信心认为，每人 1% 的消费增长率可以导致每日以低于 1 美元为生的人口比例下降 0.5% 至 3.5%。见 Martin Ravillion, “我们已经实现贫穷的千年发展目标了吗？”，《经济和政治周刊》，2002 年 11 月 16 日。

²⁹ David Dollar 和 Aart Kraay, “贸易、增长与贫穷”，发展研究小组，世界银行，2001 年。关于对本文的评论，又见 Dani Rodrik, “对贸易、增长与贫穷的评论”（2000 年）。

³⁰ Paul A. Dorosh David E. Sahn, “关于非洲的宏观经济调整对贫穷影响的全面均衡分析”，《政策模型杂志》，第 22 卷，第 6 期（2000 年），第 753 至 776 页。

另一个例子来自对 1990 年代的印度进行的研究。该项研究表明，在 1990 年代以前，印度的经济增长一般都减少了贫穷，而过去的十年很可能保持了 1980 年代的减贫率。但同时，实现较高的综合经济增长只是印度有效减贫战略的一个因素。如果增长的部门和地域构成更加均衡，如果人力资源发展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现有不平等得到更好的解决，减贫率本应高得多。³¹

因此，总的来说，虽然贸易自由化与减贫之间没有确凿无疑的联系，但跨部门和案例研究提供的证据一般强有力地表明二者之间是存在联系的。³²

调整

贸易自由化可能涉及调整问题和成本。其中包括失去仅仅因为补贴或反常而存在的工作，承包活动中工资下降或某些进口商品因为其进口不再享受补贴而价格上涨。例如，对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效果进行的估计发现世界贸易组织东亚成员国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以及南亚区域有很大的潜在收益。但中东和北非的收益相对较小，而撒南非洲可能会出现损失（反映了该区域缺乏自由化），有些食品的价格可能上涨，进口纺织和服装产品的价格也较高。³³ 同样，所有的证据表明废除《多纤维安排》会给进口商带来巨大利益，但有两类出口商会遭受损失，即配额与其相对优势相比较大的出口商和可能受《多纤维安排》的引诱而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但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相对优势的出口商。³⁴

在每个自由化的国家，如果贸易政策为了发挥作用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在调整过程中会出现两个问题。如果调整受到限制并延长对出口前景不佳的产品的依赖，就会发生第一个问题。³⁵ 同样，用于消除对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反对意见的贸易调整援助降低了决策者要求此类自由化的动机，因此可能会降低必要改革的速度。³⁶ 如果缺乏社会安全网来缓和调

³¹ Gaurav Datt 和 Martin Ravallin, “印度的经济增长将穷人落在了后面吗？”《经济观察杂志》，第 16 卷，第 3 期（2000 年），第 89 至 108 页。

³² L. Allan Winters, “贸易自由化与贫穷：联系何在？”，《世界经济》，第 25 卷，第 9 期（2002 年），第 1339 至 1367 页。

³³ G. W. Harrison, T. F. Rutherford 和 D. G. Tarr, “将乌拉圭回合量化”，《经济杂志》，第 107 卷，第 444 期（1997 年），第 1405 至 1430 页。

³⁴ Will Martin 和 L. Alan Winters, 《乌拉圭回合：扩大和深化世界贸易体制》（世界银行，1995 年，华盛顿特区）。

³⁵ Mark S. Leclair, “与潮流搏击：全球自由化时代的其他贸易组织”，《世界开发》第 30 卷，第 6 期（2002 年），第 949 至 958 页。

³⁶ Christopher Magee, “内部关税和贸易调整援助”，《国际经济杂志》，第 60 卷（2003 年），第 203 至 222 页。

整进程，就会产生这一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短期内受害最大的往往缺乏政治力量。³⁷

有证据表明，国际贸易政策会产生“区分性别”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强劲的出口表现依靠的是纺织、服装、电子、皮革产品和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女性劳动力。相反，在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中，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导致在纺织、服装和皮革产品等妇女占很大比例的行业产生失业。³⁸

由于若干原因，多样化经济体的调整成本与利益相比是很小的。与失业有关的调整成本一般是短期的，并随着工人找到新工作而终止。同时，贸易改革的好处随经济发展而增加。其次，在大多数产业中，估计表明工人失业的时间不会很长，特别是在工人最早的工作挣钱不多的情况下。第三，在许多产业中，正常的劳动力营业额超过了贸易自由化产生的下岗，因此在必要时进行的裁员没有产生大量的强迫失业。此外，在对新机会反应迅速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发挥重大作用的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后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源重新配置是通过产业间的转移进行的，从而减少了劳动力的下岗。最后，发展中国家一般在劳动力密集产业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导致贸易增加的贸易自由化往往会对劳动力有益。这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就业率为什么在贸易自由化后往往上升。³⁹

由于调整过程可能遇到困难，而且低收入水平的困难相对较多，因此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但不限于）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更长的过渡时期来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自由化协定。这些协定分为保障措施、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反倾销、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类别。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面临财政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用于负责监督这些协定实施的公共管理领域的资源通常是有限的，而这些协定的实施既耗时又费钱。其中许多过渡时期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建立实施这些协定所必要的机构以前就到期了。⁴⁰因此这种机构弱势大大增加了调整成本，虽然已经确立了更长的过渡时期来减少这些调整成本。所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包含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更长的实施期限。

³⁷ Bernard Hoekman 等，“贸易政策改革与减轻贫穷”，国际贸易小组发展研究组，世界银行，2002年，华盛顿特区。

³⁸ Nilüfer Cagatay，“性别、贫穷与贸易”，联合国开发署关于贸易和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报告（2001年，开发计划署，纽约）的背景文件（2001年）。

³⁹ Steven J. Matusz 和 David Tarr，“适应贸易政策改革”，贸易、发展和研究小组，世界银行，1999年，华盛顿特区。

⁴⁰ Constantine Michalopoulos，“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的贸易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作用”，向2000年3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最后，调整成本取决于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墨西哥在 1987 至 1995 年间的估计调整成本很少，这与较早的调查结果相一致。⁴¹ 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但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分析证明了不同国家的调整成本是不同的。

确保穷人福利的渠道

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供应

David Ricardo 在 1800 年代早期论证了若干重要的“贸易收益”。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够以比原始国内价格较低的价格来购买货物和服务。而一个国家开放贸易的第二个好处是消费者能够获得一些货物和服务，如果不开放贸易，这些货物和服务就没有供应，当然也不能以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价格购买。

进口关税的废除，同任何非关税贸易壁垒一样，也影响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和供应。进口产品的价格因此而降低。另外，这些进口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也有所下降，从而有效增加了穷人的实际收入。可能对穷人特别重要的进口产品包括基本食品、药物和其他基本保健产品。⁴² 不过，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进口关税仍然较高。⁴³ 为了解决药物和其他基本保健产品进口关税较高的问题，在 2000 年 4 月在阿布贾召开的非洲减少疟疾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保证减少或免除蚊帐、杀虫剂和控制疟疾所必需的抗疟疾药物的税款和关税。

导致货物和服务价格和供应变化的另一个战略——也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个战略——是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这些计划往往能创造贸易机会，因此从提高福利角度看是有利的。此外，也可能会有些动态收益。例如，生产规模可能更大，更多地面向其他市场也许意味着效率更高，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更大的产量和更低的价格。

加入贸易协定是一个政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衡量这是不是最佳选择是很重要的。有证据表明，1990 年代——这十年缔结了（南方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贸协）或修改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若干优惠贸易协定——发生的区域主义新浪潮在超过根据历史贸易趋势的预测极大地促进集团内部的贸易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少。⁴⁴ 此外，关于

⁴¹ Raymond Robertson 和 Donald Dutkowsky, “目的国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墨西哥的情况”，《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67 卷（2002 年），第 29 至 54 页。又见 Dani Rodrik, 《全球化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 年，华盛顿特区）。

⁴²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况，见 Geoffrey J. Bannister 和 Kamau Thugge, 《国际贸易与减轻贫穷》，货币基金组织 WP/01/54 号工作文件（2001 年，华盛顿特区）。

⁴³ 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准入：乌拉圭回合后的盘存和问题”，《专题研究》第 6 期（2001 年，日内瓦），第 48 页和表三.3。

⁴⁴ Isidro Soloaga 和 L. Alan Winters, “九十年代的区域主义：对贸易产生了什么影响？”世界银行第 2156 号工作文件（1999 年，华盛顿特区）。

1950 至 1992 年间约 40 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数据集的证据将广泛自由化的国家的增长状况与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实施广泛自由化的经济体比限制自由化的努力以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体增长要快。⁴⁵ 但有许多国家加入了，或者表示有兴趣加入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在东欧，若干国家正等待加入扩大的欧洲联盟（欧盟）。

区域协定可能会对排除在外的邻近国家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阿根廷牛和牛肉的出口量在秘鲁缔结了其成员包括出口同样产品的哥伦比亚的一项条约后有所下降。⁴⁶ 另一个例子是成立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区域贸易集团后，作为贸易集团非成员国的巴西向贸易集团成员国出口的产品降低了价格。由于向贸易集团以外的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较高，与向该贸易集团以外的国家出口的产品价格相比，巴西的出口商不得不大大降低其产品的价格，以保持其在成员国市场上的价格优势。⁴⁷

撒南非洲国家实施了三十年区域一体化计划，以加快工业化和增长。但以非洲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而产生的问题让人沮丧，因为非洲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产品，因此有关经济体进行相互贸易的产品看起来极少。⁴⁸

若干亚洲经济体将加入区域协定作为它们各自改革战略的一部分，以实现减贫所必要的出口和收入增长。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来说，建立区域联系是它们出口增长动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满足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⁴⁹的要求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贸易条例的现代化，同时也要求广泛的优惠贸易自由化。⁵⁰

但在健康的贸易形成的同时也出现了代价高昂的贸易转向，从而产生了进退两难的境地。⁵¹ 如果集团内的对外贸易壁垒较高，这一问题就会特别严重。

⁴⁵ Athanasios Vamvakidis, 《贸易协定与广泛的自由化：哪条道路增长更快？时间序列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P/98/40 号工作文件（货币基金组织，1998 年，华盛顿特区）。

⁴⁶ 《安第斯条约》是 1969 年在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签署的。委内瑞拉于 1973 年加入，智利于 1976 年退出。见 Ana Gupta 和 Maurice Schiff, 《外来者和小国家间的区域贸易协定》，世界银行第 1847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1997 年，华盛顿特区）。

⁴⁷ Won Chang 和 L. Alan Winters, “优惠的贸易安排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对价格影响的事后估计”，《世界经济》，第 24 卷，第 6 期（2001 年），第 797 至 807 页。

⁴⁸ Alexander Yeats, 《非洲区域贸易安排能带来什么？：一些经验证据》，世界银行第 2004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1998 年，华盛顿特区）。

⁴⁹ 东盟成员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⁵⁰ 《2002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方框 11；以及 Will Martin, 《东亚转型经济体的贸易政策改革》，世界银行第 2535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2001 年，华盛顿特区）。

⁵¹ 国内生产被贸易协定内成本较低而效率较高的生产商代替后就出现了贸易形成。贸易转向是在贸易协定内成本较高的供应商代替来自贸易协定外成本较低而效率较高的进口产品后出现的。

不过，即使在对外贸易壁垒相对较低的东盟内，集团新成员的贸易形成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也因为贸易转向带来的损失而大大降低。⁵²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近年来引起了大量的关注，但其他策略也影响到自由化和贸易水平，并因此可以影响增长和减少贫穷。其中一个策略需要建立出口加工区。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加工区，这是政策从内向转向外向的一部分。中国通过建立一些经济特区来着手实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外，这些区域还通过促进与国内经济的联系和鼓励技术转让对贫穷产生了间接影响其溢出效应可以影响整个经济。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促进出口效果是明显的，这些出口加工区吸引的外国附属公司通过协助当地公司生产、销售和在国际上分销产品来促使它们开始出口。⁵³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斯里兰卡的出口加工区成为就业的一个重要来源，并在有些情况下鼓励了地方创办企业的积极性。⁵⁴

劳动力市场

贸易自由化以多种方式影响劳动力市场。首先，这些改革可以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亦即就业机会的创造或减少。改革也可能对工资产生影响，包括改变技能和非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条件。例如，当跨国公司被允许进入一个国家后，它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可能多少会比当地公司严格。

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持续增长是一致的。在抽样的 19 个国家中（其中 12 个是发展中国家），除了一个国家外，其余的国家的制造业就业率都在这种自由化以后有所上升，有的是在自由化期间，有的是在自由化一年以后。此外，最坚定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即巴西和智利的就业收益最大。⁵⁵ 在五个非洲经济体——加纳、马拉维、马里、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⁵⁶——以及哥斯达黎加、秘

⁵² Emiko Fukase 和 Will Martin, 《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华盛顿特区，1999 年）；以及 Emiko Fukase 和 Will Martin, 《作为发展踏脚石的自由贸易成员资格：东盟的情况》（世界银行，2001 年，华盛顿特区）。

⁵³ Helena Johansson 和 Lars Nilsson, “作为催化剂的出口加工区”，《世界开发》，第 25 卷，第 12 期（1997 年），第 2115 至 2128 页。研究的 10 个经济体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和突尼斯。

⁵⁴ Kankesu Jayanthakumaran, “对出口加工区的利益-成本评估：文献调查”，《发展政策评论》（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第 21 卷，第 1 期（2003 年），第 51 至 65 页。

⁵⁵ 见 Demetrios Papageorgiou、Armeane Choksi 和 Michael Michaely, 《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经验教训》（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90 年）。审查期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1984 年。

⁵⁶ 见 Ronald Parker、Randall Riopelle 和 William Steel, “五个非洲国家适应自由化的小企业”，世界银行第 271 号讨论文件，华盛顿特区，1995 年。

鲁和乌拉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马拉维的福利优势是由于全国商贩数量的增加。⁵⁷

贸易自由化也通过工资对就业产生影响。在某些限制性条件下，贸易的开放有望提高劳动力充足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价格，正像它降低了资本充足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价格一样。⁵⁸ 东亚，特别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经验证据证明了具有大量非技能劳动力储备的国家的更大开放对这一类劳动力有利这一观点。不过，在许多拉丁美洲经济体中，包括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乌拉圭在内，开放的扩大基本上没有增加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墨西哥在 1980 年代中期进行了贸易改革后，向技能工人支付的奖金大大增加，从而加深了整体上的工资不平等。这反映了改革后的产业生产率提高了，并转而使用更有技能的劳动力。⁵⁹ 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之前在 1980 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与墨西哥 1994 年加入《北美贸协》的结果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墨西哥技能工人的工资增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加。这是因为同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墨西哥加入《总协定》时的相关伙伴国家）相比，墨西哥是一个技能充足的国家，但同《北美贸协》伙伴相比，墨西哥又是一个劳动力充足的国家。⁶⁰

巴西 1988 至 1994 年的贸易自由化通过外国竞争加剧导致的技术改革推动了技能奖金的增加。此外，减免关税数额较大的产业的特定产业技能回报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不过，总的来说，贸易自由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⁶¹

智利化妆品业的工资自该行业 1984 年开始自由化以来也给技能工人带来了较高的回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整个区域在 1990 年代减少了贸易壁垒，导致竞争异常激烈，进口剧增。为了提高竞争力，跨国公司经常关闭当地工厂，迫使从事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作的大多数技能较低的劳动力被解雇。许多跨国公司还从外地雇用非核心人员，如维修工，然后通过转包商以较低的薪水再次雇用。同时，在跨国公司保留工作的工人被安排在管理、营销和销售等向受教育工人提供的高薪职位。这种做法产生的净结果是与非技能工人相比，跨国公司对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大量增加。同时国内公司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结

⁵⁷ Sanjukta Mukherjee 和 Todd Benson, “1998 年马拉维贫穷的决定因素”, 《世界开发》, 第 31 卷, 第 2 期 (2003 年), 第 339 至 358 页。

⁵⁸ Stolper-Samuelson 原理, 根据从代数上对此予以证明的两个经济学家命名。

⁵⁹ Ana Revenga, 《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墨西哥制造业的情况》, 世界银行第 1524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世界银行, 1995 年, 华盛顿特区)。

⁶⁰ Raymond Roberston, “相对价格和工资不平等: 来自墨西哥的证据”, 麦卡莱斯特大学经济学系,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⁶¹ Nina Pavcnik 等, 《巴西的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市场调整》, 世界银行第 2982 号工作文件 (世界银行, 2003 年, 华盛顿特区)。

果导致这些公司的低技能工人就业增加，但工资并没有相应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工会力量较弱。⁶²

扩大开放程度还影响到劳动条件。开放贸易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兼职、临时和分包劳动力的增加，而这些劳动力是得不到全职和正式劳动力所享受的利益的。另外还发现妇女劳动力和中等薪水工人增加，特别是在服务部门。巴西在 1990 年代末出现了这样一些趋势。来自 2000 年公布数据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表明，巴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共有 7 100 万人，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在正规工作市场工作。其余的三分之二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很少享受到正规就业带来的利益。⁶³ 在印度尼西亚，工资按世界标准计算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青年妇女，她们经常不如男子活跃。不过，虽然开放与印度尼西亚标准以下的工作条件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这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实际上，外国工厂的工作条件往往比地方企业要好得多。前者的轮班和病假以及健康和安全防范的标准程序通常符合全球而不是地方标准。⁶⁴

虽然扩大开放程度有助于增加就业（包括男子和妇女），但它给妇女带来了哪些不同于男子的利益尚不明确。例如，在有些情况下，更高的女子中学入学率反而对妇女的就业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引进的技术需要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员工，同时需要大量没有经过培训的劳动力。⁶⁵

使用 1980 至 2000 年的数据对菲律宾进行的经验估计表明，在总体级别和制造分行业级别，出口倾向的增加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就业结构角度来看，开放在总体级别对妇女劳动力的影响不大，但在制造分行业级别，出口倾向的增加带来了繁荣，特别是对妇女劳动力来说。最后，出口倾向的增加在总体级别和制造分行业级别都增加了低技能生产工人的比例。⁶⁶

贸易对妇女的影响随社会经济特征、部门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孟加拉国，妇女对市场活动的参与传统上比较低，局限于劳动力市场边际的几种临时工作。⁶⁷ 1980 年代建立起大量服装厂之后（成衣提供了约 60% 的外汇收入），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大大增加。

⁶² Janine Berg, “技术、贸易与社会机构：智利化妆品行业工资不平等的增加”，新学院经济政策分析中心（2002 年），纽约。

⁶³ Ricardo Antunes, “全球经济重建与巴西的劳动力世界：工会与社会运动面临的挑战”，《地理论坛》，第 32 卷（2001 年），第 449 至 458 页。

⁶⁴ Debora Spar, “贸易、投资与劳动力：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哥伦比亚世界商业杂志》（1996 年冬季刊）。

⁶⁵ Karin A. Siegmann, “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影响：印度尼西亚的特定性别就业”，发展研究中心（ZEF），德国波恩大学，2002 年。

⁶⁶ Aniceto C. Orbeta, “全球化与就业：贸易对菲律宾就业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菲律宾发展研究所，讨论文件汇编，第 2002-04 号文件，马尼拉。

⁶⁷ Marzia Fontana, “建立贸易对工作和居家妇女影响的模型：比较角度”，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2 年，华盛顿特区。

投资与创新：资本流量和外国直接投资

扩大开放程度可能会通过对投资率的影响而给增长带来积极影响。⁶⁸ 外国投资的增加通过提高效率和采用新技术而对增长和减贫产生影响。例如，在长期实施促进自立更生的政策后于 1991 年 7 月开始实施自由化的印度，“自由化推动了竞争，而竞争又推动了技术改革。”⁶⁹ 因此公司对 1991 年后的自由化作出的反应是，提高效率，引进技术，扩大内部研究和发展。使用 1990 年代在中国大陆投资、基地位于中国香港特区的服装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些公司拥有宝贵的管理技术，成为向中国大陆转让此类技术的有效渠道。⁷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同印度一样采取了进口代替政策，以减少对原材料出口和制成品进口的依赖。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和限制进口数量对新生的制造业部门予以竞争保护。管理人员将这种环境看作“避免技术变革和激烈竞争压力的一种方法”。⁷¹ 这种情况自 1985 年开始实施改革以期墨西哥在 1986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被调查的大多数公司说它们对竞争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此外，除了将重点放在竞争能力之外，许多公司还发现有必要进行技术重组，例如通过工厂和设备的现代化。⁷² 对墨西哥玻璃行业的一家公司 Vitro 进行的技术能力发展情况调查证实了这一发现。在进口替代制度下，创新工作进展缓慢。但随着墨西哥市场的开放，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更加专业化，而且试图更快掌握生产工程，并在增加 Vitro 出口所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调整。⁷³

贸易自由化还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发挥着作用。对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和成本的调查发现，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贸易额迅速增加，导致每小时的产量特别是大型工厂的产量大大提高，同时减少了单位平均成本。⁷⁴ 印度以 1991 年大规模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证据证实了这一联系。许多产业在 1986 至 1993 年的公司一级数据表

⁶⁸ Romain Wacziarg, “衡量贸易的动态收益”, 世界银行背景文件, 《1997 年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 (1997 年, 华盛顿特区)。

⁶⁹ Naushad Forbes, “技术和印度工业: 自由化改变了什么?” 《技术创新》, 第 19 卷 (1999 年), 第 403 至 412 页; 又见 T.N. Srinivasan, “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发展: 印度”, 《亚洲经济杂志》, 第 7 卷, 第 2 期 (1996 年), 第 203 至 216 页。

⁷⁰ Edmund R. Thompson, “通过香港跨境服装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 《发展中经济体》, 第 41 卷, 第 1 期 (2003 年), 第 88 至 111 页。

⁷¹ Len J. Trevino, “墨西哥管理人员对经济改革的战略反应”, 《商业视点》, 1998 年 5 月至 6 月。

⁷² 同上。

⁷³ Cristina Casanueva, “在墨西哥的开放经济中获得公司的技术能力: Vitro 的情况”,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 第 66 卷 (2001 年), 第 75 至 85 页。

⁷⁴ Donald J. Daly, “加拿大对自由贸易的生产效应进行的研究: 概要和对墨西哥的意义”, 《北美经济学和金融杂志》, 第 9 卷 (1998 年), 第 147 至 167 页。

明，在调查的四个产业中，有三个产业的生产增长率有了很大的提升，它们是：电子、非电力机械和电力机械（第四个产业是运输设备）。对这些增长的一种解释引发了传统的效率之争。⁷⁵ 其他证明来自对 1973 至 1988 年间印度 30 个产业进行的调查，此次调查发现贸易自由化提高了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增长速度。⁷⁶

扩大开放程度增加一国投资流量的潜力非常重要，因为外国投资可能会带来新技术和更多创新。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增加投资可能会带来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创新，如墨西哥的 Vitro 公司那样。同时，这些国内发展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因此，这一进程成为一种“良性循环”，有助于通过增长来减少贫穷。不过，为了鼓励投资，正在实施的贸易自由化和改革必须可靠。因此投资者对自由化和改革可行性的信任决定了这些措施能否取得成功。⁷⁷

政府收入

虽然贸易自由化提高效率并可能提高产量和福利水平，但必须考虑一些实际的利弊得失，例如涉及对政府收入影响的利弊得失。⁷⁸ 对财政不平衡的国家来说，任何收入损失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别是因为这可能会造成用于穷人的开支减少。

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往往是用关税来代替数量限制。然后再逐渐降低关税。但降低关税可能会减少政府收入。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在 1997 年，贸易税收占有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收入的 24%，占非洲政府收入的 33%。⁷⁹ 在关税收入作为政府最大收入来源的经济体中，这一问题可能非常严重：1997 年，关税收入占冈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以上，占莱索托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以上。关税降低对各国的具体影响不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及其改革战略。对肯尼亚贸易自由化和预算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一项审查断定，自由化可能因贸易

⁷⁵ Pravin Krishna 和 Devashish Mitra, “贸易自由化、市场规则与生产率增长：印度的新证据”，《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56 卷（1998 年），第 447 至 462 页。X-效率的论点是公司试图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产量。

⁷⁶ Satish Chand 和 Kunal Sen, “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来自印度制造业的证据”，《发展经济学评论》，第 6 卷，第 1 期（2002 年），第 120 至 132 页。

⁷⁷ Halvor Mehlum, “津巴布韦：投资、可靠性和贸易自由化后的动态学”，《经济模型》，第 19 卷（2002 年），第 565 至 584 页。

⁷⁸ Andrea Cattaneo 等, “哥斯达黎加的贸易自由化、财政不平衡和宏观经济政策：一个可计算的全面均衡模型”，《北美经济学和金融杂志》，第 10 卷（1999 年），第 39 至 67 页。

⁷⁹ 《世界公共部门报告：全球化与 2001 年的状况》（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H.2）。又见 Liam Ebrill、Janet Stotshy 和 Reint Gropp, 《贸易自由化对收入的影响》，货币基金组织第 180 号临时文件（货币基金组织，1999 年，华盛顿特区）。

流量增加而大大提高预算。⁸⁰ 对中国情况的分析表明，中国使用了不同的税收工具来补偿贸易自由化造成的预算损失。⁸¹

如果进口价值不变，降低关税的短期影响是减少政府收入。不过，对当前便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可以补偿这一损失，最终甚至会超过这一损失，具体取决于对有关货物的需求弹性。在实行差别关税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较高关税和提高较低关税从而产生一个比较统一的平均关税税率，政府可能会增加收入（视受影响货物而定）。此外，这种统一关税税率还减少了管理上的困难，降低了逃避关税的可能，从而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收入，因为关税税率越低，寻求免税的动机越小。墨西哥 1985 年的自由化计划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关税逐渐代替了数量限制。然后关税税率下降，范围和覆盖面更加统一，对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进口关税总收入的实际值大体上保持不变，但整体预算收入却增加了。⁸²

降低关税对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传统上更加依赖这种收入的小经济体。因此，降低关税应当是据以改变整个税收结构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⁸³ 由于国内税收和经济增长导致的税收基础扩大最终会补偿关税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作用，因此加强国内税收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自由化的初期阶段。在这方面，国际贸易税收应当发挥最小的作用，因为用贸易税收/补贴来增加政府收入从福利角度看并不是最佳做法。⁸⁴ 从福利角度看，贸易关税和/或补贴只能为影响与贸易有关的变量而调整。为增加政府收入，个人和公司以及消费税都是比较适当的工具。但需要对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实行简化、现代化和改革。最后，通常需要有一个简化和合理化的税收进程。⁸⁵

若干案例研究突出说明了关税降低对政府收入的特定影响。在马拉维，最初强调的是减少数量限制和关税离差，这与外汇市场自由化和强化税收管理产生的积极影响一道，使调动税收的工作得到加强，贸易制度也更加自由。在菲律宾实施改革以后，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显著增加。进口的增加和改革战略一起，共同导致贸易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额百分比的增加，即使在税率下降的

⁸⁰ David Bevan, 《贸易自由化对财政的影响》, 货币基金组织第 95/50 号工作文件 (货币基金组织, 1995 年, 华盛顿特区)。

⁸¹ Zhi Wang 和 Fan Zhai, “关税减免、税收替代和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比较经济学杂志》, 第 26 卷, 第 2 期 (1998 年), 第 358 至 387 页。

⁸² Andrew Feldenstein, 《税收政策与贸易自由化: 应用》, 货币基金组织第 92/108 号工作文件 (货币基金组织, 1992 年, 华盛顿特区)。

⁸³ 见 Hubert Escaith 和 Keiji Inoue, “面对贸易自由化的美洲小经济体的关税和补贴政策”, 《一体化和贸易》(美洲开发银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 第 5 卷, 第 14 期 (2001 年)。

⁸⁴ 见 Jagdish Bhagwati 和 T.N. Srinivasan, 《国际贸易讲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83 年,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⁸⁵ 例如见 Ebrill、Stotshy 和 Gropp, 前引书; 以及 George T. Abed, 《南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与税收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98/49 号工作文件 (货币基金组织, 1998 年, 华盛顿特区)。

情况下也不例外。阿根廷和摩洛哥与菲律宾和马拉维一样，强化了关税，减少了关税的覆盖范围。⁸⁶ 在阿根廷，1991 年实施改革后，总体收入上升。摩洛哥在 1980 年代开始改革，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国内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它在 1982 至 1993 年间将最高关税率从 400% 降到 35%，并将关税档次从 47 个减少到 1996 年的 6 个。税费与关税降低导致政府收入相对稳定。⁸⁷ 许多例子表明实施国内财政改革来最终抵消贸易税降低所带来的任何损失是可能的。

收入分配

在贸易自由化是否与国内收入分布的缩小或扩大有关方面存在着争论。对 40 多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在 1978 至 1994 年间的表现所收集的证据表明，降低保护恶化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但对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影响不大。⁸⁸ 另一方面，对过去四十年 137 个国家的观察发现，增长的若干决定因素，包括对国际贸易开放，对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所占收入份额的系统影响很少。

对个别国家的重点分析表明，举例来说，中国在 1980 和 1990 年代迅速扩大了对外开放。收入不平等也在上升。根据一项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28.8 上升到 1995 年的 38.8。⁸⁹ 但将数据进一步分解后发现，1988 至 1993 年开放程度扩大的地区也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下降。实施贸易开放不仅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增长机会，还为它们创造了比邻近的城市地区增长更快的机会。不过，使用 1975 至 1995 年年度数据的大韩民国证据表明，开放率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大。⁹⁰ 同时，1996 年墨西哥国民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墨西哥，关税改革对所有收入阶层的福利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穷人比富人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多。⁹¹

多国证据表明，总的来说，贸易自由化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而对穷人有利，特别是与一般被认为促进增长的其他政策共同实施的时候；⁹² 但贸易开放

⁸⁶ 这被称为减少的“离差”，通常与平均有效保护的降低相一致。

⁸⁷ Ebrill、Stotshy 和 Gropp，前引书。

⁸⁸ Andras Savvides，“贸易政策与收入不平等：新证据”，《经济学快报》，第 61 卷（1998 年），第 365 至 372 页。

⁸⁹ Shang-Jin Wei，“全球化对中国的穷人有利吗？”，《金融与发展》，第 39 卷第 3 期（2002 年 9 月）。

⁹⁰ Jai S. Mah，“关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的说明：韩国 1975 至 1995 年的情况”，《亚洲经济学杂志》，第 14 卷（2003 年），第 157 至 164 页。

⁹¹ Elena Lanchovichina、Alessandro Nicita 和 Isidro Soloaga，“贸易改革与贫穷：墨西哥的情况”，《世界经济》，第 25 卷，第 8 期（2002 年），第 945 至 972 页。

⁹² Andrew Makay、L. Alan Winters 和 Abbi Mamo，“有关贸易、贸易政策和贫穷的经验证据的审查”，向国际开发部提交的报告，《第二本发展白皮书》的背景文件，2000 年，伦敦。

除了对整体增长从而对减贫产生影响外，对穷人不一定有系统性的影响。来自许多个别自由化实例的微观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即使贸易自由化促使所有住户的总体福利改善，相对而言最贫穷的住户不一定获得这么大的收益。随着土耳其加深与欧盟的关系，这种情况引起了土耳其的关注。⁹³

政策影响以及对各种结论的解释在于“必要”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区别。因此，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从整体上对穷人有益。但贸易自由化虽然必要，它本身却不一定足以实现这一目标。⁹⁴ 根据所采取的路线，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 1990 年以前，智利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产生的分配影响相对来说对穷人不不利。但在 1990 年后，智利成功实现了高速增长与不平等下降的结合。⁹⁵ 同样，有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平等：效率收益的程度似乎取决于中国政府选择采用什么手段来平衡预算。征收住户累进所得税在保持大部分效率收益的同时降低了基尼系数。⁹⁶

同时采取的政策对自由化能否在实际上减少贫穷至关重要。这些政策尤其需要恰如其分和平衡兼顾。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成功及其对穷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步程度。

将重点放在除贸易外的其他领域的国内改革和政策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决策者越来越把促进发展和扩大贸易这两个目标视为同一件事。但关于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说法对贸易和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而是强调国内机构改革的重要作用。这种思路认为引进的蓝图很少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开放经济在开始时就没有多大作用。相反，政策改革必须“以国内投资者为对象，并符合国内机构的现状”。⁹⁷ 不过，自由化和机构改革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这两者都是制订成功发展战略的必要因素。

国际社会的作用

迄今为止，这一讨论审查了贸易扩大和贸易自由化可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产生影响的各种内部机制。但这一进程的内在问题是有关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能

⁹³ Glenn W. Harrison、Thomas F. Rutherford 和 David G. Tarr，“贸易自由化、贫穷和有效的公平”，《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71 卷（2003 年），第 97 至 128 页。

⁹⁴ Ramkishan S. Rajan 和 Graham Bird，“贸易自由化与贫穷：我们身在何方？”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2002 年。

⁹⁵ Lance Taylor，“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对外自由化、经济状况和分配”，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2000 年，赫尔辛基。

⁹⁶ Zhi Wang 和 Fan Zhai，“降低关税、税收替代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经济学杂志》，第 26 卷（1998 年），第 2 期，第 358 至 387 页。

⁹⁷ Dani Rodrik，“全球贸易管理：假设发展确实有关系”，贸易和可持续人类发展项目的背景文件，开发计划署，纽约，2001 年。

力。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发达国家在促进这种融合中发挥的作用问题，2001年发展中经济体55%的出口产品都出口到了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很关键，因为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关闭大门意味着让穷人永远贫穷。据估计，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每年花费发展中国家1 000多亿美元，几乎是援助的两倍。工业化国家最受保护的部门有农业、纺织和服装，如果没有这种保护，这恰恰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具竞争力、可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部门，其中包括向低技能人群和穷人提供工作。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商经常从政府补贴和进口关税与配额中受益。

发展中国家需要特定的市场准入优势，这一问题在196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上首次提出。发达国家通过普惠制计划、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全球优惠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特殊待遇。⁹⁸虽然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促进进口更快地增长，但给予优惠并不能保证这些优惠能得到有效利用。

但作出了确定市场准入水平的各种尝试，最近的一次是在2003年中期。编制了一份发展承诺索引，其贸易组成部分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出口设置的壁垒，以及穷国由于富国的国内生产补贴而遭受的收入损失进行了衡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最低，欧盟居中，日本和挪威最高。⁹⁹

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抓住了发达国家的贸易优惠提供的出口机会。在这方面采取的两个显著措施是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和欧盟“除武器以外的一切产品倡议”。前者于2000年5月经签署成为法律，截至2003年1月，共有38个撒南非洲国家有资格享受关税优惠。¹⁰⁰“除武器以外的一切产品倡议”于2001年获得批准，并将最终消除对世界最穷国家除武器以外所有产品的配额和关税。2000年9月，加拿大政府扩大了其普惠制计划的产品覆盖范围，使最不发达国家的570种产品可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市场。有些国家已经从这些措施中获益。例如，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的加纳正在建立一个家具制造出口部门（见方框六.1）。莱索托至少从两个协定中获得了利益，即《南部非洲发展

⁹⁸ 《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第223至228页。

⁹⁹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些结果是在对农业保护的估计的驱动下发生的，农业保护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对结果发生了主导作用，虽然农业在发达国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见William R. Cline，“工业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索引”，第14号工作文件（全球发展中心，2002年，华盛顿特区）。

¹⁰⁰ Paul Brenton，“将最不发达国家融入世界贸易体制：欧盟除武器以外一切产品下优惠措施的当前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发展》2003年，华盛顿特区；以及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又见《2001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C.1），第五章。

共同体议定书》和《非洲增长和机会法》（见方框六.2）。这些协定使莱索托扩大了向两个主要出口市场，即南非和美国的服装和纺织品出口。

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之后，目前有更多的机会来协助贸易舞台上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部长宣言》（见A/C.2/56/7号文件，附件）以及部长决定，这些决定说明了具有重要发展内容的一项工作计划——称为《多哈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将从这些谈判中获得巨大收益，尤其是在农业和纺织领域。但在2003年3月31日，当世界贸易组织的145个成员国无法就削减农场补贴和农产品进口关税框架达成一致的时候，多哈贸易回合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期限到期了。¹⁰¹ 据估计，如果废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农业补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好处将三倍于它们当前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废除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服务业1 820亿美元、制造业1 620亿美元和农业320亿美元的静态收益。¹⁰²

方框六.1

农业以外：加纳的家具制造业

对世界上许多人口来说，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提供了大量增加收入的机会。制成品出口被看作非洲采取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少数经济“雄狮”——埃塞俄比亚、加纳、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关键因素，使它们实现了较高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水平。^a

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加纳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初级生产的农业经济国家，特别是将自然农业考虑在内的话。无论是从商品还是从市场方面来说，贸易都相对集中。初级生产（特别是农业）和服务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而制造业只占10%左右。政府政策的目标是除了可可、原木、黄金和电力等传统商品外，实现经济出口基础的多样化。^b 为实现这一目标，生产重点从主要生产农产品转移到生产增加值较高的制成品。

^a N. Rankin、M. Söderbom和F. Teal，“2000年加纳制造业调查”，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牛津，2002年11月，第31页。

^b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政策：加纳”，贸易政策审查机构（WT/TPR/S/81），第1页。

¹⁰¹ 见货币基金组织，“多哈回合的发展和货币基金组织感兴趣的一些活动”，2003年4月8日（可浏览<http://www.imf.org/external/np/pdr/doha/2003/040803.htm>）。

¹⁰² 非洲经济委员会，《2003年非洲经济报告：加速发展步伐》（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K.1）。

方框六.1 (续)

加纳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联盟（欧盟），占其出口——部分是因为贸易优惠——和进口总额的将近一半。在欧盟内部，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是欧洲的主要进口国。^c

木材和家具部门公司的出口力度大于其他部门。^d木材部门出口可能性较高的原因在于比较优势。加纳的自然资源包括木材和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其家具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了近 250%。^e这还是在全球家具行业竞争加剧、各国的单位价格趋同和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f

本行业出口取得可归因于一些特点：公司规模，其成立年限及其技术效率。例如，规模与出口成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正比关系，因为公司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较大。^g这些成本包括建立海外供应网，对外国市场的调查，以及专门适应海外市场的产品设计等。

大公司往往成立年限更长，投资和出口的可能性较大。在加纳，人们发现公司年限对出口可能性的影响非常大，但却是负面影响。这大概是因为近年成立的公司比老公司更加外向。也可能因为新成立的公司有更先进的资本设备，因而更能生产出口产品。这表明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在出口中学习”的好处，如果有此种好处的话。

从加纳家具业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司一级的效率都是使公司进入出口市场的关键因素。改善公司状况的政策可以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包括在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部门面临着迈出进入出口市场的第一步等方面问题的国家。^h

^c 同上，第 8 页。

^d N. Rankin、M. Söderbom 和 F. Teal，前引书，第六页。

^e 联合国国家综合数据，1991 至 2001 年。

^f R. Kaplinsky、M. Morris 和 J. Readman，“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导致贫困的增长：南非家具业的教训”。

^g M. Söderbom 和 F. Teal，“非洲制造公司能成为成功的出口商吗？”，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工发组织第 4 号工作文件，2001 年，维也纳和联合王国牛津。

^h N. Rankin、M. Söderbom 和 F. Teal，前引书，第 9 页。

方框六.2

农业以外：莱索托的服装和纺织制造

完全被南非包围的内陆国家莱索托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自给农耕。但莱索托的制造业在 2000 年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4%，与此相比，1985 年只有 25% 多一点，1990 年为 33%。制造业目前雇用了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因此制造部门将来的发展对提高 220 万人口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服装和纺织公司在增长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1999 年，该部门雇用了大约 18 000 人，占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的 30%。公司向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欧盟）和南非出口。^a 由于全国的失业率估计为 45%，创造就业机会成为政府政策的核心所在，该政策将劳动力高度密集的服装和纺织部门的未来发展看作重中之重。

莱索托纺织部门的增长主要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莱索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支撑制造业的。因此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对繁荣经济至关重要。虽然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贸易联系，但大多数国家与欧盟和美国的联系比南共体内部更加紧密，不过莱索托由于对南非的强烈依赖，在这方面是个例外。

纺织和服装业主要受到许多不同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影响或调节，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更多地进入市场和扩大市场边界。该部门主要受益于两个协定，即《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贸易议定书》和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它还进一步根据《洛美协定》在进入欧盟市场方面享受优惠，虽然配额限制了对该市场的进入。

促进南共体自由贸易区将对所有参与者有益，但与全球经济相比较小的南共体规模和成员国贸易不均衡可能会限制中期的贸易扩展余地。^b 不过，《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使撒南非洲国家符合资格要求的产品可以免关税和不受配额限制进入美国市场。根据《非洲增长和机会法》，自 2001 年 4 月以来，莱索托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的纺织和服装市场。

对该部门的公司来说，收益是很大的，而且出现了大幅增长。莱索托在美国服装和纺织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日益扩大。莱索托约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其中 90% 是牛仔裤和短袖圆领汗衫。自 2001 年 4 月以来，莱索托对美国的服装和纺织出口额增加了近 40%。^c 莱索托对美国出口的服装从 2000

^a 南非财政部：“莱索托”，1999 年，第 3 页。

^b Samson Muradzika，“南共体的纺织和服装：主要问题和政策展望”，政策简介，第 01/P20 号，发展政策研究股，开普敦大学，2001 年，开普敦，第 10 页。

^c <http://www.finance.gov.za/documents/fiscu/summits/1999/lesotho.pdf>。

方框六.2 (续)

年的 1.403 亿美元增加了 2001 年的 2.153 亿美元，使投资增加到 1.22 亿美元。例如，中国台湾省的纺织公司 Nien Hsig 在马塞卢外郊建立了一个服装厂，定于 2004 年完工。《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使纺织业多创造了约 20 000 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工资为平均工资的 5 至 10 倍。^d

虽然南部非洲的服装和纺织业规模较大，直接雇用了 260 000 名员工，占该区域国民产值的 6%，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很小；即使《非洲增长和机会法》等双边贸易协定带来的利益开始成为现实，非洲服装制造商出口的服装只占他们有权免交关税而运往美国服装的 3%，这表明南共体生产商抓住这一市场机会的潜力仍然很大。目前，美国 85% 的服装要靠进口。在 600 亿美元的服装进口总额中，约有 6 亿美元来自非洲。^e

纱厂和织布厂、服装生产商以及跨境正式和非正式贸易的存在意味着该部门既有垂直增长可能，也有水平增长可能。通过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莱索托继续鼓励具有财政、管理和技术能力的外国投资者扩大在该国的企业。

但对该部门的成功也有一些担忧。较弱的税务管理仍为走私和进口价值低估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造成莱索托境内市场不稳定。必须加强海关当局和边境/港口管制，以打击走私，特别是非法的二手服装的走私。^f 虽然二手服装的合法和非法进口为南部非洲许多相对贫穷的人口提供了便宜的服装，但这些进口对该区域的服装和纺织生产商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g 最后，纺织生产产生的化学废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安，这些废水实际上未经处理就流入卡利登河，而该河下游是莱索托和南非饮用水的主要来源。^h

^d Samson Muradzika, “南部非洲区域的服装和纺织业：马拉维、毛里求斯和津巴布韦案例研究”，发展政策研究股第 01/58 号工作文件，开普顿大学，2001 年，开普顿，第 9 页。

^e 《每日商务》，2001 年 2 月 16 日。

^f Muradzika, “南部非洲区域的服装和纺织业”……，第 23 页。

^g Muradzika, “南共体的纺织和服装”……，第 13 页。二手服装占美国向撒南非洲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的 51%（美国贸易部，“美国的贸易和在撒南非洲的投资”，2002 年，第十五页。

^h 《欧盟快报》，第 194 号国家报告（2002 年），第 91 页。

在多哈，部长们还同意就提高非农业产品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据说当关税率随产品加工水平提高而上升时存在），并取消非关税措施。这些措施对非洲穷国特别重要，因为整个区域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关税升级使非洲国家很难使其经济多样化，以生产增加值高的加工产品。关税高峰往往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兴趣出口的产品。关于对这些出口商来说特别重要的两个部门，即纺织业和农业，纺织业的关税壁垒仍然较高，而农业商品的较高关税和农业持续补贴抑制了农业出口。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多哈回合取得圆满后果将促使在特殊和差别待遇方面作出重大让步。虽然存在各种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实施建议，大多数国家仍然希望让有资格的国家免受世界贸易组织纪律的约束（或放宽这些纪律），或者解决没有能力遵守这些规定的问题。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资格标准，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通过自我声明获得的。但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组别例外，它们的确定是由联合国进行的。

由于发展中国家 2001 年近 40% 的出口是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社会在贸易方面协助发展中国家作用的讨论不能再，也不应该将重点只放在发达国家。非洲、东亚、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发展中国家 1996 至 1999 年的平均未加权关税率分别是 17.8%、10.4%、11.1%、19.3% 和 30.7%（发达国家为 6.1%）。虽然这些关税率在 1990 年代有所下降，但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不仅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这一主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按进口一美元计，它们也是最经常的使用者。¹⁰³

结论意见

虽然扩大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增长又有助于减贫，但开放和自由化并不是减贫的万能药。主要原因在于贸易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一般较小，特别是从短期来看。贸易政策只是增长与减贫关系中的一个要素。

自由化可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发生影响。在中短期，调整成本是决策者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需要有一些可以迅速实施的稳定计划和其他安全网，如临时收入支助和再分配援助。所有改革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贸易自由化也没有理由例外。实际上，这一概念被纳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即“贸易收益”将会大到赢家能够补偿输家的程度，以便这两个群体的福利都能得到改善。但遗憾的是，现实并没有这样美好，因此必须有适当的对策来克服困难和促进调整。潜在的安全网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补贴、现金转移（如免费提供基本服务或儿童补贴）、对没有竞争力的公司的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以及公共工程就业等。

¹⁰³ J. Michael Finger、Francis Ng 和 Sonam Wangchuk，《作为保障政策的反倾销》，世界银行第 2730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世界银行，2001 年，华盛顿特区）。

但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和贸易额的增加由于其动态而有助于促进减贫所必需的增长。因此其中的一个教训是，对贸易自由化造成的任何中短期问题的适当反应是制订适当的对策，如推行下岗工人再培训方案，而不是中止贸易改革进程。对整体可行的政策改革所造成的困难的确定应当促使寻求补充政策来减少不良影响，如提供培训和宣传最佳商业做法，以便新的市场机会能够得以利用，并在可能会对穷人产生巨大影响的部门逐渐实施改革。拒绝可能对任何穷人产生不良影响的所有改革会造成长期停滞，而这最终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贫穷。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制订避免给最贫穷住户带来损失的贸易自由化方法是可能的。其中一个这样的方法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的关税改革；但关税减免在纠正关税改革带来的分配方面的不良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引诱寻租等做法的危险。

最后，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同，因为效果取决于具体条件。这使得很难衡量和预测将从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得出的结果应用于其他国家和时期后，贸易自由化会对贫穷产生什么结果。不过，关于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对经济增长并通过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有两种强有力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贸易自由化一般不会单独实施，而是“一揽子”相互补充的改革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改革可能是增长所必要的，并且有助于促进增长。证明贸易改革重要性的第二个观点是以实际上没有“反面例子”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哪些封闭经济体曾长期实现繁荣。过去二十年左右经济增长表现良好的国家都把开放作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鉴于今天世界经济更加全球化，很难想象希望将来能够繁荣富强和减少贫穷的任何国家会采取相反的行为。

第七章

撒南非洲基于市场的农村发展办法

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的政策，对于实施农村发展战略，包括同农村贫困作斗争的努力，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章侧重介绍意在提高农业效率的部分基于市场的政策包括粮食销售改革和土地再分配，并认定此类政策对实现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格局的间接影响，特别是在撒南非洲，这个区域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总人数预计在 1990 至 2015 年之间将会增加。虽然采取基于市场的政策通常主要不是为了减轻农村贫困，但它们对减轻贫困能够发挥总体的积极影响。

拥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主粮市场，对于农村的穷人特别重要，他们往往靠生产主要的粮食取得其大部分收入。因此应特别注意粮食销售在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直至 1980 年代中期，许多非洲国家主要粮食作物的销售由特定的国家机构负责，主要是销售局，然而，国家对粮食销售干预除了普遍不能有效地确保持续的农村经济增长外，还造成经济效率低下和无法持续的财政成本。这导致更加强调旨在提高农业销售的效率和成本效益的基于市场的办法。本章介绍的销售改革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通过改善运输网络，增加粮食存储能力和向贫穷的农民提供信贷，为提高销售效率创造有利的环境，与通过销售局进行直接干预相比，能够成为政府介入粮食销售工作的一种更有效的形式。

本章还论证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政策能够促进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更公平的农村增长。如果小生产农民能够可靠地获得可耕地——以土地所有权或长期租用的形式——他们就会增加对土地的投资，生产更多的粮食并提高自己的收入。扩大的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还增加他们通过将土地作为担保物获得成本较低廉和期限较长的信贷的机会。与此同时，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要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促进农村发展的补充措施。

可将基于市场的计划视为最近 10 年间兴起的最具创新性的土地改革办法之一，它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备选办法以替代较为常规的、国家控制的土地再分配方案。不过，本章认为，当各国选择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办法时，国家仍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必决定哪些地块易手。

撒南非洲的农村发展和减贫

更加强调农村减贫的必要性

全世界大约 75% 的极端贫穷人口生活和工作在农村地区，其中三分之二主要依靠农耕或农业劳动为生。¹ 虽然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率急剧下降，但自那时以来世界各地下降的速度放慢了。据估计，到 2020 年世界上仍有 60% 的穷人生活农村地区，即使全球城市人口可能超过农村的份额。² 因此，发展中国家农村城市减贫工作取得巨大的进步，对于实现有关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将至关重要。

农村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尤其体现为收入低，资源享用机会不平等，教育水准低，营养不良，保健服务不充分和容易受到冲击的损害。消除农村贫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反映它的多维性，并因而对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这意味着增加穷人享有保健、营养、教育和培训机会的社会政策应成为农村发展战略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问题的探讨不属于本章的范围。³ 本章审查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的部分基于市场的政策并研究它们对促进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格局的间接影响，而不是审查消除农村（和城市）贫困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

鉴于发展中国家居高不下的农村贫困程度促使农村穷人移居城市地区，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之间的关系是分析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因素。可以将很大部分的城市贫困看成是农村穷人的个人减贫战略造成的，他们除了移居到城市地区外没有多少其他选择。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基于城市发展的经济政策，似乎不可能像也纳入农村发展战略的政策那样有效地减轻贫困。此外，如果政府政策不公平对待农业部门和忽视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也会严重助长农村贫困并通过称民助长城市贫困。⁵ 负面影响农村穷人的政策例子包括在提供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政策偏向城市，以及在土地所有权、政府提供的推广服务及利用有补贴的信贷和灌溉水等方面偏向大型土地所有人和农工联合企业。不平等的土地分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农村减贫的最大因素之一。

¹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结束农村贫困的挑战》（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纽约）。《联合国千年宣言》（见大会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决议）将极端贫困的人定义为每天收入不足 1 美元的人。

² M. Ravallion, “论贫困的城市化”，《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68 卷（2002 年），第 435-442 页。

³ 例如见《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哥本哈根，1995 年 3 月 12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6. IV. 8）；和《世界社会状况报告，2001 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01. IV. 5）。

⁴ M. H. Khan,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问题和政策》，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WP/00/78 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 年 4 月，华盛顿特区）。

⁵ 见 R. Sobhan, “消灭农村贫困：从微观议程转向宏观议程”，油印件，政策对话中心，达卡，2001 年 6 月。

可以论证，同农村贫困作斗争的努力成功与否至少取决于两个经济因素：向农村穷人提供法律上可靠的资产（主要是土地）享用权和增加他们进入农业市场的机会。⁶ 不能适当地利用可耕地也许是农村贫困最重要的根源，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认为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至关重要。因此，迫切需要专注于执行土地再分配政策，将它作为促进更公平的农村增长格局的一个手段。同样，能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主粮市场特别重要，因为种植主粮往往占到农村穷人收入的一大部分。因此还应特别注意粮食销售改革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即使这种类型的政策改革不是为了直接减轻贫困。

关注撒南非洲

最新的贫困预测表明，从 1990 年至 2015 年将极端贫困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见 A/56/326 文件，附件，目标 1，具体目标 1）能够在全世界一级实现，不过仍将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的最大份额生活在南亚（1999 年占 41.7%），但一个区域内穷人比例最高的则属撒南非洲，1999 年这里有 3.15 亿人民（约占人口的 40%）依靠每天不足 1 美元为生。此外，撒南非洲还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总人数在 1990 年至 2015 年之间预计将大幅度增加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区域。⁷ 由于据预测 2015 年非洲将有 4 亿多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这个区域极端贫穷的总人数将等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的总和（见图七.1）。

撒南非洲的非收入贫困指标也恶化了。例如，东亚减少挨饿人口比例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营养不足的非洲人的估计数在 1990 年代却增加了 2 700 万。⁸ 同样，撒南非洲饮食能量消费低于最低水平的人口份额最大；初等教育净入学率最低；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最高，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有关的流行率和死亡率最高；以及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最高。

贫困指标的这种明显的恶化，要求采取系统的行动处理撒南非洲悲惨的情况。国际社会和撒南非洲各国政府必须齐心协力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与贫困作斗争。换言之，正如迫切需要更加强调在世界各地减轻农村贫困一样，实现有关减贫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国际努力也应更加优先注意撒南非洲。

如果国际上更加关注缓解农村贫困，将会增强撒南非洲的减贫努力，这里绝大多数穷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地区。在东非和南部非洲，至少五分之四极端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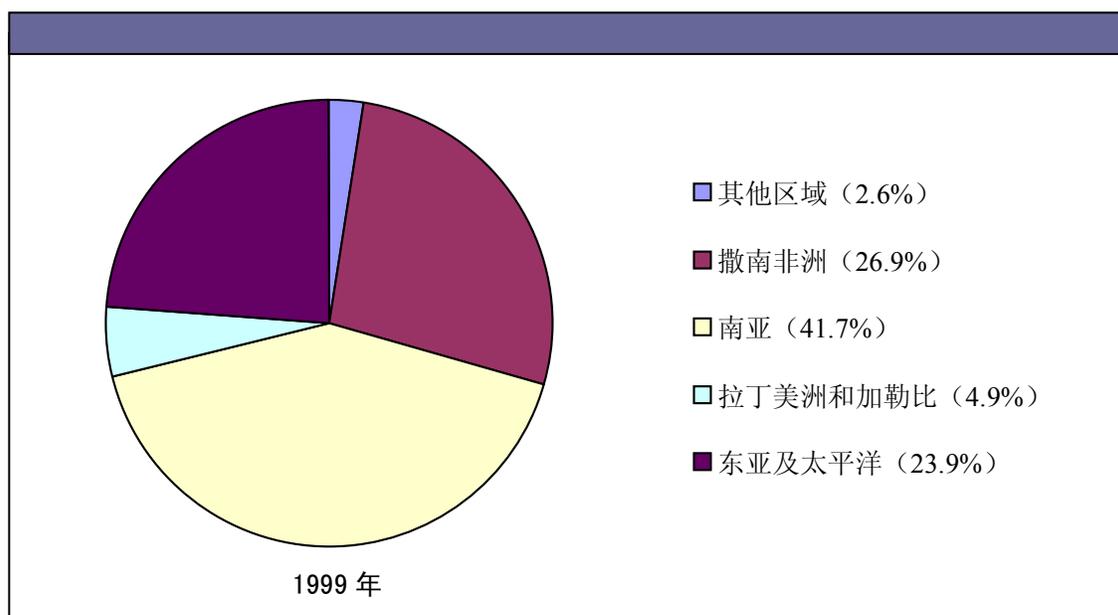
⁶ 除了基于更好地享有人力资产如保健、营养、教育和技能的社会因素外。见《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

⁷ 见世界银行，《2003 年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2002 年，华盛顿特区），第 30 页。

⁸ 秘书长题为“《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A/57/270 号文件和 Corr.1）。

穷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且 85%的穷人依靠农业为生。⁹ 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来自农业的收入——包括作物、家畜和雇佣劳动——是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住户中 96%住户的主要收入来源。¹⁰ 甚至在中非和西非——这里的城市贫困正在迅速上升——多数国家农村（相对于城市）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高得多。¹¹ 例如在加纳，1998-1999 年度 83%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多数是种粮户。¹² 最近的预测表明，只有两个非洲国家——加纳和马达加斯加——有可能以足以实现有关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速度降低农村贫困率。¹³

图七. 1.

1999 和 2015 年发展中国家区域在世界极端贫困中的份额^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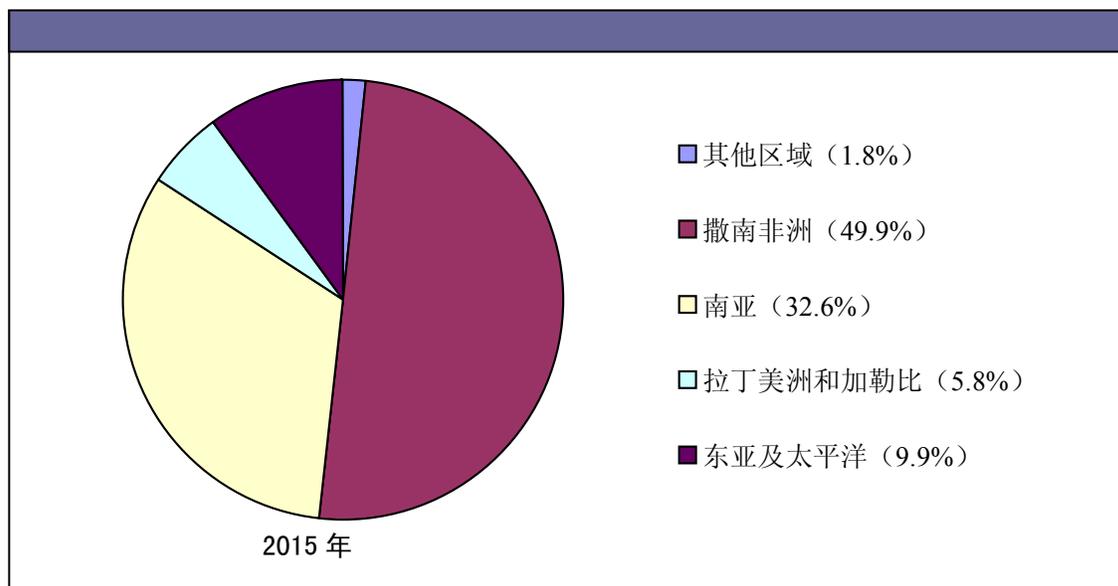
⁹ 农发基金，《农村贫困评估：东非和南部非洲》（农发基金，2002 年，罗马）。

¹⁰ 同上。

¹¹ 农发基金，《农村贫困评估：西非和中非》（农发基金，2001 年 12 月，罗马），第 24 页。一个国家（喀麦隆）目前城市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村地区。

¹² C. K. Dordunoo 和 G. Y. Dogbey，“全球化与加纳的经济改革”，载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减轻贫穷的新战略》，D. Bigman 编（联合国沃林福德，国际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国家农业研究国际服务机构（CABI/ISNAR）2002 年），第 4 章。

¹³ D. E. Sahn 和 D. C. Stifel，“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世界开发》，第 31 卷，第 1 期（2003 年），第 23-52 页。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2003 年》（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 年），第 30 页。

^a 各区域由世界银行界定。按照概览中其他地方使用的国家组合计算这些总量所需的国别数据未能获得。

农业部门持续的增长能够为许多非洲人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非洲减少农村贫困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将通过提高其农业生产力和产出来提高贫穷农民的收入。例如，发展中国家 1970 年至 1990 年期间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与 196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中期提高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扩大灌溉耕地和在所谓的绿色革命期间采用其他形式的增强型农业技术。

然而，在区域一级，这两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成功程度是十分不均衡的。例如，东亚和南亚该期间农业增长和减贫幅度大部分是它们扩大灌溉农业的结果。相反，撒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村贫困和农业呆滞持续存在的部分原因其灌溉耕地面积只有微不足道的 5%。¹⁴ 同样，虽然绿色革命确实普及到了撒南非洲，但该区域未能像亚洲那样从中受益，后者经历了重大的农业“技术转移”，它提高了主要粮食像稻米、小麦和玉米的生产力。¹⁵ 绿色革命时期实现的技术进步促成的作物产量提高有助于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快速减少农村贫困。

因此，要想使农村经济成为非洲增长的发动机，促进农村增长的适当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在过去的 20 年中，许多撒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实行了对农业生产

¹⁴ 《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

¹⁵ 见《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II.C.1），第五章。

力和农村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重要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变革。整个大陆的农业政策改革一般与援助条件制约特别是与结构调整方案密切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促成经济政策变革的关键的内在因素。国家干预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提高效率的必要性特别有利鼓励非洲各国政府实行不同的办法发展它们国家的农业。

能够促进非洲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有农业市场改革；便于更好获得实物资产（主要是土地）和金融资产以及改善推广服务、交通和灌溉基础设施的政策；公平对待农业的定价、税收和汇率政策；农业贸易自由化；以及扩大和传播农业技术研究成果。本章认为旨在提高非洲农业效率的基于市场的创新办法已在其中前两组政策中出现了，即销售改革和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办法。

撒南非洲的粮食销售改革

粮食市场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

农业作为食品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对非洲多数农村人口非常重要。此外，虽然城市贫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非正规部门，但是小农性农业却是撒南非洲农村穷人最大的收入来源。¹⁶ 特别是基本粮食作物（主粮）的种植占到非洲穷人收入相当大的份额，尽管比例日益增大的穷人也从其他来源创造收入，主要是经济作物、家畜和某些非农业活动。此外，农村穷人通常从主粮摄入 70% 至 80% 的热量。¹⁷

基本粮食作物的国内产量也对非洲穷国的国内通货膨胀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对（全国）一揽子货物零售价格指数和对穷人的福利具有巨大的影响。总之，粮食市场的恰当运作对非洲的减贫工作至关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购买粮食往往占了穷人支出的大头；主粮的销售是农村穷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组织不善的粮食市场和食品分配体系经常给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区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饥荒。

有许多证据表明，撒南非洲粮食销售的不确定性助长农业产出和生产力停滞不前。¹⁸ 该区域的粮食市场容易不稳定，原因是一系列独特的物质特点和经济特点将它们与其他农业市场相割裂。首先，主粮受制于进出口价格的巨大差别，因为它们的价值相对于运输成本往往不高，特别是在运输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其

¹⁶ 用语“小农”被经常用来指没有正式土地所有权和有时耕种低质量的土地——尤其是在大地主所拥有的地块上——并直接依靠这种活动为生的小农。因此这种粗线条的定义包括佃农和分成佃农，但不包括无地的农业劳工，农业劳工中许多依靠非常低的工资和来自不牢靠的工作的报酬为生，因此也是农村穷人的组成部分。例如见 E. R. Wolt, 《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Harper 和 Row, 1969 年, 纽约)。

¹⁷ 《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

¹⁸ J. Coulter 和 G. Onumah, “仓库收据系统在促进非洲商品销售和农村生计方面的作用”, 《粮食政策》, 第 27 卷 (2002 年), 第 319-333 页。

次，由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存储，价格预期对粮食市场当前的价格走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三，粮食供需总量的短期价格弹性较小，这意味着即使产生的小幅变化也可能导致大幅的价格波动。

此外，国际粮食市场往往受少数国家的活动支配，它们的余粮处置政策是价格不稳定的又一个根源。¹⁹ 例如，某些主要粮食商品如大米的国际价格波动往往比国内波动大得多。因此，如果农业贸易自由化促成国内与国际粮食价格更加一致，能够提高国内价格的易变性。尽管如此，正如第六章说明，有几个“成功的事例”至少可与非洲农业贸易自由化部分地联系起来。²⁰ 不过，本节将侧重于供应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原因是它通过小农生产与农村贫困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及主粮在农村穷人的消费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

虽然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一般旨在稳定国内价格，但经常有三个主要理由可证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a)避免粮食供中断和确保穷人获得粮食；(b)保护消费者（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不受价格猛涨影响；和(c)保护生产者不受与供需失衡相联系的价格猛跌的影响。因此，国家干预经常涉及给予消费者减价补贴和给予生产者提价补贴。不过，限制粮食零售价并不总是与保证最低生产者价格相容，尤其是在预算有限的穷国。尽管国家干预粮食市场造成很大的财政费用，但多数非洲（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粮食作物的销售和存储往往掌握在国家机构手里，直至 1980 年代为止。此外，许多国家的国家机构还控制了紧要投入如化肥和农药的国际采购和国内经销。

对粮食生产和销售的这种干预经常是通过国家销售局进行的，它们对关键的国内销售职能以及（对外）农业贸易拥有法定的垄断地位。非洲的销售局通常与出口经济作物——例如可可粉、咖啡、棉花、花生和茶叶等——和与稳定这些作物的价格的职能联系在一起。然而，其中至少一个（经济作物）销售局——以及几个特设的粮食销售局——也干预主要粮食作物如玉米、小米、大米、高粱和薯蓣的采购、加工和经销。尽管对主粮或经济作物市场进行干预，撒南非洲的多数销售局或者未能实现稳定价格的目标——主要因为财政和管理制约因素——或者只是暂时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却以财政不稳定作为代价。²¹ 由于这些国内制约因素，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整个非洲重新界定国家在粮食销售方面的作用并明显倾向于实行粮食（和农业）销售改革。因此，这种改革有着关键的内在原因，明显的是国家机构进行定价干预产生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

¹⁹ 不过，总的来说国际粮食价格呈长期下降的趋势，间或出现价格暴涨，例如在 1995 年。也见 S. Jones, 《发展中国家自由化的粮食销售：关键的政策问题》（牛津政策管理部 (OPM), 1998 年 5 月, 联合王国牛津), 第 2 页。

²⁰ 关于对农业贸易自由化与减贫之间假定的联系的批评，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J. Stiglitz 的特约来稿, 《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纽约), 第 80 页。

²¹ 见 S. Jones 和 S. Wickrema, “市场自由化背景下的价格稳定政策”, 《OPM 政策简介》注 2 (OPM, 无日期, 联合王国牛津)。

与此同时，从 1980 年代初起，政策改革与执行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双边援助方案推动的结构调整方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1981 年公布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倡导陷入螺旋下降的非洲经济体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包括执行一项建议即非洲各国政府减少对粮食市场的控制和增强市场力量的作用。²² 这样，在过去的 20 年中，援助条件限制也有助于形成非洲的粮食（和农业）销售改革的政策。²³ 这项改革的主要特色是：(a) 国家机构部分或完全撤出主粮销售领域；(b) 减少或取消消费者和生产者定价补贴包括投入补贴；(c) 从国家管制的价格逐步转向市场确定的定价；和(d) 放松对私人销售活动的管理控制。

部分非洲国家的粮食销售改革

撒南非洲粮食销售改革的实施情况各国之间差异巨大，而且改革目标的实现情况经常与政治承诺的程度紧密相连。改革措施主要侧重于减少国家对销售和定价的干预，或提高留下的销售局的效率。到 1990 年代末，在整个撒南非洲，这些局“在与私营部门的竞争中普遍出局”，或“变成了负责促进和管理工作的非贸易产业局”。²⁴

有些国家如加纳和马里，在实行改革前私营部门就已大量介入粮食销售（经常侵犯销售局的垄断地位）。在许多西非国家，国家销售局名义上拥有法定垄断地位并垄断了粮食销售，但经手的销售额难得超过上市主粮产出总量的五分之一。基础牢固的私营粮食交易网经营着广泛的平行市场，在国内和跨界都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改革最终专注于为扩大私营贸易提供有利的环境，尤其通过改善物质基础设施、推广服务和获得信贷的机会。

改革前对粮食销售干预比较有效的国家——主要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由于财政制约和援助条件限制，已着手进行市场自由化，但其中几个这样做时没有对改革作出充分的政治承诺。其中几个国家经常出现政策逆转，因而无法实现主要的改革目标，并给新兴的私营部门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肯尼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销售改革进行的一次综合性审查发现，私营农业贸易商屡次抱怨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²⁵ 不过，南非——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²² 世界银行，《撒南非洲加速发展：一项行动议程》（世界银行，1981 年，华盛顿特区）。这个文件被广泛称为“Berg 报告”，以它的主要作者 E. Berg 命名。

²³ 许多非洲国家也放宽了非主要商品如棉花和咖啡的市场，但对它们的分析不属于本章的范围。例如见 T. Akiyama 等人，“非洲商品市场改革：部分最近的经验”，《经济体制》（即将出版，2003 年）；以及 A. W. Shepherd 和 S. Farolti，“非洲出口作物自由化：评论”，《粮农组织 135 号农业服务公报》（粮农组织，1999 年，罗马）。

²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推广干草玉米销售指南”，《销售推广指南 2》（粮农组织，1999 年，罗马）。

²⁵ P. Seppälä 编，《自由化和忽视？东非的粮食销售政策》，世界发展研究，第 12 号（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展经济学所，1998 年 3 月，赫尔辛基）。

在较小程度上——从国家控制的粮食销售体制向日益基于市场的体制转型取得了成功。此外，如下文所证明，南非的转型导致更多地依赖现有的私营商品市场来纠正因销售局退出价格稳定领域引起的价格波动。

以下 7 个案例研究说明撒南非洲程度不等的销售改革及其在提高粮食销售效率和降低主粮实际价格方面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功，以及改革对住户粮食安全和减贫的间接影响。

加纳

甚至在改革前，小型的私营贸易商就已负责加纳粮食销售的很大部分，包括玉米等主粮。部分为了应对与 1982-1983 年度旱灾联系在一起的食物短缺局面，政府寻求扩大加纳粮食经销公司（粮食经销公司）在玉米销售活动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稳定价格进行：²⁶ 但是粮食经销公司没有能力坚持这种定价政策——主要是因为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促成了国家干预的快速逆转和更大程度的销售自由化。

1983 年在布雷顿森林机构支持下出台的经济复苏方案实行了数项基于市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改革。这包括取消玉米最低保护价和为扩大私营部门粮食贸易（包括小型交易商）创造有利的环境。在 1990 年代初，政府实行了一个中期农业发展方案，覆盖 1991 至 2000 年期间，其目标是“确定和支持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增长”。²⁷ 农业发展方案改革包括政府退出农业部门的定价和价格支持业务——但可可粉显然除外——和大幅度减少对国家机构如粮食经销公司的政府补贴。

销售改革将政府的作用从干预粮食定价和销售改变为执行支持私营部门扩展的措施，例如向玉米种植者和贸易商提供更好的存储服务 and 建设农业和销售扩大所需的农村支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当地存储能力和运输系统的改善有助于降低长期粮价及其可变性。²⁸ 目前粮食经销公司专门向私营部门的客户提供销售支持服务，主要是粮食烘干、净化和存储。鉴于女贸易商在加纳的小规模粮食销售方面特别活跃，对小规模销售的支持还具有积极的性别效应。²⁹

不过，销售改革给农业发展带来的结果好坏兼而有之。例如，自 1984 年以来实际粮价下降了，而且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人均农业产出也减

²⁶ 见 M. Kherallah 等人，《撒南非洲的农业市场改革：研究结论的综合》（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2 年 8 月，华盛顿特区），第 4 章。

²⁷ 见 Dordunoo 和 Dogbey，前引书。

²⁸ O. Badiane 和 G. E. Shively，“空间整合、运输成本和当地价格对加纳政策变化的反应”，《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56 卷（1998 年），第 411-431 页。

²⁹ F. Lyon，“信托、网络和规范：在加纳创造农业经济的社会资本”，《世界开发》，第 28 卷，第 4 期（2000 年），第 663-681 页。

少了。³⁰ 此外，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不能向农村地区和农村穷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小规模农业销售活动的扩展经常受到阻碍。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政府目前正与双边捐助国和多边机构合作，执行一个旨在加强微型金融机构和增加农村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的方案，特别是面向农村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³¹

对粮食经销公司的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抵制，限制了该国粮食销售改革的潜在效益。由于政府不愿意处理粮食销售公司的冗员和后者抵制将它的仓库充分提供给私营部门利用，造成了特定的问题。³² 现已提出建议，“应认真考虑将（粮食销售公司的）商店和粮食处理设备出售或出租给私营部门”。³³ 不过，在其他存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粮食存储设施的私有化可能引起垄断权力的问题。因此，提高粮食经销效率的努力应处理此类问题，将存储设施出租给私营部门和责成私人经营者为竞争提供便利，按商业和非歧视条件将粮食存储服务提供给第三方。³⁴

肯尼亚

由于几个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肯尼亚的销售改革过程缓慢和不均衡。直至 1980 年代，还通过给予国家粮谷和制品局（粮谷制品局）以垄断权，由它垄断全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粮食流动、向大型粮食碾磨厂的销售和国际农业贸易，以实施国家对粮食销售的干预。政府还为生产者制定全国固定的价格。尽管粮谷制品局拥有垄断地位，私营部门的交易（合法和非法二者）占到上市玉米产出的很大份额。由于私人对粮食销售的这种介入以及对国内粮食流通的限制，粮谷制品局无法消除官价与平行市场价之间的差异，而且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差。

1980 年，国家的第一个结构调整方案包括生产者价格的有限改革，但是改革粮谷制品局的压力遇到了顽固的政治抵制。生产者价格提高和粮谷制品局人员增加 3 倍，以及在 1980 年代中期建立地方购买中心，使销售局成为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到 1987 年，粮谷制品局的累积债务相当于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5%。³⁵ 整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结构调整方案和双边援助方案一再强调了粮谷制品局的彻底改革问题，但由于缺乏政治承诺而从未全面实施。

³⁰ T. S. Jayne 等人，《六个撒南非洲国家实际粮食价格趋势》，密执安州立大学国际发展工作文件第 55 号（密执安州东兰辛，密执安州立大学，无日期）。

³¹ 见《农村贫困评估：西非和中非……》第 61 页。

³² 见 J. Coulter 和 A. W. Shepherd，“库存信贷：发展农业市场的一个办法”，《粮农组织农村服务公报第 120 号》（粮农组织，1995 年，罗马），案例研究 4。

³³ 同上，第 7 节。

³⁴ 例如见 S. Jones 和 S. Wickrema，“界定国家在主粮市场的作用”，《OPM 政策简介注释 3》（联合王国牛津，OPM，无日期）。

³⁵ S. Jones 和 S. Wickrema，“改革中限制条件的利用：非洲的粮食市场”，《OPM 政策简介注释 1》（联合王国牛津，OPM，无日期）。

不过，粮食销售改革在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欧洲联盟（欧盟）的财政支助下，1986至1991年部分执行了一个谷物部门改革方案（谷改方案），使得粮食碾磨厂商能够从私营部门采购比例日益增大的供应量。到1992年，（全国）碾磨厂商大约50%的需求量是从非粮谷制品局来源采购的。此外，小规模（锤式）碾磨厂从大型（享受补贴的）碾磨厂商获得很大份额。到1990年代中期，城市锤式碾磨膳食消费量增加到玉米膳食消费总量的40%之多。鉴于很大比例的低收入家庭拥有小型城市碾磨厂或在其中工作，这可能对减贫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部分取消了对国内粮食流通的管制。因此，由于余粮区与缺粮区之间的贸易流量增加，肯尼亚大多数地区的消费者价格下降了，而且“更符合区域比较优势的农业生产的空间配置”鼓励私营部门提高效率。³⁶此外国家化肥市场的并行自由化在农业部门产生了广泛的增效作用。还有迹象表明，自由化的玉米碾磨提高了部门的竞争力——主要通过扩大小型锤式碾磨厂——并有助于降低玉米粉的（实际）价格。³⁷

尽管如此，在关键的改革领域，例如粮谷制品局改组，价格放开和允许持照的进货经纪商在粮食市场合法经营等，由于反复无常地实施，使肯尼亚的销售改革方案受到了损害。过去的几届肯尼亚政府反对改革，意味着私人销售只是在1990年代和只是在捐助国联手施压之后才自由化。缺乏政府承诺，和改革方案的制订和执行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是迄今为止改革步伐相对较慢的两个主要原因。虽然1990年代实际粮价逐步下降，但要想使销售改革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将需要制定有关政策加大销售自由化的力度，包括为私营部门在粮食销售方面拓展业务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

马拉维

马拉维的农业部门包括小农部分部门——占到农业产出的70%，包括大部分的主粮——和私营商业分部门，后者主要生产经济作物。³⁸1971年，政府成立了国家所有的农业发展和销售公司（农业发展销售公司）以干预农产品的购销活动。农业发展销售公司只在非粮食作物如棉花和烟草的采购方面拥有垄断权力。

³⁶ S. Were Omamo 和 L. O. Mose, “市场自由化条件下的化肥贸易：肯尼亚的初步证据”，《粮食政策》，第26卷（2001年），第1-10页。也见 J. K. Nyoro 等人，“自由化后时代肯尼亚销售体系的演变”，在非洲农业改革问题讲习班上宣读的论文，1999年6月27日至30日，内罗毕。

³⁷ Seppälä, 前引书。

³⁸ 见 W. Chilowa, “农业自由化对马拉维粮食安全的影响”，《粮食政策》，第23卷，第6期（1998年），第553-569页。

不过，它日益介入假定可以自由贸易的粮食产品的购销活动，导致私营贸易商被挤出局。³⁹

农业发展销售公司的销售活动旨在为小农产出提供一个可靠的市场；制订交叉补贴生活在缺乏适当运输网地区的竞争力较低的农民的全国统一价格；和提供经过补贴的农业投入。它还为玉米和大米的消费提供巨额补贴。⁴⁰ 农业发展销售公司头十年期间的活动在维持小农部门和促进住户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 1980 年代初起，由于几个微观和宏观经济问题，包括外来的冲击，农业发展销售公司维持其定价政策的难度日益增大，同时它的粮食销售活动的亏损额也日益扩大。这些问题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补贴不断上升的财政成本；农业发展销售公司员工数的增加及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马拉维不断下降或负的经济增长率和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莫桑比克内战造成的运输成本的提高；以及世界烟草价格的下跌，烟草出口的税收被用来补贴销售局的玉米支助业务。

由于这些经济困难，以及援助的限制条件，马拉维于 1980 年代推出了一连串的结构调整方案，导致逐步放开了粮食定价和销售。在 1981 至 1982 财政年度，玉米的生产者价格上涨了三分之二，并于 1987 年正式取消了农业发展销售公司在小农农业采购方面的法定垄断地位，尽管国家销售局仍活跃于粮食市场。国际金融机构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促进广泛的价格和销售自由化，尽管如此，马拉维一直是非洲国家中最顽强抵制解散国家销售机构的国家之一。

虽然价格和销售自由化导致玉米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它并未保证住户的粮食安全。作为粮食净卖方的小农得益于自由化，但作为粮食净买方或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小农的日子似乎变得更糟了。⁴¹ 小贸易商整体——其中很大部分收入较低——从销售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即使它们也面临着妨碍它们提高销售效率的严重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包括运输基础设施薄弱和成本高，存储设施不足和缺乏信贷、培训和推广服务，包括技术咨询不够。因此需要政府（和捐助国）作出更大的努力，加速粮食销售改革和确保提高私营销售效率的实惠转移给消费者，特别是穷人。

马里

马里农业销售局的建立可追溯到 1960 年代中期。在市场改革前，它拥有粮食贸易的法定垄断地位，并有权为全国的生产和消费者双方制定统一的价格。粮食定价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向军队、国家雇员和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粮

³⁹ 由于在 1980 年代初以前建立了 1 400 个销售点，促进了农业发展销售公司在粮食销售方面日益增大的介入。见 T. S. Jayne 和 S. Jones，“东非和南部非洲的粮食销售和定价政策：概览”，《世界开发》，第 25 卷，第 9 期（1997 年）第 1505-1527 页。

⁴⁰ Chilowa，前引书，第 557 页。

⁴¹ Chilowa，前引书。

食”。⁴²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农业销售局还是负责粮食援助分配的主要国家机构。

部分由于其垄断地位无效，粮食定价政策令人质疑和销售业务效率低下，私营贸易商发展了一个广泛的平行粮食市场。到1980年代初，农业销售局的“垄断”少得只占上市总产量的15%，然而它的经营赤字大幅度提高，这主要是由它的粮食进口业务和（消费者）价格补贴造成。由于农业销售局日益消耗马里政府的财政资源，迫使政府在捐助国的支助下在1981年实行了销售改革。⁴³ 通过逐步执行谷物市场改组方案——以其法文缩略语PRMC著称——的不同阶段在过去20年中进行了改革。

在PRMC的第一阶段（1981-1986年），目标是加强私营部门在法定粮食贸易中的作用和减少对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的补贴。在此阶段，实际粮食损失明显减少，而且农业销售局的经营亏损削减了三分之二。不过，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农业销售局无法维持官价，最终导致它退出价格稳定领域以便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的财政条件。在第二阶段（1988-1990年），农业销售局的主要目标包括管理国家粮食安全缓冲存量和粮食援助分配工作。此外，将捐助国的援助支持纳入了有关私营粮食贸易商信贷方案。第三阶段（1991-1994年）专注于向农民协会提供信贷（由一家国有开发银行管理）和促进私营部门仓储的扩充，包括国有存储设施的私有化。

PRMC成功地将农业销售局排除在价格稳定活动之外并降低了它在（非援助）粮食分配中的作用，以及确保了更大程度的竞争和私营部门介入粮食销售工作。国家销售体系的财政成本日益提高的状况得到了扭转，而且1985-1991年期间平均粮食产出比1975-1979年和1980-1984年两个期间的平均数高出40%。⁴⁴ 还有迹象表明，销售改革有助于加强竞争，降低粮食经销成本和实际增加消费者获得粮食的机会。⁴⁵ 此外，降低销售成本和改进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市场整合，通过增加穷人获得粮食的机会和确保较低的粮价而使城乡消费者双受益。

尽管如此，由农业销售局继续负责粮食援助的分配和国家粮食安全存量，仍是一个财政负担并且促成价格的扭曲。例如，由于“政治压力要求向某些生产商提供价格支持（补贴）和在给予合同方面优待某些供应商”，国家粮食安全存量受到了损害。⁴⁶ 此外，由于单靠销售改革不可能解决的结构问题，尤其包括国家

⁴² Jones 和 Wickrema, “改革中限制条件的利用”……。

⁴³ 尤其见 N. N. Dembele 和 J. M. Staatz, “市场改革对马里农业改革的影响”, 在农业改革问题讲习班上宣读的论文, Egerton 大学, 内罗毕, 1999年6月27日至30日。

⁴⁴ Jones 和 Wickrema, “改革中限制条件的利用”……。

⁴⁵ Coulter 和 Shepherd, 前引书, 案例研究3。

⁴⁶ Jones 和 Wickrema, 《改革中限制条件的利用》……。

许多地区薄弱的运输基础设施，确保低收入消费者可靠获得谷物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⁴⁷ 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销售改革今后的成功机会可能会打折扣，除非政府与国际伙伴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南非

南非的粮食销售体系已从受国家控制决定性地转型到了主要以市场为基础，特别是在玉米销售方面。在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的 50 多年中，南非玉米局（玉米局）执行了一项价格稳定计划，向玉米种植者提供了大量的补贴。⁴⁸ 政府在 1995 年开始减少这个玉米销售局的活动，尽管它继续征收稳定税和支持玉米出口。1996 年，新的立法仍允许某些类型的市场干预，包括征收稳定税和出口管制，尽管存在着重要的制衡规定。特别是，农业部长必须确信，任何建议的干预措施将推动市场准入的改善和出口收益的最佳化，而不严重损害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包括住户的粮食安全。

南非玉米市场法定的干预于 1997 年停止，当时关闭了玉米局。取消了对玉米买方或卖方或对玉米交易价的管制，并取消了对玉米出口的所有限制。此外，数年来，南非期货交易所（南非期交所）几年来一直在定期进行远期玉米合同的交易。南非期交所增长的原因之一是玉米市场的自由化造成现货市场价格极不稳定，而且这促使“种植者、贸易商和碾磨商利用远期合同和期货合同管理它们的价格风险”。⁴⁹ 不过，小规模的黑人种植者对南非上市粮食产量的贡献仍很小，在这方面，与南部非洲的多数其他国家不一样。

南非期交所作为粮食商品市场的功效在 1997 年厄尔尼诺/南部涛动事件中首次经受了检验。⁵⁰ 该区域预期的干旱促使白玉米的期货价格猛涨，因为碾磨商们试图获得下个季节的供应。相形之下，黄玉米（不用于人类消费）的价格——根据国家销售制度始终与白玉米的价格挂钩——几乎没有提高。这导致许多种植者大量改种白玉米。随着对干旱的担心消失，期货合同价格下跌，这表明与国家控制的体制相比，市场往往为应对冲击作出更好的准备。这样，南非期交所期货合同允许的各种风险对冲机会为粮食市场自由化引起的价格不稳定的加剧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该区域其他国家——包括小农比例可观的那些国家——也正在考虑利用类似的期货市场。

⁴⁷ 见 Dembele 和 Stattz，前引书。

⁴⁸ 特别见 B. Bayley，《市场的革命：南非农业取消管制》（OPM，2000 年 1 月，联合王国牛津）。

⁴⁹ S. Jomnes，前引书，第 33 页。

⁵⁰ 见 Jones 和 Wickrema，“市场自由化背景下的价格稳定政策”……。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尽管一开始抵制销售改革，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最终决定性地放开了玉米贸易，特别是在 1990 年代期间。该国的销售改革可以追溯到“由于国家碾磨公司（碾磨公司）实行的不可持续的定价政策导致 1981 年后法定销售体制的崩溃。”⁵¹甚至在自由化以前，由于碾磨公司没有能力实施它的法定垄断地位，平行市场就在处理可观份额的粮食交易。政府限制地区间贸易引起地方差价，也鼓励不同地区间的非法贸易。

虽然坦桑尼亚政府直至 1983 年以前一直力图取缔非法的私营贸易，但随后逐步取消了对私营销售的限制，因为事情明摆着，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国家销售体制既不可能与（合法或非法的）私营部门竞争，也无法维持官价。因此，销售自由化只是使迅速扩张的平行粮食市场合法化而已。1994 年，自由化政策出台了，而且作为结构调整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取消了玉米补贴。1987 年至 1990 年，也撤销了对地区间贸易的限制。私营贸易于 1990 年全面自由化，而且碾磨公司的活动基本上限于碾磨玉米。

私营销售体系扩展到了全国各地，但是，部分由于缺乏资金投资于存储容量的扩大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价格波动幅度依然巨大。私营销售体系的进一步扩大还面临其他障碍，主要是缺乏用于采购和投资的信贷。多数经营者是资本有限的小贸易商。资本和运输设施二者的缺乏意味着，许多小种植者也难以按合理的价格出售它们的作物。尽管如此，仍可以说玉米市场的自由化“一直是坦桑尼亚农业自由化的成功事例之一”。⁵²此外，取消补贴在其他非洲国家有时引起城市动乱，但在销售改革期间和以后，玉米的供应普遍与需求保持同步。⁵³

赞比亚

赞比亚国干预粮食销售的主要优先任务一直是让城市消费者受益。在 1960 年代中期独立后不久，政府就建立了国家农业销售局（农业销售局）。农业销售局垄断了玉米的销售并确定生产者及消费者价格，直至 1990 年代末。

销售改革于 1981 年起步，当时政府将玉米销售部分移交给了合作社并允许玉米粉和化肥价格上涨，以服从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政府于 1980 年代中期试图减少玉米补贴，但减少补贴方案的制订和执行处理十分不当，造成了玉米粉产品供应的减少和消费者价格猛涨。1956 年年底严重的粮食动乱促使政府增加补贴和将大型私营玉米碾磨厂国有化。1980 年代末通过实行粮食配给券再次

⁵¹ Jones 和 Wickrema, “改革中限制条件的利用”……。

⁵² B. Cooksey, “销售改革？坦桑尼亚农业自由化的高低潮”，《发展政策评论》，第 21 卷，第 1 期（2003），第 67-91 页。

⁵³ 同上。

试图减少补贴，但是又一次政策的 U 型转变于 1990 年代初取消了粮食配给券制。此外，还撤销了农业销售局，对全国碾磨工业实行了私有化，并在差不多同时取消了许多生产和消费补贴。

虽然在撤销农业销售局后在 1990 年代上半期大大减少了国家对销售的干预，但 1995 年设立的国有粮食储备机构继续利用公款低于市价将玉米出售给工业性碾磨厂。⁵⁴ 鉴于缺乏资金支持其扩大业务，这个机构的粮食销售额较小，尽管如此，其粮食销售也促使打乱了某些地方市场的私营销售和贸易活动。与此同时，由于道路基础设施差，缺乏信贷和投入及推广服务提供不足，妨碍了小农生产和私营销售的扩大。这特别有害于农村穷人，因为它助长农村地区粮食（消费者）价格上涨。此外，赢得 2001 年大选的政党竞选时提出再次成立粮食销售局向农民和消费者提供经过补贴的玉米价，而且制定了有关建立新的作物销售管理局的立法以供议会于 2002 年审议。⁵⁵

只有在下述情况下赞比亚的农村穷人才能够从自由化的玉米销售中得到巨大的实惠。避免此种政策逆转，减少政府对城市的倾斜，并决定性地执行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包括制订有关政策提高农业产出和生产力和为有效率的销售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推广服务，以及由捐助者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支助。不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可能落空，除非对改革作出充分的政治承诺。

非洲粮食销售改革的评估

对部分非洲国家改革经验所作的审查表明，粮食销售自由化已经产生了一些正面（以及负面）的社会经济结果。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在多数（虽然不是全部）情况下，存在着合法或非法的私营部门销售。这本身就说明粮食销售局并非在有效地履行它们法定的职能。

销售局退出粮食定价和贸易活动领域普遍有助于提高粮食经销的效率并因而降低成本。这样还减轻了国家控制的粮食销售体系的财政负担，这在财政资源稀缺的穷国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由于取消国家对相邻区域（指国家以下级和国际两级）之间私营粮食贸易的限制所引起的更大程度空间市场的整合，也有助于降低价格和增加可利用的粮食产品的种类。由于私营贸易商更多地进入粮食和农业销售部门，目前许多非洲国家的农村和（尤其是）城市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粮食产品。从短期看，消费者易受销售自由化引起的粮价波动损害的程度有时提高了，但由于私人增加对粮食加工和经销的投资，以及由于区域间或跨界贸易（它

⁵⁴ S. Jones, 前引书, 第 8 页。

⁵⁵ T. S. Jagne 等人, “虚假的保证还是虚假的前提? 东非和南部非洲粮食和投入领域市场改革的经验”, 《世界开发》, 第 30 卷, 第 11 期 (2002 年), 第 1967-1985 页。

们有助于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和增强稳定用于玉米粉的支出的能力), 这种负面影响经常最终得以减轻。⁵⁶

主要由于利用小型锤式碾磨厂, 通过降低价格提高了私人销售的效率, 使许多国家的消费者普遍受益。⁵⁷ 对放开粮食销售(程度不同)的6个非洲国家的粮食和粮食粉价格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 其中5个国家的实际价格下降了: 马里自1982年起; 加纳自1984年起; 赞比亚自1987年起; 肯尼亚自1988年起; 埃塞俄比亚自1990年起。⁵⁸ 不过, 这些国家粮食实际消费价格下跌有着不同的原因, 包括肯尼亚、马里和赞比亚等国竞争加剧及粮食销售和加工成本降低; 和由于加纳和马里取消贸易壁垒而有利于不断下跌的实际世界价格传递到国内经济中。尽管如此, 在所有5个国家中, 私营部门更多地介入粮食经销带来的效率提高, 都有助于降低实际价格。

与此同时, 粮食市场的自由化造成了一些紧要的问题需要采取纠正性政策行动的。首先, 国家销售局退出粮食销售领域有时使粮食的净购买方更易受短期价格波动的损害, 原因是国家干预确保粮价稳定的工作曾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即使由于销售局维护官方价格的能力受到财政制约而经常限制了此种政策的效益。由于价格波动有时对农村(和城市)贫困具有负面影响, 需要采取纠正措施维持住户的粮食安全, 包括(根据经济情况调查)发放粮食配给券。

其次, 由于撤销按固定价格保证进行的官方采购, 特别是在适当的私营粮食销售体系到位前取消销售局时, 部分小型种植者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 国家销售局的撤销或精简有时中断了对小农的必要支助服务的提供。上述案例研究着重说明, 适当提供信贷⁵⁹和推广服务对于非洲的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同样, 改善基础设施——主要是道路和存储设施——对于提高粮食销售活动(由公营或私营部门开展)的效率也至关重要。已有特定的证据表明, 缺乏农村支路是多数非洲国家运输成本高和市场整合程度差的一个主要原因。⁶⁰

第三, 还有人论证说, 粮食销售改革引起的化肥补贴的取消减少了小农的使用量。这反过来对农业产出和生产力并从而对农村收入和贫困经常产生负面影响。不过,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两国的证据都表明, 补贴的化肥供应的

⁵⁶ 见 T. S. Jayne 等人, 《粮食市场改革的成功和挑战: 肯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经验》(密执安州立大学, 1999年, 密执安州东兰辛)。不过, 这些负面的短期影响表明需要采取定向行动, 例如向穷人发放食品券。

⁵⁷ 同上。

⁵⁸ T. S. Jayne 等人, 《实际粮食价格的趋势》……。

⁵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销售局(和农业银行)提供的信贷不仅享受官方补贴, 而且有时候由于农民(其中许多有着牢固的政治联系)不能还贷, 这种信贷还构成非官方补贴。

⁶⁰ 见 S. Jones (前引书, 第21-22页), 他还建议征收“道路资金”税, 专用于为穷国的道路的改善和养护提供经费。

受益者主要是商业性农场而不是小农。⁶¹ 如公共水务机构为灌溉和住户消费普遍发放的价格补贴所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规模较大的种植者（和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往往从此类补贴得到过多的实惠。⁶² 尽管如此，由于销售局在向全体农民提供（经过补贴的）投入方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降低它们的作用有时候给扩大农业产出造成障碍。

最后但决非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非洲国家在改革后时期人均粮食生产下降可能意味着，销售改革普遍不利于农业。如图七.2 所示，在本节覆盖的所有 5 个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人均粮食生产都下降了，尽管 1990 年代上半期下降的部分原因是 1991-1992 年南部非洲遭遇的干旱。此外，人均粮食生产的下降也与粮食作物改为经济作物的某种多样化做法有着部分联系，后者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尽量减少风险的战略。不管怎么说，鉴于其中多数国家市场化前的产出水平得到了国家补贴的支撑，因此，人均产出的下降未必造成福利的损失。销售局的业务基本上将维持经济效率低下的国家控制的粮食体系的成本从一个社会集团转到其他的集团，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大型（和较富裕的）种植者过多地享受了此种补贴包括投入补贴。⁶³

同样，改革对偏僻地区小农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交叉补贴是否比下述做法更可取；尤其通过国家提供更好的运输和粮食存储基础设施，为提高小农相对于较具竞争力的种植者的经济效率提供有利的环境。在进行销售改革和撤销或减少生产者补贴后，鉴于偏远地区的运输成本可能超过作物本身的价值，因此超出维持生计需要的主粮的生产对于这些地区的许多小农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路网的改善可能有助于降低成本，但销售自由化也鼓励偏远地区的种植者“改变他们的种植格局和认定具有较高重量价值比的新作物，从而能够吸收较高的运输成本。”⁶⁴ 这样，销售局退出粮食定价、采购、运输和分配领域或降低了介入程度，鼓励粮食生产更能响应需求和消费者的偏好。

⁶¹ Cooksey, 前引书, 第 71 页。也见 Omamo 和 Mose, 前引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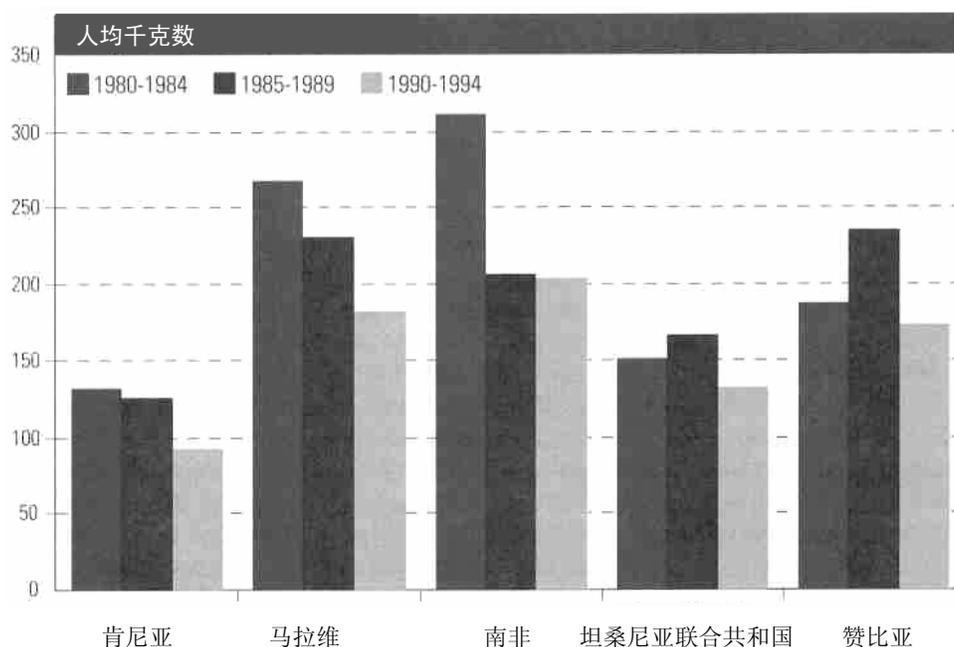
⁶² 见《199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6. II. C. 1 和 Corr. 1, 第十一章）。

⁶³ 特别见 T. S. Jayne 等人，“实际粮食价格的趋势”……。

⁶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了解和利用销售信息”，《销售推广指南 2》（粮农组织，2000 年，罗马），第 3 页。

图七.2

1980-1994 年部分非洲国家人均粗粮产出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 T. S. Jayne 和 S. Jones，“东非和南部非洲粮食销售和定价政策：一项调查”，《世界开发》，第 25 卷，第 9 期（1997 年），第 1518 页。

虽然粮食销售自由化对效率较低的农民可能具有负面影响，但恢复国家销售体制连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低下的经营效率、定价扭曲和现金的财政成本将是一种更糟的替代办法。非洲向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迈进不只是援助的限制条件造成的，也是国家销售局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和低效率的经营造成的。不过，有人担心，由于 1980 年代或 1990 年代以前许多撒南非洲国家对于面向市场的粮食体制没有什么经验，定价和销售的自由化应逐步进行。

案例研究表明，旨在减少市场不稳定性和提高粮食生产和销售效率的纠正性政府政策包括：(a) 改善农村地区的运输基础设施和粮食存储能力；(b) 向小农和私营贸易商都适当提供推广服务和信贷；(c) 向小农传播可靠的市场信息；⁶⁵ (d) 采取基于市场的措施减少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南非成立期货商品交易所的创新经验中所反映的那些措施(e) 区域贸易一体化措施，例如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支

⁶⁵ 粮农组织编制了数份有用的指南，协助撒哈拉以南的推广人员指导小型种植者和贸易商如何将市场信息最有效地用于销售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例如见“了解和利用销售”……和“玉米销售指南”……。

持的那些措施（见 A/57/304 号文件，附件）。⁶⁶ 其中有些职能在理论上被假定由销售局履行，但在实际上此类销售局干得不称职，部分原因是它们的中心注意力放在定价干预和直接粮食销售（和相关的问题）上。现在还认识到，通过定向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不是通过还有其他主要目标和经营效率往往低下的国家销售局，能够更有效（和更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目标。

最后，有竞争力（和更有效率）的私营粮食销售的发展，要求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处理潜在的市场失效、有势力的贸易商有害活动和粮食质量控制问题。由于这些职能——主要是粮食和非粮食出口作物的质量控制——部分由销售局承担，因此至关紧要的是，在销售局撤销或精简之后，其他政府机构应实施粮食质量管理。有效的管理不仅对保证出口市场，而且对确保国内粮食消费者适当标准的人体健康都很重要。法律框架的形成还应包括明确界定财产权和强制执行这些权利的合法权力。⁶⁷ 在这种背景下，如下节将要论证的那样，可以提出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加强小型种植者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作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促进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格局的一个手段。

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办法

土地改革在农村减贫中的核心作用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对就业、收入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因此，促进更有效和更公平的农业增长的政策应在农村的减贫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日益提高对在撒南非洲改善生活水准和减少农村贫困特别重要，这里大部分的穷人以农耕为生。

有关农业生产力的大量经济研究侧重于加强机械化、革命性的技术转移和提高土壤肥力等问题，但是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也能促使产量提高。发展中国家小型农场的每单位土地产量往往高于较大的农场，这主要是因为大型农场的雇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家庭劳动力，除非进行有效的监管或进行适当的奖励，而这二者的成本都非常高。⁶⁸ 例如，在巴西东北部，农场在非灌溉地上的产量提高了 10% 至 40%，而再分配给小农的灌溉地提高了 30% 至 70%。⁶⁹

1960 年代，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将土地再分配给小种植者将导致作物产量下降，但是日后的经验主义研究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家，将土地再分配给穷人提高

⁶⁶ 见 2002 年 6 月 18 日《民主、政治、经济和法人治理宣言》（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未公布），第 3 和 24 段。又见《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 111-112 页。

⁶⁷ Jones 和 Wilkrema，“界定国家的作用”……。

⁶⁸ 见 R. A. Berry 和 W. R. Cline，《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结构和生产力》（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 年）；和 A. V. Banerjee，“土地改革的前景和战略”，油印件（麻省理工学院，无日期，马萨诸塞州剑桥）。

⁶⁹ 开发计划署，《2003 年人类发展报告》……，第 89 页。

了每公顷的农业产出，至少在中长期是如此，这主要有三个原因。⁷⁰ 首先，小型农场往往每公顷使用较多的劳动力——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使用的额外劳动力——因而往往生产更多的东西。其次，如上所述，监管农场劳动力的成本随农场规模上升。第三，当小农拥有可靠的土地所有权时，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成本较低廉和期限较长的信贷——通过将土地作为抵押物——并进行农场改良和提高产出。因此，更公平的土地所有权格局往往有助于经济总量更快速及更公平的增长。⁷¹

在传统上，再分配式的土地改革以下列方式进行：(a)将不用的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村穷人；(b)征用私人占有的大片土地——有偿或无偿——经划分后分配给无地农民和无土地所有权的小农；和(c)加强小农的土地权利。在几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特别是加强小农的土地使用权或财产权，为提高每公顷的粮食产出因而也为减贫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印度，执行再分配性土地改革的邦都实现了粮食产出更大的提高和更快的减贫。⁷² 人们常常将这个国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的绿色革命联系在一起，但覆盖 1955 年至 1988 年期间的经验主义研究也表明，减贫与土地改革（主要是租赁改革）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⁷³ 印度的经验特别表明，如对土地的所有权或租佃拥有更适当的法定所有权，会鼓励小型种植者投资于土地并使他们能将土地作为担保物以进入信贷市场。

中国提供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以说明土地改革对农业增长和农村减贫的正面影响。1978 年至 1984 年土地改革期间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承包制），主要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户。⁷⁴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仍正式保持，但把土地使用权给予农户，使其报酬与产出挂钩。这有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1978 年至 1984 年期间，3 种主要作物——粮食、棉花、和油菜籽——的产出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4.8%、7.7%和 13.8%，而 1952 年至 1978 年期

⁷⁰ 关于这些因素的详尽讨论，见《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II.C.1），第五章；和 E. WagneNafziger，《发展中国的经济学》（Prentice Hall, 1997 年，新泽西州上萨德尔河），第 7 章。

⁷¹ 最近对各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鼓励措施所作的分析强调，较不公平的土地分配格局经常与较低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见 W. Easterly，《对增长的艰难探求：经济学家在热带地区的冒险和不幸遭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1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第 13 章。

⁷² 《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

⁷³ 见《2002 年南亚人力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卡拉奇）。

⁷⁴ 见《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 144 页。

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2.4%、1.0%和 0.8%。⁷⁵ 同样，1949 年至 1978 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 3.9%，1978 年至 1986 年此种增长率提高到了 13.1%。⁷⁶ 虽然 1980 年代生产力和收入的此种巨大增长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扩大灌溉农田，但在农业扩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土地改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导致的农村贫困的下降最终归因于“土地平等分配、良种、灌溉面积扩大和农产品价格受控力度减小的合并影响”。⁷⁷

在越南，通过土地再分配和市场自由化实现的农业产出的迅速增长，被认为是该国 1990 年代减贫工作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⁷⁸ 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始于 1980 年代末，当时准予长期的土地租赁，取消了价格管制，并逐步取消了对农业贸易的限制。1993 年的一项法律允许土地持有人出售、出租和继承土地和用作担保物。还允许私人拥有以及买卖农业机械和耕畜。这些改革使得私营土地市场得以发展和农业最终私有化。特别由于将集体耕地分配给小规模生产的农民，提高了占有权的安全度，因此促成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多样化，主要是改种具有巨大出口潜力的经济作物如大米和咖啡。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土地改革导致 1993 年至 1998 年期间专种（产量较高的）多年生作物的总面积大幅度增加。⁷⁹

根据越南非集体化方案实现的土地财产权的加强，可被认为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土地改革，因为它导致了私营土地市场的发展。占有权改革基于这样的认识：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为小农提供一种可靠的财产权制度，以鼓励进行投资和便利获得信贷。在土地市场的运作不能令人满意和不能强制执行土地重新占有的情况下，形式上的土地所有权往往不能作为担保物。⁸⁰ 土地的可靠拥有——表现为所有权或长期租用——也往往减少无地农民对工资低微和动荡不定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依赖。

⁷⁵ Fu Chen, L. Wang 和 J. Davis,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 第 2 期 (1998 年), 第 122-137 页。承包制成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 但作者们认定了几个机构薄弱环节并提出了加强土地使用权或财产权的措施。也见 J. M. Zhou, “中国土地合并和扩大的主要形式”, 《土地改革》, 第 1 期 (2000 年), 第 89-107 页。

⁷⁶ 见联合国大学, 《中国经济发展对农村妇女的影响》(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92. II. A. 2)。

⁷⁷ 《2001 年农村贫困报告》……第二章, 第 28 页。也见第三章。按照这份报告,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统计指数从 1978 年的 33.0 降至 1990 年的 11.5 和 1998 年的 4.6 (见表 2.1)。

⁷⁸ 例如见《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发展报告》, 方框 1、3 和世界银行, “越南, 履行它的诺言”, 《2003 年发展报告》, 第 25050-VN 号 (世界银行, 2002 年 11 月, 华盛顿特区), 第 45-50 页。

⁷⁹ 见 Q. T. Do 和 L. Iyer, “土地权 and 经济发展: 越南的证据”, 油印件 (麻省理工学院, 2002 年 7 月, 马萨诸塞州剑桥坎布里奇)。

⁸⁰ 见 H. de Soto, 《资本的神秘性: 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得胜而在其他地方失败》(Basic Books, 2000 年, 纽约), 他论证说, 财产权的正式承认将使当前非正式持有的财产可用作担保物并从而释放出穷人“隐藏的”资本资产。

土地占有权改革特别适合于拥有大量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劳动力或耕种国有土地的小农的国家。在拥有大片适合农业的未用国有土地的国家，也能利用面向市场的土地改革来安置无地农民或无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相形之下，拥有大量无地农民——或无土地所有权的小农——而且其多数可耕地为地主私人正式所有的国家，经常采取强制措施再分配此类土地。强制性土地改革正常情况下与无补偿的征用联系在一起，但土地的再分配也能够以低于市价的强制性购买为基础。

例如，日本是当代世界成功实施这种土地再分配的首批国家之一，它是在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实施的。在该方案中，国家发挥了核心作用，将大型土地所有人拥有的土地分成若干等份后再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小农归其个人所有。政府还执行一系列补充政策，包括向小农适量提供信贷和推广服务。较有争议的措施——例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进口壁垒——也有助于该国土地改革取得成功。由于许多新的（小规模）土地所有人原本是改革前就种地的佃农，因此方案的执行因下述情况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受益人拥有业经证明的能力耕种（和甚至管理）他们所分得的农场。

日本的首创方案不同于其他强制类型的土改——主要是与广泛的政治动乱联系在一起的那些⁸¹——因为政府征用土地至少给予原来的土地所有人以部分的补偿，“它按名义价格将田地再转让给已在上耕作的小型分成佃农”。⁸² 日本的土地再分配方案有助于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和小农的收入。⁸³ 因此，成功的土地改革方案——有时甚至是国家控制的方案，如在日本那样——能够导致经济总量更快增长和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收入分配更加公平。⁸⁴

虽然类似于日本执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后来被成功地移植到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但其他形式的土地改革被更广泛地用于发展中国家，从比较激进的强制性办法到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都有。本节的其余部分侧重介绍后一种办法。

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案例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强制性土改形式——主要是无偿的土地征用——带来的问题，对基于市场的土改的关心增大了。首先，因为土地征用与私有财产

⁸¹ 在过去，多数（强制性）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与社会政治动乱或殖民统治的消亡联系在一起。见 H. Binswanger, K. Deininger 和 G. Feder, “农业土地关系中的权力、扭曲、叛乱和改革”，载于《发展经济学手册》，第三卷，J. Behrman 和 T. Srinivasan 合编（纽约，Elsevier, 1995 年），第 2659-2772 页。

⁸² M. G. McDonald, “日本的农业土地持有情况：土改后的五十年”，《地理论坛》，第 28 卷，第 1 期（1997 年），第 58 页。

⁸³ 《2000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 139 页。

⁸⁴ 然而最近的研究说明了日本的首创性土地改革方案的长远问题，包括土地分割造成的较低效率到非农场经济扩大的政治障碍。例如见 M. G. McDonald, 前引书和 J. M. Ehou, 前引书。

权的保护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它往往破坏私人投资，甚至破坏“对经济的国际信心”。⁸⁵ 此外，土地所有人和其他地方精英经常利用政治权力削弱强制性土地再分配方案的执行。对这些方案的没收性的反应导致有势力的土地所有人通过各种法律或其他手段拖慢它们的执行，包括细分他们的土地避免征用或拿出不适合农业的地块用于强制性购买。⁸⁶ 反过，对征用的抵制经常导致政治不稳并导致各国政府作出更激烈和不民主的反应。

其次，各国政府有时候企图实行强制性的土改作为应对眼前的社会政治压力而不是作为长远的农村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例如，政府经常在开展组织严密和政治上活跃的土改运动的区域作出再分配土地的努力。⁸⁷ 因此，此种努力往往无视经常组织涣散的最贫穷农民的需要。此外，安抚最活跃的农民组织的努力可能为政治操纵、受益人和征用地块的不适当选择和甚至社会冲突的加剧开辟道路。⁸⁸

第三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改革方案变得效率低下，因为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中央政府一级土改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当土地为了投机目的而不是生产目的进行分配时，政治干预也会促成破坏土地再分配和土地利用效率下降。例如有人论证说，这是肯尼亚所作尝试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在 1954 年期间企图用非洲人向欧洲人购买土地的新制度取代殖民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虽然在中西部的高原上将大片的土地转移给了非洲人，“但政治领导层将多数土地再分配给了自己、盟友和委托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农耕的经验”。⁸⁹

同样，还可以论证，强制性的土改往往受供应驱动并因而导致经济效率更加低下。⁹⁰ 这一方面很重要，因为强制性的土改开始时通常先认定用于征用的农业用地，然后再寻找潜在的无地受益人接受这块土地并安置下来。如果征用生产性农场（相对于利用程度不足的土地而言）并给予缺乏成为有效生产者的知识和手段的定居者或由国家分配环境脆弱的土地，就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即使在小

⁸⁵ K. Deininger 和 J. May, “存在着公平增长的空间：南非的土改情况”，油印件（世界银行，2000 年，华盛顿特区）。

⁸⁶ 例如见 A. de Janvry 和 E. Sadoulet, “对抵制机构变革情况的研究：拉丁美洲土地改革的败局”，《世界开发》，第 17 卷，第 9 期（1989 年），第 1397-1407 页。

⁸⁷ K. Deininger, “使谈判达成的土改发挥作用：哥伦比亚、巴西和南非的倡议”，《世界开发》，第 27 卷，第 4 期（1999 年），第 651-672 页。

⁸⁸ 见联合国国际发展司（发展司），“改善穷人的生计：土地政策的作用”，磋商文件（发展司，2002 年 11 月，伦敦）。

⁸⁹ E. Wayner Nafziger, 前引书，第 194 页。

⁹⁰ 见 S. M. Borras, “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更好地了解市场引导的土改：侧重分析巴西案例”，《土地改革》，第 33 卷，第 1 期（2002 年），第 32-50 页。

农型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国家机构也不能有效地瞄准利用程度不足的土地和实现提高经济效率的预定目标。⁹¹

最后一并可以论证是最重要的一的问题是强制性的土改方式经常扭曲土地市场的运作。(可耕)土地市场两个最有用的功能是允许效率较高的生产者购买或增加土地占有量，反过来说是允许效率低下的农民退出农业领域。结构性障碍妨碍农村穷人通过市场得到土地，但证据也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机构利用管理工具限制(而不是促进)土地的利用、销售和租赁，作为强制性土地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⁹²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土地租赁市场往往比较有利于农村穷人……允许他们获得土地”，原因是交易成本较低而且更有机会减少农村穷人面临的市场失效。⁹³

当强制性土地改革方案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大型土地所有人与小农或无地农民之间制造或加剧社会经济紧张关系时，它们往往使社会冲突升级和破坏农业发展，就如巴西、菲律宾和津巴布韦部分地区的情况那样。不过，有几种非强制性的替代办法可以改进土地的分配——不求助于征用私人持有的土地——也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减少农村贫困。这包括：(a)分配在环境上不脆弱并且非不适合农业的未用的国有土地，(b)实行累进土地税以阻止为了非生产目的长期拥有大片土地，和(c)实行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

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可能特别适合于这样的国家：未用的国有土地极少而且拥有大量无法对(可耕)土地权利提出令人满意的权利要求的无地农民和小农。它的主要创新点是使受益的农民能够从国家机构领取赠款，以便按市场价格从自愿卖主那里购买土地。这种“愿卖愿买”的做法明显不同于土地征用，因为它能够鼓励土地所有人出售闲置的土地并为无地农民的非法占有提供一种替代办法。

因此，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求驱动型，因为它涉及愿买方——一开始接受政府赠款的援助——与市场上的土地卖方之间的自愿交换。不是依靠政府来决定谁将受益于征用的土地——有时候基于政治原因——而是由潜在的受益人自己在市场上“竞争”可用的土地。最想得到土地和为耕种作出最充分准备的潜在受益人可能比其他部分农民更能通过筛选过程获得政府的赠款。鉴于技术最熟练的潜在农民可能比对农耕不关心或知识极少的人更能获得土地，因此这将导致不仅提高针对性而且能够提高生产力。

⁹¹ Deininger 和 May, 前引书, 第 20 页。

⁹² 见 A de Janvry 等人, “土地的获得和土地政策改革”, 载于《土地的获得、农村贫困和公共行动》, A. de Janvry 等人合编(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联合王国牛津)第 1-26 页; 和 K. Deininger 和 H. P. Binswanger, “世界银行土地政策的演变: 原则、经验和未来的挑战”, 《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 第 14 卷, 第 2 期(1999 年), 第 247-276 页。

⁹³ A. de Janvry 等人, 前引书, 第 15 页。

这种办法意在从供需双方刺激农村土地市场的运作。从供应方看，它鼓励土地所有人减少（利用不足的）农田的持有量，这一点可通过实行累进土地税制和其他财政机制而进一步增强。从需求方看，它向贫穷的小农或具有农耕经验的农村劳动力提供政府赠款以通过市场购买土地。为了增强潜在受益人的讨价还价地位和减少交易成本，鼓励受益人参加为了这些目的而成立的社区组织。这些组织有时与地方政府或愿意向受益人提供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合作，能够帮助筛选申请人，代其洽谈购买事宜和提供后续技术援助。

几个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南非，试行了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由于南非执行得最为深入，下节将审查它采用这种创新性土改办法的经验并评估这种办法作为强制形式土改的替代办法的效果。

南非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

如多数撒南非洲国家一样，南非农村（相对于城市）地区贫困的发生率高得多。如表七.1所示，1995年71%的农村居民被划分为穷人，而城市居民的比例是29%。此外，户主为女性的农村住户比男户主住户更可能受穷：估计数表明，2000年女户主住户占到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贫穷总户数的77%。⁹⁴ 这种情况部分可用存在着较发达的非农业部门——主要是采矿和制造业——作解释：该部门鼓励农村成年男子移居城市和采矿地区，将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地区。⁹⁵

南非的贫困不仅同性别联系在一起，而且同种族密切相关：1990年中期，60%以上的南非黑人是穷人，而白人只占1%（也见表七.1）。南非贫困的这种种族相关的特点及农村特点的原因中许多可以追溯到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不准南非黑人在仅占全国面积不足15%的所谓“家园”以外的地方拥有或租用土地。1997年，至少有90万个黑人住户生活在以前的“家园”而得不到可耕地，而且据估计在1990年代末80%以上的可耕地仍为白人农场主所拥有。⁹⁶

为了处理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格局，南非政府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执行一项广泛的土改方案。这个方案包括3个主要组成部分：(a)归还或补偿由于殖民主义或种族隔离政策而使黑人公民失去的土地；(b)将白人所拥有的耕地重新分配给黑人农民；和(c)实行土地占有制改革以便更可靠地利用在前“家园”的土

⁹⁴ M. Aber, “南非的慢性贫困：发生原因和对策”，《世界开发》，第31卷，第3期（2003年），第473-490页。

⁹⁵ 在许多非洲国家，也存在机构障碍阻挠妇女获得土地所有权。例如见非洲开发银行，“实现非洲千年发展目标：进步、前景和政策影响”（未发表，2002年6月）。

⁹⁶ 见 M. Aliber, 前引书，第480页；和 J. Kirsten、S. Perret 和 J. van Zyl, “南非的土地改革和新的水管理背景：原则、进展和问题”，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政策专题组研讨会编写的文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0年9月）。

地。⁹⁷ 鉴于大量的黑人住户希望获得土地但缺乏所需的单证或没有资格参加归还部分或保有权部分，再分配成为该国土地改革的主要支柱。政府为土地再分配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在 1995 年至 1999 年期间（自愿）转让几乎 3,000 万公顷的农田，即全国可耕地总面积的 30%。

表七.1

1995 年南非的贫困情况

指标	人数 (千)	人口比例 (百分比)
全国贫困情况	19 700	49.9
农村地区贫困情况	13 700	70.9
城市地区贫困情况	6 000	28.5
黑人人口中的贫困情况	18 300	60.7
白人人口中的贫困情况	44	1.0

资料来源：K.Deininger 和 J.May，存在着公平增长的空间：南非的土改情况，油印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0 年）。

为拟订一个土地再分配方案作出了特别的努力，该方案避免了上述与强制形式土改有关的问题，主要是征用、低于市场价格的强制性购置和土改官僚机构的扩大。因此，更加注重援助潜在的受益人包括在种族隔离期间被逐出的无地农民通过土地市场的发展购买土地。这种创新的土地再分配办法基于政府提供一笔赠款——称作安置和土地购置赠款（安置和购地赠款）——使农村住户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可耕地。安置和购地赠款原先等于国家住户方案规定的最大补贴，即 1.6 万兰特（目前相当于大约 2,000 美元）。赠款只发放给月收入低于 1,500 兰特的潜在受益人。

潜在受益人可以使用赠款购买私人所有人报价的土地，只要购买的土地用于农业，例如种植经济作物、牧草或甚至用来提高农户粮食消费量的维持生存的农耕。例如，大型土地所有人可以下述方式起动交易，即将一个商业性农场的一部分划分为小块土地以根据该方案出售。此外，地产开发商可以购买可耕地（用私人资金而不是政府赠款），建造基本的基础设施，将它划分为小块土地并随后根据该方案出售给受益人。要不由潜在受益人负责设计自己的项目，不过他们可以使用赠款资金为此目的雇请顾问。

⁹⁷ 关于这个综合性的土地改革方案的详情，见 L.Cliffe，“南非的土地改革”，《非洲政治经济评论》，第 84 期（2000 年），第 273-286 页；和 M.Aliber，前引书。

在实践中，受益人经常组成集团以便集体获得赠款，设计项目和购置土地。在政府于 1996 年颁布《共同财产协会法》后，这种集体行动特别受到鼓励。本法建立了有关机制，为代表无地公民团体购买土地的社区倡议提供经费和便利。不过，在向这些社区倡议提供援助方面如果国家干预的力度出乎预料，将对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方案的执行具有负面影响。政府为执行土地改革方案而建立的土地事务局（土地局），在动员社区协会代表潜在受益人获得可用于购买土地的不同类型赠款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土地局处理提议的项目的家长式做法拖慢了方案的执行速度：据估计，它批准一个项目平均要花两年时间。⁹⁸

因此，土地再分配方案未能避免强制性方案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过程，公营部门试图在其中包办一切”。⁹⁹ 方案执行中官僚主义的拖延特别应对未能实行土地再分配的目标负责。1995 年至 2000 年，全国商业性农田中不到 1% 是由私人土地所有人情愿根据方案出售的：涉及 0.6% 或不到 6 万个受益人，另有 0.3% 是以市政公地的形式。¹⁰⁰ 这种令人失望的土地转让速率也与阻碍穷人参加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些阻碍因素包括：(a) 不能用政府赠款支付的预付费用，(b) 与现代耕作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制约因素，(c) 某些群体的无地农民和无土地所有权的小农地域流动性低，和 (d) 成功进行小规模农耕所需的农村服务和推广服务提供程度不足。¹⁰¹

不过，由于转让的土地大多用于种植和其他农业目的，1990 年代下半期交割率低的问题减轻了。¹⁰² 1999 年闲置的面积不足 5%（见图七.3）。这种情况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降低为了投机目的而保持农田的刺激性，而且成功地瞄准较好地准备为生产性目的利用再分配的土地的小农和无地农民。此外，相当比例成功的受益农民还能够（集体）获得补充的私人贷款。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两个：(a) 它证明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受益人能够获得政府赠款以外的信贷来源，和 (b) 它鼓励私营放款人帮助加强筛选过程以便确保最合适的申请人购买再分配的土地。还有迹象表明该方案成功地普及到了农村穷人；1999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土地改革受益人在国家贫困线之下。¹⁰³

⁹⁸ Deininger 和 May，前引书，第 24 页。

⁹⁹ 见 Kirsten、Perret 和 van Zyl，前引书。

¹⁰⁰ M. Aliber，前引书。由于根据市政公地计划，土地所有权属于市政当局，提供给低收入的住户，主要用于放牧它们的家畜，因此特别难以量化受益人的实际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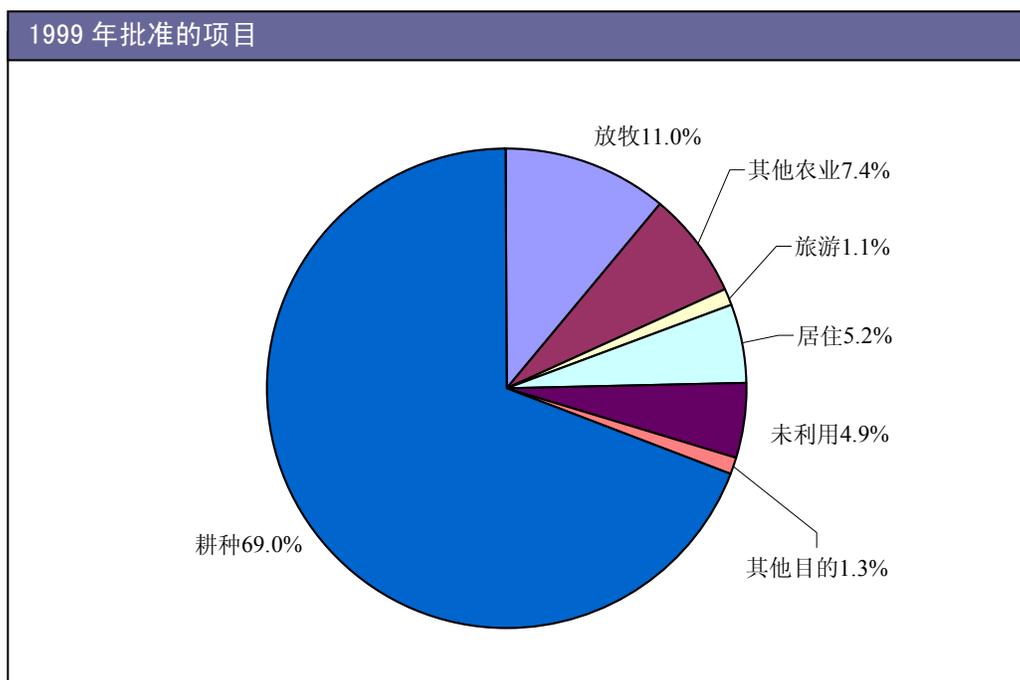
¹⁰¹ 见 F. J. Zimmerman，“穷人参加南非土地再分配的障碍，”《世界开发》，第 28 卷，第 8 期（2000 年），第 1439-1460 页。

¹⁰² 虽然这通常是土地再分配方案——基于市场的方案和国家控制的方案——的一项要求，但在实践中，大片的再分配土地经常最终落入没有农耕经验的投机者手中。

¹⁰³ Deininger 和 May，前引书，第 14 页。

图七.3

按使用类型分列根据南非再分配方案转让的土地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南非土地事务局提供的数据（如 Cliffer 所提及，“南非的土地改革”，《非洲政治经济评论》，第 84 期（2000 年），第 281 页）。

此外，在改善小农获得灌溉水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是土地改革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先决条件。1998 年《南非国家水法》承认水必须用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实行了一系列创新措施以解决国家水资源利用格局高度不公平的问题，包括加强水用户协会和小农灌溉计划。¹⁰⁴ 虽然存在着过去种族隔离的水资源政策产生的转型难题，但该法中拟订的新的水政策可能是“在农村地区实现公平、减贫和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¹⁰⁵

而且，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是在该国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相关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国家机构退出农业销售活动和从国家控制的价格转向由市场确定的定价，就如上述南非期交所市场所说明的那样。它还包括减少或取消造成农业部门扭曲的对商业性（白人所有的）农场的投入性补贴。这些补贴促成南非专注于低价值作物（例如小麦）的生产，而不是“鉴于该国优越的自然条件

¹⁰⁴ 见 S. R. Perret, “南非的水政策和小农灌溉计划：历史和新的机构挑战”，《水政策》，第 4 期（2002 年），第 283-300 页；

¹⁰⁵ 特别见 Perret, 前引书，第 298 页。

专门从事人们预期的高价值作物和农业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¹⁰⁶ 此外，还对金融机构包括农村金融代理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并对物质及社会基础设施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主要是农村道路、学校和医院。促进宏观经济和部门自由化的这些补充经济政策对于该国实行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广泛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与土地交易笔数的增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种族隔离期间每年平均有 4.5% 的可耕地易手，但在 1997 年和 1998 年，这一数字均提高到了 6% 以上。¹⁰⁷

尽管如此，到了 1990 年代末，情况变得清楚了：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加速土地的再分配和向已经根据方案重新安置的农民提供更有用的推广服务。人们日益认识到，土地方案在经济上的长期可行性要求采取新的措施为小规模商业性农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简化方案的执行。2001 年推出了经修订的基于市场的方案，题为“土地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其中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调整，现简述如下。¹⁰⁸

为了提高土地再分配的速度和减少官僚主义的拖延，下放执行工作。现在由县级官员协助申请人编写项目建议，同时由省（而不是国家）一级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批准这些项目建议。因此，受益人现在可加入方案，从情愿的卖方那里购买土地，并比原先方案更快地获得土地所有权。通过加快利用不足的土地向小农的有效转让，修订的方案预计会加速农业产出和收入的增长，从而有助于农村的减贫工作。

最重要的调整是现在所有受益人都必须缴款——现金、劳动和（或）实物——以便获得赠款。最低的赠款金额要求个人最低缴款 5 000 兰特（按 2003 年汇率为 650 美元）。按滑动费率向受益人提供更多的赠款金额，根据他们的缴款多少确定（见表七.2）。随着赠款金额和缴款金额增加，赠款占项目总费用的比例缩小。赠款和缴款都按住户计算。如果受益人决定集体申请，个人缴款和赠款总金额都按团体代表的住户数据比例调整。

方案继续专注于实现土地所有权（在黑人与白人土地持有人之间）更公平的分配，但个人缴款的实行不仅在于加强受益人对其项目的承诺，而且在于增加每个受益人的平均赠款额（从而增加个人缴款额）。这可能使部分潜在（很穷的）申请人更难获得政府赠款。因此，个人缴款机制意味着，修订后的方案更加面向打算建立或扩大中小型商业性农场的农民而不是没有任何资产的贫穷的无地农民。因此，有人担心最贫穷部分的农民将因缴费而被挤出修订后的土地再分配方案。例如，对修订后的方案进行的初步分析认为，“以需求引导的配给计划造成

¹⁰⁶ Deininger 和 May，前引书，第 6 页。

¹⁰⁷ 同注 106，第 7 页。

¹⁰⁸ 关于经修订的方案详情，见 Kirsten Perret 和 Van Zyl（前引书）。

的一个明确的危险是，农村人口较富裕的部分将证明更倾向于参加并因而将是主要的受益方，而较穷的部分将基本被拉下而享受不到方案的好处”。¹⁰⁹

评估经修订的方案对南非的农村减贫工作是否有重大的正面影响将为时过早。然而明显的是，通过增加获得（不同金额）赠款的选择方案，借助于建立更多数目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有竞争力的中小型农场，经修订的方案应促进长远的结构变化。预计准备最充分的受益农民也将更具生产力地利用分到的土地。

表七. 2.

南非土地再分配、赠款和个人缴款的滑动费率

政府赠款 (兰特)	本人缴款 (兰特)	每个住户的 项目总费用 (兰特)	赠款份额 (百分比)	本人缴款份额 (百分比)
20 000	5 000	25 000	80	20
40 871	35 000	75 871	54	46
68 888	145 000	213 888	32	68
100 000	400 000	500 000	20	80

资料来源：J.Kirsten、S.Perret 和 J.van Zyl “南非的土地改革和新的水管理背景：原则、进展和问题”，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改革专题组研讨会编写的文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0年9月），第10页。

由受益人缴纳现金意味着，新的土地所有人现在将有更大的积极性对土地进行最具生产力的使用以使个人投资获得最大的回报。项目总费用的最低缴款还将有助于将想轻易获得财富转移但无意耕种再分配的土地的申请人筛选出局。因此，批准项目中未加利用的土地的份额甚至有可能降到原始土地再分配方案所取得的5%的数字以下。此外，通过促进中小型商业性农场的增长，预计方案还会鼓励私营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补充的（私人）贷款更多地介入项目的执行。这将不仅增强受益人对保证农场取得成功的承诺，而且鼓励私营放款人加强筛选过程并在项目开工后对它们进行独立监测。

鉴于小规模受益人经常将利用不足的农田转向生产目的，经修订的方案意在提高农业产出，刺激农村收入增长—主要是受益人的收入—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确保小农提高农业产出和生产力，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能够间接推动农村地区的增长和更公平的农村发展格局（主要对于白人和黑人农民）。不过，它不能自动地消灭农村的贫困。为了尽量提高其功效，经修订的方案象所有形式的

¹⁰⁹ F. J. Zimmerman, 前引书, 第1441页。

土地改革一样，也需要以更好的基础设施例如农村道路作为补充，提供农业支持服务和为它的执行提供适量的资金。

有时人们论证说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实施将因它的费用而受到阻碍，南非原始土地再分配方案的年度资本支出在高峰财政年度（1998/1999 年度）只相当于政府年度预算总额的 0.2%。¹¹⁰ 虽然这种较小份额的政府支出也可能与原始土地再分配方案差强人意的执行速度有联系，但提供例如支持经修订的方案下 4 万个小规模受益人所需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年度支出将不到 2001 年政府一般支出的 1%。¹¹¹ 因此，除了提供政府赠款外，提供基础设施和支农服务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算所力所能及的。需要的是应具有政治意愿更优先地在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战略之内进行再分配性的土地改革和投资于支持土地再分配受益人的活动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其目标是将许多农村人员转变为土地所有人。

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评估

人们日益认识到，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能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强制性土改形式的一种有用的替代办法。基于市场的土地方案的执行可能会因暂时的问题而放慢速度，但南非的经验证明，能够对这种类型的土改进行调整以应对此类问题而不在土地和农业市场的运转中损害向提高经济效率转移的工作。基于市场的计划的计划的政治化程度也往往比强制性办法低得多。¹¹²

与此同时，如果瞄准具有农业技能和至少拥有一些金融资本储备的受益人，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办法可能会得到更有效的贯彻执行。因此，通过鼓励农民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获取可耕地，基于市场的方案因而能够提高农业效率（在可耕地比较稀缺的国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产出和农村收入。此外，基于市场的计划经常有助于发展土地市场和使收入较低的农民更有机会获得土地，即使最贫穷的农民在参加这些计划的过程中遇到困难。

由于对提高生产力的这种关注，农民中最贫穷（和竞争力最低）的部分参加像南非这样的计划可能会有困难。因此，基于市场的方案本身不可能转移足够的土地以满足具有耕种愿望和能力的全体农村穷人的需要。当各国选择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办法时，国家仍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必决定哪些地块易手。在这方面，各国政府需要：（a）制定选择受益人的标准；（b）保留环境上不适于农耕

¹¹⁰ 见 A. V. Banerjee, 前引书, 第 31 页; 和 M. Aliber, 前引书, 第 486 页。

¹¹¹ 见 Kirsten、Perret 和 van Zyl, 前引书。这一估计包括供水和环境卫生、电力和农村道路, 以及卫生和教育。按此速率, 需要花 11 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安置 1997 年生活在“家园”的多达 90 万无地住户中的一半住户。“一般政府支出”用语的用法同《2003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界定（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¹¹²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类似的倡议遭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土地或革命运动的激烈反对, 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

的地区；(c) 为购买土地提供赠款和贷款；(d) 提供推广服务和更好的运输基础设施；和 (e) 考虑执行补充政策以普及到不能从现行方案中受益的无地农民。当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成为一项更广泛的农村发展和减贫战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时，它能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基于市场的土改在如南非这样未用的可耕地极少和拥有许多无地农民和对土地权利提不出明确的要求的小农的国家特别有用。因此，南非的土改经验能够对土地分配格局高度不平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撒南非洲而且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具有相关性。例如在南部非洲，基于市场的土地计划至少在有限的程度上可以在像马拉维和纳米比亚这样急需进行土改的国家执行，而且能够为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提供一种冲突性较少的选择办法。¹¹³ 在像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共和国这样的其他国家——这里有大片适合于农业的未利用的国有土地——小农发展需要土改措施的程度不如需要信贷、推广服务和改善的农村基础设施的程度。

结论意见

在过去的 20 年中，许多穷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除了证明普遍不能有效地确保持续的农村经济增长外，国家对农业部门的某些类型的干预还造成了经济效率低下和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此外，双边和国际捐助方或放款机构已变得日益不愿或不能提供资金以支付国家对农业生产和销售进行直接干预及维持低效率的土地利用政策的不断增加的成本。这导致更加强调基于市场的办法以提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和成本回收率。不过，这些办法在农村减贫方面产生了混杂的结果。因此今后主要的挑战是执行各种纠正措施以解决土改问题，同时不断提高效率，降低销售成本和保持基于市场的改革办法产生的财政节约。

因此，必须将今后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巩固或加强粮食销售改革的努力更好地纳入注重住户粮食安全和扶贫的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战略。不过，至关紧要的是应设计和利用各种替代手段，以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粮食销售局长期追求的粮食安全目标。改革应当将提高粮食销售体系的效率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实现一些有争议的目标，例如支撑低效率的农民，长期以来这种做法与粮食销售局业绩令人失望（和最终消亡）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案例研究表明，薄弱的运输基础设施和销售农产品的高运输成本给成功实施销售和土地改革都造成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对粮食销售的干预应放弃独家垄断的做法和定价工作，改为努力提供有助于提高销售效率的有利环境，这将包括改善运输基础设施，提高粮食存储能力和发展农村市场。增加准入农村市场的机会能够为提高农村穷人的收入并从而为消除农村贫困的斗争作出重大的贡献。

¹¹³ 实际上，有人提出了有关打算造福马拉维 1.5 万至 2 万农村住户的基于市场的计划的建议。

只有大大增加农村穷人获得可加利用的生产资源——在穷国，其中最重要的仍是土地——的机会，他们才将能够大幅度增加收入。虽然土地再分配只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几种选择方案之一，但人们日益认为它在土地所有格局高度不公平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南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现在人们广泛认识到，在减轻农村地区的贫困和促进更公平的增长格局的努力中，土地再分配能够发挥紧要的作用，但由于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强制形式土地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日益关心基于市场的土改办法。南非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开创性经验证明，这种办法的灵活性足以应对各国特定的问题而不损害发展土地市场、提高农业经济效率、提高农村收入和实施农村减贫的努力。

由于土地再分配能对减贫作出重大的贡献，因此不能将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视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办法，将它与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促进农村综合发展的其他政策割裂开来。基于市场的土地改革的成功尤其取决于执行促进农村发展和小农农业的补充措施。此类措施必须尤其处理以下各个问题：提供信贷，提供推广服务，传播合适的农业技术，获得灌溉水和改善运输基础设施等。因此各国政府在促进农村发展格局更加公平方面仍可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指确保有效的管理，而且指在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战略的背景下为增加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

如在其他部门一样，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举措可能产生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甚至可能意味着收缩某些经济部门。不过，基本的目标必须是增加整个经济的就业和生产，从而提高总体的生活水准和减少贫困。如何减少农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求制定一套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提倡基于市场的粮食销售和土地再分配办法是可能有益的两项此类政策。

第八章

转型经济体与贫困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多数前东欧中央计划国家和前苏联已基本完成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²不过，其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恢复和超过改革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实现转型使人们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出现前所未有的增加。在 1990 年代，转型经济体区域是世界上总体生活水准下降的唯一区域。本章侧重分析转型经济体中一些与政策相关的关键性贫困问题。本章尝试回答的主要问题有：什么原因造成转型经济体中贫困现象引人注目的增加？转型经济体贫困的性质是什么？不同转型经济体贫困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何在？转型经济体各国政府和个人如何应对贫困？用什么办法能够使这些应对战略取得更大的成功？

东欧各国始于 1989 年，前苏联各国始于 1992 年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贫困大幅度增加。按每天依靠不足国际价格 4 美元为生的人数衡量，在改革开始前即 1989 年，该区域的穷人数为 1 360 万，占人口的 4%，其中 650 万在当时苏联的中亚共和国，360 万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360 万在巴尔干半岛，中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和波罗的海各国各 10 万。到 1993—1994 年度，该区域穷人总数为 1.192 亿，其中 8 320 万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1 190 万在中亚共和国，1 290 万在巴尔干各国，300 万在波罗的海国家，40 万在中欧。³

这些数字表明，实行中央计划历史最长的国家和地区，即俄罗斯联邦和沙皇俄国的其他地区，与中欧各国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相比，无论转型前还是转型后，贫困率都高得多。中欧各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迫采用中央计划体制。它们原比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富裕，并保留了一些能使得较易实施市场经济的机构。如果不实行中央计划体制，它们本将是像西方邻国一样的发达经济体，并几乎肯定提早许多年成为欧洲联盟（欧盟）的成员国。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先进程度低于中欧各国，而波罗的海国家属于前苏联最富裕的共和国之列。因此，不能将不同转型经济体相对贫穷的状况一概认为是出人意料的事情。不过，某些观察家——以及该区域许多居民——始料未及的是，转型非但

² 本章中将转型经济体区域理解为包括 30 个国家，其中包括 15 个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3 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2 个成员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2003 年 2 月 4 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可以注意到，“东欧”指除独联体成员国以外的所有转型经济体，因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

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区域局，《转型中的贫困》（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8. III. B. 27），第 15 页，图 1.8。这些数字基于按购买力平价计每天 4 美元的贫困线。

不是只持续数年时间和一旦摒弃中央计划的低效率就会较快地提高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准，而且实际上造成许多国家大规模的贫穷化。苏联的一些地区尤其如此，它们不像波罗的海各国那样，没有近代史上独立的经验，也没有为获得独立和放手在日益受制于市场力量的世界经济中运作将要造成的冲击做好准备。

表八.1 表明，在 1990 年代晚些时候，按每天依靠不足国际价格 1 美元为生界定的绝对贫困的比率在东欧各国仍低于 2%，但罗马尼亚除外，如果不计阿尔巴尼亚，2001 年罗马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是该区域的。按每天 2 美元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贫困率比其他东欧国家高得多。不仅从人均收入看这些国家比确定 2004 年加入欧盟的国家更穷，而且它们仍未从转型的衰退中完全恢复过来。这样，在波兰 200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 1989 年水平近 30% 的同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低 10% 以上。

除了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成员，到 2002 年没有一个超过 198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按每天依靠不足 2 美元为生的人口百分比计算，独联体国家的贫困率比东欧高得多。独立体国家应对贫困中面临的问题与东欧各国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数量级：它们必须恢复转型前的产出水平并确保社会较贫穷的成员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本章的很大部分分析将关注独联体国家而不是东欧各国。

转型经济体贫困率上升前发生的冲击主要是政治因素造成——苏联先是对中南欧名义上独立的国家随后又对苏联内部各共和国的控制瓦解。这些政治因素有着经济根源——与市场经济体系相比，中央计划体制在提供这些国家公民实际想得到的货物和服务方面表现糟糕。拆除中央计划体制和建立市场体系必然导致冲击，历史学家将继续讨论各个国家采取的步骤是否尽量减少破坏和尽量增加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各国通向市场的路线差异巨大，在转型的初期，这条路线有几个共同的要素，下文对此作一分析。这些要素是：(a) 改革衰退，随着人浮于事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减少就业人数，这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下降；(b) 恶性通货膨胀，它使人民的储蓄大幅贬值并导致降低许多转型经济体的实际工资；(c) 各社会群体、区域和经济部门之间收入不平等加剧；和 (d) 苏维埃时代的社会保护系统解体。此外，在该区域几乎半数国家中，人民因内乱和族裔冲突而遭受了严重的收入损失。鉴于在转型前转型经济体很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本来相对较低，上述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将他们推到贫困线以下。当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时，就更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表八. 1.
1992-1999 年转型经济体的绝对贫困率

国家	调查年份	每天低于 1 美元的人口 (百分比)	每天低于 2 美元的人口 (百分比)	2002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1989 年:100)
东欧				103.4
阿尔巴尼亚		113.9
保加利亚	1997	<2	21.9	82.9
克罗地亚	1998	<2	<2	86.4
捷克共和国	1996	<2	<2	105.8
爱沙尼亚	1998	<2	5.2	93.6
匈牙利	1998	<2	7.3	111.7
拉脱维亚	1998	<2	8.3	80.6
立陶宛	1996	<2	7.8	74.1
波兰	1998	<2	<2	129.6
罗马尼亚	1994	2.8	27.5	87.4
斯洛伐克	1992	<2	<2	108.7
斯洛文尼亚	1998	<2	<2	117.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78.5
独立国家联合体				68.0
亚美尼亚	1996	7.8	34.0	79.3
阿塞拜疆	1995	<2	9.6	63.1
白俄罗斯	1998	<2	<2	95.2
格鲁吉亚	1996	<2	<2	35.1
哈萨克斯坦	1996	<2	15.3	85.4
吉尔吉斯斯坦		73.2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7	11.3	38.4	38.6
俄罗斯联邦	1994	7.1	25.1	70.2
塔吉克斯坦		43.1
土库曼斯坦	1998	12.1	44.0	98.4
乌克兰	1999	2.9	31.0	47.3
乌兹别克斯坦	1993	3.3	26.5	106.3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概览，2003 年，第 1 期》（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03. 11. E. 26）；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各期）。

在独联体最贫穷的国家，负面因素特别明显。由于失去随苏联解体而终止的联邦补贴，它们受到很大损害。⁴此外，在 1990 年代，其中 5 个国家受到战争和内乱的影响，有时不得不收容数十万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而且，有些国家还遭受了自然灾害和连绵不断的政治危机（亚美尼亚的例子见方框八.1）。

方框八.1

亚美尼亚的贫困

亚美尼亚共和国，人口 380 万，原是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该国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而且是个内陆国，但它曾是苏联最繁荣的共和国之一，亚美尼亚人享有受过良好教育、勤劳和具有企业经营才能的美誉。

1991 年底苏联的分裂沉重打击了亚美尼亚的福利。来自联邦政府主要以低价能源为形式的转移突然终止了，这部分转移在 1989 至 1991 年期间曾构成其财政收入的 31% 和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到来的时机又极为不巧，当时亚美尼亚仍须处理 1989 年破坏性地震的后果。共和国之间贸易的同时崩溃，几乎切断了亚美尼亚向苏联其他地区的出口。使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与阿塞拜疆就有争议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飞地发生的敌对行动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进一步耗竭预算资源，并造成两个方向的难民流。接近 30 万难民越境进入了亚美尼亚。

在转型的头四年，亚美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3%。在危机最严重的年份即 1990 年代中期，由于几乎没有电力或供暖，许多亚美尼亚城市看起来像鬼城似的。在首都埃里温这座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人们砍下城市公园中的树木用作燃料。

日益萎缩的经济和战争意味着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削减用于社会保护的支出。在 1990 年代末，养老金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平均养老金降到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下。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而保健支出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面对经济危机和国家无力保护他们不受穷的局面，数十万亚美尼亚人离开共和国前往俄罗斯联邦和更遥远的国家。许多留下的人转向了非正规经济。

⁴ 例如，就去年吉斯斯坦而言，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中，这些补贴相当于政府预算的 30%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10-12%，而在乌兹别克斯坦，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5%。见《2001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11.C.1），第六章，题为“增大的脆弱性：贫困与日益恶化的社会条件”的小节；以及 Martin C. Spechler，“猎获中亚虎”，《比较经济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2 年秋季），第 17 页。

方框八.1 (续)

亚美尼亚开始恢复的时间早于独联体多数其他成员国，在过去的7年中，借助于外国援助和亚美尼亚人从国外寄回的汇款（估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美尼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刚过2 000美元。1999年，按国际贫困线4.30美元衡量，贫困人数占到人口的86.2%，而按该贫困线一半衡量，严重贫困人数占到人口的43.5%。这种贫困的高发生率很大程度上也是收入的极度差异造成的。1987-1990年至1996-1998年期间，亚美尼亚反映不平等情况的基尼系数从0.27上升至0.61，其中50.6%的收入归于最富的人，只有5.5%的收入属于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

在过去的数年中，由于经济复苏，移民大量汇款和国际上提供巨额援助，亚美尼亚大规模的暂时贫困减少了。政府重建社会保护体系的努力也正在产生结果。在将补贴有针对性地分配给最贫穷家庭的数量和效率方面，亚美尼亚已成为独联体领先的国家之一。根据经济情况调查进行的定向补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一数字比其他独联体国家高得多，其他国家的此种补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至1.5%。亚美尼亚的穷人还受益于新的国际“独联体7国”倡议，它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荷兰及瑞士两国政府于2002年发起，向独联体最穷的7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援助。

资料来源：《2001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II.C.1），第六章，题为“对小的内陆转型经济体的挑战”；《转型：头十年。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教训》（世界银行，2002年，华盛顿特区）；《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欧洲和中亚的贫困和不平等》（世界银行，2001年，华盛顿特区）；以及Sam Vaknin，合众国际通讯社，2003年1月23日。

宏观经济背景

改革性衰退

1990年代期间，转型经济体大规模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崩溃后出现严重衰退。改革性衰退遍及该区域27个国家，历时3年（波兰）至9年（乌克兰）不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5%至70%，不过不能将下降全部归咎于经济改革。在独联体各国，衰退使收入的降幅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可与之相比的只有俄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情况。

鉴于转型经济体尤其是前苏联各继承国穷人普遍遭受苦难，有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能规避贫困的大规模增加吗？

多数专家认为，转型经济体一开始产出急剧下降是下列因素合在一起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动造成需求休克，政府定单减少和对外贸易遭到破坏，生产者不能将资源重新快速配置到新的用途而造成供应休克。许多转型经济体市场机构素质低劣和高度腐败增大了衰退的深度。⁵

对于改革的速度和顺序仍有不同看法。有人说加快改革步伐将会更有利于增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较快的改革在短期内较为痛苦，但更有利于较高的长期增长速度。⁶从事后来看，特定国家的改革进程似乎基本上由政治权力的分配所预先确定。⁷因此，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改革的前夜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前共产党官僚和大型国有企业经理的手中。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确定改革议程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形之下，在许多东欧国家，民间社会有着很大的发言权，而且各种基层组织如波兰的“团结”工会等，凭其本身的实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东欧，工作人口能够指望从一起步就将减贫措施纳入改革方案。

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治差别是明显的。通货膨胀给穷人带来的苦难比带给富人的大，因为他们通常缺乏保护他们的收入和资产不受物价快速上涨影响的信息和技能。因此，恶性通货膨胀一般导致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⁸不过，在转型经济体，稳定政策的成功一般取决于政治因素。东欧主要国家的政策根据国家共识采取行动，能够较快地遏制通货膨胀。在独联体各国，与通货膨胀进行

⁵ Janos Kornai, 《主路和旁道：改革和共产党后转型问题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和英格兰伦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年）；世界银行，《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欧洲和中亚的贫困和不平等》（世界银行，2000年，华盛顿特区）；Vladimir Popov, “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辩论的终止”，《比较经济研究》第XLII卷，第1期（2000年春季），第1-58页；和Jan Svejnár, “转型经济：业绩和挑战”，《经济前景杂志》，第16卷，第1期（2002年冬季），第3-28页。

⁶ Joseph Stiglitz, 《全球化及其不满者》（纽约，W.W.Norton出版社，2002年）；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世界银行，1996年，华盛顿特区）；Marek Dabrowski、Stanislaw Gomulka和Jacek Rostowski, “从何处改革？对Stiglitz观点的批判”（伦敦，经济成就中心，伦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院，2000年）；以及Stanley Fischer和Ratna Sahay, “接受股票”，《金融和发展》，第37卷，第3期（2000年9月），第2-6页。

⁷ “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软弱和通过防止共产党人重新上台以维护自由的愿望所驱动”，西方市场转型问题主要顾问之一承认说。见Richard Kayard, “为何这么痛苦？”，载于《共产主义的兴起：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教训》，Peter Boone、Stanislaw Gomulka和Richard Layard 合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伦敦），第5页。又见：Joseph Stiglitz, 《社会主义往何处去》（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Marek Dabrowski、Stanislaw Gomulka和Jacek Rostowski, 前引书；Stanley Fischer和Ratna Sahay 前引书；Lesgok Balcerovicz, “波兰的改革”，《金融和发展》，第37卷，第3期（2000年9月），第14-16页；和Gerald Roland, “转型的政治经济”，《经济前景杂志》，第16期，第1卷（2002年冬季），第29-50页。

⁸ “通货膨胀是一种递减和任意的税赋，较低收入段的人一般承担了其过大部分负担”，《减贫战略的原始资料》，第2卷，第5页。也见《转型中的贫困》……，第23页。

的斗争经常由于强大的政治利益的存在而复杂化了。在俄罗斯联邦改革的头几年，企业主管们的游说活动造成政府信贷大量流向他们的企业，从而给恶性通货膨胀火上浇油。据有人估计，1992至1993年期间，这些信贷造成财富向企业的净转移约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⁹恶性通货膨胀的净损失者是私人储户，多数是退休金领取者。总之，俄罗斯联邦私人储蓄遭到破坏使住户失去了高达四分之一的财富。¹⁰

通货膨胀损害或破坏了许多其他转型经济体的私人储蓄，其中多数转型经济体未将存款与通货膨胀挂钩或进行补偿。不过，在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通货膨胀率较低）和如波兰（多数存款采用外币保存），储户的损失较小。¹¹

私营部门投资

随着私有化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急剧减弱，产生增长的责任自然大多转移到私人投资包括外国投资。不过，转型经济体在这方面的情况远非令人满意。其中多数国家的投资水平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就独联体国家而言，问题经常不是缺乏储蓄，而是商业氛围较差和机构支持质量低。这种情况下，1999至2001年，俄罗斯联邦的国内储蓄超过了30%，而国内投资不足20%，其中相当部分的差额可用资本外逃来解释。独联体的商业氛围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1999至2001期间，在东欧准入欧盟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人均200美元左右，而在独联体各国，相应的数字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1%即不到人均40美元。¹²

近年来，许多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和一般商业氛围已经改善了。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6年以来联合在转型经济体进行的广泛的企业调查，在该区域几乎所有的国家，1999至2002年，经济管治和一般商业环境改善了。在东南欧和独联体国家，进步特别明显，其部分原因是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发生更迭和俄罗斯联邦新领导层掌权。不过，东南欧各国和独联体的商业环境质量的总体得分仍然低于中东欧各国。平均而言，2002年两个前国家集团的得分等于后一个国家集团1999年的得分。¹³

⁹ Richard Layard, 前引书, 第8页。

¹⁰ Simon Commander、Andrei Tolstopyatenko 和 Ruslan Yemtsov, “再分配的渠道”, 《转型经济学》, 第7卷, 第2期(1999年7月), 第24页。

¹¹ 在最近几年,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人因1990年代初恶性通货膨胀的损失而开始领取有限的存款补偿金。然而补偿是部分的, 而且只限于在世储户中最年长的人。

¹²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02年转型报告: 农业和农村转型》(伦敦,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02年), 第54-55页。

¹³ 同上, 第22-31页。

收入分配

在转型过程中，按住户一级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在几乎所有转型经济体都快速和明显地拉大。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反映不平等情况的吉尼系数提高到 45% 以上（见表八.2）。反过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又与财富不平等的大幅度增加直接关联，后者是政府资产实行私有化的方法造成的。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情况尤其如此。由于采用十分具有争议的方式实行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私有化，瞬间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和甚至亿万富翁（见方框八.2）。反映不平等情况的按吉尼系数衡量，东欧各国的不平等程度比独联体各国的低得多：1999 至 2000 年，系数在 0.30 至 0.34 的范围之内，接近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水平。

表八. 2.

1987-1998 年转型经济体吉尼系数

国家	1987-1990	1993-1994	1996-1998
东欧	0.23	0.29	0.33
保加利亚	0.23	0.38	0.41
克罗地亚	0.36	..	0.35
捷克共和国	0.19	0.23	0.25
爱沙尼亚	0.24	0.35	0.37
匈牙利	0.21	0.23	0.25
拉脱维亚	0.24	0.31	0.32
立陶宛	0.23	0.37	0.34
波兰	0.28	0.28	0.33
罗马尼亚	0.23	0.29	0.30
斯洛文尼亚	0.22	0.25	0.30
独立国家联合体	0.28	0.36	0.46
亚美尼亚	0.27		0.61
白俄罗斯	0.23	..	0.26
格鲁吉亚	0.29	0.28	0.43
哈萨克斯坦	0.30	..	0.35
吉尔吉斯斯坦	0.31	0.33	0.47
摩尔多瓦共和国	0.27	0.55	0.42
俄罗斯联邦	0.26	..	0.47
塔吉克斯坦	0.28	0.48	0.47
土库曼斯坦	0.28	..	0.45
乌克兰	0.24	0.36	0.47

资料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2 年转型报告：农业和农村转型》（伦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2 年），第 9 页。

财政政策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政府在许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明显降低。1989-1990年度至 1999-2000 年度，东欧各国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从 50% 降至 40%，独联体国家从 40% 降至 25-30%。¹⁴ 在多数转型经济体，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集中投资和军事开支减少，而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表示的社会福利计划、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支出基本上保持原状。¹⁵ 然而，由于改革性衰退，社会保护方面支出的实际数额减少了，除非提高这种支出的份额以补偿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实际支出的下降幅度在独联体国家特别大，因为 199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40-70%。

东欧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败政退缩的总体程度，也在于实现这种退缩的方法。在许多东欧国家，政府支出的减少以较为有序的方式管理，而在许多独联体国家，情况却不是这样。¹⁶ 在许多独联体国家，政府在对付贫困方面的作用被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进一步削弱，它们阻止收入向较为脆弱的社会成员的再分配。例如在东欧，退休金和失业补助金的支出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而在独联体，此种支出只占 5%。继续执行部分价格补贴和基于企业提供社会服务的原有制度，有助于穷人度过最艰难的转型期，但总体上看独联体国家的财政政策未能履行它们的社会保护职能。

方框八.2

俄罗斯联邦：亿万富翁的国家？

2003 年《福布斯》世界最富个人名单上，俄罗斯联邦冒出了 17 位亿万富翁，这个数字只低于三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德国和日本。按超级富豪数目衡量，俄罗斯联邦超过了加拿大（15 位亿万富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4）和法国（13），这些国家 200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5 万至 2.7 万美元，而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 000 美元（按市场汇率计算）。它也把中国（无亿万富翁）远远抛在后面，甚至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把巴西抛在了后面。巴西人口和人均收入与俄罗斯联邦非常接近，它的市场资本主义历史悠久得多，但只产生了 4 位亿万富翁。

¹⁴ Vladimir Popov, 前引书, 第 54 页;《2000 年转型报告》……, 第 62 页; 和《转型: 头十年。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教训》(世界银行, 2002 年, 华盛顿特区), 第 47 页。

¹⁵ 不过, 在独联体的多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 社会保护、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 经常幅度很大《转型中的贫困》……, 第 94-95 页。

¹⁶ “不是完全停止执行某些政府计划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其他的计划以期提高它们的效率, 而是有些政府半死不活地拖着所有的计划, 将资金减半, 让它们勉强地运转。全盘保持所有服务的政治压力压倒了更有选择性地精简优先任务的必要性”《转型中的贫困》, ……第 36 页。

方框八.2(续)

俄罗斯联邦几乎所有的超级富豪的财富，都来自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成熟市场经济体中亿万富翁的财富，依靠的是独特的企业家天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的天赋，或是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但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财富却不一样，它们主要是由政府法令创造的。最大的俄罗斯私营公司不是白手起家的；相反，它们是由于既有政府公司受内线操纵的私有化和垄断性的拍卖而诞生的。实际上，俄罗斯所有的亿万富翁（以及许多“普通”百万富翁，如果说不是多数）是由政府官僚的政治决定“指定的”。

俄罗斯私有化的长远后果仍有待评判。有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在向独联体其他国家作证明时说，将优质的政府资产保留在国家手中将会带来更糟的后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某些有争议的私有化造成了俄罗斯收入不平等的增长。

资料来源：《福布斯》，2003年3月17日；Francisco H.G.Ferreira，“经济转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转型经济学》，第7卷（世界银行）第2期（1999年7月），第377-410页；和Michael Alexeev，“私有化对俄罗斯财富分配的效应”，《转型经济学》，第7卷（世界银行）第2期（1999年7月）。

2001至2003年，几个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联邦，走上了财政改革之路，其目标是增加政府收入和制止政府乱成一团的财政退缩。在俄罗斯联邦，据报道，简化税收结构和实行统一的13%的所得税，在提高依法纳税和收入入库的程度方面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过，仍有待观察的是，财政状况的好转是否将转化为减贫方案提高资金到位率和效率。

贸易和外汇政策

伴随着转型经济体的市场改革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并取消了货币管制，以便刺激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这样，贸易政策将对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然则，从短期来看，开放的贸易制度不仅造就赢家也产生输家。穷人作为消费者依赖于对外贸易，如果贸易的放开使他们得到以前无法获得或价钱非常昂贵的外国货物、服务和食品，他们的福利就提高。穷人作为生产者，如果受雇于出口产业或出口相关的产业，也因贸易更加自由化而受益。与此同时，如果穷人就业的产业因外国进口的竞争而受影响，他们作为生产者就可能变成输家。¹⁷

¹⁷ “鉴于开放与增长之间的正联系，可以预期贸易自由化总体上有助于穷人。不过，在短期内，自由化对某些穷人可能有负面影响，这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来源和自由化对穷人消费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的影响。”见Bernard Hoekman等人，“贸易政策”。载于《减贫战略原始资料》，第2卷……，第30页。

在市场改革的头几年，转型经济体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国竞争，给国内工业造成严重的损害。由于无法与外国生产者竞争，它们不得不减少产出、就业和（或）工资。与此同时，有些转型经济体的出口商利用石油、木材和金属原材料等巨大的国内外差价赚取高额利润。不久，转型经济体的保护主义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从完全自由化的道路往后退缩并开始提高关税和实行配额和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和出口管制。为保护国内市场，有的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等还维持了复合汇率。

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取决于本国的许多因素（是否拥有多样化的经济，地理位置及其机构的状况）和贸易伙伴的许多因素。在实行贸易自由化时也可能发生成本；可能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前，与进口展开竞争的工业减少了就业机会。¹⁸不过，事实证明实行统一的低关税对某些国家相当有效。这方面走在前边的也许是爱沙尼亚，它实行统一的零关税，类似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还实行累进关税制，税率的分散程度较低，与智利相似。¹⁹

在汇率管理领域，有利于增长并因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要求对一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保持一种定值低而不是定值过高的实际汇率。低定值的汇率有助于促进出口。从历史上看，拥有低定值国家货币的政策有助于刺激东南亚和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加，使它们克服或减少贫困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然而，与此同时，定值过高的汇率使穷人享受的进口价格降低的好处少于富人，因为进口货物在穷人消费中所占份额较小。²⁰

基于资源的经济体如俄罗斯联邦的情况较为复杂。出口原材料使外国货币大量流入，造成国家货币定值过高的持续风险，即所谓的荷兰病。在俄罗斯联邦，1998年危机前卢布大幅升值，成为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1998年的贬值，虽然打乱了国家的金融体系，但对经济增长却相当有益，而且总体上可以认为对穷人来说是一种积极的情况发展。最近几年货币再次实际升值，此事正成为政策方面担忧的重大事项。

暂时贫困与长期贫困

长期贫困的出现

在转型初期政府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存在缺陷，迫使比较贫穷的转型经济体的人民严重依赖于自助式的经济存活方法。私人应对贫困的反应包括增加在非正规

¹⁸ 见 Joseph E. Stiglitz. “新兴市场和新经济体的全球化和增长”，《政策模型杂志》，第 25 卷（2003 年），第 513 页。

¹⁹ 见 Bernard Hoekman 等人，前引书，第 33-34 页。

²⁰ 见 Brian Ames 等人，“宏观经济问题”，载于《减贫战略原始资料》，第 2 卷，第 9 页。

经济中的就业，种植家庭自留地和严重依赖于家庭内部的转移。由于在国内缺乏机会，导致劳动力大量移居本区域情况较好的经济体和其他国家。大批的人别无选择，就去从事犯罪和卖淫活动。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以东欧经济复苏为契机，转型经济体区域的贫困情况有了转机。自 1998 年卢布贬值以来，独联体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势头相当强劲。不过，在总体改善的同时，贫困集中出现在特定的区域和经济部门，以及人口的特定群体中。因此，虽然衰退诱发的“暂时”贫困消退了，但规模较小然而局部扎根的长期贫困却并未消失。集中和严重的长期贫困的出现是一种较新的现象。²¹

由于贫困程度多种多样，东欧主要改革派在应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独联体国家面对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在东欧各国，特别是欧盟加入国，²²由于收入水平正在超过转型前的水平而且正在实现基于市场的经济增长，暂时贫困正在减退。各国政府的目标主要包括改善现行的社会保护机制和根除局部地区的集中贫困。在最贫穷的独联体国家，主要任务是缓解严重的贫困和防止现行保健和教育体系的瓦解。对于其他独联体国家而言，任务在于通过鼓励性的经济政策减少规模依然巨大的暂时贫困，同时又遏制集中的长期贫困不断增长的危险势头。

目前，转型经济体的贫困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见方框 8.3）。在转型前，防止贫困主要靠政府保证的就业、免费保健和教育，以及巨额补贴的食品、住房和公用事业。政府按照其集体主义的思想，确保颇为平等主义的工资分配并严格限制其他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政府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相当慷慨的社会保护体系。还向所有住户提供广泛的卫生和教育服务，保证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此外，转型经济体的多数住户从中央计划时期继承了宝贵的实物资本即原为国有的配备全套便利设施的公寓房。这使它们成为较为资产富有的住户，与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住户形成对照。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主要由企业而不是政府提供某些关键的服务和社会保护，例如住房、育儿和社会保障。

²¹ 证明这种现象系最近出现证据的是，世界银行 1996 年关于转型经济体的综合报告和开发计划署 1998 年关于转型中贫困问题的报告均未将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及，它们指出“几乎尚未出现什么迹象”表明该区域出现了一个下层社会（见《从计划到市场》……；和《转型中的贫困》……，第 18 页。

²² 欧盟加入国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其中 8 个预定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预定于 2007 年被接纳。

方框八.3

转型经济体中贫困程度的衡量

没有人怀疑转型经济体中贫困程度总体出现大规模的提高,但如何衡量却存在着问题。由于转型经济体有着独特的特点,如社会化的保健和教育,实行补贴的公用事业和家庭内部大量的转移,与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比较难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贫困程度。下列因素使转型经济体贫困衡量工作进一步复杂化:产出和价格波动大,非正规经济规模大,人口流动量大和统计系统仍在调整以适应市场环境。在本章中,转型经济体中贫困的分析主要依赖于绝对指标,基于通常以国际美元界定的“固定”贫困线。此外,还利用了相对贫困指标,基于“移动”贫困线,由各别国家以与平均工资或人均收入的比例界定。

在衡量转型经济体贫困程度方面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统计规模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其估计数从斯洛伐克的6%至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60%以上不等。政府统计机构正在加大力度说明非正规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定期上调以包括非正规经济和家庭小块自留地的产出。不过,很大部分的非正规经济未能被政府数据收集人员注意到,只能根据间接指标如电消费量进行大概的估计。规模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是利用住户支出测量贫困程度比根据报告的收入进行测量较为可靠的理由之一。

只是收入低这一项不能表达穷人的总体贫困程度。更广泛的福利量度可以包括平等程度、获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和政治参与情况。得出的指标一般紧密相关,但能够显示出某种程度不同的趋势。例如,与仅仅基于贫困的量度相比,将贫困与不平等结合起来的指标显示转型经济体福利的恶化程度大得多。当然,其原因在于转型经济体1990年代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大。

对于以前提倡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收入差异的突然到来造成很大的心理痛苦。这些国家基于调查的“主观贫困程度”在1990年代提高到比“测量的贫困”高得多的程度。这样,2001年代在保加利亚,73%的人口自称是穷人,而基于国家贫困线测定的只占12.8%。俄罗斯联邦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0%以上自称穷人,约为根据国家贫困线测定的人数的两倍。

资料来源: Simon Johnson、Daniel Kaufman 和 Andrei Shleifer,“转型中的非正规经济”,《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第2卷(1997年),第159-221页; J.Flemming 和 J.Micklewright,《收入分配、经济制度和转型》,载于《收入分配手册》,Anthony Atkinson 和 Francois Bourguignon 合编(阿姆斯特丹,Elsevier,2000年),第843-910页; Carola Grun 和 Stephan Klasen,“转型国家的增长、收入分配和福利”,《转型经济学》,第9卷,第2期(2001年),第378页; Aline Coudouel、Jesko S.Hentschel 和 Quentin T.Wodon,“贫困的测量和分析”,载于《减贫战略原始资料》,第1卷, Jeni Klugman 编(世界银行,2002年,华盛顿特区),第27-74页;《保加利亚的贫困评估》,世界银行报告,第24516号(2002年10月29日,华盛顿特区),第3-7页; 和《劳动报》,2003年1月11日。

转型经济体很大部分的贫困看来是暂时性的。由于转型前收入分配颇为平等而且许多家庭徘徊在贫困线附近，因此在收入下降时很多人被推到这条线的下面。在该区域各经济体开始复苏时，其中许多家庭的收入恢复到了贫困线之上的水平，从而使贫困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暂时现象。

不过，在暂时性的大规模贫困减少的同时，转型经济中也出现了长期和集中贫困现象的增长。这是与人口的区域、部门、统计学和其他特点相联系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收入分化过程促成的。如可以预期的那样，在改革性衰退期间，不同人群（城市与农村、受教育与未受教育、就业与失业及自营职业）的日子过得不一样。有些群体能够较快脱离贫困，而另一些群体则自转型开始以来一直陷于贫困境地。

在所有的国家，暂时贫困是由不利但暂时的宏观经济条件造成的，例如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下降、恶性通货膨胀或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战争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如自然灾害，也能导致暂时贫困。与这种贫困类型相反，长期贫困主要是由微观经济因素造成的，如特定区域或行业的特点，或各别住户成员的特点如教育程度、专业、年龄、性别、和民族等。²³

最近根据对住户支出的纵向调查对几个转型经济体长期贫困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长期贫困占到总体贫困人数的一半左右。²⁴根据这项研究（其中将穷人界定为收入或支出分布中处于底部 20%的人），可以将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联邦大约 10%的人口视为长期贫穷并因而可能永久处于下层社会（见表八.3）。

部门和区域的收入分化

在中央计划时代，除了进行跨界和共和国间转移外，各个中央政府还在区域一级积极进行交叉补贴。中央计划的瓦解导致区域性交叉补贴大为削弱。随着国民经济对外开放，这造成各别区域、城市和地区的财富发生巨大的变化。前苏联的各个区域情况尤其如此，其中许多区域失去了宝贵的能源补贴和其他联邦援助；但是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即使最富裕的转型经济体也在其国界内出现了无数萧条区域。这些区域受市场改革打击特别惨重，例如相对价格变动，取消补贴，国家订单减少和运输成本增加等。例子包括俄罗斯联邦北部地区和国防生产区域（见方框八.4）。

²³ Michael Lokshin 和 Barry M. Popkin, “俄罗斯联邦正在出现的下层社会：收入动态，1992–1996 年”，《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 47 卷，第 4 期（1999 年），第 822–823 页，区分贫困的暂时部分与长期部分是充满困难的工作，因为它要求长时间的观察和组合数据。只有少数几个转型体能以可比较的格式提供此种数据。因此贫困的多数测量实际上只提供点滴信息，因为特定年份的人均贫困点数，对于登记为穷人的以前收入状况或对于他们下一年的收入情况并不揭示什么信息。

²⁴ 这对应于中国和印度长期贫困问题研究中发现的类似比例。见世界银行，《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消灭贫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纽约），第 140 页。

表八.3

暂时和长期贫困：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联邦，1994-1996年^a

百分比			
人口份额	匈牙利 (收入)	波兰 (支出)	俄罗斯联邦 (支出)
根据测定贫困得出的人口份额			
始终贫困(4轮全部)	8.8	5.9	3.4
有时贫困(4轮中1、2或3轮)	26.3	31.6	41.9
从未贫困(4轮中无一轮)	65.0	61.5	54.7
根据利用“基本”贫困转型问题的进行的 模拟得出的人口份额			
始终贫困(4轮中全部)	9.7	10.7	10.0
有时贫困(4轮中1、2或3轮)	22.6	20.1	21.8
从未贫困(4轮中无一轮)	67.8	69.2	68.2

资料来源：《转型报告，2000年》(伦敦：欧行，2000年)，第98页。

^a 根据1994-1996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联邦进行的4轮全国住户纵向调查得出的数据。A组列示调查直接观察的贫困人数。在B组中，对人数进行调整以顾及总的转型休克的影响并反映“基本的”长期贫困。在每轮调查中，将贫困界定为收入或支出分布中处于底部20%的人。

另一方面，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多数大都市福利相对提高和新的繁荣区域出现，例如石油丰富的西西伯利亚。一般来说，赢家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和贴近主要经济中心的区域。²⁴

²⁴ 见 V. Popov, “俄罗斯各区域的改革战略和经济成就”, 《世界开发》, 第29卷, 第5期(2000年), 第856-886页; N. Mikheeva, “俄罗斯各区域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化和区域政策问题”(莫斯科, 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学会(经济学教研会), 1998年); Irina Dolinskaya, 《俄罗斯的转型和区域不平等: 改组还是拖延?》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2/169号(2002年10月, 华盛顿特区); Leonid Fedorov, “俄罗斯联邦区域不平等和区域极化, 1990-1999年”, 《世界开发》, 第30卷, 第3期(2002年), 第443-456页; 和 Simon Iommander、Tolstopiatenko 和 Ruslan Yemtsov, 前引书。

方框八.4

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日益萎缩的巨人

在 1990 年代，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受到了三重冲击：大幅度的预算削减、激进的市场改革和与其他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合作伙伴的传统经济联系的断裂。从 1980 年代晚期苏联军事建设达到高峰至 1996 年落到最低点这段时间里，国防开支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从 15-17% 降到了 3-4%，军事工业的产出减少了 80%，国防工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二。

国防工业企业分布在俄罗斯的大多数省份。不过，其中大部分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区域，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

在苏维埃时代，国防企业与经济的其余部分相比具有许多优势：它们拥有最熟练的工作人员，包括工人和工程师，并开展了最出色的研究与发展和创新工作。较高的工资是吸引和保留素质较高工人的主要因素。此外，国防企业拥有广泛的设施，它们提供各种社会服务——零售商店、医院、幼儿园和儿童夏令营、体育场、海滨度假胜地和图书馆。

由于军事订单大幅度减少，国防企业的处境比经济的其余部分更加艰难，这特别体现在大幅减薪、拖欠工资、人员流失和劳资关系紧张等方面。在转型期内，由于企业无力提供经营资金，其中有些社会服务设施被关闭或出售。

在整个 10 年改革过程中，国防工业的平均工资只是平均工资的 40-60% 和制造业平均工资的 50-80%。在经济的其他分支部门，只有教育、农业和保健等平均工资低于国防工业。近年来，国防工业的工资开始追赶经济的其他部门。不过，差距依旧存在。2000 年，根据一项国防企业调查，它们的平均工资为每月 3 135 卢布（按市场汇率计算刚过 100 美元），相当于工业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 60% 和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 80%。

不过，工资低只是俄罗斯国防工业工资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持断不断地拖欠工资。即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也难免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例如，2002 年，位于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 Izhmash 厂平均拖欠工资两个月。

作为在不支付具有竞争力的工资的情况下留住工人的一个手段，许多国防企业继续依靠基于企业的社会服务。通过总统令，国防企业的所有“社会基础设施实物”的控制权应于 1997 年以前移交市政当局。实际上，移交过程没有完成。到 2003 年，只有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移交市政预算，或以出售方式或以出租方式。

方框八.4(续)

企业在开始改革其社会基础设施之后，认识到了其中一些财产对保留人员的重要性并决定放慢转型速度或完全停止转型。截至 2001 年，60-70%的国防企业继续拥有医务室、食堂和图书馆；30-35%的企业拥有商店、儿童营地、娱乐设施、体育场馆和住房；约有 20%的国防企业拥有幼儿园。

俄罗斯联邦不同区域的国防企业之间分化程度很严重。位于或靠近中心城市的企业与位于国家偏远地区特别是远东、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企业相比，享有较优越的经济及社会条件。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大区的国防企业，2002 年月平均工资为其他区域的 1.4 倍多。这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心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比各省的活跃得多，因此不满意工资或工作条件的国防工业的工人能够很容易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在各省的国防企业，特别是位于所谓封闭城市的企业，没有多少工人拥有这种选择。不过，莫斯科生活费用高得多，这种情况基本上抵销了按实际价值衡量的工资水平的差别。

资料来源：Clifford Gaddy, 《过去的代价：俄罗斯与军事化经济遗产作斗争》(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1996 年, 华盛顿特区); Ksenia Gonchar,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国防工业”, 波恩军转民国际中心, 2000 年, 波恩; Alexei Izyulmov 等人, “市场改革与俄罗斯国防企业的区域分化”, 《欧亚研究》, 第 54 卷, 第 6 期 (2002 年), 第 959-974 页;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委员会, 《人民的生活水准》(可查阅: <http://www.gks.ru/>); 和 Udmurtia, “武器生产厂商仍在因拖欠工资而受困扰”, 2002 年 9 月 21 日 (可查阅: <http://www.regions.ru/article/any/id/854061.html>)。

由此造成的贫困程度差别会是巨大的。例如，华沙居民受穷的可能性只有波兰其他地方的六分之一；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的贫困程度比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低 8 倍。²⁵ 因此，例如俄罗斯联邦 89 个行政区域的人均收入差异比美利坚合众国 50 个州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前者差异系数为 51.9%，而后者为 14.8%²⁶。

在转型经济体，农村地区仍比城市地区穷。不过，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的格局是不同的。在多数东欧国家，农村贫困的程度比城市的贫困程度高出许多（约 50%）。在独联体国家，城乡间的差距不那么明显。在其中一些国家（例如格鲁吉亚），农村地区的贫困程度实际上比城市低。独联体国家农村地区形势较好的原因是，与东欧各国相比，这些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大得多。在独联体的

²⁵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 74 页；和 Simon Clarke, “俄罗斯的贫困”，《经济转型问题》，第 42 卷，第 5 期（1999 年 9 月），第 21 页。

²⁶ Simon Commander、Andrei Tolstopiatenko 和 Ruslan Yemtsov, 前引书, 第 34 页；和 Jeni Klugman 和 Jenine Braithwaite, “俄罗斯联邦转型期间的贫困：概述”，《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第 12 卷，第 1 期（1998 年 2 月），第 39 页。

有些区域，制造业的悲惨经济危机甚至使萧条的农业地区有了吸引力。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导致了去城市化，或促使城市居民向农村地区倒流，独联体的中亚各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²⁷

冲突与贫困

中央计划体制的瓦解导致几乎建立起了 20 个新独立的国家，但伴随这种现象的是无数的国家和民族冲突，其中几起升级为全面的军事冲突。

战争和政治危机造成大的混乱。在 1990 年代，各转型经济体接近 5 000 万人受到战争和动乱的直接影响。其中 800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²⁸ 由于前南斯拉夫发生战争，其中半数来自这个国家，另 150 万由外高加索的战争造成，其余由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冲突造成。其中许多国家形成了由乞丐包括移民儿童组成的城市下层社会，而且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继承国等国家为民族冲突的难民建立了难民营。

到了 1990 年代末，转型经济体实际上所有的军事冲突都停止了或激烈程度降低了。不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仍然十分庞大。根据联合国估计，到 1999 年，国内流离失所者在阿塞拜疆还有 57 万，在格鲁吉亚有 27.9 万，在俄罗斯联邦有 49.8 万。²⁹ 战争和被迫移徙的后果将在今后许多年持续存在。例如，1999 年阿塞拜疆 75% 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生活在临时居所内。在格鲁吉亚，三分之一的流离失所家庭在重新定居后数年仍没有固定收入。³⁰ 在波斯尼亚，人们发现前军人和难民的家庭受穷的风险大得多。³¹

特定民族贫困

转型经济体中特定的民族贫困并非都与内战联系在一起。遭遇此种和平时期贫困的群体包括东欧各国的罗姆人和土耳其族人和在俄罗斯联邦及前苏联其他继承国的来自中亚的移民工人。据认为，数目在 700 万至 900 万之间的罗姆人是欧洲最大的少数民族。

²⁷ Kathrgn H. Anderson 和 Richarl Pomlret, “新的市场经济体的相对生活水准：来自中亚住户调查的证据”, 《比较经济学杂志》, 第 30 卷 (2002 年), 第 702 页。

²⁸ Branko Milanovic,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世界银行, 1998 年, 华盛顿特区) 第 4-5 页。

²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1 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及增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增编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纽约), 第 205 和 207 页。

³⁰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 第 52 页; “在中东欧、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波罗的海的监测”, (MONEE 项目)《转型中的妇女》, 区域监测报告, 6 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儿童发展中心, 1999 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 第 11 页。

³¹ Marcelo Bisogno 和 Alberto Chong, “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平等状况的决定因素”《转型经济学》, 第 10 卷, 第 2 期 (2002 年), 第 335 页。

在保加利亚，少数民族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20%，但占穷人的 60%以上。土族人的贫困风险比保加利亚族人高 3.5 倍，而罗姆人的贫困风险则高 10 倍（见表八.4）。少数民族的贫困不仅范围大而且程度高。罗姆族穷人的贫困差距（将收入提高到贫困线所需的收入增加的百分比）是 25.4%，而保加利亚族穷人的贫困差距只有 1.1%。保加利亚和东欧其他国家罗姆人贫困程度高，导致最近欧洲联盟委员会、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学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率先发起了一个倡议。2003 年 6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了这个专题的高级会议。

在俄罗斯联邦，最穷的少数民族是来自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难民、民族冲突如车臣冲突造成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非法移民。（国际救济团体报告说，截至 2002 年，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有 11 万车臣难民，其中多达 2 万人居住在相邻的印古什共和国的帐篷城市中³²。

表八.4

保加利亚按民族分列的贫穷情况

百分比			
	在人口总数中的份额	民族群体贫困率 ^a	民族群体贫困差距 ^b
保加利亚族人	82.3	5.6	1.1
土族人	7.1	20.9	53
罗姆族人	8.8	61.8	25.9
其他	1.8	7.6	1.2
合计	100.0	11.7	3.6

资料来源：《保加利亚贫困评估》，世界银行报告，第 24516 号（华盛顿特区，2002 年 10 月 29 日）。

^a 低于贫困线的人口的百分比。

^b 贫困线与穷人平均收入之差，以占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

俄罗斯联邦境内大多数非法移民是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公民。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最近为这一类别给出的估计数是 1 000 万。³³ 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中亚，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非法移民是人口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之一，收入低，居住在不达标准的住房中，而且经常受到当地商人和警察的迫害和敲诈勒索。

³² 《莫斯科时报》，2002 年 12 月 19 日。

³³ Newsrn.com，2001 年 10 月 24 日（<http://newsru.com/russia/24@t2001/nelegaly.html>）。

住户特点与贫困

如在多数其他市场经济体中一样，转型经济体中贫困的风险对年龄、性别、教育、子女数和其他住户特点很敏感。在中央计划时期，转型经济体区域的各国政府以对年幼和年长者一视同仁地关怀而感到自豪。老年退休金和儿童支助制度保证了低下但稳定的收入，而免费的公共教育和保健满足了这些基本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国家的这类福利的绝对值下降了。不过，相对而言，年幼者失去的比年老者多得多。

贫困的发生率随着家庭子女数而提高。例如在俄罗斯联邦，根据 1997 年的国家贫困线，贫困计数情况为两个子女的家庭的 37%，3 个子女的家庭的 50%，4 个或 4 个以上子女的家庭的 72%。在亚美尼亚，根据 1996 年的一项调查，两倍于平均人口的家庭，其极端贫困率也是平均数的两倍。³⁴ 极端贫困和机能失调家庭数目的增加，导致出现了大批外逃的街头儿童。在俄罗斯联邦，估计无家可归的儿童达到 100 万，这个数字表明出现了只能与 1920 年代初内战后时期可比的情况。

转型经济体老年公民贫困的风险一般低于普通的公民。东欧各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退休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保持在市场改革前的水平，而且在有些国家实际上增加了。在多数独联体国家，大体上保持了退休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鉴于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实际收入减少了。不过，与人口的其他群体相比，退休金领取人员生活过得较好。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以外的所有东欧国家，退休金领取人员的贫困风险低于整个人口。在独联体国家，老年人的贫困风险普遍高于平均数，但差距不大，而且在两个国家即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贫困的风险较低。³⁵ 与年轻人不一样，转型经济体中多数退休人员能够依靠积累的资产如公寓房和园地。在独联体的许多贫穷家庭中，退休金领取人员实际上与其家庭中较年轻的成员共享其货币和实物资源。

缺乏教育是贫困风险一个重要的预报因素。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受穷的风险比全国平均数高出 20-60%。相形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低于平均数。在较为富裕的东欧经济体，这种关系更为牢固，这些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高，但这一点对于最穷的经济体如中亚各国而言也成立。

总之，东欧国家个人和住户特点与长期贫困之间的联系比独联体国家牢固。这表明前者不加区分的大规模暂时贫困趋于减少，而后者此种贫困占压倒多数。

³⁴ 《转型中的妇女》……，第 10 页。

³⁵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 82-83 页。

就业、失业与贫困

由于效率低下和不计实际生产成本，转型前各经济体在貌似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并声称官方的失业率为零。在市场改革的初期，随着许多效率低下、浪费和不需要的生产的取消而造成的转型经济体产出的减少，比记录的失业的增加较为明显。其原因包括充分就业的定式思维具有惯性，政治上担心大量失业，在许多国有和新近私有化企业中维持软性预算限制，对劳动力短缺习以为常的企业屯积劳动力和劳动力的地域流动性小。³⁶

不过，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中央计划经济的遗产已破坏殆尽，从而削弱了其中许多因素的力量，特别是转型进入最深入阶段的国家。因此，进行市场改革未过数年，转型经济体的失业率从不到 5% 上升到了 10-15% 或更多（关于部分国家的情况，见表八.5）。工作岗位的总体损失甚至大于仅仅由失业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因为千百万人完全退出了劳动力。1989 年至 1998 年，转型经济体中估计损失了 2 600 万个工作岗位——为转型前总数的 13%。

³⁶ 关于软性预算限制的不利影响，见《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II.C.1）方框四.2。也见 Janos Kornai，《主路和旁路》……，Olivier Blanchard，《共产党后转型经济学》（Clarendon 出版社，1998 年，联合王国牛津）；Mark E. Shaffer，“转型经济体的企业有软性预算限制吗？概念和证据的重新审议”，《比较经济学杂志》，第 26 卷，第 80-103 页；和 Vahaly Ioyumov，“转型经济体失业——产出权衡：奥肯规律适用吗？”，《计划经济学》（即将出版）。

表八.5

1991-2001 年部分转型经济体的产出、失业和实际工资

国家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保加利亚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1.7	-7.3	-1.5	1.8	2.8	-10.2	-7.0	3.5	2.4	5.8	4.1
失业率 (百分比)	11.1	15.3	16.4	12.8	11.1	12.5	13.7	12.2	16.0	17.9	17.7
实际工资 (1998 年=100)	68.0	76.7	77.6	63.7	60.2	49.6	40.1	48.1	51.7	48.9	48.7
捷克共和国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1.6	-0.5	0.1	2.2	6.0	4.3	-0.8	-1.2	-0.4	2.9	3.1
失业率 (百分比)	4.1	2.6	3.5	3.2	2.9	3.5	5.2	7.5	9.4	8.8	86
实际工资 (1998 年=100)	68.9	76.0	78.8	84.9	92.2	100.4	102.3	101.0	107.4	108.1	117.0
波兰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7.0	2.6	3.8	5.1	71	6.0	6.9	4.8	4.1	4.0	1.0
失业率 (百分比)	12.2	14.3	16.4	16.0	14.9	13.2	10.3	10.4	13.1	15.1	16.2
实际工资 (1998 年=100)	75.4	73.3	71.2	71.6	73.3	77.9	82.4	85.2	90.1	97.4	102.1
俄罗斯联邦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5.0	-14.5	-8.7	-12.7	-4.1	-3.6	1.4	-5.3	6.4	10.0	5.0
失业率 (百分比)		5.2	6.1	7.8	9.0	10.0	11.2	13.3	12.2	9.8	8.7
实际工资 (1998 年=100)	93.9	63.1	63.4	58.4	42.1	47.7	50.0	37.0	35.8	43.3	51.8

资料来源：欧洲经委会，《欧洲经济概览：2003 年，第 1 期》（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11E.26）；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2002 年：农业与农村转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2 年，伦敦）第 58、65-66、133-141-185 和 193 页；《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报告 2001 年修订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1 年，伦敦），第 15 页；《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欧洲和中亚的贫困和不平等》（世界银行，2000 年，华盛顿特区），第 125 页；和俄罗斯统计局（可查阅 <http://www.gks.ru/>）。

不过，与发达国家的经历（就业下降时就业者的实际工资一般并不同时下降）形成对比，在许多转型经济体，实际工资也下降，因为名义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快速的通货膨胀。独联体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到 1990 年代中期，实际工资下降了 40-50%。不仅实际工资下降，而且经常大量拖欠，有时长达一年之久。

通货膨胀猖獗和宏观经济高度不稳定，使独联体国家的工人不及东欧工人那样能够捍卫他们的实际工资。特别是通货膨胀，独联体国家比东欧严重得多。在改革的头几年，独联体最大的那些国家每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2000%。在东欧，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率在 100-200% 的范围内。宏观经济较快趋于稳定，有助于东欧工人部分或完全恢复转型前的工资水平。1989-1991 年期间实际工资下降了 25% 左右，自那时起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平均恢复 15-20%。在宏观经济稳

定多花了几年时间的多数独联体国家，实际工资继续下降，一直延续到 1990 年代中期。³⁷ 独联体的工资在 1995-1997 年期间有所恢复，但在 1998 年卢布危机后急剧下降。自 1999 年以来，工资增加了，但仍比转型前时期低得多，特别是如果把经常拖欠和不支付考虑进去的话。

工会力量薄弱，失业保护不充分和依赖于特定企业的非工资福利，例如有补贴的住房、保健和育儿，迫使独联体国家的工人留守在低工资的工作岗位上。劳动力地域流动性小加剧了这种倾向。由于各种障碍如住房市场不发达，交通成本高和存在种种法律限制，千百万的工人无法利用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只有坚持报酬很低的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可做。

独联体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个主要的瓶颈，即中小型企业数量不足，其主要根源在于此类企业面临恶劣的法律和税收环境和继续实行软性预算限制和和大企业享有的其他特权。³⁸ 相形之下，在东欧，中小企业的待遇比较优惠，它们为新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从而成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东欧，中小企业的就业和产出快速增长，使这个部门变成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到 1998 年，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立陶宛雇工 50 人或不足 50 人的企业生产了 55-56% 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形之下这类企业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仅生产了 10-20% 的国内生产总值。独联体国家中小企业的份额仍然很低，尽管它们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经济的平均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只有达到在就业和增加值中占 40% 的临界值，才能感受到中小型企业对总体就业和增长的正面影响。³⁹

失业补助和最低工资

劳动力市场向转型调整的方法不同——东欧主要通过减少就业人数，而独联体通过减少就业人数和实际工资二者——是这两个国集团不同的劳动力政策造成的，而且对贫困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

在东欧，特别是在转型比较深入的那些国家，政府从一开始就维持较高的失业补助水平。而独联体国家则相反，失业补助少得可怜。例如在斯洛伐克，2000 年的失业补贴一般在平均工资的 40% 至 50% 之间。与独联体国家相比，东欧失业补助也有期限较长和覆盖面较宽的特点。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³⁷ Tito Boeri 和 Katherine Terrell, “转型中劳动力重新分配的机构决定因素”, 《经济前景杂志》, 第 16 卷, 第 1 期 (2002 年冬季), 第 54 页; 和 Jan Sveinar, “转型经济学: 成就和挑战”, 《经济前景杂志》, 第 16 卷, 第 1 期 (2002 年冬季), 第 18 页。

³⁸ 在改革的头 3 年 (1992-1994 年), 俄罗斯联邦的小企业数目从 26.8 万个增加到了 89.7 万个。然而, 宏观经济不稳定, 来自较大公司的不公平, 竞争和政府奉行十分不利的政策等阻止了私营小企业的增长, 实际上将小企业数目冻结在 100 万个的水平上。

³⁹ 《转型: 头十年……》, 第 39-42 页。

补助的期限为 24 个月，而俄罗斯联邦的最长时期是 6 个月。在罗马尼亚，即使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如果无法找到工作，也有资格享受失业补助。

在俄罗斯联邦，最低工资不足平均工资的 10%，而失业补偿（并非基于裁员前的平均工资）经常按最低工资水平支付。⁴⁰ 由于失业补助定得非常低，多数失业人员甚至不屑于进行登记。这样，俄罗斯联邦登记的失业数约为基于调查的失业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经费有限只是补助水平低的部分原因：在俄罗斯联邦，联邦就业介绍机构多年出现预算盈余。⁴¹

失业状况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报转型处于最深入阶段的国家的贫困情况。在波兰和匈牙利，以失业人员为户主的住户受穷的可能性为以就业人员为户主的住户 4 倍。在匈牙利，1990 年代中期，贫穷住户中 60% 的户主失业；在保加利亚和波兰，这个比例为 30%；而在爱沙尼亚，这个比例为 24%。然而，在独联体国家，贫困与失业的联系不那么大。俄罗斯联邦只有 11% 的穷人、白俄罗斯只有 5% 的穷人来自失业者行列。⁴² 这种表面看来反常的主要原因是独联体工资水平极低，使得就业与失业之间的差别不象东欧那样明显。

东欧的最低工资立法与独联体不同。在东欧，最低工资定在平均工资的 30% 至 40%，而在独联体国家，允许最低工资从 1990 年接近平均工资的 30% 减少到 1996 年的不足 10% 和 2002 年的不足 7%。⁴³

原则上，应将最低工资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即向住户提供的收入至少应使其成员足以达到国家贫困线。例如在美国，将最低工资定在约为国家贫困线的 4 倍。这样，四口之家中一名工作人员得到的最低工资所产生的收入应刚好保证家庭不会降到贫困线以下。甚至在转型达到极其深入阶段和国家，也只有领取平均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的人才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样，波兰在 1990 年代中期，平均工资与法定贫困线的比率几乎为 3：1。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这一比率刚好为 2：1。⁴⁴

东欧较高的最低工资和失业补助，提供了使工作人员得以避免贫困的工资底限。这项政策的代价是降低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和增加税收。与之相反，在独联体，由于没有有效的工资底限，使实际工资远远低于贫困线并产生了千百万的“工作穷人”。

⁴⁰ 由于对通货膨胀起不了多少保护作用，俄罗斯联邦和许多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最低工资实质上丧失了它的基本意义，各政府机构已将其转变为一个独特的记账单位。

⁴¹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 345 页；和 Tito Boeri 和 Katherine Terrell，前引书，第 72 页。

⁴² Branko Milanovic，前引书，第 98 和 117 页。

⁴³ Tito Boeri 和 Katherine Terrell，前引书，第 65 页；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可查阅 <http://www.gks.ru>）。

⁴⁴ Branko Milanovic，前引书，第 97-99 页。

近年来，独联体国家的决策者日益认识到，实际工资低严重阻碍消除贫困的斗争和进行经济重组的更广泛的目标：由于最低工资很低，使人不愿意裁掉富余的劳动力，从而减慢了过时企业所急需的重组。在俄罗斯联邦，参加“最低工资辩论”的有些人要求工会、企业与政府达成一项全国三方协议，旨在大幅度提高经济中的工资水平。作为此种承诺的交换条件，政府将同意全面减税，而工会则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纪律。⁴⁵ 在2000—2001年，斯洛文尼亚政府和公共及私营部门的雇员和雇主就工资问题订立了一个“社会伙伴关系”协议。在克罗地亚也正在谈判达成一项类似的伙伴关系协议。⁴⁶ 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所有此类尝试中，应审慎评估对投资特别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抑制效应。

付对贫困：政府的反应

从基于中央计划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转型到基于市场力量的制度，需要变革经济的所有方面，包括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在以前的体制下，贫困被说成基本上不是个问题，因为就业、基本住房、教育和保健由国家保证和供给。不仅收入而且很大部分的社会服务都由就业地提供。⁴⁷

伴随转型出现的衰退，使旧的社会保护体制经受了它毫无准备的考验。除了转型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缩小之外，政府在经济中的份额也缩小了。衰退和财政退缩的双重冲击意味着，各国必须建立一种替代制度以提供社会服务和减少贫困，但依靠的资源减少了。1989至2000年，东欧各国政府合计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平均从53%降至42%，而在独联体国家，该份额从50%降到26%。在几个最穷的独联体国家，该份额下降得更多，例如在格鲁吉亚降到了18%。⁴⁸ 不过，这种下降的很大部分是政府投资支出的消减造成的。

对于转型期间如何保护人民，各个转型经济体应对挑战的办法明显不同。在转型进入极其深入阶段的国家，政府发挥了主动作用缓解转型的冲击。尽管面临衰退压力，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维持了社会保护水平，同时又给体制本身重新确定方向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部分独联体国家也基本保持了社会保护的水平，例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不过这里的体制没有进行多少改革。在其余的转型经济体，在特定基础上进行改革的同时收缩了社会保护体制的规模。几个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如格鲁吉亚，情况特别艰难，社会保护几乎处于解体状态。

⁴⁵ 对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 Viktor Ivanter 博士的采访（可查阅 www.echo.msk.ru）。

⁴⁶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1年转型报告：转型中的能量》（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1年，伦敦），第195页；和《2002年转型报告：农业和农村转型》……，第135页。

⁴⁷ 关于改革前社会保护体制的说明，例如见 Branko Milanovic，前引书，第12-19页；和《转型中的贫困》……，第90-93页。

⁴⁸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132页；《转型：头十年……》，第81-82页。

政府社会保护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a) 社会保障（包括退休金和失业补助）；(b) 定向的福利（家庭补贴）；(c) 不定向的补贴；和 (d) 保健和教育的提供。除了社会保护外，政府还能够采取主动措施应对贫困，如职业培训和公共工程。

退休金的改革

在所有的社会保护方案中，退休金方案在转型过程中也许保存得最为完好。东欧的情况尤其如此，在有些国家，用于退休金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了转型前的水平；但是甚至在最贫困的转型经济体，退休也为退休金领取者及其家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稳定收入的作用。如前文所讨论，退休金领取者的贫困风险一般小于或接近于整个人口的风险，而且明显小于失业者或农村地区的居民。⁴⁹

平均而言，1990 年代，用于退休金的政府开支在东欧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并在独联体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就个别国家而言，这个比例不等，从波兰的 15.5%（1997 年）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96 年）、格鲁吉亚（2000 年）和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1996 年）仅占 2-3%（见表八.6）。⁵⁰ 对于退休金支出的跨国比较必须审慎对待。转型经济体多数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相似（妇女 55 岁和男子 60 岁），但其他的资格条件可能不同。在某些专业类别，转型经济体的工人可以在 45 岁甚至更早退休。此外，转型经济体对于残疾退休金的领取条件往往很宽松，所以退休年龄前的退休金领取者中残疾人的数目增加了。在波兰和克罗地亚，第一年领取退休金的人中间分别有 60%和 90%不满 60 岁。⁵¹

表八.6

1994-2000 年用于政府开支退休金的

百分比				
国家	年份	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	年份	平均退休金占人均收入的比例
东欧				
阿尔巴尼亚	1995	5.1
保加利亚	1996	7.3	1995	39.3
克罗地亚	1997	11.6
捷克共和国	1999	9.8	1996	37.0
爱沙尼亚	1995	7.0	1995	56.7
匈牙利	1996	9.7	1996	33.6

⁴⁹ Branko Milanovic, 前引书；和《转型：头十年……》，第 39-42 页。

⁵⁰ 《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 292-294 页。

⁵¹ 《转型中的贫困》……，第 98 页；和《2002 年转型报告》……，第 183 页。

国家	年份	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	年份	平均退休金占人均收入的比例
拉脱维亚	1995	10.2	1994	47.6
立陶宛	1998	7.3	1995	21.3
波兰	1997	15.5	1995	61.2
罗马尼亚	1996	5.1	1994	34.0
斯洛伐克	1994	9.1	1994	44.5
斯洛文尼亚	1996	13.6	1996	49.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8	8.7	1996	91.6
独立国家联合体				
亚美尼亚	1996	3.1	1996	18.7
阿塞拜疆	1996	2.5	1996	51.4
白俄罗斯	1997	7.7	1995	31.2
格鲁吉亚	2000	2.7	1996	12.6
哈萨克斯坦	1997	5.0	1996	18.8
吉尔吉斯斯坦	1997	6.0	1994	35.0
摩尔多瓦共和国	1996	7.5
俄罗斯联邦	1996	5.7	1995	18.3
塔吉克斯坦	1996	3.0
土库曼斯坦	1996	2.3
乌克兰	1996	8.6	1995	30.9
乌兹别克斯坦	1995	5.3	1995	45.8

资料来源：《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CD-ROM（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年）。

为了补充其退休金收入，转型经济体的许多退休人员继续工作。在退休金领取者总数中，捷克共和国、波兰和俄罗斯联邦有10%至12%的人继续工作，但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只有4%至6%的人继续工作。经合发组织欧洲成员国退休金领取者的平均就业率不足4%。⁵²

虽然在最穷的独联体国家退休金水平不够高，但对于最富裕的转型经济体而言，退休金水平也许是无法长期维持的。鉴于多数转型经济体的人口组成情况，情况更是如此。人口中老年人的份额正以快于就业的份额增加，造成依赖比率快速增长。1990年代晚些时候，在有些东欧国家，退休金领取者的人数迫近工资劳动者人数。

⁵² Alexandre Kolev 和 Anne Pascal, “什么因素使俄罗斯的退休金领取者继续工作?”, 《转型经济学》, 第10卷, 第1期(2002年), 第33页。

近年来，多数转型经济体开始改革它们的退休金制度。目标是模仿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智利的退休金制度，它们已改革了退休金计划，逐步减少退休金中现收现付部分，同时在现有的退休金上增加基于就业界定的缴款计划和个人私人计划。此外，其中多数改革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和实行更严格的资格条件。在 2001—2002 年，阿尔巴尼亚将妇女的退休年龄从 55 岁提高到 60 岁，男子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爱沙尼亚已开始向统一的 63 岁退休年龄制过渡。对于较富裕的东欧国家来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不过，在有些独联体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据某些人估计男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低于退休年龄。⁵³ 因此，对照工作年龄人口高流动性造成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造成的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定向社会保护

定向福利方案（对有子女贫穷家庭的直接付款、个人住房、公用事业和其他补贴）与退休金相比，在社会保护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小得多。在东欧，定向援助的开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5%（亚美尼亚除外，该国的开支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⁵⁴

由于经济形势迅速变化，非正规部门规模大和经济状况调查经验极少，难以对此种方案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名义上定向的补贴的一大部分发给了富裕而不是贫穷的住户。在根本不进行经济状况调查的国家，资源的浪费特别巨大。

不过，有几个例子说明转型经济体的定向福利方案取得了成功。拥有此种方案的一个经济体是罗马尼亚，它将对有子女家庭的定向援助与上学情况联系起来。在罗马尼亚，几乎 80% 的社会援助资金和 50% 以上的家庭补贴发给了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这个比例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见表八.7）。

⁵³ Michael Ellman, “改革过程的社会成本和后果”，载于《2000 年欧洲经济概览》，第 2/3 期（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II.28），第 133 页。

⁵⁴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293 页。

表八.7

1996-1997 年转型经济体中现金补助的定向情况

百分比			
国家	年份	社会援助	子女/家庭补贴
阿尔巴尼亚	1996	47	..
亚美尼亚	1996	..	25
克罗地亚	1998	25	28
爱沙尼亚	1995	44	40
匈牙利	1997	46	20
哈萨克斯坦	1996	6	24
拉脱维亚	1998	20	29
罗马尼亚	1997	79	5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7	47	5
乌兹别克斯坦	1999	23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欧洲和中亚的贫困和不平等》（华盛顿特区，2000年），第298页。

注：本表显示在不同国家多大比例的一般现金援助和子女/家庭补助到达最穷的20%的人口。

例如，在拉脱维亚、克罗地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最穷的20%的住户只领到社会援助资金总额的20%至25%，这反映出定向性较差。在罗马尼亚，最穷的20%的人口得到社会援助总额的79%，这表明定向比较准确。

不定向的补贴

在转型经济体，不定向的补贴采取对下述项目实行价格控制的形式，即公用事业包括电、暖气、电信、供水和其他一些服务和货物如公共交通和基本主食。补贴的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在转型最深入的国家，补贴微不足道，而在独联体国家，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如阿塞拜疆，1999年电和天然气的补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2%；在俄罗斯联邦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⁵⁵

所有转型经济体都从中央计划时期继承了广泛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向几乎所有的住户提供电力和向50-90%的住户提供自来水、集中供气、供暖和排污系统。在改革前，基于前苏联充裕的能源供应，转型经济体的能源价格被压得很低。随着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散，流向东欧的补贴能源停止供应，因此迫使这些国家

⁵⁵ 同上，第135页；和经合组织，《经济概览：俄罗斯联邦》（经合组织，2002年，巴黎），第20页。

支付国际市场水平的价格。与此同时，在多数独联体国家，各国政府试图维持公用事业的低价，声称这项政策是社会保护的一种形式。补贴分政府预算拨款的明补，或体现为允许客户不支付造成能源供应企业拖欠款累积或免除能源使用企业税款的暗补。在俄罗斯联邦，显然为了维持就业，地方政府给予大型能源使用企业大量补贴，在 1990 年代中期这项补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交互补贴比较普遍。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工业用户的电费约为住户电费的两倍。⁵⁶

无论从财政影响还是从宏观经济效率损失看，能源补贴让转型经济体付出极大的代价。此外，这些补贴在帮助穷人方面的作用很受争议。即使价格以实际生产成本为基础，多数转型经济体电力和取暖的支出也只占家庭预算很小的比例，通常在 5% 以下。⁵⁷ 鉴于穷人只得到用于维持能源补贴的资源的一部分，可以看出需要其他更有选择性的社会援助方案。

目前转型经济体用来帮助穷人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替代方法包括：(a) 生命线费率，其中初始部分能源免费或低价供应；(b) 定向能源补贴；和(c) 一般收入支助。这些方案的效率各不相同，因为它取决于收入和能源使用的准确测量；但是在许多转型经济体，这种测量十分不准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独联体国家目前普遍实行的造成浪费的全面补贴制度需要加以改革。

用于教育和卫生的政府开支

良好教育和卫生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普及的教育和保健体制是中央计划国家的骄傲。不过，到中央计划体制崩溃时，卫生和教育体制已经在失效，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低于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就表明了这一点。

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即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多数转型经济体仍努力将用于教育和保健的政府开支维持在某一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水平上。在有些国家如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份额甚至提高了。然而在高加索和中亚各国，份额下降了（见表八.8）。不过，改革性衰退使支出金额大幅度下降。⁵⁸

除卫生和教育开支减少以外，转型经济体还遇到了效率低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在教育方面，这些问题包括人浮于事，生产能力利用率低，资源向高等教育倾斜，教育质量下降和腐败加剧。

开支和效率的下降已经影响到了成果的质量和对穷人的影响尤其大。1990 年代许多独联体国家的义务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的入学率降低了，1998 年在哈

⁵⁶ 《2001 年转型报告》……，第 98 页。

⁵⁷ 同上，第 99 页。

⁵⁸ 《转型中的妇女》……，第 16 页。

萨克斯坦，6至12岁儿童中有19%不上学。⁵⁹1989年至1997年，亚美尼亚普通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下降了15%，格鲁吉亚下降了40%，而塔吉克斯坦下降了45%。

接受教育的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在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人口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只得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不足的10%，而收入最高的两个五分之一分别得到29%和26%。⁶⁰保加利亚2001年最穷五分之一人口的子女与最富五分之一的子女的入学率差距，城市和农村分别为23%和45%。在俄罗斯联邦，低收入家庭17-19岁子女的入学率比高收入组低三分之一，而大专院校的入学率为一半。1990年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所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大学，非莫斯科科学生的比例从占总数的80%降到了20%。⁶¹

表八.8

1990、1998和2000年政府在教育 and 卫生方面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百分比				
国家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政府在卫生方面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1990	1998	1990	2000
东欧				
阿尔巴尼亚	5.9	..	3.4	2.1
保加利亚	5.2	3.4	4.1	3.0
克罗地亚、	7.2	4.2	9.5	8.0
捷克共和国	..	4.2	4.8	6.6
爱沙尼亚	..	6.8	1.9	4.7
匈牙利	5.8	4.6	6.0	5.2
拉脱维亚	3.8	6.8	2.7	3.5
立陶宛	4.6	6.4	3.0	4.3
波兰	4.6	5.4	4.8	4.2
罗马尼亚	2.8	3.5	2.8	1.9
斯洛伐克	5.1	..	5.0	5.3
斯洛文尼亚	4.8	6.8

⁵⁹ 《转型中的贫困》……，第72页；和《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230页。

⁶⁰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0页。

⁶¹ 《保加利亚贫困评估》，世界银行报告，第24516号（世界银行，2002年10月29日，华盛顿特区），第110页；Milanovic,《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第12-19页；《转型中的穷国》……，第75页；和《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232页。

百分比				
国家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政府在卫生方面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1990	1998	1990	200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独立国家联合体	..	4.1	9.2	5.1
亚美尼亚	7.0	3.2
阿塞拜疆	..	3.4	2.7	0.7
白俄罗斯	4.8	..	2.5	4.7
格鲁吉亚	..	5.2	3.0	0.8
哈萨克斯坦	3.2	4.4	3.2	2.7
吉尔吉斯斯坦	8.4	5.4	4.7	2.2
摩尔多瓦共和国	5.6	10.2	4.4	2.9
俄罗斯联邦	3.0	3.5	2.5	3.8
塔吉克斯坦	10.0	2.1	4.9	1.0
土库曼斯坦	4.3	..	4.0	4.6
乌克兰	5.2	4.5	3.0	2.9
乌兹别克斯坦	9.5	7.7	4.6	2.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光盘（华盛顿特区，2002年）；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1年：让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和增编（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01年），第195-197页。

入学率不断下降和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具有长远后果：影响较穷家庭子女的创收机会并从而制造“贫困陷阱”。⁶² 关于改革教育的建议要求更强调提供普及基础教育（特别是在较穷的独联体国家）；将政府资金从高等教育重新配置到初等和中等教育；裁减公立教育系统雇用的人员；及合并学校基础设施。⁶³

在转型经济体中制止人力资本减少趋势的方案取得成功的为数很少的例子之一是上述罗马尼亚对贫穷家庭实行的定向家庭补贴制度，将这种补贴与这些家庭子女的上学情况联系起来（类似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用的方案）。这个方案于1993年实行，它有助于把罗马尼亚的入学率从1992年的89.6%提高到1997

⁶² 关于就贫困陷阱进行的更充分的讨论，见《2000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II.C.1），第六章，题为“作为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的教育”。

⁶³ Peter S.Keller 和 Christian Heller，《转型国家的社会部门改革》，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01/35号（华盛顿特区，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第21-22项；《转型中的贫困》……，第86-87页；和《转型：头十年……》，第85页。

年的 95%。⁶⁴ 主要由于这个方案，罗马尼亚还实现了政府教育经费最公平的分配：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得到了公共开支的 24%，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得到了 15%。⁶⁵

公共保健体制的衰落也过度地影响了较穷的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人口中较贫穷部分。在中亚和高加索，保健支出的相对值和绝对值双双下降了。在格鲁吉亚，下降幅度从 199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跌至 2000 年的 0.8%（见表 8.8）。此外，没有进行结构改革以向新的市场环境调整，意味着损失了保健效率和可利用保健的机会，尤其是对于穷人。保健的主要问题包括人浮于事，医院床位过多，住院时间长于所需期限和病人为医疗服务普遍进行非正规的支付。

日益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享受保健的机会不平等。在保加利亚，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得到 13% 的政府保健开支，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得到了 25%。1997 年在俄罗斯联邦，11% 的病人负担不起医疗费和 41% 的病人买不起必需的药物。在哈萨克斯坦，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子女免疫接种覆盖率超过 80%，但底部的五分之一刚刚达到 40%。⁶⁶

保健体制的混乱造成健康指标的下降。在独联体各国最贫穷的区域和巴尔干半岛，儿童和妇女普遍发生营养不良、贫血和缺碘现象。与此同时，肺结核、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流行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保健危机正在造成另一个危险的贫困陷阱，因为健康状况不佳是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为解决危机提出的措施包括：将资源其中于预防性（而不是治愈性）初级保健；以儿童为重点；合并各种设施，从而减少医院床位；合理调整私人付款。⁶⁷

⁶⁴ 指 6-7 岁至 14-15 岁年龄组的儿童，根据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和方法。见：Michael Ellman，前引书，第 130 页。

⁶⁵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80 页。

⁶⁶ 《转型：头十年……》，第 86 页；《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81 页；和《使转型对人人起作用……》，第 259 页。

⁶⁷ Peter Keller 和 Christian Heller，前引书，第 21-23 页；《转型中的贫困》……，第 57-63 页；和《转型：头十年……》，第 85 页。

应对贫困：私人反应

由于多数转型经济体政府提供的减贫方案力度不够，贫穷的家庭和个人站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前沿。在转型开始时，转型经济体的人民未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对市场经济规则的了解很肤浅。此外，如前所述，1990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许多人的储蓄付之东流。

各种各样的应对战略应运而生：自营职业和非正规经济增长；耕种家庭自留地以满足粮食需要；家庭内部转移；国内迁徙；和向其他国家移民。其中每种战略各有好处，而且事实说明有些战略的减贫效率高于政府的转移。例如现已证实家庭内部向穷人的转移比类似的政府补贴针对性较强，因此就给定的资源转移而言，在福利方面产生较大的效益。⁶⁸与此同时，许多私人的应对战略导致社会和经济上受人质疑的结果如去城市化（城市居民迁回农业地区），非正规经济增长和犯罪的蔓延。

自营职业和非正规经济的增长

面对失业和（或）工资下降，转型经济体的千百万人转向自营职业。其中许多人组成未加登记的单干企业，从事各种活动如转售消费品，“穿梭贸易”和在家中进行的业务如缝纫、修理、清洁、提供日托服务和家教。⁶⁹

1990至1995年，非正规部门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据估计在保加利亚从25%增至36%；在拉脱维亚从12%增长35%；在罗马尼亚从14%增至19%；在阿塞拜疆从22%增至61%；在俄罗斯联邦从15%增至42%；在乌克兰从16%增至49%（见表8.9）。不过，该部门的增长不一致。在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以及在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非正规部门在经济中的份额已所减少或略有增加。⁷⁰

非正规经济不同的增长格局着重说明转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开放性和活跃性是不同的。在转型比较深入的那些国家，正规经济为就业和创办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而在其他转型经济体，这些机会的缺乏迫使千百万人转入非正规部门。例如在俄罗斯联邦，1 200多万人自营职业，多数属于单干。与此同时，

⁶⁸ 《保加利亚贫困评估》……，第100页；和 Stanislav Kolesnikov 和 Ksenia Yudaeva，“危机后俄罗斯的不平等和贫困”，《经济趋势》，第8卷，第3期（1999年8月），第14页。

⁶⁹ 穿梭贸易这一用语一般被用来描述转型经济体中成千上万的个人从事的不受管理和不作登记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它涉及从国外进货并在俄罗斯联邦的街头市场上出售。在19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联邦，未作登记的穿梭贸易的营业额估计达到了100亿美元，与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年收入总额不相上下。

⁷⁰ 根据定义，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估计数只能是大概数。每项此类估计严重依赖于采用的假设和方法。有关讨论例如见：Simon Johnson、Daniel Kaufman 和 Andrei Shleifer，“转型中的非正规经济”，《布鲁金斯经济活动问题论文》，第2卷（1997年），第159-221页；和 Maria Lacko，“隐藏经济-不明的数量？”，《转型经济学》，第8卷，第1期（2000年），第117-149页。

俄罗斯联邦正式登记的小企业数目不足 100 万个，查比之下，波兰有 400 万个，美国超过 1 500 万个。实际上，俄罗斯联邦私营小企业的总数还不及美国每年新开张的企业数。

除了自营职业机会外，非正规经济还提供大量的兼职岗位。例如在俄罗斯联邦，据估计大约 70% 的此类岗位在非正规经济中。⁷¹

表八.9

1990 和 1995 年部分转型国家非正规经济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估计数

百分比		
国家	1990	1995
东欧		
保加利亚	25.1	36.2
捷克共和国	6.7	11.3
爱沙尼亚	19.9	11.8
匈牙利	28.0	29.0
拉脱维亚	12.8	35.3
立陶宛	11.3	21.6
波兰	19.6	12.6
罗马尼亚	13.7	19.1
斯洛伐克	7.7	5.8
独立国家联合体		
阿塞拜疆	21.9	60.6
白俄罗斯	15.4	19.3
格鲁吉亚	24.9	62.6
哈萨克斯坦	17.0	34.3
摩尔多瓦共和国	18.1	35.7
俄罗斯联邦	14.7	41.6
乌克兰	16.3	48.9
乌兹别克斯坦	11.4	6.5

资料来源：Simon Johnson、Daniel Kaufman 和 Andrei Shleifer，“转型中的非正规经济”，《布鲁金斯经济活动问题论文》，第 2 卷（1997 年），第 183 页。

⁷¹ Byung-Yeon Kim，《俄罗斯住户参加非正规经济的情况》，《转型经济学》，第 10 卷，第 3 期（2002 年），第 703 页。

耕种自留地和去城市化

普遍拥有小块家庭自留地是中央计划经济体的特色之一。这一特色的深层原因部分在于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未来共产主义取消社会城乡差别的梦想），部分在于实际，事实证明这一特色十分重要，有助于人们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存活下来。据某些估计，前苏联各继承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实际上所有的农村居民都拥有此种家庭自留地。中东欧区域这个比例也许略低，但在巴尔干却类似。在俄罗斯联邦大约 1.45 亿人口中，1990 年代中期此种自留地的数目估计为 5 500 万块。⁷² 家庭自留地作为减贫手段的作用难以高估。这些自留地的产量在保加利亚粮食消费总量中占 22%，在俄罗斯联邦占 20-24%。⁷³

在有些国家，躲到农村从事劳动成为摆脱贫困的一种比较长远的解决办法，导致城市居民重新定居到农村。这种趋势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最为明显。在改革的头 5 年，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以及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农业的就业人数实际上增加了。因此，农业起着一种缓冲作用，缓解改革衰退给最穷部分的人民带来的打击。⁷⁴

内外移民

尽管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差，转型经济体的千百万人试图通过移居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躲避贫困的威胁。人们为应对经济和政治动乱而移民的程度在独联体特别严重。1990 年代期间，仅俄罗斯联邦一国就接纳了近 1 100 万移民，几乎全部来自独联体。⁷⁵ 与此同时，在 1992 至 2002 年期间，接近 540 万俄罗斯公民移居其他国家。内外移民的实际数目也许高得多，因为政府机构难以跟踪非法的劳工移民。

非法移民在独联体的其他国家普遍存在，例如下述情况可以证明，即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移民到俄罗斯联邦和波兰找工作，而摩尔多瓦人移民到罗马尼亚和西欧各国及其他国家。东欧各国移居外国的程度较低但人数仍然不少。1990 年代，保加利亚每年移居国外的人有 5 万至 9 万，而波兰的人数在 1 万至 2 万之间（净移民数）。独具特点的是，在这个时期，最富裕的转型国家中的两个即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移民人数为正净值。⁷⁶

⁷² Harm Tho Seeth 等人，“俄罗斯的贫困：用园地混过经济转型期”，《世界开发》，第 26 卷，第 9 期（1998 年），第 1612 页。

⁷³ 《保加利亚贫困评估》……，第 100 页；和 Simon Clarke，前引书，第 15 页。

⁷⁴ Liesbeth Dries 和 Johan F. M. Swinnen，“转型期内的机构改革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来自波兰农业的理论证据，《世界开发》，第 30 卷，第 3 期（2002 年），第 458 页。

⁷⁵ 《俄罗斯统计年鉴》（统计局，1991 年，莫斯科），第 128 页；和 <http://www.gks.ru>。

⁷⁶ 《保加利亚贫困评估》……，第 102 页。

家庭内部转移的作用

家庭内部的转移，包括来自移民的汇款，在独联体各国尤其重要，那里的政府社会保护体制业经证明特别薄弱。在俄罗斯联邦，根据住户调查，1997年所有住户中25.2%的住户得到了家庭内部的转移，而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住户中31.5%得了这种转移；在哈萨克斯坦，类似的比率分别为27.5%和33.8%；而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比率是35.5%和31.7%⁷⁷在俄罗斯联邦，1993年家庭内部的转移构成住户现金收入总额的4.7%，1996年占到7.1%，1998年占到12%。这些转移占到此种转移净领取者收入的20%和占到所有领取者中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一半。⁷⁸独具特点的是，在俄罗斯联邦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家庭内部转移的作用增大了，而在波兰（它恢复经济增长的时间早得多），这种作用减弱了。⁷⁹2001年在保加利亚，14%的家庭得到了私人转移，达到这些住户平均消费的34%。

与政府援助相比，家庭内部的转移一般针对性更强。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俄罗斯联邦，家庭内部的转移将人均总贫困点数降低4%，政府转移将其降低1.5%。⁸⁰在保加利亚，此种转移将领取住户中的贫困率降低了16个百分点，将保加利亚的总体贫困率降低了2个百分点。⁸¹

结论意见

与多数预期相反，事实证明，与许多国家一开始的设想相比，向市场转型的时间较长而且社会代价大得多。1990年代的改革性衰退和许多住户收入的急剧减少，造成该区域大规模的贫困和匮乏。到1990年代中期，转型经济体4.14亿人口中几乎30%的人生活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4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以最快速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遏制住了贫困的增加。在这些国家，衰退时间较短，收入分化不那么剧烈，而且各国政府齐心协力向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例如退休金领取者、失业者、单身母亲和儿童。在多数独联体国家，情况严重得多，而且在有些国家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穷人。

向市场经济转型最深入的东欧国家的政府对大规模贫困的挑战普遍作出了适当的反应，而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其他国家（例如巴尔干各国）政府的对策，充其量说也是不充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过时和其他客

⁷⁷ 《2001/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44页。

⁷⁸ Simon Clarke, 前引书, 第30页。

⁷⁹ Jeni Klugman 和 Jenine Braithwaite, 前引书, 第54页。

⁸⁰ Stanislav Kolesnikov 和 Ksenia Yudaeva, 前引书, 第14页。

⁸¹ 《保加利亚贫困评估》……，第100页。

观因素，预先决定了政府的这种失效。不过，政策选择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许多独联体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利益集团成功地从社会开支中转走了很大部分已经在不断减少的政府资金。

面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人民不受穷的局面，转型经济体中千百万的人求助于私人战略来摆脱贫困。这包括不登记的就业和自营职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和在极端情况下从事犯罪活动。这样，东欧与贫困进行的斗争以政府行动为主，但在独联体，这种斗争却以私人反应为主。

在市场改革开始后 10 多年，所有的转型经济体都已回到了经济增长的道路，这制止了贫困的进一步增加。不过，许多挑战依然存在。

其中一项挑战是慢性长期贫困的出现。较富和较穷的转型国家都存在这种形式的贫困，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发展成一个新的永久性下层社会的风险。慢性贫困集中于萧条的产业、特定区域和人口及民族群体，以及多子女的农村家庭。对于东欧较富的国家来说，慢性贫困（其中有些很严重）的出现也许是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的贫困挑战。

事实证明，利用定向的社会保护，依靠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转型经济体早期此类成功经验，可能有利于转型经济体向慢性贫困作斗争的努力。措施将包括绘制区域贫困图，投资于运输设施以帮助萧条区域进入新市场和克服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以及执行特定民族的社会方案。在有些情况下，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也许是适当的，例如重新安置有些地点如俄罗斯联邦北方地区和封闭的军工城市的人口，因为这里不存在可持续就业的前景。

劳动力市场领域主要的挑战是向转型经济体人民提供日益增多的具有收益和合法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的政策任务是不同的。在前者，由于劳动力市场较具灵活性，此项任务可以描述为对现行的立法进行微调，例如通过对失业补助实行更严格的资格条件。相反，在独联体各国，必须提高微薄的失业补助和最低工资并将它们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挂钩。如果废除对中小企业的行政和财政限制和削减对效率低下的大型企业的补贴，将使独联体的劳动力市场从中受益。可以鼓励政府失业管理机构提供更主动的就业服务如工作岗位配对和职业再培训。

转型经济体的第二轮改革应包括旨在协调政府和私人应对贫困办法的措施。例如，这将包括将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非正规部门和通过处理大规模非法移民问题的移民立法。

在社会保护领域，东欧各国政府面临着根据国家财政能力调整现行的补助水平如退休金水平的任务。例如，这将意味着在象波兰和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国家转而实行多支柱退休金制度和可能削减不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们在这些国家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大于发达国家。在独联体国家，目标应是减少或取消浪

费的全面能源补贴，提升社会保障付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并使个人基本社会保护水平更接近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

某些转型经济体政府可能会发现提高政府教育和卫生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是有益的。合理的份额对维护人力资本至关重要，人力资本是人口创收前景的关键性决定因素⁸²应当制止和扭转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下降的趋势，在最大的独联体国家（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盟和乌克兰）这一点特别明显。否则，不良的健康和较低的教育程度将使这些国家千百万年轻人处于恶性的贫困陷阱中。

许多东欧国家消除大规模贫困的前景相当看好。其中 8 个国家将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而另外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拟于 2007 年随后加入。到十年末，在欧盟支助下经过自身的努力，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将大大减轻。

独联体各国减轻贫困的前景的明朗程度低得多。在中亚和高加索较小和较穷的国家，随着它们的经济继续复苏，急性的大规模贫困也许将会减退。不过，如不扭转收入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和奉行积极的创造就业机会政策，减贫的进展速度将很慢。国际战略如多边的“独联体 7 国”倡议，对于遏制这里的贫困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最大的独联体国家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第二阶段改革的方向。为实现其增长潜力，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可考虑放开劳动力和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部门增长，并取消对大企业的浪费性补贴。反过来，这些措施的实行将取决于缩小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和保持总体的政治稳定。

尽管有种种安全和社会保障，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前景和中央计划体制明显的失效促使东欧和苏联各国人民摆脱了这种制度。目前，向市场体制转型已有十多年时间，这种前景正在实现，但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这个区域的部分国家已准备好加入或重新加入发达世界，但在另一些国家，仍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目前，最糟的情况也许结束了，但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拥有合适的手段并借助于政府适当的支助和政策，转型经济体各国千百万受过良好教育和勤劳的人民将完全有能力摆脱他们的悲惨命运。

⁸² 《转型中的贫困》……，第 36-37 页。

附件

统计表

附件

统计表

本附件载列了各组主要数据，《2003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这些数据和信息为截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可获得的数据和信息。

本附件是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监测和评估股根据从联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以及从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国家及私人来源获得的资料编写的。最近几年的估计数是经济监测和评估股在与各区域委员会和参加联接项目(直接见下文)的成员协商后得出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概览》中载列的数据可能不同于这些其他组织和来源的出版物的数据,其中包括时间选择、抽样构成和总合方法的差异(数据差异的其他原因见下文“数据质量”一节)。由于从个别国家取得的数据有所更新和变动,本《概览》中的历史数据可能与以前的版本有所不同。

预测是基于上述联接项目 2003 年 4 月开展的预测活动的结果做出的,联接项目是一个由经济监测和评估股和多伦多大学共同协调的计量经济模式国际协作研究小组。它本身是一个全球模型,把 79 个国家和区域经济模型的贸易和金融变量联接在一起,这些模型由 60 多个国家机构和经济监测和评估股管理。^a主要的联系因素是商品贸易和价格,以及主要国家的利率和汇率。联接系统利用互动过程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经济的前后一致的预测,以便根据内存因素,同时确定国际贸易流量和价格以及其他变量。国际原油价格是一个例外。预计 200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一揽子七种原油的平均价格将上涨 12%,2004 年将下跌约 10%。

国家分类

为分析起见,《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把国家分为三类中的一类:发达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下列表格具体列示了这些类别的构成。进行分类是为了反映各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有几个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的特点使其可以列入不止一个类别,但从分析的角度讲,这些类别都是相互排斥的。

发达经济体(见表 A)的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是最高的。它们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并且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提供广泛的服务;农业占产出的比重普遍很小,制造业所占比重普遍下降。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工人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工人,经常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达经济体往往是科技研究的中心。发达国家的政府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而且一般不寻求外援。

^a 有关联接项目的其他信息请访问 <http://www.un.org/analysis/link/index.htm>。

转型经济体的特点是 1980 年代末期开始转型，它们不再按社会主要组织原则对资源分配实行中央管理，而是着手逐步建立或重建市场经济。这些经济体在开始转型时，有些已经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许多特点，另一些则具有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些特点。但是从本《概览》分析的角度看，它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经济结构进行的转型。

表 A

发达经济体^a

欧 洲			
欧洲联盟	其他欧洲国家	其他国家	主要工业化经济体
欧元区			
奥地利	冰岛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比利时	马耳他	加拿大	法国
芬兰	挪威	日本	德国
法国	瑞士	新西兰	意大利
德国		美利坚合众国	日本
希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爱尔兰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其他欧盟国家			
丹麦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a 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监测和评估系统监测的国家。

表 B
转型经济体^a

波罗的海国家	中欧和东欧国家	独立国家联合体
爱沙尼亚	中欧	亚美尼亚
拉脱维亚	捷克共和国	阿塞拜疆
立陶宛	匈牙利	白俄罗斯
	波兰	格鲁吉亚
	斯洛伐克	哈萨克斯坦
	斯洛文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东南欧	摩尔多瓦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	俄罗斯联邦
	保加利亚	塔吉克斯坦
	克罗地亚	土库曼斯坦
	罗马尼亚	乌克兰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a 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监测和评估系统监测的国家。

世界其他国家被统一归入发展中经济体这个范畴。这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类别，但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它们中许多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和范围广泛的贫穷现象。在科学技术创新及其在新产品和生产工艺中的应用上，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引进者而非开发者。它们往往更易受到经济冲击的伤害。

根据 95 个经济体的数据计算发展中国家产出增长估计数。1995 年，这些经济体的国内总产值和人口占有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领土的 97% 至 98%。抽样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和人口在发展中国家所属的每个地理区域占 95% 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该地区抽样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和人口至少占 90%。

本《概览》采用了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名称：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亚、中国及东亚和南亚（其中包括太平洋岛屿）。^b 按地域对国家进行的分类在下文表 C 中具体列出。

表 C

按区域分列的发展中经济体^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东亚	南亚	西亚
燃料净出口国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墨西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委内瑞拉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喀麦隆 刚果 埃及 加蓬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b 尼日利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b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巴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科威特 ^b 阿曼 ^b 卡塔尔 ^b 沙特阿拉伯 ^b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b
燃料净进口国	阿根廷 巴巴多斯 巴西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海地	贝宁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 乍得 科特迪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加纳 几内亚	香港 SAR ^c 马来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大韩民国 新加坡 ^b 中国台湾省 ^b 泰国	孟加拉国 印度 缅甸 尼泊尔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塞浦路斯 以色列 约旦 黎巴嫩 土耳其 也门

^b 地理区域的名称和构成根据“统计用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ST/ESA/STAT/SER.M49/Rev. 3)，但西亚除外，本《概览》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包括在西亚中(这是因为石油部门在其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		
			东亚	南亚	西亚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乌拉圭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毛里求斯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南非 苏丹 多哥 突尼斯 乌干达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中国		

^a 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监测和评估系统监测的国家。

^b 净债权经济体。

^c 中国特别行政区。

《概览》还采用了称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理分组，其中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但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大国在国内总产值、人口和国际贸易等方面都居本区域首位，分类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出撒南非洲众多较小经济体的情况，避免因为把这两个国家包括在内而导致失真。

为进行分析起见，将发展中国家分为燃料出口国或燃料进口国，因为出口燃料的能力或进口燃料的需求对一个国家进口其他商品和服务因而对产出的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往往受制于手头拥有的外汇。之所以只考虑

燃料而非范围更广的能源，是因为燃料价格与石油价格有着更直接的联系，而石油价格特别易变，常常对国家的收入和进口能力有很大影响。

一国若同时符合以下三项标准，即被界定为燃料出口国：**(a)**其国内主要商业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煤和褐煤，但不包括水电和核电)的产量超过其国内消费量至少 20%；**(b)**其燃料出口值至少占其出口总值的 20%；**(c)**未被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

燃料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分组是最不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名单是由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发展政策委员会建议基础上提出的建议决定的。该委员会提出确定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并就个别国家的资格提出建议。一个国家列入名单的基本标准是在人均国内总产值、经济脆弱性指数和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等几个方面低于确定的起点。^c截至 2003 年 5 月，列入名单的有如下 49 个国家：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多哥、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在一些表格中采用了净债权国和净债务国的分类法，其依据是货币基金组织在其 1996 年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所评估的各国在 1995 年年底时的净外国资产状况。^d表 C 中的脚注标识^b代表净债权国。

重债穷国是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考虑减债倡议(增强的重债穷国倡议)的国家。截至 2003 年 4 月，重债穷国包括：安哥拉、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赞比亚。^e

^c 见发展政策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2000 年 4 月 3 日至 7 日)(《2000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 13 号》(E/2000/33))，第四章。

^d 货币基金组织，1996 年，华盛顿。

^e 见货币基金组织，“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债务减免：事实一览表”2003 年 4 月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hipc.htm>)。

数据质量

掌握一个时期各国统一的和可比较的统计资料，对于监测经济发展、探讨社会和贫困问题和评估环境变化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多面性，要求对国家和国际经济、环境和社会数据采用一种综合办法。

1993年修订的《国民账户体系》^f和1993年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货币基金组织手册》）^g，为建立一个反映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协调统一的统计制度奠定了基础。《国民账户体系》体现了宏观和微观方面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分类。现已尽量将《货币基金组织手册》中的概念与《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概念以及货币基金组织有关银行、政府财政和货币统计的方法充分融合在一起。此外，可以通过一个与国民账户体系的中心框架半集成的卫星账户系统，确定国民账户数据与诸如社会、保健、社会保障和旅游等其他方面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

各国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根据这些标准报告它们的数据，而且现有的这些数据被列入了本附件的统计资料中。但是，报告国在覆盖范围、定义和数据收集方法方面不一致，有时会降低本《概览》和其他国际出版物必须采用的某些国家和国际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对于数据迟报、不完整或不报的情况，在选定情况下进行了调整和估计。

数据普遍不准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用了过时的基准调查和人口普查，而有关行为和条件的各种模型和假设也已陈旧。另一方面，当统计管理机构力图使用新的数据来源和更新的调查方法改进它们的估计数时，这些数列可能是不连续的。国民收入估计数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有时需做大约10%至30%的修订。

国民账户和有关指标主要记录通过货币交换进行的市场交易。易货贸易、家庭生产、仅够维持生活的产出和非正规部门活动并不总是加以记录；这些项目在某个国家的全部活动中可能占有很大份额，忽略这些项目可能导致大大低估国家产出。由于各国低估的程度不等，进行比较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经过一段时间后，日益加强的货币化会将非市场部门引入生产的主流中，产出的增长率将因此被夸大。

国家统计资料没有反映经济活动的范围及这些活动在一个时期内的演变，已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关心的问题。此外，由于新的生产方式、交易和实体的激增，先前的统计制度和框架已不适用。因此许多转型经济体已经开

^f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XVII.4）。

^g 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华盛顿）。

始对国家统计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其结果是，现已对这些国家的几个数据系列进行修正，并有望对过去和目前执行的措施作进一步的修正。^h

在特定时间或在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各种缺陷会妨碍在各国或国家类别之间进行比较。各国数据的缺失、不可靠或不一致需要国际组织做出估计和加以替代，以使国家汇总数据的构成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前后一致。尤其是，由于缺少有关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内总产值的可靠估计数，在编制许多数据系列用的国家总计数时需要借助估计数，因为求这些总计数时往往使用国内总产值加权数。

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估计数和其他统计数据的准确程度与其统计系统发展的阶段相关。特别是在非洲，不同的国家和国际来源提供的该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总计数值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处于内乱或战争之中的国家数据常常仅为大概数量。最后，在那些通货膨胀率高和汇率不平衡的国家，国民核算数据中可能含有大量不真实情况。

其他类型的统计数据也有很多问题，诸如失业、消费价格上涨以及进出口额等。例如，由于各国所用定义的差别，对国家间失业情况的比较必须谨慎，因此表 A.7 对于可得到这方面数据的发达国家采用了标准化失业率定义，在许多情况下，这方面的数据与某些国家的定义大相径庭。

消费品价格指数是各国政府最早收集的经济数据系列之一，但即使在拥有最先进的统计系统的国家，对消费品价格指数仍有许多争议。这主要是由于推出了新的商品，而且商品质量和消费行为产生了变化，但由于不经常进行消费调查和修正一揽子抽样商品，往往反映不出这些变化。

对上述许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即使有的话，由于分配用于改进统计系统和报告的资源不足，也会使统计方面的缺点长期存在。有鉴于此，本《概览》所载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应该作为近似值和估计数看待。

数据定义和常规

汇总数据不是各国数据的总和，就是其加权平均数。除另有说明外，增长率的多年平均数用年度综合变动百分率表示。所遵循的惯例是省略多年增长率的基准年，例如，1980 年代一个变数的 10 年平均增长率常被确定为 1981—199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h 见《1995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5.II.C.1），统计附件，题为“数据防止误解说明和常规”的一节。

产出

在界定每个国家的实际国内总产值时沿用各国的惯例，这些国家的数据相加得出区域和全球产出的数字。每一类国家产出的增长率都是根据按 1995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各国国内总产值总数得出的。1995 年按国内货币计算的各国国内总产值数据被折合成美元(在有些情况下作了调整ⁱ)，并利用每个国家实际国内总产值的变动在时间上作了前后展期。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组以 1995 年为中心，约 15 年期的合理累计增长率数据。

计算世界产出的备选汇总方法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采用国家数据的汇率换算加权法，将各国的产出增长率汇总，得出区域和全球总数。这类似于其他国际报告，如世界银行的报告中遵循的方法。不过，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和经合组织在《经济展望》中使用的汇总方法是依据从“国际美元”——使用购买力平价从本国货币换算而来——表示的国内总产值中求出的国家加权数。由这两种方法产生的不同加权数在表 D 中列出。目前对采用哪种方法的问题仍有争议。

表 D

基准年产量和按人口平均产量

	国内生产总值 (10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1995 年 汇率基准	1995 年购买力 平价基准	1995 年 汇率基准	1995 年购买力 平价基准
世界	28 767	34 716	5 157	6 230
发达经济体	22425	19061	27 017	22 965
其中：				
美国	7401	7401	27 537	27 537
欧洲联盟	8427	7 345	22 615	19 711
日本	5134	2 879	40 920	22 948
转型经济体	785	2 327	1 913	5 666
发展中国家	5557	13328	1 281	3 072

ⁱ 在个别汇率看起来无法实现时，用备选汇率替代。可以采用有关年份汇率的平均数，或采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年度的汇率，同时根据自那时以来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

	国内生产总值 (10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1995 年 汇率基准	1995 年购买力 平价基准	1995 年 汇率基准	1995 年购买力 平价基准
按区域分列:				
拉丁美洲	1 689	3 037	3 569	6 418
非洲	463	1 321	685	1 952
西亚	735	1 253	3 449	5 878
东南亚	2 669	7 717	897	2 594
中国	700	3 237	574	2 654
按分析类别分列:				
净债权国	574	791	10 695	14 734
净债务国	4 983	12 537	1 163	2 926
燃料净出口国	4 856	3 184	1 660	4 042
燃料净进口国	1 308	10 144	1 197	2 857
备忘项目: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8	452	314	1 111
最不发达国家	140	528	247	93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采用购买力平价加权数的理由是，当对两个国家的生产进行合计时，应采用一组共同价格对两国相同的活动进行估价。但当使用市场汇率换算国内总产值的本国货币价值时，常不采用这种方法。购买力平价方法采用单独一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被比较国家的某些价格平均数，来重新估价不同国家的支出总额。然后，据此将这些重新估价的国内总产值量与一个采用货币兑换率标准的国家(通常是美国)联系起来，假设该国以购买力平价值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总产值相同。因此，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因素从原则上讲，是购买用货币兑换率标准国家的一个货币单位能够买到的货物和服务需支付的本国货币单位数。

但是，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践中，购买力平价都很难计算，因为各国的货物和服务并不总是可以直接比较的，因此也就难以直接比较它们的价格。尤其困难的是衡量许多服务，如保健和教育的产出和价格。

有人利用购买力平价估计数计算各经济体的相对大小，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最近订出的一组购买力平价价格也仅涉及一小部分国家。最初在 1985 年，只有 64 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后来在国际比较方案支持下进行的工作已经使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但仍远远低于《概览》需要其数据的国家数。

不过，现已注意到以下两方面的某些规律性，一是按市场价格衡量时得出的国内总产值与其主要开支构成之间的规律性，二是按从国际比较项目中得出的“国际”价格衡量时，得出的国内总产值与其构成之间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并使用其他关于消费价格的部分数据)设计出了一种方法，用来大致估算那些没有参加国际比较方案的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及其主要开支构成的购买力平价水平。估算的结果被称为“佩恩世界统计表”。^j

不论是购买力平价方法还是汇率方法，都不能以一种纯理论或完全一致的方式适用于各国国内总产值数据的加权。对一个全球范围的国际比较方案来说，数据需求非常之大，尽管每一轮的覆盖范围都有所扩大。同样，由于以汇率为基础的加权方法假定汇率仅由对外贸易交易和服务决定，并且国内经济都在竞争和自由的条件下运营，因此其应用受到许多国家的外汇管制和反常价格的限制。此外，每个国家都有不适用于“单一价格法”的大量非外贸货物和服务。然而，全球的自由化趋势也许会使今后更加一致地使用汇率的方法成为可能。即便如此，这些方法在概念上不尽相同，因此对世界产出的增长也会有不同的衡量方法。

1981-1990 年期间与 1991-2000 年期间的差异见表 A.1。在两组计算结果中，估计数使用了相同的国家，并使用了个别国家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相同数据。总增长率的不同完全是由于使用了表 D 中所列两组不同加权数的结果。

根据购买力平价换算因素而不是汇率估价各国国内总产值时，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尽管在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按汇率换算时，各区域的增长率没有多大差别（见表 A.1）。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 1990 年代的总体增长速度比世界其他国家迅速，根据购买力平价衡量，这些国家的国内总产值比重大于根据市场汇率估算的比重。中国的影响尤其重要，因为它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高增长率。

^j 见 Robert Summers 和 Alan Heston, “佩恩世界统计表(标号 5): 一项扩大的国际比较, 1950-1988 年”, 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 第 R1562 号(1991 年 5 月,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国际贸易和金融

表 A.13 所列贸易值的主要依据，是使用年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的商品贸易海关数据，这些数据大多取自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以国际收支数据作补充。贸易的美元价值估计数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和经济监测和评估股的估计数，而对进出口数量与价值的预测则主要依靠联接项目。

用于确定各类发展中国家进出口数量衡量方法的单位价值，一部分是根据联合国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三位数和四位数混合等级的商品类别出口价格加权平均数估算出来的；这些加权数反映了每种商品或每个商品类别在该区域进出口总值中所占的份额。

对于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而言，贸易额的增长是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监测和评估股收集的各国数据汇总而来的。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由于欧洲单一市场开始运作，过去在欧盟各成员国边境负责收取和检验各国进出口产品报关单的海关已被取消，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欧盟内部贸易数据收集系统，称为共同体内部统计。该系统主要使用从企业直接收集的资料。为了对统计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它已同涉及欧盟内部贸易的增值税申报系统联网，因此，由于方法的改变，这些国家 1992 年和 1993 年的数据依然缺少连续性。

初级商品总额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0-4 部分：

- **食品**包括《国际贸易标准分类》0-1 部分，即食品和主要供食用的活牲畜；以及饮料和烟草；
- **农业原料**包括《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2 部分(除燃料外的不可食用原材料)和第 4 部分(动植物油、脂和蜡)，但第 2 部分中的分类 27 和 28 除外(分别为粗肥料和原矿物，以及金属矿和金属屑)；
- **燃料**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3 部分(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物质)。

制成品总额包括《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5-8 部分：

- **纺织品**包括分类 65(纺纱、织布、制成品、未在其他部分具体规定或包含在内的产品及有关产品)和分类 84(各种服装和服饰用品)；
- **化学品**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5 部分；
- **机械运输设备**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分类 7；
- **金属**包括分类 67(铁和钢)和 68(有色金属)。

表 A.19 至表 A.22 以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统计》及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中确定的定义和方法为依据。各区域委员会、官方和私人来源以及

经济监测和评估股的估计数用作对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补充。在任何必要情况下，以国家货币汇报的数据都按该时期平均市场汇率转换成美元。区域和分区总计是个别经济体数据的总和。因此，欧元区国家的经常项目差额反映了各个国家总和的财政状况，不排除欧元区内的交易。

除 2003 年欧佩克数据以外，表 A.18 所依据的是国际能源机构《石油市场月报》。2003 年欧佩克供应量的估计数是根据 2003 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数据和欧佩克生产定额方面的资料得出的。《概览》中采用的国家组别和区域与国际能源机构所使用的有所不同，已经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整，将这些不同之处考虑在内。

统计表目录

一. 全球产出和宏观经济指标

页次

表 A. 1.	1980-2002 年世界人口、产出和人均国内总产值	190
表 A. 2.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191
表 A. 3.	转型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192
表 A. 4.	发展中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193
表 A. 5.	发达经济体：1985-2001 年投资、储蓄和净转移	195
表 A. 6.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失业率	196
表 A. 7.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1994-2004 年失业率	197
表 A. 8.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	198
表 A. 9.	转型经济体：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	199
表 A. 10.	发展中国家：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	200
表 A. 11.	主要发达经济体：1994-2002 年金融指标	201
表 A. 12.	选定国家：1994-2002 年实际有效汇率、广义量度	202

二. 国际贸易

表 A. 13.	世界贸易：1994-2003 年按主要国家分组列示的出口和进口价值及数量变动 ..	204
表 A. 14.	贸易方向：1990-2002 年出口额（离岸价格）	206
表 A. 15.	世界商品贸易的组成：1990-2001 年出口额	208
表 A. 16.	世界商品贸易的组成：1990-2001 年进口额	210
表 A. 17.	1994-2003 年初级商品价格指数	212
表 A. 18.	1994-2003 年世界石油的供应、需求和价格	213

三. 国际金融和金融市场

表 A. 19.	1994-2002 年按国家类别列示的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	214
表 A. 20.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发达经济体的状况	215
表 A. 21.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转型经济体的状况	216
表 A. 22.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状况	218
表 A. 23.	1993-2002 年按贷款列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净额	220
表 A. 24.	1993-2002 年按贷款列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转型经济体的贷款净额	221
表 A. 25.	1982-2001 年按类别列示的主要来源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	222
表 A. 26.	1990-2001 年主要来源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区域分配情况	223
表 A. 27.	1994-2002 年多边发展机构的资金承付额	224

一. 全球产出和宏观经济指标

表 A.1.

1980-2002 年世界人口、产出和人均国内总产值

	国内总产值的增长 年百分数变动				人口增长率 年百分数的变动		人口 (百万)		人均国内总产值 汇率基准 (1995 年美元)	
	汇率 基准 (1995 年美元)		购买力 平价基准							
	1981- 1990	1991- 2002	1981- 1990	1991- 2002	1981- 1990	1991- 2002	1980	2002	1980	2002
世界	2.9	2.4	3.0	2.8	1.7	1.4	4 367	6 110	4 531	5 669
发达经济体	3.0	2.1	3.0	2.3	0.6	0.6	756	860	20 225	30 721
美国	3.2	2.9	3.2	2.9	1.0	1.0	230	289	20 851	32 081
欧洲联盟 ^a	2.3	1.9	2.4	1.9	0.3	0.3	355	377	17 628	26 035
日本	4.1	1.2	4.1	1.2	0.6	0.3	117	128	27 381	43 384
转型经济体 ^b	1.8	-1.4	2.0	-1.8	0.7	0.0	378	406	2 616	2 349
发展中国家	2.3	4.2	3.4	5.0	2.1	1.7	3 233	4 844	1 087	1 498
按区域分列										
拉丁美洲	1.1	2.5	1.3	2.6	2.0	1.6	356	527	3 654	3 705
美洲	2.0	2.5	1.9	2.4	2.9	2.5	446	798	801	730
西亚	-2.8	2.3	-1.5	2.6	3.3	2.3	137	248	6 758	3 673
东南亚	7.0	6.2	6.9	6.8	1.8	1.4	2 295	3 270	407	1 164
中国	9.1	9.7	9.1	9.7	1.5	1.0	999	1 294	167	932
除中国以外的地区	6.6	5.0	5.9	4.8	2.1	1.8	1 296	1 976	592	1 316
东亚	7.0	5.0	6.3	4.8	1.9	1.5	411	599	1 322	3 236
南亚	5.3	4.9	5.2	4.9	2.2	1.9	885	1 377	252	480
按分析类别分列:										
净债权国	1.6	3.9	0.9	3.6	3.1	1.9	37	62	10 624	11 670
净债务国	2.4	4.3	3.6	5.1	2.1	1.7	3 197	4 782	977	1 365
燃料净出口国	1.1	2.6	0.7	2.9	2.6	2.0	552	897	2 403	1 795
燃料净进口国	4.0	4.8	4.6	5.6	2.0	1.6	2 682	3 947	816	1 430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1.8	2.5	1.2	2.2	3.1	2.7	261	486	388	334
最不发达国家	2.2	3.5	1.9	3.3	2.7	2.6	381	675	270	286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a 1991 年起包括德国东部各州。^b 1990 年以前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表 A.2.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年百分数变动 ^a												
	1994-2002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发达经济体	2.4	2.9	2.4	2.7	3.0	2.5	2.7	3.5	0.9	1.4	1 ³ / ₄	2 ¹ / ₂
美国	3.3	4.0	2.7	3.6	4.4	4.3	4.1	3.8	0.3	2.4	2 ¹ / ₂	4
加拿大	3.4	4.7	2.8	1.7	3.9	3.6	4.5	4.8	1.5	3.4	2 ³ / ₄	3 ³ / ₄
日本	1.2	1.0	1.9	3.4	1.8	-1.1	0.1	2.8	0.4	0.2	³ / ₄	³ / ₄
澳大利亚	4.5	4.8	3.5	4.3	3.7	5.2	4.8	8.0	2.7	3.5	3	2 ¹ / ₂
新西兰	3.1	5.1	3.7	3.1	2.6	-0.4	4.1	3.8	2.5	3.8	2 ³ / ₄	2 ¹ / ₂
欧盟 15 国	2.3	2.8	2.4	1.6	2.5	2.8	2.8	3.4	1.6	1.0	1 ¹ / ₄	2 ¹ / ₂
欧元区	2.2	2.4	2.3	1.4	2.3	2.8	2.8	3.4	1.5	0.8	1	2 ¹ / ₄
奥地利	2.2	2.4	1.7	2.0	1.3	3.3	3.7	3.0	1.0	1.5	1 ¹ / ₂	2 ¹ / ₂
比利时	2.4	3.2	2.4	1.2	3.6	2.2	3.0	4.0	1.0	0.7	1 ¹ / ₄	1 ³ / ₄
芬兰	3.9	4.0	3.8	4.0	6.3	5.3	4.1	6.1	0.7	1.4	1 ³ / ₄	2 ³ / ₄
法国	2.2	2.1	1.8	1.1	1.9	3.1	3.2	3.6	2.1	1.2	1 ¹ / ₄	2 ¹ / ₂
德国	1.5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¹ / ₂	2
希腊	3.1	1.5	1.9	2.4	3.6	3.4	3.6	3.9	4.0	3.6	3 ¹ / ₄	4
爱尔兰	8.1	5.8	10.0	7.8	10.8	8.6	10.9	10.0	5.7	4.0	3 ¹ / ₂	4 ¹ / ₄
意大利	1.9	2.2	2.9	1.1	2.0	1.8	1.6	2.8	1.8	0.5	1	2
卢森堡	4.5	4.2	3.8	3.6	9.0	5.8	6.0	7.5	1.0	0.3	³ / ₄	3
荷兰	2.8	3.2	2.3	3.1	3.6	4.3	4.0	3.3	1.3	0.5	³ / ₄	1 ³ / ₄
葡萄牙	3.3	2.4	5.5	3.5	4.0	4.6	3.8	3.5	1.7	0.5	³ / ₄	2 ¹ / ₂
西班牙	3.0	2.3	2.7	2.4	3.5	3.8	3.7	4.1	2.8	1.9	2	2 ³ / ₄
其他欧盟国家	2.8	4.6	3.0	2.4	3.2	3.0	2.7	3.2	1.8	1.8	2 ¹ / ₄	3
丹麦	2.7	5.5	2.8	2.5	3.0	2.5	2.3	3.0	0.9	1.8	2 ¹ / ₂	2
瑞典	2.8	3.3	3.7	1.1	2.1	3.6	4.5	3.6	1.2	1.9	1 ¹ / ₂	2 ³ / ₄
联合王国	2.9	4.7	2.9	2.6	3.4	2.9	2.4	3.1	2.1	1.8	2 ¹ / ₄	3
其他欧洲国家	1.8	2.2	1.6	1.9	2.8	2.3	1.4	2.9	1.1	0.3	¹ / ₄	1 ³ / ₄
冰岛	3.5	4.0	0.1	5.2	5.3	5.1	3.9	5.5	2.9	-0.5	1 ³ / ₄	3 ¹ / ₄
马耳他	3.8	5.7	6.2	4.0	4.9	3.4	4.1	6.4	-1.2	1.0	1 ¹ / ₂	2
挪威	3.0	5.5	3.8	4.9	4.7	2.0	0.9	2.3	1.4	1.3	0	1 ³ / ₄
瑞士	1.2	0.5	0.5	0.3	1.7	2.4	1.5	3.2	0.9	-0.2	¹ / ₂	1 ³ / ₄
备忘项目：												
主要发达经济体	2.3	2.8	2.3	2.7	3.0	2.3	2.6	3.3	0.7	1.4	1 ³ / ₄	2 ³ / ₄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

^a 作为单个国家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加权平均值计算，其中加权数量是以基于 1995 年价格和汇率的国内总产值计算的。计算方法见《199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和更正（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2.II.C.I 和 Corr.1 和 2），附件，引言正文。

^b 部分为计数。

^c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表 A.3.
转型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年百分数变动 ^a												
	1994-2002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转型经济体	1.3	-7.2	-0.6	-0.1	2.4	-0.8	3.4	6.7	4.4	3.8	4	4
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3.4	3.6	5.5	4.1	3.5	2.8	1.3	3.9	2.9	2.8	3 ^{1/2}	4
中欧和东欧	3.4	4.0	5.7	4.1	3.3	2.6	1.4	3.9	2.7	2.6	3 ^{1/4}	3 ^{3/4}
阿尔巴尼亚	6.5	8.3	13.3	9.0	-7.0	8.0	7.3	7.8	6.5	6.0	6	6
保加利亚	0.8	1.8	2.8	-10.2	-7.0	3.5	2.4	5.8	4.1	4.8	4	4 ^{1/2}
克罗地亚	4.4	5.9	6.8	5.9	6.8	2.5	-0.4	3.7	3.8	5.2	3 ^{3/4}	4 ^{1/4}
捷克共和国	2.0	2.2	6.0	4.3	-0.8	-1.2	-0.4	2.9	3.1	2.0	3	4
匈牙利	3.5	3.1	1.4	1.4	4.6	4.9	4.2	5.2	3.8	3.3	3 ^{3/4}	4
波兰	4.4	5.1	7.1	6.0	6.9	4.8	4.1	4.0	1.0	1.2	2 ^{1/3}	3
罗马尼亚	1.3	3.9	7.1	4.0	-6.1	-5.4	-3.2	1.8	5.3	4.9	4 ^{1/4}	4 ^{3/4}
塞尔维亚和黑山 ^d	1.8	2.7	6.0	5.9	7.4	2.5	-19.3	5.0	6.2	3.0	4	4
斯洛伐克	4.5	4.8	7.0	6.5	6.5	4.1	1.9	2.2	3.3	4.4	4	4 ^{1/2}
斯洛文尼亚	4.1	5.3	4.2	3.5	4.5	3.8	5.2	4.6	3.0	3.1	3 ^{1/2}	4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0.6	-1.9	-1.2	0.7	1.5	2.9	2.7	5.1	-4.5	0.3	3	3 ^{1/2}
波罗的海国家	3.7	-4.7	2.2	4.2	8.4	5.8	-0.2	5.5	6.7	6.3	5 ^{1/2}	5 ^{3/4}
爱沙尼亚	4.2	-2.0	4.3	3.9	10.6	4.7	-1.1	6.4	5.4	5.8	5 ^{1/2}	6
拉脱维亚	4.4	0.6	-0.9	3.7	8.4	4.8	2.8	6.8	7.9	6.1	5	5 ^{1/2}
立陶宛	3.0	-9.8	3.3	4.7	7.0	7.3	-1.8	4.0	6.5	6.7	6	6
独立国家联合体	-0.2	-13.7	-5.1	-3.6	1.4	-4.0	5.5	9.3	5.7	4.7	4 ^{1/2}	4 ^{1/4}
亚美尼亚	6.7	5.4	6.9	5.9	3.3	7.3	3.3	6.0	9.6	12.9	8	7
阿塞拜疆	2.1	-19.7	-11.8	1.3	5.8	10.0	7.4	11.1	9.9	10.6	9	8
白俄罗斯	1.7	-12.6	-10.4	2.8	11.4	8.4	3.4	5.8	4.1	4.7	3	2
格鲁吉亚	3.1	-11.4	2.4	10.5	10.8	2.9	2.9	1.8	4.5	5.4	6	7
哈萨克斯坦	1.2	-12.6	-8.2	0.5	1.7	-1.9	1.7	9.6	13.2	9.5	7	6 ^{1/2}
吉尔吉斯斯坦	-1.2	-20.1	-5.4	-7.1	9.9	2.1	3.6	5.0	5.3	-0.5	4	5
摩尔多瓦共和国	-4.6	-31.2	-1.4	-7.8	1.3	-6.5	-4.4	1.9	6.1	7.2	6	5
俄罗斯联邦	-0.1	-12.7	-4.1	-3.6	1.4	-5.3	6.4	10.0	5.0	4.3	4 ^{1/2}	4
塔吉克斯坦	-0.2	-18.9	-12.5	-4.4	1.7	5.3	3.7	8.3	10.2	9.1	7	7
土库曼斯坦 ^e	3.0	-17.3	-7.2	-6.7	-11.3	5.0	16.0	17.6	20.5	19.3	12	10
乌克兰	-3.9	-23.0	-12.2	-10.0	-3.0	-1.9	-0.4	5.8	9.0	4.8	4	4 ^{1/2}
乌兹别克斯坦	2.2	-4.2	-0.9	1.6	2.5	4.4	4.4	4.0	4.5	4.2	4	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的数据。

^a 作为单个国家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其中加权数是基于 1995 年价格和汇率的国内总产值计算的。

^b 部分为估计数。

^c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d 2003 年 2 月 4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成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正式名称。

^e 土库曼斯坦数字的可靠性因记载不详的通货紧缩程度而受到质疑。

表 A.4.

发展中经济体：1994-2004 年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年百分数变动 ^a												
	1994- 2002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发展中国家 ^d	4.2	5.6	5.0	5.7	5.4	1.6	3.5	5.8	2.1	3.2	3 ¹ / ₂	5
其中：												
非洲	3.2	2.5	2.7	5.2	3.0	3.0	2.9	3.1	3.3	2.9	3 ¹ / ₄	4
燃料净出口国	3.2	0.5	3.9	4.2	3.3	3.6	3.7	3.4	2.9	3.0	3 ¹ / ₄	3 ³ / ₄
燃料净进口国	3.2	3.7	1.9	5.8	2.8	2.7	2.5	2.9	3.5	2.8	3 ¹ / ₄	4 ¹ / ₄
东南亚	5.9	8.4	8.1	7.3	6.0	0.5	6.3	7.1	3.7	5.7	5 ¹ / ₄	6
东亚	4.5	9.1	8.5	7.6	6.3	-0.5	6.3	7.6	3.5	5.8	5	6 ¹ / ₄
东亚（除中国以外）	4.7	7.6	7.6	6.7	5.1	-4.6	5.9	7.4	1.4	4.5	3 ¹ / ₂	5
南亚	5.3	5.2	6.3	6.0	4.8	5.3	5.9	5.0	4.6	4.8	5 ³ / ₄	6
西亚	2.8	-0.8	4.0	4.6	5.5	4.1	0.7	6.4	-1.2	2.0	1 ¹ / ₄	3 ³ / ₄
燃料净出口国	2.9	-0.5	1.7	3.9	5.9	4.7	2.6	6.4	1.0	0.7	1	4
燃料净进口国	2.6	-1.3	7.5	5.8	4.9	3.3	-2.1	6.3	-4.6	4.2	2	3 ¹ / 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4	5.3	1.4	3.7	5.2	2.0	0.4	3.9	0.3	-0.8	2	3 ³ / ₄
燃料净出口国	2.3	3.6	-2.4	3.7	5.7	3.2	1.5	5.5	0.6	-0.2	1 ¹ / ₂	4 ¹ / ₂
燃料净进口国	2.4	6.1	3.0	3.8	4.9	1.5	0.0	3.3	0.2	-1.0	2 ¹ / ₂	3 ¹ / ₄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4	2.1	3.8	5.4	4.3	3.3	2.8	2.5	3.3	2.9	3 ¹ / ₂	4 ¹ / ₂
最不发达国家	4.4	2.0	4.4	5.0	5.5	4.3	4.6	4.7	4.7	4.0	4 ¹ / ₂	5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												
阿根廷	0.0	5.8	-2.8	5.5	8.1	3.9	-3.4	-0.5	-4.5	-10.9	4	4 ¹ / ₂
巴西	2.8	6.2	4.2	2.9	3.5	0.2	0.8	4.5	1.5	1.5	1 ³ / ₄	2 ³ / ₄
智利	4.7	5.4	9.9	7.0	7.6	3.9	-1.1	5.4	2.8	2.1	3	4
中国	8.8	12.6	10.5	9.6	8.8	7.8	7.1	8.0	7.3	8.0	7 ¹ / ₂	8
哥伦比亚	2.0	6.3	5.4	2.1	2.8	0.5	-4.3	2.7	1.6	1.5	1 ³ / ₄	2 ³ / ₄

年百分数变动 ^a												
	1994-2002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埃及	4.3	2.3	4.7	5.0	5.5	5.6	6.0	3.2	3.5	3.0	1 ³ / ₄	3 ¹ / ₄
香港特别行政区 ^e	3.6	5.3	4.7	4.8	5.2	-5.1	3.0	12.1	0.6	2.3	2	3
印度	5.7	5.4	6.7	6.4	5.3	5.6	6.4	5.1	5.1	5.0	6	6 ¹ / ₄
印度尼西亚	2.8	7.5	8.1	8.0	4.7	-13.1	0.1	4.8	3.3	3.6	3 ¹ / ₂	4 ¹ / 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9	1.8	4.2	5.0	2.5	2.2	2.5	6.1	5.0	5.7	5 ³ / ₄	4 ¹ / ₄
以色列	3.1	6.6	7.1	4.5	2.1	2.2	2.2	6.0	-0.9	-1.2	0	3 ¹ / ₂
大韩民国	5.8	8.6	8.9	7.1	5.5	-5.8	10.7	8.8	3.0	6.3	4	6
马来西亚	4.9	9.2	9.5	8.2	7.7	-7.5	5.6	8.3	0.4	4.2	4 ¹ / ₄	6
墨西哥	3.1	4.6	-6.2	5.5	6.8	4.8	5.2	6.9	-0.3	0.9	2 ¹ / ₂	4 ¹ / ₂
尼日利亚	2.7	1.3	2.5	4.3	2.7	1.8	1.0	3.8	3.9	2.7	3	4 ¹ / ₂
巴基斯坦	3.9	4.2	4.9	5.2	1.3	3.7	4.1	3.9	3.1	4.6	5	5 ¹ / ₄
秘鲁	4.4	12.8	8.6	2.5	6.7	-0.4	1.4	3.6	0.2	5.2	4 ¹ / ₂	5
菲律宾	3.8	4.4	4.8	5.5	5.2	-0.5	3.4	4.0	3.3	4.6	4 ¹ / ₄	5
沙特阿拉伯	1.4	-2.7	-0.2	4.0	3.0	1.6	0.5	4.5	1.2	0.7	3	3
新加坡	5.5	10.1	8.9	7.0	7.8	0.3	5.9	10.3	-2.0	2.2	2 ¹ / ₂	4 ³ / ₄
南非	2.8	3.2	3.1	4.3	2.6	0.8	2.0	3.5	2.8	3.0	2 ³ / ₄	3 ¹ / ₂
中国台湾省	4.7	6.5	6.1	5.6	6.8	4.6	5.4	5.9	-1.9	3.5	3 ¹ / ₄	4 ¹ / ₂
泰国	2.9	8.7	8.6	6.7	-1.3	-10.2	4.2	4.4	1.6	5.2	4 ¹ / ₄	4 ¹ / ₂
土耳其	2.2	-6.1	8.0	7.0	6.8	3.8	-5.1	7.1	-8.0	7.8	2 ³ / ₄	3
委内瑞拉	-0.7	-3.0	3.1	-1.3	5.1	0.2	-6.1	3.2	2.7	-8.9	-12	8 ¹ / ₂

资料来源：联合国。

^a 作为单个国家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加权数是根据1995年价格和汇率的国内总产值计算的。

^b 部分为估计数。

^c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d 包括占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98%的国家。

^e 中国特别行政区。

表 A.5.
发达经济体：1985-2001 年投资、储蓄和净转移

占国内总产值百分比				
		国内投资总额	国内储蓄总额	资产净转移额
合计 ^a	1985	21.8	21.4	0.4
	1990	22.9	22.7	0.1
	1995	21.5	22.2	-0.7
	2000	21.9	21.1	0.7
	2001	20.4	19.8	0.7
主要发达经济体 ^a	1985	21.7	21.1	0.5
	1990	22.6	22.4	0.2
	1995	21.5	22.0	-0.4
	2000	21.8	20.5	1.2
	2001	20.1	18.9	1.2
欧洲联盟(欧盟 15 国)	1985	14.9	15.5	-0.7
	1990	16.6	16.7	-0.1
	1995	14.7	15.9	-1.2
	2000	15.1	15.5	-0.5
	2001	14.4	15.2	-0.8
德国 ^b	1985	20.0	23.0	-3.0
	1990	22.7	26.0	-3.3
	1995	22.6	23.3	-0.6
	2000	21.9	22.3	-0.4
	2001	19.6	21.5	-1.9
日本	1985	28.3	31.7	-3.4
	1990	32.8	33.7	-0.9
	1995	28.2	29.6	-1.4
	2000	25.9	27.4	-1.4
	2001	25.5	26.1	-0.6
美利坚合众国	1985	20.2	17.4	2.7
	1990	17.6	16.4	1.2
	1995	18.1	17.0	1.1
	2000	20.7	17.0	3.7
	2001	18.7	15.2	3.5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国民账户》。

^a 国家数据已按年度平均汇率折算成美元以供合计。

^b 1991 年以前的数据仅指西德。

表 A.6.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失业率^a

百分比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发达经济体 ^c	7.9	7.5	7.6	7.3	6.9	6.3	5.9	6.1	6.7	7	6 ³ / ₄
美国	6.1	5.6	5.4	4.9	4.5	4.2	4.0	4.7	5.8	6	5 ¹ / ₂
加拿大	10.4	9.5	9.7	9.1	8.3	7.6	6.8	7.2	7.7	7 ¹ / ₄	6 ³ / ₄
日本	2.9	3.2	3.4	3.4	4.1	4.7	4.7	5.0	5.4	5 ¹ / ₂	5 ¹ / ₂
澳大利亚	9.7	8.5	8.5	8.5	7.7	7.0	6.3	6.7	6.3	6 ¹ / ₄	6 ³ / ₄
新西兰	8.2	6.3	6.1	6.6	7.5	6.8	6.0	5.3	5.2	5 ¹ / ₂	5 ¹ / ₂
欧盟 15 国	11.1	10.7	10.8	10.6	9.9	8.7	7.8	7.4	7.6	8	8
欧元区	11.5	11.3	11.5	11.5	10.8	9.4	8.5	8.0	8.3	8 ³ / ₄	8 ³ / ₄
奥地利	3.8	3.9	4.3	4.4	4.5	4.0	3.7	3.6	4.3	4 ¹ / ₂	4
比利时	10.0	9.9	9.7	9.4	9.5	8.6	6.9	6.7	7.3	7 ¹ / ₄	7
芬兰	16.6	15.4	14.6	12.7	11.4	10.2	9.7	9.1	9.1	9 ¹ / ₄	9 ¹ / ₄
法国	12.3	11.7	12.4	12.3	11.8	10.7	9.3	8.5	8.7	9	8 ³ / ₄
德国	8.4	8.2	8.9	9.9	9.3	8.4	7.8	7.8	8.2	9	9 ³ / ₄
希腊	9.6	10.0	9.8	9.8	11.1	12.0	11.0	10.4	9.9	9 ¹ / ₂	8 ³ / ₄
爱尔兰	14.3	12.3	11.7	9.9	7.5	5.6	4.3	3.9	4.4	5 ³ / ₄	5 ¹ / ₂
意大利	11.1	11.6	11.7	11.7	11.8	11.3	10.4	9.4	9.0	9	8 ³ / ₄
卢森堡	3.2	2.9	3.0	2.7	2.7	2.4	2.3	2.0	2.4	3 ¹ / ₄	3
荷兰	7.1	6.9	6.3	5.2	4.0	3.2	2.8	2.4	2.7	4	5
葡萄牙	6.9	7.3	7.3	6.8	5.2	4.5	4.1	4.1	5.1	6 ¹ / ₄	5 ³ / ₄
西班牙	24.2	22.9	22.2	20.8	18.8	12.8	11.3	10.6	11.4	11 ¹ / ₄	10 ¹ / ₂
欧盟其他国家	9.5	8.6	8.3	7.2	6.4	5.9	5.3	4.9	5.0	5 ¹ / ₄	5 ¹ / ₄
丹麦	8.2	7.2	6.8	5.6	5.2	4.8	4.4	4.3	4.5	4 ¹ / ₄	4 ¹ / ₄
瑞典	9.4	8.8	9.6	9.9	8.3	7.1	5.6	4.9	4.9	5 ¹ / ₂	5 ¹ / ₄
联合王国	9.6	8.7	8.2	7.0	6.3	5.8	5.4	5.0	5.1	5 ¹ / ₄	5 ¹ / ₂
其他欧洲国家	4.4	4.1	4.3	4.2	3.4	3.1	2.9	2.9	3.2	4	4 ¹ / ₄
冰岛	5.4	4.9	3.8	3.9	2.7	2.0	2.3	2.3	3.1	3 ¹ / ₄	3
马耳他 ^d	4.1	3.7	4.4	5.5	5.6	5.8	5.0	5.1	5.2	5 ¹ / ₄	5 ¹ / ₄
挪威	5.5	5.0	4.9	4.1	3.3	3.2	3.4	3.6	3.9	4 ¹ / ₄	4 ³ / ₄
瑞士	3.8	3.5	3.9	4.2	3.5	3.0	2.6	2.5	2.8	4	4
备忘项目											
主要发达经济体	7.1	6.8	6.8	6.6	6.4	6.1	5.7	6.1	6.7	7	6 ³ / ₄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a 失业率已由经合组织依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标准化（见经合组织，《标准失业率：来源和方法》（1985年，巴黎），以便在各国之间和一段时期内进行比较。

^b 部分为估计数。

^c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d 未标准化。

表 A.7.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1994-2004 年失业率^a

百分比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中欧和东欧											
阿尔巴尼亚	18.0	12.9	12.3	14.9	17.6	18.2	16.9	14.5	14.2	14 ^{1/4}	14
保加利亚	12.8	11.1	12.5	13.7	12.2	16.0	17.9	18.1	17.7	16	15
克罗地亚	17.3	17.6	15.9	17.6	18.6	20.8	22.6	23.1	21.9	21 ^{3/4}	20
捷克共和国	3.2	2.9	3.5	5.2	7.5	9.4	8.8	8.6	9.2	9	8 ^{1/2}
匈牙利	10.9	10.4	10.5	10.4	9.1	9.6	8.9	8.4	8.1	8	7 ^{3/4}
波兰	16.0	14.9	13.2	10.3	10.4	13.1	15.1	16.2	17.8	17 ^{3/4}	17 ^{3/4}
罗马尼亚	10.9	9.5	6.6	8.8	10.3	11.5	10.5	8.6	8.4	9	8 ^{1/2}
塞尔维亚和黑山 ^d	23.9	24.7	26.1	25.6	27.2	27.4	26.6	27.9	29.0	30	29
斯洛伐克	14.8	13.1	12.8	12.5	15.6	19.2	17.9	18.6	17.8	18	17 ^{1/2}
斯洛文尼亚	14.2	14.5	14.4	14.8	14.6	13.0	12.0	11.6	11.6	11	11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30.0	36.6	38.8	41.7	41.4	44.0	45.0	45.0	43.0	40	40
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	5.1	5.0	5.6	4.6	5.1	6.7	7.7	7.7	7.7	7	6 ^{1/2}
拉脱维亚	6.5	6.6	7.2	7.0	9.2	9.1	7.8	7.7	8.5	7 ^{3/4}	7
立陶宛	4.5	7.3	6.2	6.7	6.9	10.0	12.6	12.5	11.3	10 ^{1/4}	9 ^{3/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的数据。

^a 期末登记失业数据。^b 部分为估计数。^c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d 2003 年 2 月 4 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成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正式名称。

表 A. 8.

发达经济体：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a

平均年百分数变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b	2004 ^b
发达经济体	2.2	2.1	2.0	2.0	1.3	1.2	2.0	1.8	1.2	1 ¹ / ₄	1 ¹ / ₄
美国	2.6	2.8	2.9	2.3	1.6	2.2	3.4	2.8	1.6	2 ¹ / ₄	1 ¹ / ₂
加拿大	0.2	2.2	1.6	1.6	1.0	1.7	2.7	2.5	2.2	2 ¹ / ₄	2 ¹ / ₄
日本	0.7	-0.1	0.1	1.8	0.7	-0.3	-0.7	-0.7	-0.9	-1 ¹ / ₄	-1 ¹ / ₄
澳大利亚	1.9	4.6	2.6	0.3	0.9	1.5	4.5	4.4	3.0	2	2
新西兰	1.7	3.8	2.6	0.9	1.3	1.4	2.7	2.7	2.3	2	2
欧盟 15 国	2.9	2.8	2.3	1.9	1.5	1.2	2.3	2.5	2.0	2	1 ³ / ₄
欧元区	3.0	2.7	2.3	1.8	1.3	1.1	2.3	2.6	2.0	1 ³ / ₄	1 ¹ / ₂
奥地利	3.0	2.3	1.8	1.3	0.9	0.6	2.4	2.7	1.8	1 ¹ / ₂	1 ³ / ₄
比利时	2.4	1.5	2.1	1.6	1.0	1.1	2.5	2.5	1.6	1	1 ¹ / ₄
芬兰	1.1	1.0	0.6	1.2	1.4	1.2	3.4	2.6	1.8	1 ³ / ₄	1 ¹ / ₂
法国	1.7	1.8	2.0	1.2	0.7	0.5	1.7	1.6	1.9	1 ³ / ₄	1 ¹ / ₂
德国	2.8	1.7	1.4	1.9	0.9	0.6	1.9	2.5	1.3	1 ³ / ₄	1 ¹ / ₄
希腊	10.9	8.9	8.2	5.5	4.8	2.6	3.1	3.4	3.6	1 ¹ / ₂	3 ¹ / ₄
爱尔兰	2.4	2.5	1.7	1.4	2.4	1.6	5.6	4.9	4.7	3 ³ / ₄	3 ¹ / ₂
意大利	4.0	5.2	4.0	2.0	2.0	1.7	2.5	2.8	2.5	2 ¹ / ₄	2
卢森堡	2.2	1.9	1.4	1.4	1.0	1.0	3.1	2.7	2.1	2	1 ³ / ₄
荷兰	2.8	1.9	2.0	2.2	2.0	2.2	2.5	4.5	3.5	2 ¹ / ₄	1
葡萄牙	4.9	4.1	3.1	2.2	2.8	2.3	2.9	4.4	3.6	3	2 ¹ / ₂
西班牙	4.7	4.7	3.6	2.0	1.8	2.3	3.4	2.8	3.1	2 ¹ / ₄	2
欧盟其他国家	2.4	3.1	2.1	2.6	2.7	1.5	2.6	2.0	1.8	2 ¹ / ₂	2 ³ / ₄
丹麦	2.0	2.1	2.1	2.2	1.9	2.5	2.9	2.3	2.4	2 ¹ / ₄	2
瑞典	2.2	2.5	0.5	0.5	-0.1	0.5	1.0	2.4	2.2	2	1 ¹ / ₂
联合国	2.5	3.4	2.4	3.1	3.4	1.6	2.9	1.8	1.6	2 ¹ / ₂	3 ¹ / ₄
其他欧洲国家	1.1	2.0	1.0	1.2	0.8	1.3	2.1	1.7	0.9	1	1 ¹ / ₂
冰岛	1.6	1.7	2.3	1.7	1.7	3.2	5.2	6.4	5.2	2 ¹ / ₂	2 ³ / ₄
马耳他	4.1	4.0	2.5	3.1	2.4	2.1	2.4	2.9	2.2	1 ¹ / ₂	1 ¹ / ₂
挪威	1.4	2.5	1.3	2.6	2.3	2.3	3.1	3.0	1.3	3 ¹ / ₄	1 ¹ / ₄
瑞士	0.9	1.8	0.8	0.5	0.1	0.7	1.6	1.0	0.6	0	0
备忘项目：											
主要发达经济体	2.0	1.9	1.9	2.1	1.3	1.1	1.9	1.6	1.0	1 ¹ / ₄	1 ¹ / ₄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数据。

^a 各国家组的数据为加权平均数，每年的加权数为 1995 年按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b 部分是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表 A.9.

转型经济体：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

平均年百分数变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2003 ^b	2004 ^b
转型经济体 ^c	416.2	145.1	41.1	38.3	21.9	50.6	19.6	14.6	10.7	9	8 ^{1/2}
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45.0 ^c	25.8	25.2	66.9	16.6	11.7	12.2	9.0	5.0	4	4
中欧和东欧	44.6 ^c	25.5	25.4	69.4	17.0	12.1	12.7	9.3	5.2	4	4
阿尔巴尼亚	21.5	8.0	12.7	33.1	20.3	-0.1	0.0	3.1	5.1	2 ^{1/2}	2
保加利亚	96.2	62.0	121.7	1058.3	18.7	2.6	10.2	7.4	5.8	4	4
克罗地亚	97.5	2.0	3.6	3.7	5.9	4.3	6.2	5.2	2.3	2 ^{1/4}	3
捷克共和国	10.0	9.1	8.9	8.4	10.6	2.1	3.9	4.7	1.8	1	2 ^{1/2}
匈牙利	19.1	28.5	23.6	18.4	14.2	10.1	9.9	9.2	5.0	5	4 ^{3/4}
波兰	33.2	28.1	19.8	15.1	11.7	7.4	10.2	5.5	1.9	1 ^{1/2}	2
罗马尼亚	137.1	32.2	38.8	154.9	59.3	45.6	45.7	34.5	22.5	15	12
塞尔维亚和黑山 ^d	^e	71.8	90.5	23.2	30.4	44.1	75.7	88.9	19.2	12	8
斯洛伐克	13.4	10.0	6.1	6.1	6.7	10.5	12.0	7.1	3.3	8	5
斯洛文尼亚	21.0	13.5	9.9	8.4	8.1	6.3	9.0	8.4	7.5	5	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26.6	16.4	2.5	0.9	-1.4	-1.3	6.6	5.5	1.8	2 ^{1/2}	2 ^{1/2}
波罗的海国家	54.2	32.1	22.0	9.3	6.3	2.0	2.2	2.8	1.6	2	2 ^{3/4}
爱沙尼亚	47.9	28.9	23.1	11.1	10.6	3.5	3.9	5.8	3.6	3 ^{1/2}	4
拉脱维亚	35.7	25.0	17.6	8.4	4.7	2.4	2.6	2.5	1.9	2	2 ^{1/2}
立陶宛	72.0	39.5	24.7	8.8	5.1	0.8	1.0	1.3	0.3	1	2
独立国家联合体	670.4	232.4	52.8	17.3	25.8	79.1	24.8	18.5	14.6	12 ^{3/4}	12
亚美尼亚	4964.0	175.5	18.7	13.8	8.7	0.7	-0.8	3.0	1.1	4	3
阿塞拜疆	1663.9	411.5	19.8	3.6	-0.8	-8.6	1.8	2.0	2.8	3	3 ^{1/2}
白俄罗斯	2219.6	709.3	52.7	63.9	73.2	293.7	168.9	61.0	42.6	35	40
格鲁吉亚	22286.1	261.4	39.4	7.1	3.5	19.3	4.2	5.0	5.6	6	6
哈萨克斯坦	1880.1	176.3	39.2	17.5	7.3	8.4	13.4	8.0	5.9	6 ^{1/2}	6
吉尔吉斯斯坦	278.1	42.9	31.3	23.4	10.3	35.7	18.7	7.0	2.1	4	5
摩尔多瓦共和国	486.4	29.9	23.5	11.8	7.7	39.3	31.3	10.0	5.2	7	8
俄罗斯联邦	309.0	197.4	47.8	14.7	27.8	85.7	20.8	18.6	15.8	13	12
塔吉克斯坦	350.3	682.1	422.4	85.4	43.1	27.5	32.9	37.0	10.2	10	12
土库曼斯坦	2719.5	1105.3	714.0	83.7	16.8	23.5	7.0	8.2	15.0	18	15
乌克兰	891.2	376.7	80.2	15.9	10.6	22.7	28.2	12.0	0.8	6	5
乌兹别克斯坦	1910.2	304.6	54.0	58.8	17.7	29.0	24.9	26.6	24.2	25	2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的数据。

^a 部分为估计数。

^b 预测。

^c 不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

^d 2003年2月4日起，“塞尔维亚和黑山”成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正式名称。

^e 年极度通货膨胀率百分点超过1万亿。

表 A. 10.

发展中国家：1994-2004 年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率^a

平均百分数变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b	2003 ^c	2004 ^c
发展中国家按区域分列：	139.5	23.2	14.2	9.7	10.7	6.5	5.6	5.6	6.9	8	6 ¹ / ₄
非洲 ^d	19.6	19.2	12.9	7.9	6.5	5.3	6.0	6.1	8.8	11	7 ³ / ₄
东亚和南亚	11.6	9.5	6.7	4.6	9.1	2.4	1.4	2.9	2.2	3	3
东亚	12.0	9.3	6.3	4.0	8.6	1.9	0.9	2.7	1.8	2 ³ / ₄	2 ³ / ₄
南亚	10.1	10.3	9.0	7.4	11.6	4.9	4.1	3.7	4.0	4 ¹ / ₂	4 ³ / ₄
不包括中国的东亚	6.2	5.8	5.3	4.6	13.0	3.4	1.1	3.7	3.0	3 ¹ / ₂	3 ¹ / ₄
西亚	39.7	37.8	31.2	28.9	27.8	22.3	18.3	16.8	16.3	14	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08.5	40.8	20.1	11.3	8.1	7.5	7.4	5.8	10.5	13	9 ¹ / ₂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不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南非）	32.7	22.0	20.8	12.0	8.7	9.8	10.3	11.0	14.4	12 ¹ / ₄	12 ¹ / ₄
最不发达国家	25.3	21.4	20.0	11.8	14.4	11.9	6.0	5.6	10.7	8	8
主要发展中国家											
阿根廷	4.2	3.4	0.2	0.5	0.9	-1.2	-0.9	-1.1	25.9	19	12
巴西	930.0	66.0	15.8	6.9	3.2	4.9	7.0	6.9	8.4	14	10
中国	24.2	16.9	8.3	2.8	-0.8	-1.4	0.3	0.5	-0.7	1	1
香港特别行政区 ^e	8.7	9.1	6.3	5.8	2.9	-4.0	-3.7	-1.6	-3.0	1 ¹ / ₂	1 ¹ / ₂
印度	10.2	10.2	9.0	7.2	13.2	4.7	4.0	3.7	4.4	4	4 ¹ / ₂
印度尼西亚	8.5	9.4	8.0	6.7	57.6	20.5	3.7	12.6	12.6	9 ¹ / ₄	9
以色列	12.3	10.0	11.3	9.0	5.4	5.2	1.1	-5.0	5.7	3	2 ¹ / ₂
大韩民国	6.2	4.5	4.9	4.4	7.5	0.8	2.2	4.1	2.8	3 ³ / ₄	3
马来西亚	3.7	3.5	3.5	2.7	5.3	2.7	1.5	1.4	1.8	1 ¹ / ₂	2
墨西哥	7.0	35.0	34.4	20.6	15.9	16.6	9.5	6.4	5.0	5	3 ³ / ₄
沙特阿拉伯	0.6	4.9	1.2	0.1	-0.4	-1.6	-0.8	-0.5	-0.5	2	1 ¹ / ₂
南非	8.9	8.7	7.4	9.0	6.7	5.1	5.2	4.8	10.6	6 ³ / ₄	5
中国台湾省	4.1	3.7	3.1	1.8	2.6	0.2	-1.9	0.6	-0.2	1 ¹ / ₄	1 ¹ / ₂
泰国	5.0	5.8	5.8	5.6	8.1	0.3	1.5	1.7	0.6	2	1 ¹ / ₂
土耳其	106.3	88.1	80.3	85.7	84.6	64.9	54.9	54.4	45.0	36 ¹ / ₄	2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国家金融统计》的数据。

^a 所用加权数为按 1995 年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b 部分为估计数。

^c 部分根据联接项目进行的预测。

^d 不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

^e 中国特别行政区。

表 A. 11.

主要发达经济体：1994–2002 年金融指标

百分比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短期利率 ^a									
加拿大	5.1	6.9	4.3	3.3	4.9	4.7	5.5	4.1	2.5
法国 ^b	5.7	6.4	3.7	3.2	3.4	2.7	4.2	4.3	4.0
德国	5.3	4.5	3.3	3.2	3.4	2.7	4.1	4.4	3.3
意大利	8.5	10.5	8.8	6.9	5.0	3.0	4.4	4.3	3.3
日本	2.2	1.2	0.5	0.5	0.4	0.1	0.1	0.1	0.0
联合王国	4.9	6.1	6.0	6.6	7.2	5.2	5.8	5.1	3.9
美国	4.2	5.8	5.3	5.5	5.4	5.0	6.2	3.9	1.7
长期利率 ^c									
加拿大	8.6	8.3	7.5	6.4	5.5	5.7	5.9	5.8	5.7
法国	7.4	7.6	6.4	5.6	4.7	4.7	5.5	5.0	4.9
德国	6.7	6.5	5.6	5.1	4.4	4.3	5.2	4.7	4.6
意大利	10.6	12.2	9.4	6.9	4.9	4.7	5.6	5.2	5.0
日本	3.7	2.5	2.2	1.7	1.1	1.8	1.7	1.3	1.3
联合王国	8.0	8.3	8.1	7.1	5.4	4.7	4.7	4.8	4.8
美国	7.1	6.6	6.4	6.4	5.3	5.6	6.0	5.0	4.6
政府财政收支平衡 ^d									
加拿大	-6.7	-5.3	-2.8	0.2	0.1	1.7	3.1	1.8	1.3
法国	-5.6	-5.6	-4.1	-3.0	-2.7	-1.6	-1.3	-1.4	-3.1
德国	-2.5	-3.2	-3.4	-2.7	-2.1	-1.4	1.5	-2.7	-3.6
意大利	-9.1	-7.6	-6.5	-2.7	-2.8	-1.9	-0.3	-1.4	-2.3
日本 ^e	-3.7	-4.7	-5.0	-3.8	-5.5	-7.2	-7.4	-6.8	-7.1
联合王国	-6.8	-5.8	-4.4	-2.0	0.4	1.3	4.3	0.9	-1.4
美国	-3.6	-3.1	-2.2	-0.9	0.3	0.7	1.4	-0.5	-3.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依据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经合组织《经济展望》和 EUROPA（欧盟在线）《欧洲经济》。

^a 货币市场利率。

^b 自 1999 年 1 月起，代表欧洲银行同业 3 个月利率，这是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c 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

^d 按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总产值百分比计算的盈余 (+) 或赤字 (-)。

^e 1998 年的赤字没有考虑到中央政府承担日本铁路清算公司和国家森林特别账户的债务（在国内总产值中占 5.2 个百分点）。

2000 和 2001 年已将邮政储蓄账户的延期税款包括在内。

表 A. 12.

选定国家：1994-2002 年实际有效汇率、广义量度^a

1990=10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	89.7	87.5	96.2	97.8	90.0	92.5	86.9	83.2	88.5
奥地利	109.6	112.4	110.7	107.6	108.5	107.0	103.9	105.8	107.9
比利时	109.6	112.6	111.0	106.8	108.0	107.8	102.3	102.3	103.2
加拿大	88.6	92.2	91.4	92.6	91.1	89.6	89.1	84.4	79.7
丹麦	104.5	107.6	107.8	105.7	108.7	109.3	104.4	87.6	86.6
芬兰	79.4	85.2	84.0	81.7	80.6	78.4	72.7	128.2	123.7
法国	102.9	103.7	103.7	98.9	100.9	98.0	91.2	110.2	106.9
德国	99.9	105.0	101.8	95.9	96.9	94.6	90.8	106.9	109.9
希腊	106.4	108.1	113.2	114.8	111.5	114.3	112.7	144.7	164.2
爱尔兰	97.5	97.6	100.0	100.6	98.3	95.6	89.8	72.8	72.0
意大利	79.1	75.5	83.2	83.5	84.0	82.3	80.8	91.3	92.4
日本	125.9	127.0	108.5	103.1	100.7	110.3	116.6	93.4	97.0
荷兰	110.3	114.2	113.3	109.4	112.1	112.5	108.2	114.6	115.5
新西兰	100.0	107.5	117.8	120.8	105.4	100.8	92.1	122.0	119.5
挪威	98.6	101.0	100.4	102.3	97.9	97.2	94.0	85.6	82.7
葡萄牙	104.2	104.1	105.4	112.6	112.6	112.5	108.7	68.3	81.8
西班牙	79.8	83.1	83.2	79.5	79.9	78.2	76.5	91.3	93.2
瑞典	83.7	90.7	95.4	91.4	90.4	87.3	87.4	81.3	82.0
瑞士	111.4	118.2	116.2	108.9	111.6	110.8	108.1	103.9	95.7
联合王国	92.2	89.3	91.8	105.5	109.7	108.2	109.7	73.9	77.3
美国	100.3	95.6	100.1	106.2	114.2	114.3	117.7	182.7	182.3
发展中经济体									
阿根廷	111.4	109.0	113.0	120.5	123.0	125.0	127.5	131.8	70.5
巴西	94.2	100.5	98.8	105.0	103.9	77.2	93.3	84.4	79.7

1990=10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智利	113.9	120.3	126.6	135.1	128.9	125.1	135.0	128.2	123.7
哥伦比亚	118.4	117.1	121.6	132.7	126.1	113.2	109.1	110.2	106.9
厄瓜多尔	137.6	135.0	137.1	148.4	152.7	115.0	102.1	144.7	164.2
香港特区 ^b	113.9	112.4	120.7	130.9	137.4	125.3	121.0	122.0	119.5
印度	77.7	75.6	74.0	80.9	77.8	77.2	82.6	85.6	82.7
印度尼西亚	99.8	98.3	103.0	96.3	47.6	72.3	70.8	68.3	81.8
大韩民国	85.8	87.5	89.9	84.4	65.9	72.9	78.9	73.9	77.3
科威特	148.5	140.1	147.7	156.0	162.6	165.5	172.8	182.7	182.3
马来西亚	106.1	105.9	111.1	108.5	83.3	84.8	86.8	93.4	95.5
墨西哥	112.2	78.9	89.8	102.8	102.4	112.7	126.2	133.1	133.4
摩洛哥	104.8	108.0	111.9	111.3	115.9	118.1	121.1	119.3	117.8
尼日利亚	141.2	58.3	79.2	91.2	99.8	99.3	100.3	110.9	114.9
巴基斯坦	104.7	104.9	105.6	110.4	110.9	106.2	102.7	97.1	101.3
秘鲁	97.8	98.3	102.5	106.5	106.4	97.1	98.9	103.4	103.8
菲律宾	104.3	103.4	114.7	107.4	83.0	88.2	86.9	92.5	95.6
沙特阿拉伯	99.8	96.2	103.4	114.7	126.2	129.7	140.5	153.7	156.1
新加坡	108.8	110.0	114.8	116.8	113.4	109.0	108.9	110.1	109.5
南非	98.4	96.9	90.6	97.2	86.0	82.7	84.1	75.9	66.5
中国台湾省	96.4	97.3	94.9	96.1	87.4	82.5	87.1	82.9	80.1
泰国	99.2	96.2	99.8	93.8	81.9	85.7	86.3	83.8	85.7
土耳其	73.0	75.9	74.5	78.6	78.4	77.8	87.8	77.5	88.6
委内瑞拉	109.3	139.2	119.1	139.4	157.5	169.1	179.8	197.7	163.5

资料来源：JP Morgan Chase。

^a 指数是根据对经合组织 22 种货币和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数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23 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进行的“广义”量度。实际有效汇率用于调整相对价格变动名义指数，可以衡量由于币值变动和通货膨胀差异，对该国制成品国际价格竞争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指数上升表示竞争能力下降，反之亦然。相对价格变动基于主要用来衡量产品制造第一阶段国内制成品（粮食和能源除外）价格的各种指数。货币指数加权值是根据相关国家 1990 年的双边贸易模式得出的。

^b 中国特别行政区。

二. 国际贸易

表 A. 13.

世界贸易：1994-2003 年按主要国家分组列示的出口和进口价值及数量变动

年百分数变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2003 ^b
出口产品美元价值										
世界	13.5	19.4	4.3	3.5	-2.3	3.9	11.9	-3.8	4.1	10
发达经济体	12.5	18.9	2.6	2.3	0.3	2.2	6.4	-3.4	2.8	10 ^{1/2}
北美洲	11.2	14.6	6.4	9.3	-0.7	5.0	13.0	-6.5	-2.8	6
西欧	13.7	22.5	3.0	-1.5	1.8	-0.3	2.3	0.6	0.5	13 ^{3/4}
日本	9.6	11.6	-7.3	2.5	-7.9	8.6	10.0	-17.3	3.9	4
转型经济体	17.5	29.1	8.0	2.2	-2.1	-1.0	27.0	5.2	7.9	9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	16.3	30.1	5.7	6.5	13.5	-1.2	14.0	11.3	10.0	9
独立国家联合体	19.0	27.9	10.9	-1.8	-17.0	-1.0	39.0	-1.4	5.6	9
发展中国家	15.5	19.5	7.6	6.4	-6.5	7.7	22.7	-5.9	6.3	8 ^{1/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6.4	20.9	10.2	10.4	-2.4	5.6	19.2	-3.6	0.7	4 ^{3/4}
非洲	2.7	12.5	19.7	2.5	-15.0	10.3	22.8	-5.9	2.7	8 ^{1/4}
西亚	6.6	12.3	13.6	-5.7	-24.1	25.1	43.4	-4.0	0.3	6
东亚和南亚	16.8	21.3	5.0	4.0	-6.9	6.5	18.7	-10.6	5.8	7 ^{3/4}
中国	33.1	22.9	1.6	20.8	0.5	6.1	28.1	6.5	22.3	15
备忘项目：										
燃料出口国	5.9	15.9	19.5	0.5	-9.9	14.4	59.1	-5.9	-2.1	6 ^{1/4}
非燃料出口国	18.5	21.3	4.4	6.7	-4.7	4.7	13.1	1.2	6.4	4 ^{3/4}
进口产品美元价值										
世界	13.3	19.4	4.8	2.8	-2.3	5.4	10.8	-4.0	3.3	10
发达经济体	13.4	18.0	3.6	2.6	1.9	5.2	9.7	-4.0	2.3	10 ^{1/2}
北美洲	13.7	11.3	6.2	10.3	4.6	10.9	18.2	-6.3	1.8	7 ^{1/2}
西欧	13.0	20.7	2.3	0.0	3.8	1.4	3.7	-1.9	3.5	14
日本	13.9	22.0	4.0	-3.0	-17.2	11.2	21.4	-7.4	-5.7	2 ^{1/2}
转型经济体	13.0	33.4	13.9	9.0	0.5	-8.0	13.0	11.0	8.9	9 ^{1/4}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	14.1	37.0	16.5	6.7	13.0	-2.5	12.0	9.0	8.6	9
独立国家联合体	10.2	24.4	6.7	15.9	-19.0	-24.0	16.0	15.8	9.6	10
发展中国家	13.0	21.0	6.3	4.3	-10.2	4.4	19.9	-4.9	5.4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8.6	11.6	9.7	16.2	5.2	-3.7	15.8	-3.0	-6.3	5 ^{1/4}
非洲	5.8	21.2	2.0	6.0	-1.0	1.0	10.9	-4.2	5.1	8 ^{3/4}
西亚	-7.9	23.1	9.3	0.6	-6.4	-0.3	3.2	3.3	8.4	-2 ^{1/2}
东亚和南亚	18.4	24.8	5.3	2.0	-20.0	7.6	23.7	-10.8	5.1	8 ^{3/4}
中国	12.2	11.6	7.6	2.5	-1.5	18.2	35.8	8.2	21.2	16
备忘项目：										
燃料出口国	3.9	9.5	7.8	7.1	-5.7	7.3	7.4	2.7	2.6	4 ^{1/4}
非燃料出口国	15.4	23.8	5.8	3.7	-12.0	2.8	-0.8	4.0	14.4	-8 ^{3/4}

表 A. 13. (续)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2003 ^b
出口额										
世界	10.5	9.4	4.8	9.3	3.6	5.1	10.8	-0.9	2.0	3 ³ / ₄
发达经济体	9.5	7.3	4.2	9.2	4.0	4.4	9.2	-1.2	0.1	2 ³ / ₄
北美	9.0	9.1	6.2	10.9	3.7	6.4	10.6	-5.3	-2.5	2 ³ / ₄
西欧	11.4	7.6	3.8	7.7	5.4	3.9	10.0	2.1	0.0	3 ¹ / ₄
日本	1.7	3.3	0.6	9.6	-3.7	2.7	5.1	-11.8	7.0	1 ¹ / ₄
转型经济体	2.7	13.7	6.0	-0.9	6.9	4.0	13.0	8.7	7.8	6 ³ / ₄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	0.2	16.7	4.5	0.8	15.0	7.0	20.0	11.6	6.0	6 ³ / ₄
独立国家联合体	5.8	10.0	7.9	-2.9	0.2	2.0	7.0	5.5	9.9	6 ³ / ₄
发展中国家	14.1	13.7	6.5	9.9	1.9	7.2	13.9	-1.5	5.8	5 ¹ / 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9.2	9.9	9.3	12.8	7.8	6.6	9.7	-0.1	0.7	2
非洲	11.7	7.3	8.2	5.2	-0.9	2.1	2.6	2.3	2.6	1 ¹ / ₂
西亚	8.1	6.0	9.0	-0.7	-1.5	0.6	9.7	3.2	-1.9	-1 ¹ / ₄
东亚和南亚	14.5	16.6	5.8	9.3	0.1	10.0	15.4	-5.4	4.8	5 ³ / ₄
中国	31.0	18.9	2.4	26.3	4.1	7.4	25.8	7.6	23.6	14 ³ / ₄
备忘项目：										
燃料出口国	5.7	9.0	15.1	4.9	1.2	7.5	7.7	5.1	-4.4	-1 ¹ / ₂
非燃料出口国	15.0	16.5	5.9	11.3	2.9	7.1	13.5	-0.3	2.8	2
进口额										
世界	10.5	7.8	6.1	9.0	3.0	5.3	10.2	-1.0	1.6	4 ¹ / ₄
发达经济体	11.1	7.0	4.9	8.7	5.9	6.1	6.4	-1.6	0.0	4 ¹ / ₂
北美	12.0	7.2	5.6	13.3	10.3	10.4	15.1	-3.5	1.1	3
西欧	10.0	5.9	4.4	7.6	6.1	3.4	2.4	0.0	0.0	6 ¹ / ₂
日本	13.6	12.5	3.5	2.7	-10.0	9.5	0.3	-4.3	-7.1	-2 ¹ / ₄
转型经济体	9.6	9.9	13.8	9.0	2.0	-6.0	15.0	12.7	9.3	8 ¹ / ₂
中欧和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	13.0	11.4	17.9	7.6	10.0	5.0	15.0	9.0	6.8	8
独立国家联合体	1.3	6.0	2.4	13.6	-15.0	-28.0	14.0	21.7	15.4	10
发展中国家	9.5	9.7	8.5	10.2	-4.7	4.0	19.6	-1.1	4.4	3 ³ / 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4.4	4.2	8.4	23.1	7.2	-6.9	4.1	2.7	-8.3	1 ¹ / ₂
非洲	2.0	10.8	3.8	6.3	2.0	1.5	18.2	-2.2	2.6	2 ¹ / ₄
西亚	-11.1	11.3	11.8	6.4	-2.6	2.3	14.4	4.6	4.8	-7 ³ / ₄
东亚和南亚	14.8	12.5	8.2	8.4	-12.7	6.9	19.4	-7.4	4.0	4 ³ / ₄
中国	9.1	0.1	11.4	9.4	6.0	18.6	52.6	12.3	20.1	12 ¹ / ₄
备忘项目：										
燃料出口国	-0.2	-1.0	11.2	13.8	-0.2	-0.4	17.0	4.2	0.1	-1 ¹ / ₂
非燃料出口国	11.9	11.6	8.7	10.1	-6.7	10.3	11.8	5.0	9.7	-14 ¹ / ₄

资料来源：联合国，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欧洲经委会、拉加经委会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a 部分为估计数。

^b 预测。

表 A. 14.

贸易方向：1990-2002 年出口额（离岸价格）

		目的地 ^a											
		世界 ^b	发达经济体	欧盟	美国	日本	转型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非洲	撒南非洲	西亚	东亚和南亚
		十亿美元	百分比										
世界 ^b	1990	3 381.7	72.1	43.7	14.5	6.1	..	22.8	3.8	2.8	1.1	3.5	12.8
	1995	5 077.9	65.1	37.5	14.7	5.8	4.3	29.0	5.0	2.3	0.8	3.2	18.5
	2000	6 369.2	66.6	35.7	18.5	5.3	4.1	28.5	5.7	2.0	0.7	3.3	17.5
	2002	6 389.2	65.9	36.2	17.9	4.8	4.8	28.3	5.3	2.2	0.7	3.4	17.5
发达经济体	1990	2 444.4	76.4	50.3	12.4	4.2	..	19.9	3.9	2.8	1.0	3.3	9.9
	1995	3 427.8	70.6	45.4	12.4	3.9	3.5	24.9	5.1	2.4	0.7	3.1	14.3
	2000	4 027.6	71.9	44.1	15.4	3.2	3.8	23.8	6.2	2.0	0.5	3.2	12.4
	2002	3 994.5	71.4	44.9	14.8	2.9	4.8	23.1	5.6	2.1	0.6	3.3	12.0
欧洲联盟 (欧盟)	1990	1 488.4	81.8	65.9	7.0	2.1	..	13.2	1.8	3.5	1.2	3.4	4.4
	1995	2 018.3	77.4	62.4	6.7	2.1	5.3	15.7	2.5	3.0	0.9	3.5	6.8
	2000	2 284.0	78.9	62.1	9.3	1.8	6.1	14.3	2.4	2.6	0.7	3.8	5.5
	2002	2 409.0	77.6	61.0	9.4	1.7	7.3	14.1	2.2	2.7	0.7	3.7	5.5
美国	1990	393.1	63.9	26.3	-	12.4	..	34.6	13.7	2.0	0.5	3.4	15.5
	1995	583.5	57.3	21.2	-	11.0	1.1	41.5	16.5	1.7	0.3	3.5	19.8
	2000	772.0	55.6	21.3	-	8.4	0.9	43.4	21.7	1.4	0.3	3.1	17.3
	2002	693.1	54.9	20.8	-	7.4	1.0	44.0	21.5	1.5	0.3	3.2	17.8
日本	1990	287.7	58.6	20.4	31.7	-	..	40.1	3.4	1.9	0.9	3.5	31.3
	1995	443.0	47.7	15.9	27.5	-	0.5	51.7	4.2	1.7	0.7	2.2	43.7
	2000	478.2	50.9	16.4	30.1	-	0.6	48.5	3.9	1.0	0.3	2.3	41.3
	2002	412.8	48.8	14.7	29.2	-	0.7	50.5	3.6	1.1	0.4	3.1	42.7
转型经济体	1995	205.7	50.6	41.6	3.9	1.8	35.6	13.0	1.6	1.3	0.2	3.9	6.2
	2000	284.4	58.2	49.1	4.9	1.2	28.2	13.2	1.8	1.3	0.3	4.9	5.3
	2002	309.0	59.7	51.1	4.6	1.0	26.4	13.1	1.4	1.4	0.3	4.7	5.6

表 A. 14. (续)		目的地 ^a											
		世界 ^b	发达经济体	欧盟	美国	日本	转型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非洲	撒南非洲	西亚	东亚和南亚
		十亿美元	百分比										
发展中 国家	1990	831.3	61.3	23.4	22.2	12.2	..	32.5	4.0	2.5	1.4	4.0	21.9
	1995	1 442.0	54.1	18.1	21.9	10.9	1.6	41.2	5.2	2.4	1.2	3.4	30.2
	2000	2 054.5	57.4	17.5	26.5	10.0	1.1	39.6	5.1	2.1	1.0	3.3	29.1
	2002	2 083.1	56.2	17.3	25.9	9.0	1.4	40.5	5.1	2.3	1.1	3.4	29.6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1990	128.0	71.9	24.5	38.9	5.6	..	24.7	16.5	1.5	0.4	2.1	4.6
	1995	228.5	68.0	16.7	44.4	3.9	0.9	29.1	20.7	1.3	0.4	1.3	5.9
	2000	366.6	73.9	11.3	57.8	2.2	0.7	22.7	17.7	0.8	0.2	1.0	3.4
	2002	355.9	72.2	12.3	53.3	2.1	1.0	24.9	18.1	1.1	0.2	1.2	4.5
非洲	1990	98.7	71.0	50.6	14.8	3.0	..	14.2	1.1	7.1	5.2	2.3	3.7
	1995	102.3	65.9	47.1	13.2	3.0	1.4	23.9	1.9	10.5	7.8	3.0	8.5
	2000	140.5	70.2	47.8	16.6	2.1	1.1	26.1	3.5	9.0	6.8	3.5	10.2
	2002	143.5	70.5	48.6	14.5	3.4	1.2	25.9	3.5	9.2	7.0	3.6	9.6
撒南非洲	1990	28.1	74.9	49.8	16.9	3.4	..	21.2	1.7	11.9	9.2	1.3	6.4
	1995	29.8	69.6	46.6	17.6	3.7	1.7	26.8	1.2	13.5	9.5	2.2	9.9
	2000	43.8	59.7	36.3	17.5	2.1	1.6	33.8	2.2	11.0	8.1	1.4	19.2
	2002	47.4	63.9	41.2	15.3	2.8	1.7	29.6	2.3	10.6	8.2	1.3	15.4
西亚	1990	149.4	59.7	25.4	13.7	17.7	..	31.0	3.0	2.9	0.9	10.6	14.6
	1995	169.6	50.3	22.8	10.3	15.1	3.4	34.4	1.6	3.0	0.8	9.9	19.8
	2000	278.4	52.7	20.5	14.0	16.1	1.7	38.8	1.0	3.3	0.8	7.8	26.7
	2002	264.2	49.8	20.4	13.6	13.7	2.2	40.0	1.2	3.8	1.0	8.6	26.4
东亚和 南亚 (包括中国)	1990	455.2	56.8	16.5	21.9	14.3	..	39.1	1.5	1.7	1.0	2.8	33.1
	1995	941.6	50.2	14.5	19.5	12.7	1.4	47.2	2.4	1.7	0.8	2.7	40.4
	2000	1 269.1	52.2	15.3	21.3	11.8	1.2	46.2	2.6	1.5	0.6	2.9	39.1
	2002	1 319.5	51.6	14.7	22.1	10.6	1.5	46.4	2.6	1.6	0.7	2.9	39.2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

^a 由于基本数据完全没有指明目的地，因此各目的地的贸易份额相加不到100%。

^b 包括转型经济体的数据；1994年以前，转型经济体的数据很不完整。

表 A. 15.

世界商品贸易的组成：1990-2001 年出口额

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出口国家类别	出口总额 (十亿美元)			总额			初级商品								
							其中								
							粮食			农业原料			燃料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世界 (十亿美元)	2 848.5	4 906.4	5 814.4	797.5	990.1	1 119.0	268.8	413.9	395.8	119.2	176.0	142.6	372.7	331.4	515.1
世界 (百分比份额)	—	—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经济体	1 865.1	3 338.6	3 696.0	45.1	51.6	47.6	63.0	65.8	66.0	62.2	60.3	62.0	23.0	31.3	31.0
转型经济体 ^a	124.6	194.7	254.1	6.1	6.5	7.3	3.5	3.7	2.9	5.3	6.8	5.5	8.2	9.1	11.0
发展中国家	858.9	1 973.0	1 864.3	48.8	41.9	45.2	33.5	30.5	31.1	32.5	32.9	32.5	68.8	59.6	58.0
非洲	92.5	111.4	103.4	8.5	7.1	7.0	4.1	4.0	2.8	5.1	4.1	3.3	13.7	12.1	11.1
拉丁美洲	154.3	237.6	351.2	11.0	10.7	11.6	14.5	12.6	14.1	7.3	8.5	11.4	9.3	8.5	9.1
东亚和南亚	459.1	862.6	1 170.5	13.4	13.1	11.9	13.1	12.2	12.4	19.0	19.1	16.5	12.3	11.1	10.1
西亚	153.0	163.9	244.6	16.0	11.1	14.6	1.9	1.8	1.9	1.1	1.1	1.3	33.6	27.9	27.7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29.7	33.5	36.4	2.6	2.4	2.5	2.6	2.6	2.1	3.1	2.7	2.8	2.3	2.1	2.7
最不发达国家	58.4	24.2	33.7	2.9	1.5	1.7	2.0	1.3	0.9	3.0	1.7	1.5	3.9	1.5	2.3

表 A. 15. (续)															
出口国家类别	合计			制造品											
				其中											
				纺织品			化学品			机械和运输			金属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世界 (十亿美元)	1 992.03	3 797.84	4 577.2	178.2	325.9	359.5	236.4	455.4	562.9	953.11	890.62	418.9	152.7	267.0	223.3
世界 (百分比份额)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经济体	73.3	72.0	67.0	42.1	42.2	36.2	81.0	80.2	80.4	79.7	77.7	69.7	65.2	63.0	66.5
转型经济体 ^a	3.7	3.3	3.5	2.1	4.1	4.2	3.6	4.3	2.8	3.7	1.4	2.8	8.5	14.4	9.8
发展中国家	23.0	24.7	29.5	55.7	53.7	59.6	15.4	15.5	16.8	16.5	20.9	27.5	26.3	22.5	23.8
非洲	1.1	0.9	0.5	2.5	2.5	2.4	1.4	1.0	0.4	0.3	0.2	0.2	6.2	3.2	1.0
拉丁美洲	3.3	3.3	4.7	3.4	4.3	6.8	2.9	2.8	2.9	2.6	2.8	4.8	9.4	7.9	8.1
东亚和南亚	17.3	19.2	22.8	47.3	43.4	46.1	8.2	9.5	11.1	13.2	17.3	21.8	8.7	9.6	12.4
西亚	1.3	1.3	1.5	2.5	3.5	4.2	2.9	2.2	2.4	0.4	0.5	0.7	2.0	1.9	2.2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0.5	0.2	0.2	0.5	0.5	0.5	0.3	0.1	0.1	0.2	0.0	0.1	2.2	0.8	0.7
最不发达国家	1.6	0.2	0.3	1.6	1.3	2.6	1.6	0.1	0.1	1.6	0.0	0.1	2.6	0.2	0.4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 1995 年以来的数据包括前苏联各国之间的贸易流量。1992 年以前，这些贸易流量被认为是内部流量。

表 A. 16.

世界商品贸易的组成：1990-2001 年进口额

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进口国家类别	出口总额 (十亿美元)			总额			初级商品								
							粮食			农业原料			燃料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世界 (十亿美元)	2 848.5	4 906.4	5 814.4	797.5	990.1	1119.0	268.8	413.9	395.8	119.2	176.0	142.6	372.7	331.4	515.1
世界 (百分比份额)	-	-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经济体	1 941.6	3 381.7	4 144.2	68.6	72.3	74.8	66.2	71.3	72.7	66.0	67.9	65.6	69.0	75.3	79.5
转型经济体 ^a	128.9	193.4	240.7	5.5	5.3	4.6	8.2	6.0	5.1	3.9	2.6	3.9	4.2	6.2	4.4
发展中国家	778.0	1331.3	1 429.5	25.9	22.4	20.6	25.6	22.7	22.2	30.1	29.5	30.4	26.8	18.5	16.1
非洲	98.8	112.7	87.4	3.0	2.6	1.7	4.9	3.6	3.3	3.7	3.1	2.0	1.4	1.4	0.5
拉丁美洲	110.7	233.9	314.5	4.4	4.5	4.7	4.7	4.6	5.9	3.9	4.5	5.1	4.5	4.8	3.9
东亚和南亚	467.3	834.7	856.2	15.2	12.4	11.7	10.9	10.5	9.2	19.8	19.4	20.5	18.3	10.8	10.3
西亚	101.2	150	171.4	3.3	2.8	2.5	5.2	4.0	3.9	2.8	2.6	2.7	2.7	1.5	1.3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29.6	39.6	37.5	1.0	1.0	0.6	1.5	1.3	1.2	0.8	1.0	0.6	0.7	0.7	0.8
最不发达国家	27.4	35.7	34	1.0	1.0	0.7	1.6	1.4	1.1	1.7	1.0	1.0	2.7	0.5	0.3

表 A.16 (续)															
进口国家类别	总额			制成品											
				其中											
				纺织品			化学品			机械和运输			金属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1990	1995	2001
世界 (十亿美元)	1 992.0	3 773.2	4 504.9	178.2	321.3	346.1	236.4	468.0	576.5	953.1	1881.2	2364.1	152.7	258.7	235.2
世界 (百分比份额)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经济体	68.0	68.1	70.4	69.5	68.1	71.0	61.6	67.3	69.7	66.8	66.5	68.9	63.9	66.8	67.6
转型经济体 ^a	4.2	3.6	4.0	2.6	4.9	4.1	4.4	4.1	4.6	5.1	3.1	3.7	4.4	3.2	5.3
发展中国家	27.9	28.4	25.6	27.9	27.0	24.9	34.0	28.6	25.6	28.1	30.4	27.4	31.7	30.0	27.2
非洲	3.6	2.2	1.5	2.5	2.4	2.1	4.5	2.5	1.5	4.0	2.3	1.5	3.2	2.0	1.5
拉丁美洲	3.8	4.9	5.6	2.1	4.0	5.5	5.9	5.7	6.6	4.0	5.4	5.8	3.4	3.2	4.3
东亚和南亚	16.9	18.2	15.5	19.8	16.9	14.2	19.4	17.5	14.6	16.9	19.9	17.2	20.0	21.4	17.7
西亚	3.6	3.1	3.0	3.5	3.6	3.1	4.1	3.0	2.9	3.2	2.8	3.0	5.0	3.4	3.7
备忘项目：															
撒南非洲	1.1	0.8	0.5	0.8	0.7	0.6	1.1	0.8	0.5	1.3	0.8	0.6	0.7	0.6	0.4
最不发达国家	1.0	0.7	0.6	1.2	3.7	3.7	0.9	3.1	3.1	1.1	0.7	0.5	2.2	0.5	0.5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 1995年以来的数据，包括前苏联各国间的贸易流量。1992年之前，这些贸易流量被认为是内部流量。

表 A. 17.

1994-2003 年初级商品价格指数

	非燃料商品 ^a						制成品 出口指 数 ^b	非燃料 商品实 际价格 ^c	备忘项 目： 原油 ^d	
	食品	热带饮 料	植物油 籽和油	农业原 料	矿物和 金属	合并指数				
						美元				特别提 款权
1994	152	91	107	140	124	130	92	99	83	57.5
1995	160	92	118	161	149	143	96	110	82	62.4
1996	170	78	113	145	131	137	96	106	81	75.1
1997	162	104	112	130	131	136	100	99	87	69.2
1998	140	86	120	116	110	118	89	95	78	45.5
1999	114	68	92	104	108	102	76	91	71	64.7
2000	120	59	71	106	121	104	80	87	75	102.2
2001	126	46	65	104	109	101	80	84	76	85.6
2002	121	50	82	97	107	99	78	86	73	90.2
2000 I	114	66	79	101	123	104	77	89	74	95.0
II	117	61	76	105	119	103	79	88	74	99.3
III	122	56	67	111	122	105	82	86	77	109.4
IV	128	52	63	108	119	105	83	84	79	104.9
2001 I	133	50	61	110	118	107	84	87	77	88.7
II	127	48	60	106	114	102	82	84	77	96.5
III	127	44	73	106	105	101	80	84	76	90.5
IV	119	42	70	95	101	94	75	83	72	67.2
2002 I	119	47	71	93	107	96	78	82	74	72.2
II	120	48	78	96	109	98	78	84	74	92.3
III	120	51	86	100	105	100	76	87	72	97.9
IV	126	55	92	99	107	103	78	89	73	98.0
2003 I	129	56	93	107	112	107	79	177.

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商品价格月报》；联合国，《统计月报》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公报》。

^a 所有非燃料商品指数以 1985 年为依据。^b 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指数（1990 年为基准年）。^c 美元非燃料商品价格合并指数减去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d 石油输出国组织一揽子七种原油的综合价格。

表 A. 18.

1994-2003 年世界石油的供应、需求和价格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世界石油供应量 ^{a,b} (每天百万桶)	68.4	70.1	72.0	74.3	75.5	74.1	76.8	76.8	76.6	79.4
发达经济体	17.6	18.0	18.4	18.6	18.4	18.1	18.5	18.3	18.3	18.6
转型经济体	7.5	7.3	7.3	7.4	7.5	7.7	8.1	8.7	9.6	10.2
发展中国家	41.9	43.3	44.8	46.7	48.0	46.7	48.5	48.0	46.9	48.8
欧佩克 ^c	27.3	27.7	28.4	29.9	30.8	29.4	30.7	30.1	28.5	30.0
非欧佩克 ^d	14.6	15.7	16.4	16.8	17.1	17.3	17.8	17.9	18.4	18.8
加工增加量 ^e	1.4	1.5	1.5	1.6	1.6	1.7	1.7	1.7	1.8	1.8
世界需求总量 ^f	68.9	69.9	71.6	73.1	73.5	75.3	76.2	76.5	76.9	78.0
石油价格(美元/桶)										
欧佩克一揽子	15.53	16.86	20.29	18.68	12.28	17.47	27.60	23.13	24.36	26.00
布伦特油	15.83	17.06	20.45	19.12	12.72	17.81	28.27	24.42	24.97	28.00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能源机构，《石油市场月报》，各期；中东经济概览；<http://www.mees.com/Energy-Tables/basket.htm> (2003年4月30日访问)。

^a 包括原油、冷凝液、天然气液体、非传统来源油料和其他供应来源。

^b 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不符。

^c 能源信息局（美国能源部）提供2003年数据。

^d 1993年起包括厄瓜多尔，其中包括中立区，1995年起不包括加蓬。

^e 精炼加工的净损益额（不包括转型经济体和中国的净损益）和海洋运输损失额。

^f 包括炼油厂交货/原始库存和海上贮槽以及炼油厂燃料和非传统油料。

三. 国际金融和金融市场

表 A. 19.

1994-2002 年按国家类别列示的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

十亿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	2002 ^b
发达国家	15.0	54.1	39.3	86.2	-28.6	-164.1	-274.1	-244.6	-275.0
欧元区	20.5	56.3	80.7	100.8	63.8	24.9	-21.8	10.6	64.7
日本	130.3	111.0	65.8	96.8	118.7	114.6	119.7	87.8	112.9
美国	-118.2	-105.8	-117.8	-128.4	-203.9	-292.9	-410.3	-393.4	-503.5
发展中国家 ^c	-71.9	-97.0	-70.6	-43.8	-11.3	66.4	122.6	99.8	163.4
燃料净出口国	-45.5	-16.2	18.6	1.7	-51.5	16.3	99.4	50.5	50.1
燃料净进口国	-26.4	-80.8	-89.2	-45.5	40.2	50.1	23.3	49.3	113.3
净债权国	9.8	20.3	37.5	38.6	8.6	37.9	85.8	81.1	89.2
净债务国	-81.7	-117.3	-108.1	-82.4	-19.9	28.5	36.8	18.7	74.2
转型经济体	1.3	-4.4	-12.9	-27.7	-29.0	-2.1	27.2	14.5	10.2
中欧和东欧	-3.3	-7.4	-16.7	-19.3	-19.4	-23.8	-19.6	-17.4	-21.4
独立国家联合体	4.6	3.8	5.2	-6.5	-7.2	23.8	48.2	33.5	33.8
世界其他国家 ^d	55.6	47.3	44.2	-14.7	68.9	99.9	124.3	130.3	101.5
贸易系额	-96.5	-114.4	-101.9	-117.4	-80.3	-52.2	-29.0	-12.2	-59.6

资料来源：联合国，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数据。

注：由于四舍五入，主要国家类别的总数可能不符。

^a 部分为估计数。

^b 初步估计数。

^c 95 个经济体。

^d 未报的贸易、服务、收入和转移，以及所报数据存在的错误和时间安排的不对称。

表 A. 20.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发达经济体的状况

十亿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
所有发达经济体 ^b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2 871.1	3 434.8	3 528.8	3 616.5	3 644.6	3 711.6	3 970.8	3 824.2	3 901.7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 777.1	-3 312.1	-3 436.1	-3 520.6	-3 617.8	-3 821.2	-4 207.3	-4 024.8	-4 098.0
贸易差额	94.0	122.8	92.6	95.9	26.8	-109.6	-236.5	-200.7	-196.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78.9	-68.7	-53.3	-9.7	-55.4	-54.6	-37.6	-44.0	-78.7
净投资收入	0.4	11.7	17.5	38.2	21.6	29.3	53.3	45.8	23.7
往来差额	15.0	54.1	39.3	86.2	-28.6	-164.1	-274.1	-244.6	-275.0
主要工业化国家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2 117.6	2 477.7	2 537.5	2 626.7	2 626.9	2 684.7	2 890.9	2 750.7	2 781.7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 049.5	-2 396.5	-2 494.7	-2 586.0	-2 623.0	-2 810.9	-3 159.9	-3 004.3	-3 044.9
贸易差额	68.1	81.1	42.8	40.7	-5.1	-126.1	-269.0	-253.6	-263.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79.6	-77.6	-52.3	-15.9	-44.2	-58.5	-37.5	-26.8	-58.6
净投资收入	30.8	30.3	44.8	56.0	49.7	48.9	76.0	83.3	57.7
往来差额	-11.5	3.6	-9.5	24.7	-49.3	-184.6	-306.5	-280.4	-321.9
欧元区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1 324.0	1 653.1	1 688.3	1 668.0	1 766.2	1 757.2	1 790.4	1 813.5	1 895.9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1 234.0	-1 527.3	-1 540.2	-1 515.7	-1 616.0	-1 651.9	-1 734.6	-1 704.2	-1 739.9
贸易	90.0	125.8	148.1	152.3	150.2	105.3	55.8	109.3	156.0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69.5	-69.5	-67.5	-51.5	-86.4	-80.4	-77.6	-98.7	-91.3
净投资收入	-31.9	-32.5	-31.1	-23.7	-45.5	-38.5	-35.9	-49.0	-63.6
往来差额	20.5	56.3	80.7	100.8	63.8	24.9	-21.8	10.6	64.7
日本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385.7	428.7	400.3	409.2	374.0	403.7	459.5	383.6	394.9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41.5	-296.9	-316.7	-307.6	-251.7	-280.4	-342.8	-313.4	-301.3
贸易差额	144.2	131.8	83.6	101.6	122.4	123.3	116.7	70.2	93.6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13.9	-20.7	-17.8	-4.8	-3.6	-8.7	2.9	17.6	19.2
净投资收入	40.9	45.0	53.5	58.2	54.6	57.5	60.4	69.3	66.0
往来差额	130.3	111.0	65.8	96.8	118.7	114.6	119.7	87.8	112.9
美国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504.9	577.1	614.0	680.3	672.4	686.3	774.6	721.8	685.4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668.7	-749.4	-803.1	-876.5	-917.1	-1 030.0	-1 224.4	-1 146.0	-1 167.0
贸易差额	-163.8	-172.3	-189.1	-196.2	-244.7	-343.7	-449.8	-424.2	-481.6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45.6	66.5	71.3	67.8	40.9	50.8	39.5	30.8	-21.9
净投资收入	21.1	29.1	28.6	25.1	12.7	23.9	27.7	20.5	-1.2
往来差额	-118.2	-105.8	-117.8	-128.4	-203.9	-292.9	-410.3	-393.4	-503.5

资料来源：联合国，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的数据。

^a 初步估计数。^b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可能不符。

表 A. 21.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转型经济体的状况

十亿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	2002 ^b
转型经济体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172.0	218.4	234.6	245.1	236.5	232.9	291.5	306.4	339.0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168.9	-220.5	-252.4	-272.8	-266.2	-234.9	-263.1	-292.4	-326.1
贸易差额	3.1	-2.2	-17.7	-27.7	-29.7	-1.9	28.4	14.1	12.9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1.8	-2.2	4.8	0.0	0.6	-0.2	-1.2	0.5	-2.7
净额									
净投资收入	-6.5	-7.8	-9.8	-13.8	-18.4	-15.1	-15.8	-12.7	-14.7
往来差额	1.3	-4.4	-12.9	-27.7	-29.0	-2.1	27.2	14.5	10.2
独立国家联合体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95.0	115.6	126.0	124.3	106.7	107.6	146.3	145.0	154.7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81.7	-99.8	-112.6	-117.9	-98.5	-73.3	-83.9	-96.4	-106.4
贸易差额	13.3	15.8	13.4	6.4	8.1	34.3	62.4	48.7	48.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8.7	-12.0	-8.2	-12.9	-15.3	-10.6	-14.2	-15.1	-14.5
净额									
净投资收入	-1.8	-3.3	-5.9	-9.4	-13.0	-9.4	-9.5	-6.4	-6.4
往来差额	4.6	3.8	5.2	-6.5	-7.2	23.8	48.2	33.5	33.8
俄罗斯联邦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67.4	82.4	89.7	86.9	74.4	75.5	105.0	101.9	107.2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50.5	-62.6	-68.1	-72.0	-58.0	-39.5	-44.9	-53.8	-61.0
贸易差额	16.9	19.8	21.6	14.9	16.4	36.0	60.2	48.1	46.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9.1	-12.9	-10.7	-15.0	-16.2	-11.4	-13.3	-13.2	-13.5
净额									
净投资收入	-1.7	-3.1	-5.0	-8.4	-11.6	-7.9	-7.0	-4.1	-4.3
往来差额	7.8	7.0	10.8	-0.1	0.2	24.6	46.8	35.0	32.8
波罗的海国家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4.3	5.8	6.7	8.3	8.7	7.5	9.4	10.4	12.1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5.1	-7.7	-9.4	-11.4	-12.4	-10.8	-12.3	-13.7	-16.0
贸易差额	-0.9	-1.9	-2.7	-3.1	-3.8	-3.3	-2.9	-3.2	-3.9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0.8	1.2	1.3	1.2	1.3	1.2	1.5	1.6	1.7
净额									
净投资收入	-	-	-0.1	-0.3	-0.3	-0.4	-0.5	-0.6	-0.6
往来差额	-0.1	-0.8	-1.4	-1.9	-2.4	-2.1	-1.5	-1.6	-2.2

表 A. 21. (续)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	2002 ^b
中欧和东欧 ^c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72.8	97.0	102.0	112.5	121.2	117.9	135.8	151.0	172.2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82.1	-113.1	-130.4	-143.4	-155.2	-150.8	-166.8	-182.3	-203.7
贸易差额	-9.4	-16.0	-28.4	-30.9	-34.0	-33.0	-31.0	-31.4	-31.5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6.1	8.7	11.7	11.6	14.6	9.2	11.5	14.0	10.1
净额									
净投资收入	-4.7	-4.5	-3.8	-4.0	-5.1	-5.3	-5.8	-5.8	-7.6
往来差额	-3.3	-7.4	-16.7	-19.3	-19.4	-23.8	-19.6	-17.4	-21.4
中欧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55.5	76.3	80.9	90.7	98.9	97.0	111.4	125.1	142.8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61.5	-85.3	-99.6	-110.3	-119.9	-118.5	-130.6	-140.6	-155.6
贸易差额	-6.0	-8.9	-18.8	-19.6	-21.0	-21.5	-19.2	-15.5	-12.8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3.3	6.2	7.6	7.3	8.2	3.6	3.9	4.7	-0.1
净额									
净投资收入	-4.2	-3.8	-3.0	-3.2	-4.0	-4.1	-4.6	-4.4	-5.8
往来差额	-2.7	-2.7	-11.1	-12.3	-12.8	-17.9	-15.3	-10.8	-12.9
南欧和东欧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17.3	20.7	21.1	21.8	22.3	20.9	24.4	25.9	29.4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0.7	-27.8	-30.8	-33.1	-35.3	-32.3	-36.3	-41.7	-48.2
贸易差额	-3.4	-7.1	-9.7	-11.3	-13.0	-11.5	-11.8	-15.8	-18.8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	2.8	2.5	4.7	4.1	6.4	5.6	7.5	9.4	10.3
净额									
净投资收入	-0.6	-0.7	-0.9	-0.8	-1.1	-1.2	-1.2	-1.4	-1.5
往来差额	-0.6	-4.6	-5.0	-7.3	-6.7	-5.8	-4.4	-6.4	-8.5

资料来源：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经委会的数据。

^a 部分为估计数。

^b 初步估计数。

^c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相加可能不符。

表 A. 22.

经常项目交易：1994-2002 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状况

十亿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	2002 ^b
发展中经济体 ^c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1 189.5	1 430.9	1 576.4	1 684.7	1 557.4	1 687.1	2 085.3	1 950.0	2 073.0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1 190.0	-1 437.0	-1 549.4	-1 635.5	-1 474.3	-1 523.3	-1 848.2	-1 751.2	-1 829.9
贸易差额	-0.5	-6.1	27.0	49.2	83.1	163.8	237.1	198.7	243.1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71.4	-90.8	-97.6	-93.0	-94.4	-97.4	-114.5	-98.9	-79.7
净投资收入	-68.2	-83.5	-90.3	-88.8	-97.7	-99.4	-105.9	-104.4	-107.4
往来差额	-71.9	-97.0	-70.6	-43.8	-11.3	66.4	122.6	99.8	163.4
净燃料出口国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293.9	345.9	413.5	438.3	374.4	446.4	616.8	561.6	564.4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60.6	-284.4	-309.0	-347.5	-349.7	-353.2	-418.7	-420.6	-423.9
贸易差额	33.4	61.5	104.5	90.7	24.7	93.2	198.1	141.0	140.6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78.8	-77.7	-85.9	-89.0	-76.2	-76.8	-98.7	-90.5	-90.5
净投资收入	-25.6	-24.3	-26.2	-23.1	-24.1	-25.8	-30.2	-30.1	-31.2
往来差额	-45.5	-16.2	18.6	1.7	-51.5	16.3	99.4	50.5	50.1
净燃料出口国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895.6	1 084.9	1 162.9	1 246.4	1 183.0	1 240.7	1 468.6	1 388.4	1 508.5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929.5	-1 152.6	-1 240.4	-1 288.0	-1 124.6	-1 170.1	-1 429.5	-1 330.6	-1 406.0
贸易差额	-33.9	-67.6	-77.5	-41.6	58.4	70.6	39.0	57.7	102.5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7.5	-13.2	-11.7	-4.0	-18.2	-20.5	-15.8	-8.5	10.8
净投资收入	-42.6	-59.2	-64.1	-65.7	-73.5	-73.6	-75.7	-74.3	-76.2
往来差额	-26.4	-80.8	-89.2	-45.5	40.2	50.1	23.3	49.3	113.3
净债权国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290.2	342.4	380.3	386.6	320.9	360.4	474.1	417.8	429.3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243.5	-289.2	-298.1	-314.1	-275.7	-283.5	-339.7	-294.0	-299.6
贸易差额	46.7	53.2	82.1	72.5	45.2	76.9	134.4	123.7	129.7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36.9	-32.9	-44.6	-33.9	-36.6	-39.0	-48.6	-42.7	-40.6
净投资收入	9.8	14.2	12.8	18.5	15.6	-17.0	17.2	15.4	1.1
往来差额	9.8	20.3	37.5	38.6	8.6	37.9	85.8	81.1	89.2
净债务国									
货物：出口（离岸价格）	899.3	1 088.4	1 196.1	1 298.1	1 236.5	1 326.7	1 611.2	1 532.2	1 643.7
货物：进口（离岸价格）	-946.5	-1 147.8	-1 251.3	-1 321.5	-1 198.6	-1 239.8	-1 508.6	-1 457.2	-1 530.3
贸易差额	-47.2	-59.4	-55.1	-23.3	37.9	86.9	102.7	75.0	113.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34.5	-57.9	-53.0	-59.1	-57.8	-58.3	-65.9	-56.3	-39.1
净投资收入	-78.0	-97.7	-103.0	-107.2	-113.3	-116.4	-123.1	-119.8	-108.5
往来差额	-81.7	-117.3	-108.1	-82.4	-19.9	28.5	36.8	18.7	74.2

表 A. 22. (续)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	2002 ^b
按区域总计:									
拉丁美洲									
货物: 出口 (离岸价格)	193.8	236.0	264.1	293.2	289.3	305.6	366.1	352.0	353.6
货物: 进口 (离岸价格)	-207.8	-234.9	-261.8	-309.7	-328.2	-316.2	-366.7	-359.2	-334.4
贸易差额	-14.0	1.0	2.3	-16.5	-38.9	-10.6	-0.6	-7.2	19.2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37.4	-39.2	-41.0	-49.5	-49.8	-44.2	-46.8	-45.4	-34.4
净投资收入	-37.9	-42.6	-44.6	-49.4	-52.9	-52.6	-54.3	-55.9	-53.4
往来差额	-51.3	-38.1	-38.7	-66.0	-88.7	-54.8	-47.4	-52.6	-15.2
非洲									
货物: 出口 (离岸价格)	95.0	110.6	122.8	124.9	106.3	115.1	150.4	139.6	142.4
货物: 进口 (离岸价格)	-95.5	-111.6	-111.7	-118.3	-118.3	-116.0	-120.5	-122.0	-125.1
贸易差额	-0.5	-1.0	11.0	6.6	-12.0	-0.9	29.9	17.6	17.3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9.5	-11.8	-8.4	-10.9	-8.8	-7.8	-12.1	-9.2	-11.8
净投资收入	-12.0	-12.8	-13.6	-11.8	-10.2	-11.8	-13.3	-13.4	-12.8
往来差额	-10.0	-12.7	2.6	-4.3	-20.8	-8.7	17.8	8.4	5.5
西非									
货物: 出口 (离岸价格)	156.9	176.9	216.0	219.7	178.5	216.3	299.4	277.9	281.9
货物: 进口 (离岸价格)	-137.8	-165.8	-179.9	-188.4	-184.6	-178.7	-210.7	-202.0	-214.7
贸易差额	19.0	11.1	36.2	31.3	-6.1	37.6	88.7	75.9	67.2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27.9	-20.9	-31.1	-26.7	-13.5	-24.6	-32.7	-32.5	-32.4
净投资收入	-3.2	0.2	0.4	1.8	2.3	-1.1	-4.5	-4.8	-3.8
往来差额	-8.9	-9.8	5.0	4.6	-19.6	13.0	56.0	43.4	34.8
东亚和南亚									
货物: 出口 (离岸价格)	743.8	907.4	973.5	1046.9	983.3	1050.1	1269.5	1180.5	1295.1
货物: 进口 (离岸价格)	-748.9	-924.7	-996.0	-1019.1	-843.1	-912.4	-1150.4	-1068.1	-1155.7
贸易差额	-5.1	-17.3	-22.5	27.7	140.1	137.6	119.1	112.4	139.4
服务、收入和经常性转移净额	3.4	-19.0	-17.1	-5.9	-22.3	-20.7	-22.9	-11.8	-1.1
净投资收入	-15.1	-28.4	-32.4	-29.3	-36.8	-33.8	-33.8	-30.4	-37.4
往来差额	-1.7	-36.3	-39.6	21.8	117.8	117.0	96.2	100.6	138.3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和国家官方来源和其他来源的数据。

^a 部分估计。

^b 初步估计数。

^c 95 个经济体。由于四舍五入, 总数可能不符。

表 A. 23.

1993-2002 年按贷款列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净额

十亿美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经常性贷款	-0.2	-0.8	12.5	-2.6	13.0	14.1	-9.8	-6.5	17.6	15.3
偿还条件										
3 ¹ / ₄ -5 年（信贷档） ^a	-0.2	0.1	12.4	-1.4	13.6	11.2	-9.6	-5.8	18.5	15.2
3 ¹ / ₂ -7 年（补充融资贷款机制/扩大贷款政策） ^b	-1.5	-1.4	-1.6	-1.3	-0.7	-0.1	0.0	0.0	0.0	-0.1
4 ¹ / ₂ -10 年（扩大基金贷款机制）	1.5	0.5	1.8	0.1	0.2	3.1	-0.2	-0.7	-0.9	0.2
优惠贷款	0.2	0.9	1.5	0.2	-0.1	0.2	0.1	-0.2	0.0	-0.1
信托基金 ^c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结构调整款 ^d	-0.1	-0.2	-0.1	-0.4	-0.3	-0.2	-0.2	-0.1	-0.1	-0.3
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扶贫和增长贷款 ^d	0.4	1.1	1.6	0.5	0.2	0.4	0.2	-0.1	0.1	0.2
其他贷款 ^e	-0.2	-0.9	-1.6	-0.7	-0.9	-0.7	0.7	0.0	0.0	-0.3
补偿性融资	-0.2	-0.9	-1.6	-0.7	-0.9	-0.7	0.7	0.0	0.0	-0.3
体制转轨贷款 ^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共计	-0.2	-0.7	12.5	-3.1	12.0	13.7	-9.0	-6.7	17.6	15.0
备忘项目：										
贷款协定的某些特点										
全年提出的数目	13	26	18	20	14	15	16	18	12	15
平均长度（月）	24	25	23	29	33	29	32	28	22	29
承付总数（十亿美元）	3.0	6.6	23.2	5.2	38.4	29.5	13.0	22.1	24.2	50.8

资料来源：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货币基金组织概览》。

^a 基本备用安排，包括补充储备贷款（1997 年 12 月设立），当突然发生具有破坏性的市场信心丧失导致对资本账户和储备的压力而产生巨额短期融资需要时取用（比定期提取成本更高、期限更短）；补充备用或长期安排的承诺，最高不超过一年，分两档和多档提取。还包括自然灾害紧急援助和自 1995 年开始的冲突后状态紧急援助。

^b 补充融资贷款机制（1979—1981 年）和扩大贷款政策（1981—1992 年）从货币基金组织向成员国借得的基金提供资源。货币基金组织所支付的利息要比在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净债权国地位的国家所获的报酬高。因此，补充融资贷款机制和扩大贷款政策资源的用户所付的利息要比提取普通资源高，后者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然而，补充融资贷款机制下的利息款部分由有资格向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的国家补贴，而扩大贷款政策提款没有补贴）。

^c 主要利用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所得的资金，1977—1981 年期间，信托基金按照一年调整规划放款。合格标准按照人均收入最高标准决定，贷款 10 年期满，从第六年开始偿还，利率为每年 0.5%。

^d 结构调整贷款和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前者主要从信托基金回收资金融资，而后者由贷款和赠款融资）向长期存在国际收支问题的国际开发协会合格国家提供贷款；资金分三年拨付（根据政策框架文件安排）；从第 5.5 年开始偿还，10 年结束；利率为 0.5%。1999 年 11 月 22 日，此项贷款被重新命名为扶贫和增长贷款，目前用于支助《扶贫战略文件》中载述的政策改革。

^e 1963—1988 年为补偿贷款办法；自 1988 年 8 月为补偿和应急贷款办法；2000 年 2 月起恢复为补偿贷款办法（偿还条件与信贷档相同）。

^f 见下表 A.24 的说明。

表 A. 24.

1993-2002 年按贷款列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转型经济体的贷款净额

十亿美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经常性贷款	0.1	0.2	4.4	3.7	2.1	3.0	-3.0	-3.1	-0.7	-0.9
偿还条件										
3 ¹ / ₄ -5 年 (信贷档)	0.1	0.5	4.9	1.2	0.0	-0.8	-3.1	-3.2	-0.6	-0.1
3 ¹ / ₂ -7 年 (补充融资贷款机制/扩大贷款政策)	0.0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 ¹ / ₂ -10 年 (扩展基金贷款机制)	0.0	0.0	-0.5	2.6	2.2	3.9	0.1	0.2	0.0	-0.8
优惠贷款 (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	0.0	0.0	0.1	0.2	0.2	0.2	0.1	0.1	0.1	0.0
其他贷款										
补偿性融资	0.0	-0.7	-0.6	-0.2	0.1	2.9	0.1	0.0	-2.8	-0.1
体制转轨贷款 ^a	2.0	2.8	0.9	0.0	0.0	-0.5	-0.8	-1.1	-0.8	-1.0
共计	2.1	2.3	4.8	3.7	2.4	5.6	-3.6	-4.1	-4.1	-1.8
备忘项目：										
贷款协定的某些特点										
全年提出的数目	9	8	12	12	7	6	4	5	9	5
平均长度 (月)	18	18	13	28	21	32	19	28	25	27
承付总数 (十亿美元)	1.6	2.1	9.2	13.2	2.1	3.4	5.6	0.3	1.5	1.4

资料来源：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a 体制转轨贷款于 1993 年 4 月设立，1995 年 12 月停止新的提取业务，协助由于以前的贸易安排中断引起严重国际收支问题的转型经济体。对于还没有做出备用安排的成员国，可以分两档提取，以支持政策改革意向书面声明。假定争取更高的信贷档已经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第二档可在第一档之后 6-18 个月提取（偿还条件与扩展基金贷款相同）。关于其他贷款的说明见上文表 A. 23。

表 A. 25.

1982-2001 年按类别列示的主要来源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

捐助集团或国家	官方发展援助增长率 ^a (2000 年价格和汇率)		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比	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百万美元)	2001 年按类别划分的官方发展援助百分比分配					
	1982-1991	1992-2001	2001	2001	双边			多边		
					赠款 ^b	技术合作	贷款	联合国	国际开发协会	其他
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合计	2.84	-0.50	0.22	52 336	63.8	26.0	3.1	10.0	6.8	16.3
欧盟合计	3.34	-0.33	0.33	26 290	61.7	19.9	-1.8	8.8	6.4	24.9
奥地利	3.03	1.03	0.29	533	62.7	16.7	1.3	3.4	4.7	27.8
比利时	0.04	0.56	0.37	867	58.5	24.7	..	4.2	5.7	32.3
丹麦	4.49	3.81	1.03	1 634	64.1	8.4	-0.9	16.6	3.1	17.1
芬兰	14.17	-5.16	0.32	389	58.9	18.3	-1.0	17.2	8.0	17.2
法国 ^c	5.04	-4.34	0.32	4 198	69.6	31.8	-7.7	2.6	5.5	30.0
德国	1.85	-1.85	0.27	4 990	57.3	31.8	-0.1	9.2	7.0	26.6
希腊	0.17	202	40.1	7.9	0.5	3.0	2.5	53.5
爱尔兰	3.08	14.83	0.33	287	64.1	8.7	2.8	24.0
意大利	8.99	-5.88	0.15	1 627	33.6	5.7	-6.4	11.2	14.8	46.9
卢森堡	16.41	15.31	0.82	141	75.2	3.5	..	5.7	2.8	16.3
荷兰	1.03	2.77	0.82	3 172	75.4	20.0	-5.3	14.3	3.6	12.0
葡萄牙	..	3.63	0.25	268	118.1	33.2	-52.0	3.0	0.0	28.7
西班牙	..	4.73	0.30	1 737	50.5	9.0	9.8	2.9	5.6	25.3
瑞典	3.21	1.16	0.81	1 666	67.9	3.9	1.1	16.4	0.0	11.3
联合王国	0.34	3.51	0.32	4 579	56.9	15.2	3.2	7.6	10.2	25.0
澳大利亚	1.02	1.08	0.25	873	75.6	45.9	..	5.8	7.6	10.9
加拿大	3.29	-3.17	0.22	1 533	79.7	22.6	-1.4	8.1	0.0	13.6
日本	4.66	-0.37	0.23	9 847	48.2	19.7	27.6	8.6	8.8	6.9
新西兰	-0.77	2.74	0.25	112	75.9	36.6	..	8.9	3.6	11.6
挪威	5.60	0.86	0.83	1 346	73.2	8.6	0.7	18.2	5.9	6.0
瑞士	5.92	1.52	0.34	908	68.3	11.2	2.2	9.0	9.1	10.8
美国	1.68	-2.61	0.11	11 429	81.3	43.4	-6.9	13.7	6.8	7.1
阿拉伯国家 ^d	490	—	80.6	—	—	19.4	—
沙特阿拉伯	73	—	100.0	—	—	0.0	—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d	265	—	64.9	—	—	35.1	—
大韩民国	—	..	—	—	100.0	—
中国台湾省	—	..	—	—	..	—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经合组织，《发展合作：2002 年报告》（2003 年，巴黎）。

^a 平均年增长率，按 1980—1981 年、1990—1991 年和 2000—2001 年的平均数字计数。

^b 包括技术合作。

^c 不包括从法国流向海外省，即瓜德罗普岛、法属几内亚、马提尼克岛和留尼汪岛的资金。

^d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包括所有赠款和贷款；多边官方发展援助包括联合国、国际发展协会和“其他”，其中包括技术合作。

表 A. 26.

1990-2001 年主要来源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区域分配情况

百万美元，两年平均数										
捐助集团或国家	所有发展中国家		其中：							
			拉丁美洲		非洲		西亚		东亚和南亚 ^a	
	1990-1991	2000-2001	1990-1991	2000-2001	1990-1991	2000-2001	1990-1991	2000-2001	1990-1991	2000-2001
官方发展援助合计 ^b (净额)	59819.4	51004.4	5614.7	5471.3	25307.5	16 020.4	5 642.8	1 777.6	15 117.6	15 429.7
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										
双边	40 967.1	35 538.6	4 522.5	4 148.4	16 322.5	10 190.2	3 604.8	915.9	9 985.0	10 631.8
澳大利亚	738.7	709.2	0.6	0.7	71.9	36.1	2.3	0.2	616.8	590.3
奥地利	367.7	299.2	19.5	46.4	84.5	78.4	52.1	16.1	151.3	63.6
比利时	521.3	490.1	40.6	41.9	293.5	231.7	8.0	0.4	41.5	61.0
加拿大	1 731.1	1 179.8	179.9	124.8	511.9	217.4	27.9	6.9	369.1	190.6
丹麦	690.7	1 029.0	30.9	76.3	329.6	441.0	12.9	4.3	139.3	210.9
芬兰	541.7	220.7	35.5	15.5	281.0	72.9	16.7	4.6	110.5	54.1
法国 ^c	5 691.9	2 712.3	258.8	110.6	3 662.6	1 670.7	144.0	74.9	1092.6	281.7
德国	4 592.9	2 772.9	525.4	340.2	1 752.8	848.9	746.8	232.1	920.3	622.0
希腊	0.0	90.7	0.0	0.4	0.0	2.8	0.0	3.5	0.0	6.5
爱尔兰	26.3	169.6	0.2	6.2	17.4	114.7	0.8	0.5	0.5	11.8
意大利	2 178.5	409.5	406.6	-5.8	1 108.8	218.7	56.4	6.2	93.0	22.9
日本	7 823.4	8 613.0	704.1	768.9	1 354.0	1 158.4	756.0	216.3	4070.1	5 006.2
卢森堡	20.3	102.2	2.6	15.8	10.0	44.6	1.2	0.6	5.0	18.8
荷兰	1 794.4	2 233.6	315.6	206.2	581.5	727.1	50.4	48.4	486.8	414.6
新西兰	81.2	84.8	0.4	2.3	1.1	5.2	0.0	0.1	58.5	74.4
挪威	744.9	937.1	64.9	73.3	412.7	331.6	4.8	27.2	150.0	196.8
葡萄牙	130.8	181.0	0.0	1.3	129.0	112.2	0.0	0.0	0.0	56.8
西班牙	697.1	934.9	243.7	506.6	231.3	125.4	4.5	22.7	135.5	110.9
瑞典	1 427.5	1 223.2	134.7	152.1	740.5	375.2	31.1	11.7	252.4	233.9
瑞士	638.9	636.0	78.7	63.0	269.7	158.5	16.5	12.5	146.8	126.8
联合王国	1 646.4	2 665.6	110.1	193.4	679.2	1 177.7	52.1	28.8	434.3	586.0
美国	8 881.5	7 844.4	1 370.0	1 408.3	3 799.5	2 041.0	1 620.5	189.5	710.5	1 699.7
多边	14 598.5	14 619.6	1 071.1	1 275.3	6 844.2	5 541.4	576.7	639.3	4 974.3	4 406.9
发展援助委员会共计	55 565.6	50 158.3	5593.6	5423.6	23166.7	15731.5	4 181.5	1 555.2	14 959.3	15 038.6
阿拉伯国家										
双边 ^d	652.9	519.0
多边	113.9	131.0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社部，根据经合组织《资金流向受援国的地域分布》计算。

^a 包括中亚转型经济体

^b 由于难以衡量，不包括中央计划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所提供的援助。捐助总额包括提供给某些欧洲国家的数额和未分配的数额，因此要比按区域分列的数额合计高。

^c 不包括从法国流向海外省即瓜德罗普岛、法属几内亚、马提尼克岛和留尼汪岛的资金。

^d 视年份而定，阿拉伯双边援助约有 35—40%未按地域分配。

表 A. 27.
1994—2002 年多边发展机构的资金承付额^a

百万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金融机构	40 656	43 516	44 701	45 760	57 928	42 770	36 882	41 787	38 523
非洲开发银行	1 655	802	823	1 880	1 742	1 765	1 984	2 373	2 039
亚洲开发银行	3 864	5 759	5 878	9 648	6 208	5 158	5 830	5 513	5 700
加勒比开发银行	56	110	99	54	122	153	184	120	129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 232	2 616	2 774	2 625	2 658	2 784	2 901	3 276	4 130
美洲开发银行	5 298	7 454	6 951	6 224	10 403	9 577	5 336	8 067	4 753
美洲投资公司	43	36	72	67	223	190	143	128	123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364	414	447	430	443	434	409	434	390
世界银行集团	27 187	26 361	27 729	24 899	36 352	22 899	20 238	22 004	21 382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16 427	15 950	15 325	15 098	24 687	13 789	10 699	11 709	10 176
国际开发协会	7 282	5 973	6 490	5 345	7 325	5 691	5 861	6 859	8 040
国际金融公司	3 478	4 438	5 914	4 456	4 340	3 419	3 678	3 436	3 166
联合国系统业务机构	3 537	3 931	3 726	3 453	4 290	4 198	3 803	4 690	4 56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b	1 036	1 014	1 231	1 529	1 764	1 632	1 458	1 526	1 493
联合国人口基金	278	340	285	322	326	245	171	236	29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810	1 481	1 133	521	962	891	1 016	1 152	1 188
世界粮食计划署	1 413	1 096	1 077	1 081	1 238	1 430	1 158	1 776	1 592
承付总额	44 193	47 447	48 427	49 213	62 218	46 968	40 685	46 477	43 092
备忘项目：									
承付额按 1990 年购买力单位 ^c	44 639	43 134	45 686	49 710	65 493	51 613	46764	55330	50107

资料来源：个别机构提供的年度报告和资料。

^a 贷款、赠款、技术支助和适当情况下的参与股权；所有数据按日历年分列。

^b 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主管的基金。

^c 按以美元计算的联合国发达经济体成品出口价格指数折算的承付总额：1990=100。

联合国提供下述相关出版物：

《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世界经济趋势和政策（公私互动促进发展）》

《概览》第一部分指出，2001 年，世界经济遇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报告指出，几乎每个国家都受到影响，这说明世界各经济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使 2001 年的衰退雪上加霜，很有可能产生较长期后果，不仅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影响到全球发展。《概览》第一部分除了调查发展速度普遍放慢的原因外，还讨论了 2001 年在就发展问题进一步形成国际共识方面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如在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和墨西哥蒙特雷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

《概览》第二部分审视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生产整个社会可能需要的一些货物和服务时互动关系不断变化的某些方面。报告指出，在所有国家，国家负有一些基本任务，如提供对外防御和维护国内法律和秩序。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本身应当直接生产或提供这类货物和服务，现在已日益认识到，如果私营部门通过各种活动如生产或分配而参与，能够比公营部门单独运营更高效和有效地提供这些货物和服务。不过，如《概览》所指出，私营部门在这类活动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改变了国家的作用，但不一定削弱国家的作用。各国政府继续负有建立法规框架、有效公共机构、税收安排和有助于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和努力的其他措施负有主要责任，尽管各国所采用的方式不同。

出售品编号：E.02.II.C.1 ISBN 92-1-109140-3 页数：325 定价：55.00 美元

《2003 年世界经济状况和前景》

该第五份年度报告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共同编写，它对《2002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关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趋势和政策的第一部分作了更新，审查了 2002 年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产出增长缓慢、通货膨胀温和、利率较低、财政平衡恶化、国际贸易增长率低且不平衡、国际资本流量减少、许多非燃料商品价格降低及股票价格下跌。报告指出，由于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状况可能恶化。因此，促进世界经济有力和持续地恢复增长应作为 2003 年多数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优先事项。

出售品编号：E.03.II.C.2 ISBN 92-1-109144-6 页数：63 定价：10.00 美元

《非洲的能力建设：有效的援助与人力资本—发展政策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2002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

本报告由一个独立专家小组编写，侧重审查对非洲援助的有效性。报告突出说明以持久贫穷、艾滋病流行病和区域冲突激增为表现形式的新旧挑战，强调需要增加对该区域的援助。报告建议采取一项旨在建设受援国能力的战略，敦促非洲国家探讨建立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创新方式。报告还审查了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社会中人和能力促进发展这一主题，以便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参与当代的全球社会，并建议通过采取创新做法大力改革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卫生部门。

出售品编号：E.02.II.A.4 ISBN 92-1-104514-2 页数：76 定价：10.00 美元
